

ГОРБАЧЁВ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 著
述弢 译





戈尔巴乔夫之谜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 著　述　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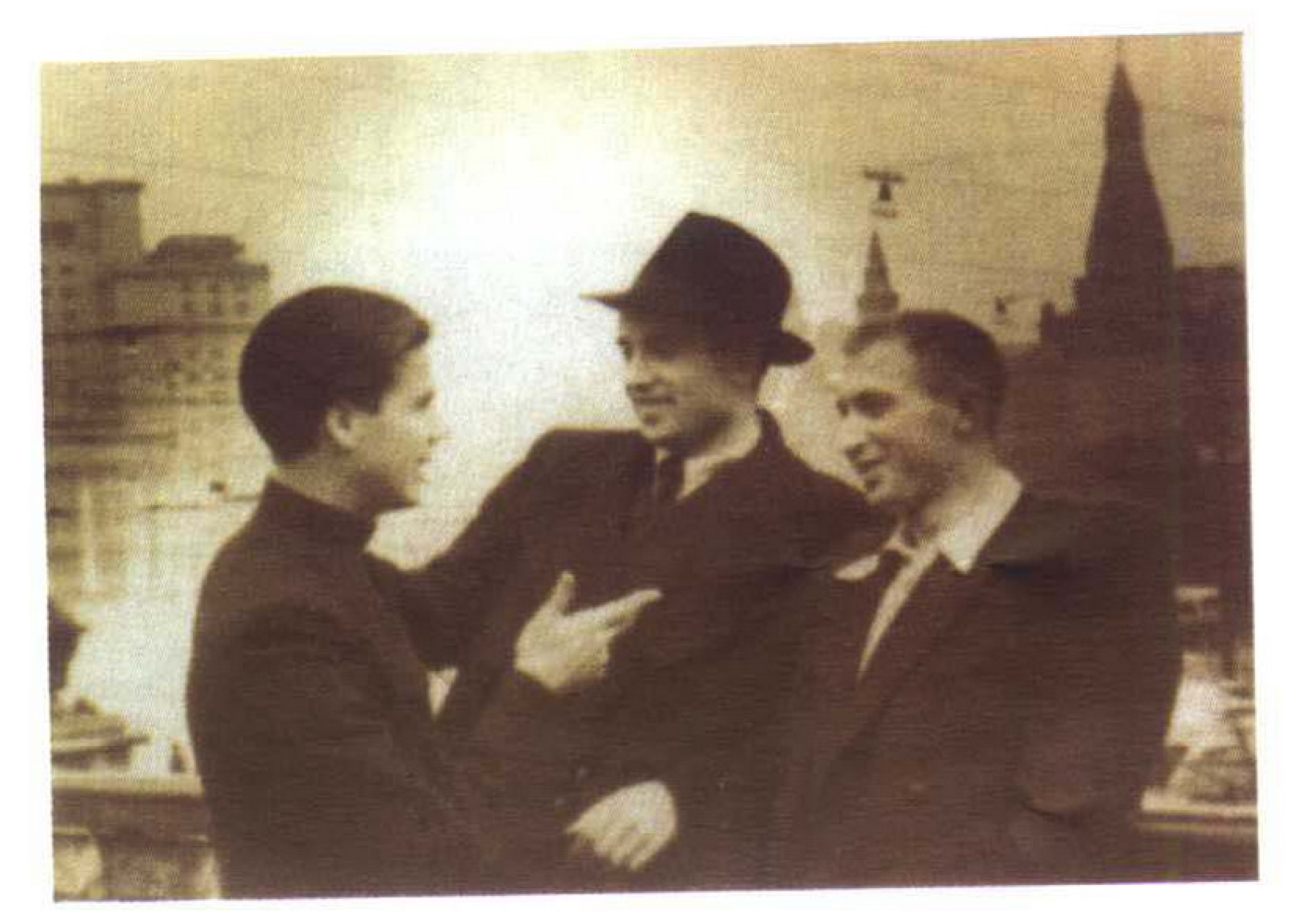
CCTP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2004－48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尔巴乔夫之谜/(俄罗斯)格拉乔夫著；述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
ISBN 7－80211－048－3
Ⅰ.戈...
Ⅱ.①格...②述...
Ⅲ.戈尔巴乔夫－生平事迹
Ⅳ.K835. 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750 号

戈尔巴乔夫之谜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2. 7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 60 元



大学年代



新婚燕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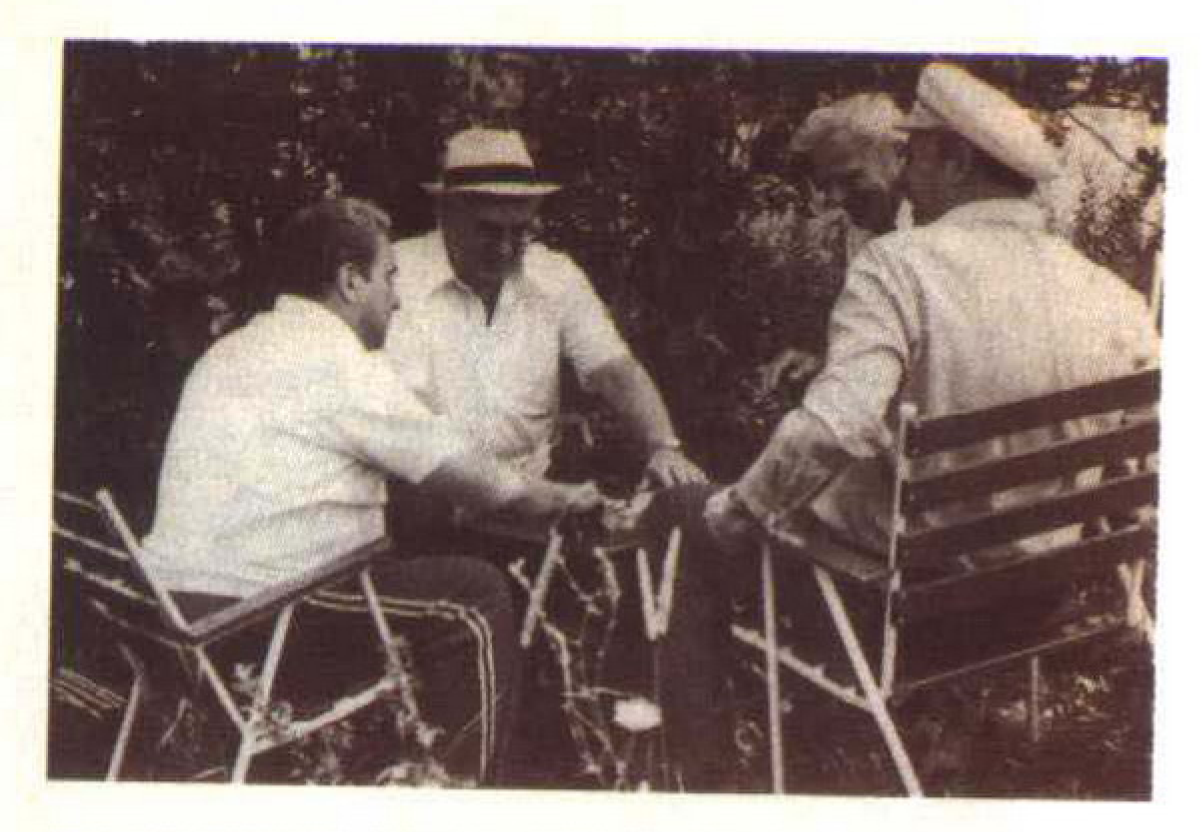
1977年访问法国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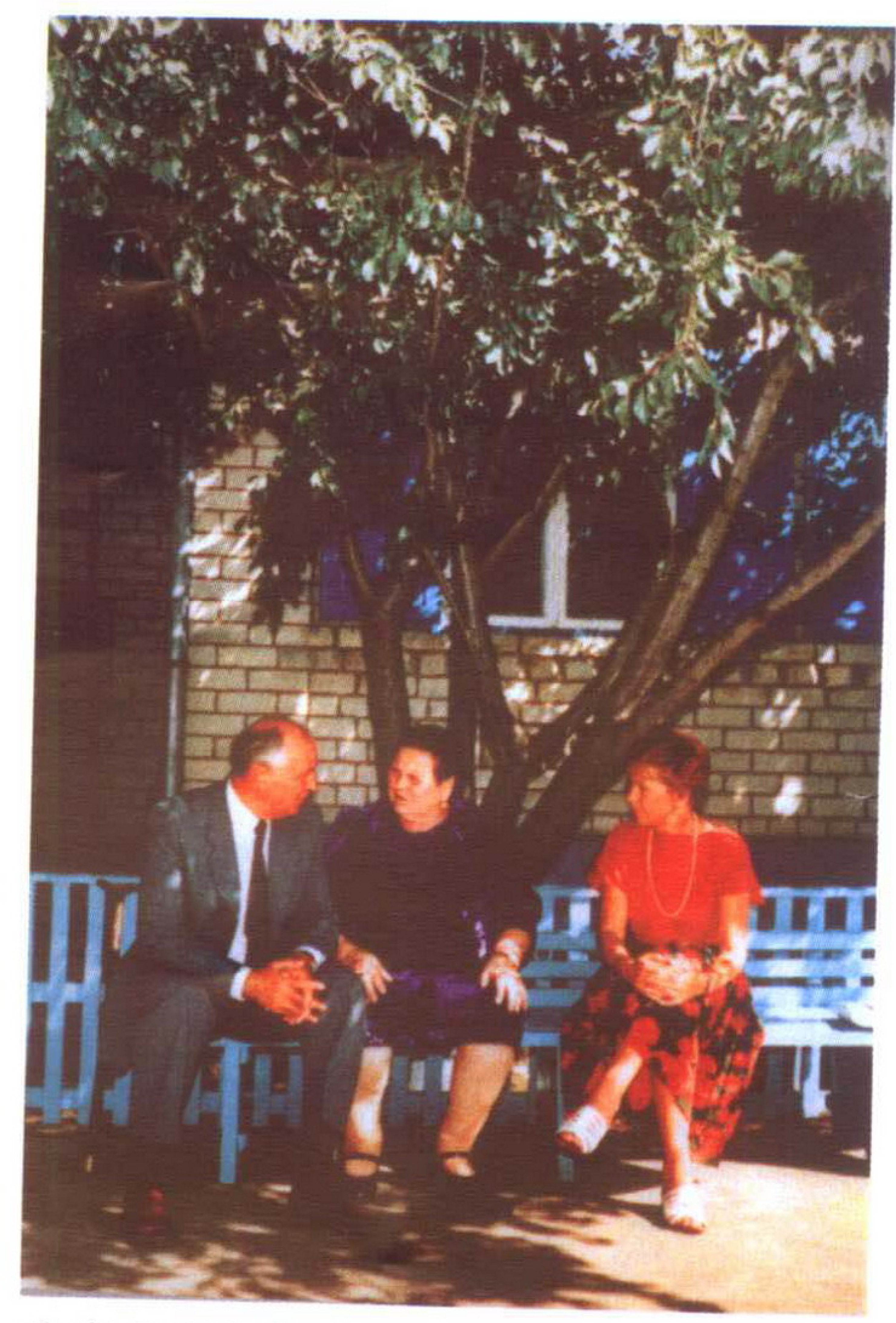
1989年与妻子赖莎合影



其乐融融



同安德罗波夫是牌桌上的老搭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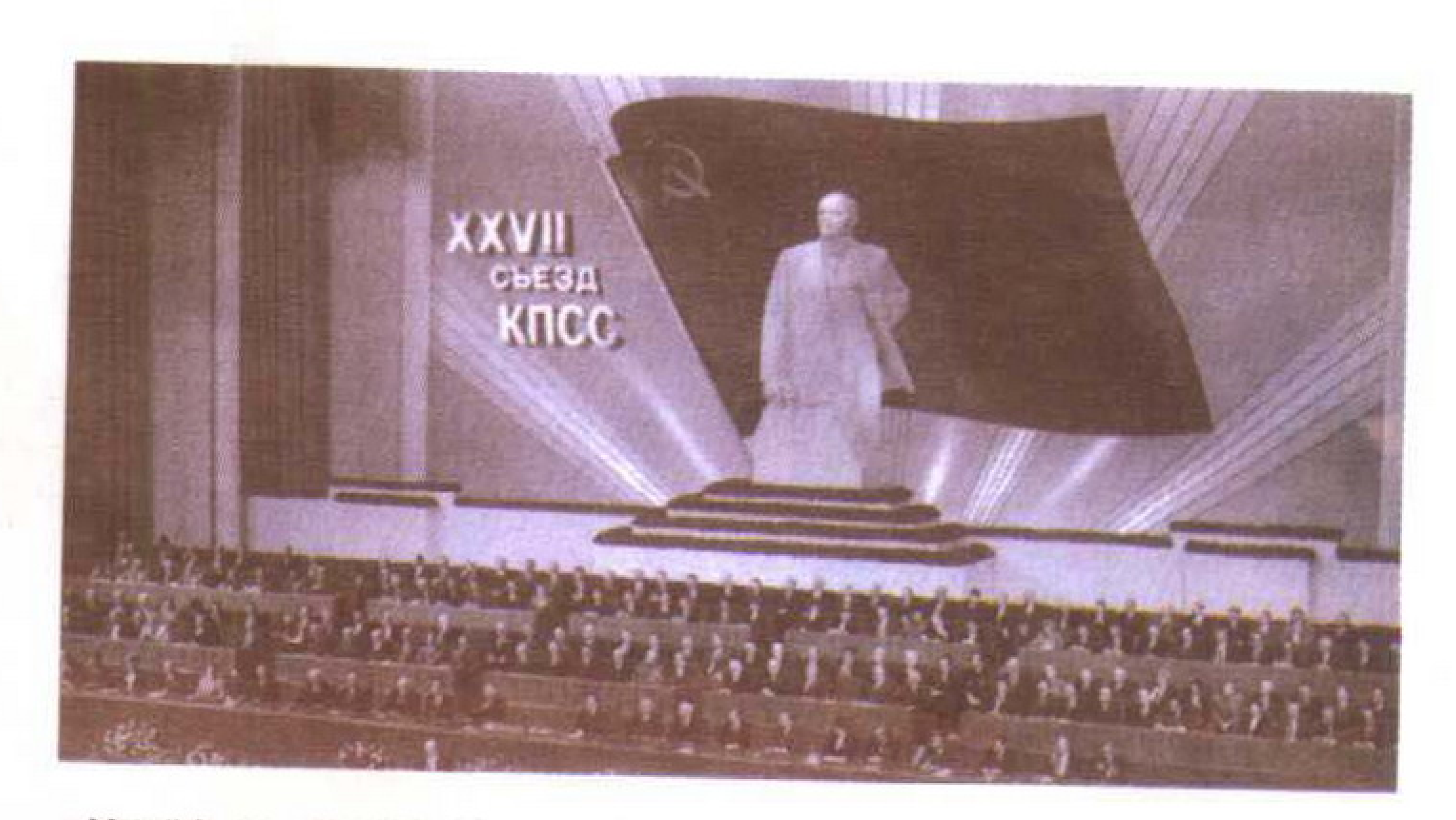
和老母亲拉家常



新当选的总书记走马上任



同美国总统里根在红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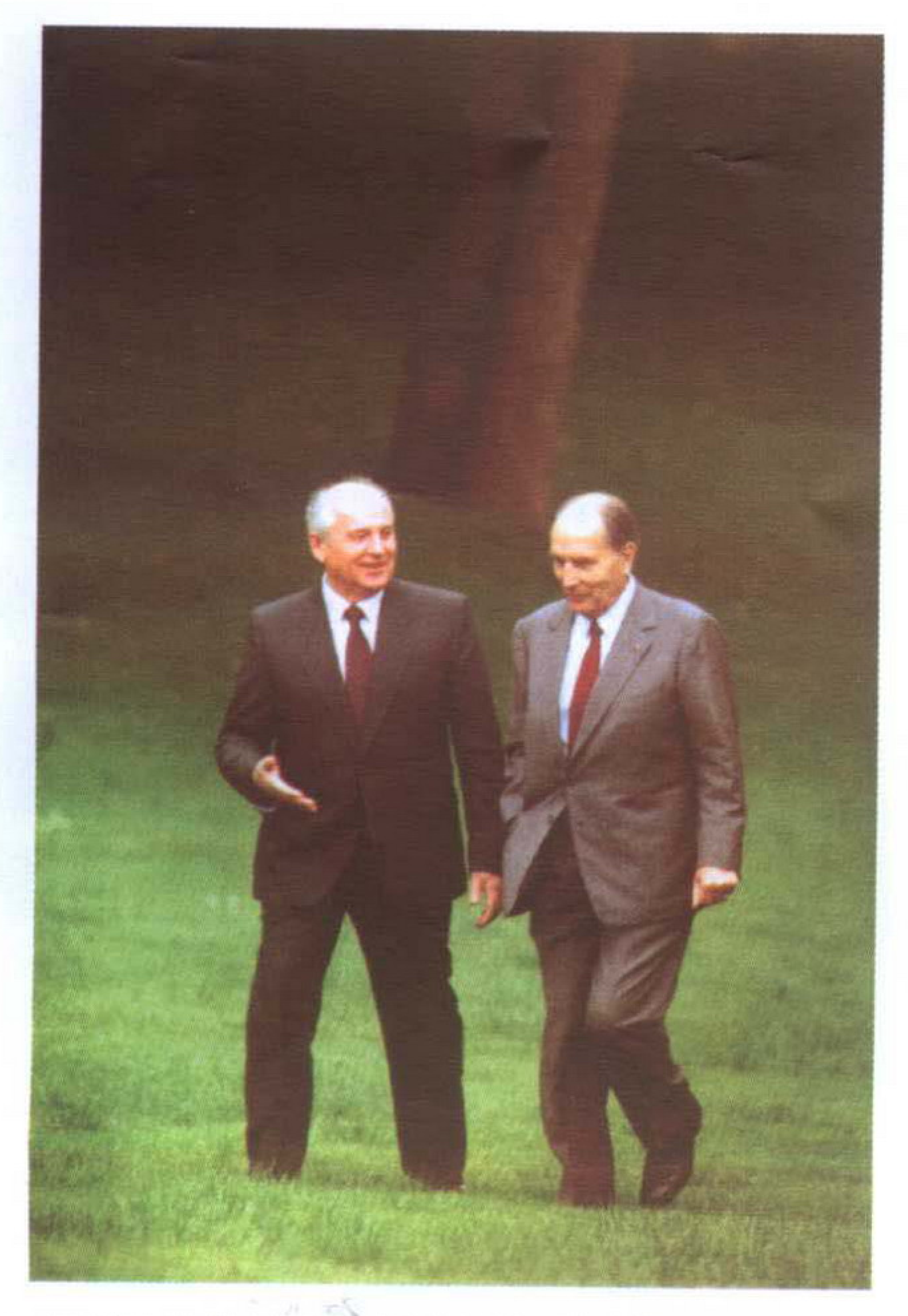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会场



同群众在一起



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乡亲们中间



与法国总统密特朗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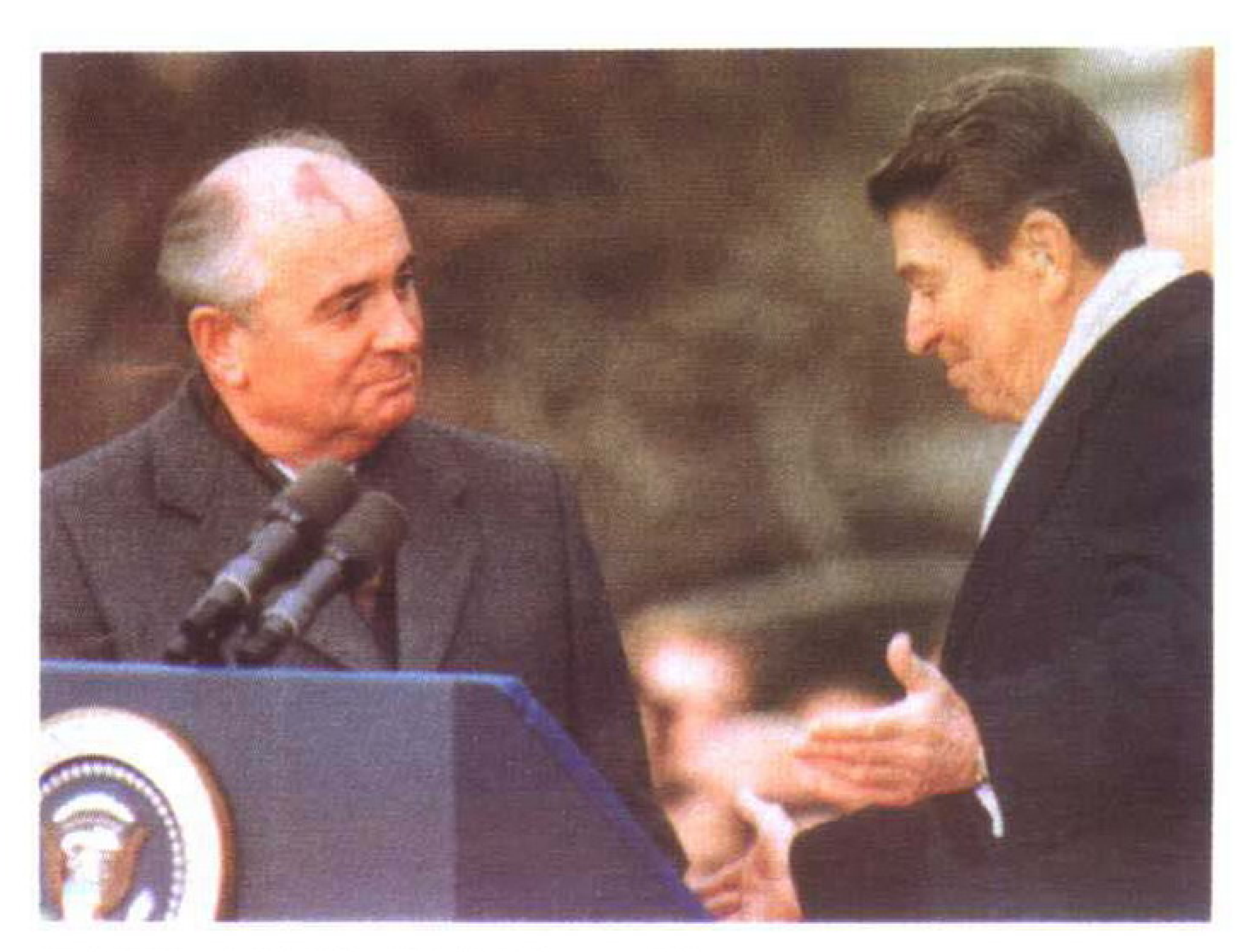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合影



1991年8月22日夜间自被软禁的
福罗斯返回莫斯科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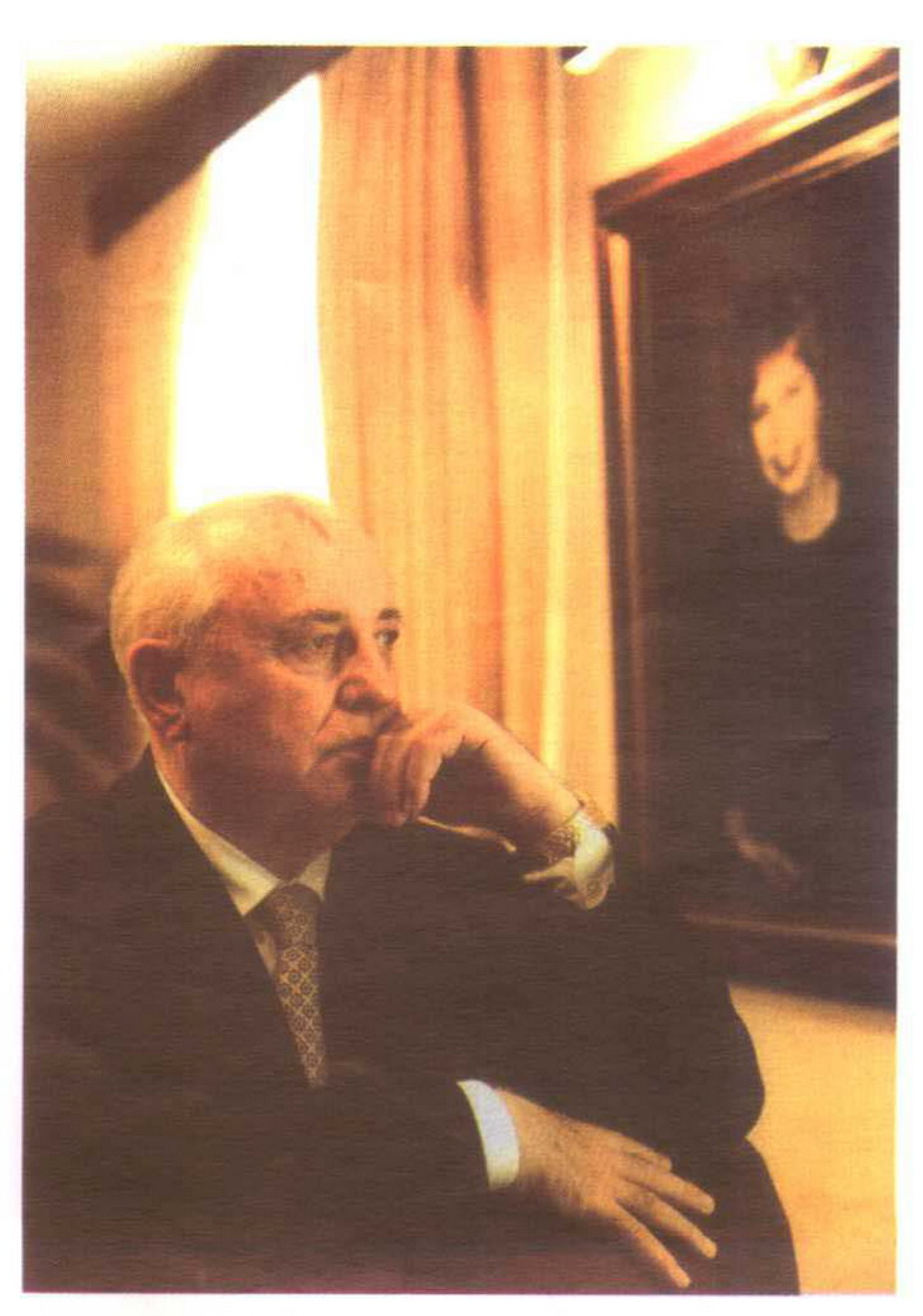
与美国总统里根在一起



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引吭高歌



哀思无限赖莎已去世

译者序

1985年3月，正当盛年的戈尔巴乔夫脱颖而出，一举击败其他对手，荣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可谓如日中天，踌躇满志。上台伊始，即励精图治，倡导改革，并频频出访，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风云人物。

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依然口碑甚佳。通常认为结束冷战的功劳非他莫属。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国内又如何呢？1996年他参与竞选俄罗斯总统，得票数仅为0.59%。他已经完全被人所遗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苏联解体10周年之际，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和最后一任新闻秘书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向世人献出俄国第一本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感受和先前从未公布的大量材料，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即：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戈尔巴乔夫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使世界避免核冲突的救星呢，还是个政治上一知半解、不善于把握国家权力缰绳的执政者？作者向读者提出了自己对于戈尔巴乔夫之谜的解答，并且对于改革时期、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主要人物的作用，悲剧性事件的实质和后果进行了分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方面及其与

西方的“冷”军事对抗方面的必然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苏联体制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要做到闭眼不看事实已是相当不易，只有希望西方千万不要采取足以使可怕的威胁变成现实的步骤。然而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意味着新的一轮更大的军备竞赛，那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于是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为了应对里根的挑战，需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必须设法退出作为冷战战略基础的直接对抗。其次，业已走入绝境的苏联体制本身也要动一动，否则，苏联可能成为世界进程的局外人，最终连本国的国家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采取行动。不过，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却正好选择了改革之路。这绝非偶然。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在戈尔巴乔夫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二十大、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哥穆尔卡和“布拉格之春”。

改革什么？从何入手？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本已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激进改革计划？还是他的政策基本上均系即兴之作、他在投入改革时希望事件进程本身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引退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对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已久，有一个大致的计划，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事件进程来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应当说，他本人对于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都还很模糊。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其详细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至于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则是个崭新的课题。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之前，并未研究过改革社会主义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决心对政治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去掉套在社会头上的恐怖羁绊，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不仅国家的经济，而且整个制度都会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当然，他和他的战友没有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计划。他们

仓促上阵，即兴发挥，还因为受到来自全国民众的压力，人们期待出现奇迹。

改革之初关键性的那几年，戈尔巴乔夫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已显露出来，这个特点最终导致他那尚未建成的改革大厦一朝倾覆。那就是他不愿从事千篇一律的日常工作，几乎到了厌烦的地步。他感到激动和着迷的，是“大事”，宏伟的想法，扭转乾坤的决定，远离日常事务的计划。这样一来，他就处于依赖地位，处处依赖负责解决日常问题的人。1985－1987 年间，他所依赖的是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两人都在他当选总书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利加乔夫成为实际上的第二书记，以书记处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果断地承担起管理党的机关的任务，因而又承担了起草大部分政治决议的任务。授意发表列宁格勒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那篇堪称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的文章，便是利加乔夫的一大杰作。雷日科夫身为总理，实际上将整个经济领域都置于自己的麾下。在他的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连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政治阵地也放弃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与 1991 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当时失去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无法挽回。

后来，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在改革初期的严重失误，是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严重滞后：一是将党一分为二，就是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人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不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且更有甚者，他们在这个领域简直就是在往后倒退。例如，几乎在同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居然产生了两个相互抵触的决定，即《关于鼓励个体劳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同非劳动收入作坚决斗争的决定》，后面这个决定按照过去的传统，规定了私人住房、温室等等的硬性限额。当年作出的种种决定，诸如发展机械制造业的纲要、加快科技进步的措施、创建区农工联合公司或者实行对制成品的国家验收制度的做法等等，都是在复活奄奄一息的行政命令经济，保持这种经济的结构（其中的军事工业过分膨胀）及其赖以生存的规律。

1985年春天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的反酗酒运动，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多么地考虑不周。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它不仅使国家预算出现亏空，而且还催生了生产和非法销售酒类的黑手党。往后除了酒类黑手党而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等“弟兄”。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黑手党。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像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大亨已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推出的总结报告，并未预言官方的世界观将发生重大革命。改革起始阶段的构想，习惯性地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许诺回归“真正的列宁思想”，提出的原则是：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戈尔巴乔夫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个体制整个说来十分可靠，可以更新陈旧过时的体制，使之年轻化、现代化，将其与民主联姻，认为苏联精英能够以文明的方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并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他的幻想、后来证明也是致命的失误在于，无论对于老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所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均估计不足。此外，他还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就像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一样，即使在俄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尚不开化、就对民主的基本知识的了解而言堪称“野蛮人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的自动调节器。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加大了力度，试图挽救愈来愈深地陷入泥潭的苏联经济，仍然希望发掘体制的潜力，消除工业和技术方面的落后状况，为此制定了几个追赶型的发展计划。试图从几个方面同时并进，搞经济核算，搞自筹资金、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的“三自运动”，开始实行协议价格和削减国家订货。这一切都寸步难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领导人锐意改革，全民也热情高涨，几乎是绝对地支持改革。问题就出在“中间环节”，也就是官僚化的党的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官僚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官僚盘踞的机关拼命抵制改革。于是，在来自各地的“炮打司令部”的呼声的推动之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对苏联官僚的堡垒进行围攻。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偏离了本可沿着“邓

小平方式”的轨道将他所设想的改革推行下去的道路。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场最严重的核灾难使刚刚起步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既然做出了关于公开性的承诺，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公诸于世呢？戈尔巴乔夫在沉默了十四天之后，终于在电视讲话中坦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自此他发现开诚布公、公开性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王牌。并且把公开性当成民主化的主要工具。他指望将所开始的改革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戈尔巴乔夫也许尚未充分意识到，公开性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载舟亦可覆舟。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刻板、保守、因循守旧。一旦在公开性和社会民主化的作用下支柱开始坍塌，社会主义体制就开始土崩瓦解。

随着社会民主化及其命运攸关的主要成分——公开性的过程的开始，民族主义情绪即迅速高涨甚至发生爆炸。当时并非人人都意识到，在同极权主义作斗争时，不知不觉地也在同极权主义的存在形式——苏联作斗争。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国家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家一代笃信“牢不可破的联盟”确系坚不可摧，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戈尔巴乔夫对于民族因素估计不足，忽视了日趋激烈的民族问题，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派则早已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廉价的普及燃料，可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数千哈萨克青年走上阿拉木图街头，抗议任命非哈萨克人为该共和国首脑；数千鞑靼人走上莫斯科街头，要求重返家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独立的运动渐成气候；第比利斯出现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并取消阿布哈兹自治的游行…… 民族冲突此起彼伏，接踵而来，搞得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打乱了他想为改革规定的时间表。

在经济改革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便只剩下惟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在他看来，党本身已经成为主要的障碍，因而也成了主要的改革对象。他需要苏维埃和一切非党的机构来向

党施加压力，破除党对权力的垄断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为所欲为。于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构想：将政治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筹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议会）。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本意是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握各级国家权力。然而，党内的民主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却纷纷得手。尽管代表中苏共党员占了85%，却有30%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总的说来是20%的党组织书记落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居然也落选了。地方领导人手中拥有一切资源，却往往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修改鼎鼎大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原来是从法律上巩固共产党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现在删去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系“领导和指导力量”、“核心”的内容。一个月后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此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许多党的官员眼看大事不好，便投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开始形成好斗的反改革势力。大多数普通党员则纷纷交出党证或停止交纳党费，成批地离开党的组织。共和国的精英也掉头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若干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当时对党的官员，应当找出其他最佳的处理办法，不该把他们全都当成保守甚至反动的阶层来谴责，不该疏远他们，毕竟这都是精英啊。

有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马上转向对外政策，是想逃避愈积愈多的国内问题。其实并不尽然。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实际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政期间，时任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即已意识到，苏联经济被庞大的军事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作为第二梯队的成员之一，对于军事开支的具体数字，却无从得知。及至登上总书记宝座之后，才掌握了大概的数

据，就连这样的数据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军费开支占了国家预算的40%，70%以上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满足军队和军工企业的需要！戈尔巴乔夫1985年春天在笔记本中把“结束军事竞赛”作为外交优先考虑的头号问题，以下依次是“撤出阿富汗”、“同美国和中国搞好关系”，这绝非偶然。他是充分估计到军备竞赛在使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最终实际上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弦更张，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当时“冷战”的格局未变，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破冰之旅十分艰苦。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实现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5年11月的日内瓦会晤。这次会晤虽然只是见面认识、相互摸底、试探对方的意图，却是两国首脑直接对话的良好开端。会晤中里根突然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其间又经过无果而终的雷克雅未克会晤。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美国。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中短程导弹条约》。此乃结束“冷战”的第一步。此次访问在美国掀起一场“戈尔巴乔夫热”。戈氏夫妇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当然，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颇受欢迎的深层原因在于，他领导下的那个强大而沉闷的国家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莫斯科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两德统一可以提到日程上来。启动了销毁整整一个级别的杀人导弹的进程。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准许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访问，轰动一时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关于1941年悲剧的材料使苏联公民茅塞顿开。

1989—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顶峰。198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为“十年人物”。次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没有亲自前往奥斯陆出席授奖仪式。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形势。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外交上的成功与他的政策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具有悲剧性的后果之间的脱节，已是有目共睹。

改革进行了三四年，经济上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状态仍在继续，且有增无减，苏联成了一个全面紧缺的国度。看来，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经济方面总是从属于改革的

主要方面即政治方面，并且负有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使命。因此，只要出现使问题复杂化的政治事件，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经济上的决定都多次取消，要么是推迟到局势好转时再实施，而由于国内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消退，戈尔巴乔夫就腾不出手来认真抓经济。说来奇怪，在政治改革方面都表现出尚无先例的勇气的戈尔巴乔夫，一遇到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意识形态禁忌，便莫名其妙地缩手缩脚，止步不前。比方说，他依然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制。更将价格改革视为畏途。刚刚提到面包和通心粉涨价就引起居民的恐慌，戈尔巴乔夫贸然许诺：今后不同老百姓商量，决不搞任何提价。经济改革方面一再延误，坐失良机，曾有人预言“戈尔巴乔夫惟一的危险是空荡荡的商店和消费者的不满，这种不满必将引起普遍的动荡”，却不幸而言中。至 1991 年春天，何处可以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已成为戈尔巴乔夫这位总书记兼总统的第一要务。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关心党的机关的年轻化，也希望物色一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便在 1985 年从乌拉尔召来鲍里斯·叶利钦。两年之后，此人的政治野心已昭然若揭，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朋友甚至建议将叶利钦发落至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个偏远的国家去当大使。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当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改变国内的状况时，其竞争对手叶利钦却正虎视眈眈，一心夺取他手中的权力。

1990 年伊始，一股反亚美尼亚反俄的屠杀洪流席卷巴库，戈尔巴乔夫迟迟不肯出兵，当情况进一步恶化、局面几乎变得不可收拾时，他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派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巴卡京前去平息骚乱。波罗的海沿岸那边，也是频频告急。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戈尔巴乔夫携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亲赴维尔纽斯，为了阻止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苏联分离出去，他可说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后也是铩羽而归。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俄罗斯也加入到这股闹独立的浪潮里来。1990 年 6 月 12 日，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紧随其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北奥塞梯、科米、卡累利阿、加告兹等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雅库特、第聂伯河沿岸、南奥塞梯和伊尔库茨克等州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

苏联的命运岌岌可危。戈尔巴乔夫竭力保住苏联。他确信原来的苏联已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决定建立一个可以保证所有参与国的主权和权利平等的新联盟。他提出的“九加一模式”（即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加上联盟总统）成了他拯救苏联的最后一次机会。1991 年 3 月举行的关于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中，有 74.5% 的人支持戈尔巴乔夫。新的联盟条约草案经过反复磋商，终于最后敲定，只等签署了。时间定在 8 月 20 日。

戈尔巴乔夫曾经向全国发出可能出现灾祸和有人可能搞独裁的警告，自己却表现得惊人地无忧无虑，并未采取任何使自己免遭意外危险的措施。对于所接收到的警告、信号和征兆统统不予重视。他认为联盟条约的签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十拿九稳，决定 8 月初去位于黑海之滨的福罗斯度假。有人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他的战友们可能会有动作，他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没那胆量同总统作对呢。”临行前，戈尔巴乔夫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到新奥加廖沃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均应下台。殊不知克留奇科夫手下的人窃听了他们的谈话。这里点到的几位仁兄实际上就是后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戈尔巴乔夫原定 8 月 19 日结束休假，回莫斯科签署联盟条约。然而 8 月 18 日，一群不速之客来到福罗斯。这是政变策划者派出的代表团。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遭到严辞拒绝。又让他向副总统亚纳耶夫交权，戈尔巴乔夫拒不接受这个建议。谈话不欢而散。8 月 19 日早上 6 时，各主要媒体播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的消息，并宣布戈尔巴乔夫有病在身，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任、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政变自此

开始。

对戈尔巴乔夫说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任凭别人摆布。首先是任凭政变分子摆布，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眼下他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都取决于那些积极批评他的人，取决于他的政治对手。只得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昨天还在要求他下台，如今却在白宫前面筑起了人墙；民主派新闻界不久前还在对他进行无情的攻击，这时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维护他。正是他们以其协同一致的努力制止了政变，解救了自己的总统。不过他本人也属于粉碎政变者之列，因为他面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讹诈，率先毫无保留地说"不"。

政变的阴霾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逃过了这些年来一直担心的"赫鲁晓夫式下场"。然而，为了这一无可争议的胜利，他也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政治损失。许多人认为，正是他应当为政变负责，是他把政变分子弄到自己的身边。从福罗斯归来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他的死对头叶里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里钦的果断行动，他才得以重返克里姆林宫。凡此种种，都对他的执政者威信打击甚大，他已失去往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政变使党、克格勃和军队威信扫地，剥夺了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家领导人所拥有的传统的权力手段。

政变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联盟所做的一切努力均付诸东流。8 月 24 日，叶利钦以俄罗斯的名义签署了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命令，从而迈出了瓦解苏联的第一步。12 月 1 日乌克兰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公民赞成乌克兰独立，自此可说苏联实际上已经解体。戈尔巴乔夫为防止国家瓦解、保住联盟作了最后的冲刺，却已无力回天。12 月 9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斯拉夫共和国的首脑在白俄罗斯的密林里签署别洛维日协议，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辞职声明，黯然下台。

看似牢不可破的国家瓦解了，苏联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解体，并未酿成全球性的切尔诺贝利灾难，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 1985 年 3 月完全另有所图地上台执政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改革初期他就曾说过苏

联社会孕育着深刻的变化。他充当了历史助产士的角色。

从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开始至今，将近20年过去了，眼下许多人都会赞同这样的意见：也许没有以最好的方式利用戈尔巴乔夫所碰到的历史机遇的，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还有当时的苏联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此外，整个世界也没有充分地利用“戈尔巴乔夫机遇”。

致中国读者

能有机会同本书的中国读者对话，我甚感欣慰，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首先是希望发现新的庞大的读者群，这是在一个我们眼看着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一的国度里。

不过，还有一个也许是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愿意向我未来的中国读者介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这一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的经历。

同改革有关的事件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原来的苏联社会，并导致苏联解体，然而它也对20世纪末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革的经历中，有靠本书传主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倡导、政治勇气和对选定目标的执著追求作保证的无可争议的成就。他所选定的目标是：民主，法律至高无上和国际关系中不接受暴力。

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有不少的失望、不少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991年8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

我愿意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其历史自始至终、尤其是近几十年

来都同俄罗斯社会和国家息息相关的国家里，本书的读者不会对这些事件和我的有关思考抱无动于衷的态度。

安德烈·格拉乔夫
2004 年 7 月

序

“*没有历史，只有传记。*”1987年12月，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接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曾引用了拉尔夫·爱默生的这句话。这位美国哲学家究何所指呢？是不是说历史应当根据伟大活动家的名字和建树来研究呢？是不是说除了人和人的行为而外，历史再无其他自我表达的工具了呢？

将历史按照沙皇、国王、总统或者总书记的名字划分成若干个时代，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办法了。只是问题在于历史有它自己的、与执政者的职位和官衔并不相符的官阶表。历史万神殿中的位置并不预先保留，也不出售。如果说其中有个位置是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预留的，那也决非因为他曾在苏联执政达六年半之久（起初以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后来又以苏联总统的身份），而是因为他那支配手中无限权力的方式。

人们将要回忆他，提到他，有人赞扬，有人诅咒，不仅仅为了他已经做到、他敢于去做的事情，而且也为了他未下决心去做、他克制住未去做的事情。20世纪末将是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因为正是他一举结束了世纪冲突，将历史翻到新的一页，这样在一张白纸上继续书写历史就成为可能。

普普通通的人是怎样成为历史人物的？是什么使得他们脱颖而出的呢？是他们那有别于其他人非凡的才能、精力、虚荣心、对权力的渴望、忠于理想、道德上过分严肃，或者不顾一切的犬儒主义、毫无原则呢，还是与其他人有关的对生活的了解、捕捉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希望的能力？显而易见，在每个人身上这一切都按照不同的比例混杂在一起，其成分的确定只能靠直觉，至于要证实是否已做出理想的菜肴，那就得看结果了。

大概戈尔巴乔夫早在青年时代即已具备大部分以上品质。但尚未达到让人们可以猜到他会成为国家级以至世界级领导人的程度。历史的阴谋是按照只有它自己知道的脚本和日历来展开的，就连历史的主角不到一定时候也不明白自己使命的意义所在。而戈尔巴乔夫命中注定的使命却是非同小可：摧垮主宰了将近半个地球的体制。这个体制对世界霸权虎视眈眈，而且尚无、至少在表面上尚无任何气数将尽的征兆。多半是恰恰相反，随着这个“国际冒险主义和历史幻想相结合”（俄国哲学家伊万·伊林语）的体制内部日益凋落和衰亡，随着它日益频繁地将其领导人一一送入克里姆林宫墓地，它那充当超级大国的要求却愈益无法克制，愈益失去理智。其结果，无论其在阿富汗的冒险还是瞄准西方和东方的新型导弹，与其说是肯定吓倒了苏联那些现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倒不如说是对于风烛残年的体制日甚一日的衰败起了伪装和弥补的作用。

因此，凡是知道或者猜到体制瓦解的不可逆转的进程的人，完全有理由担心，只要依然是个“难啃的骨头”（戈尔巴乔夫语）的体制一朝瓦解，巨大的破坏能量以及社会中所积聚的暴力的巨大能量必将释放出来。“如果苏联体制崩溃时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列夫·兰道说道，“那就是奇迹。”奇迹出现了。

看似牢不可破的国家瓦解了，而一头扎进历史死胡同的极权主义体制，在全世界惊讶的目光中完成了政治上的自杀。苏联解体并未成为全球性的切尔诺贝利灾难，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便是那个1985年3月完全另有所图地上台执政的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

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若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策略灵活性，若是没有他那种屡屡处于风口浪尖却能化险为夷的‘不倒翁’天赋，苏联帝国能够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体吗？”《时代报》评论员克里斯托弗·伯特伦写道。多亏有了戈尔巴乔夫，充满革命、世界破坏性剧变和世界大战的20世纪，这个阶级对抗、“铁幕”、将欧洲分隔开来的世纪，这个因可能发生酿成世界大难的核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世纪，比日历规定的期限提前10年宣告结束。这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所追求的呢，还是历史并未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就将他列入了伟大改革家的名单？

目 录

致中国读者/1

序/1

第一章　根基与命运/1

第二章　“牛头不对马嘴”/40

第三章　普通的“锡匠”？/75

第四章　改革——什么？/112

第五章　地球总书记/147

第六章　“惟有党不会背叛我”/178

第七章　保住不能解散！/215

第八章　“他是上帝，我是凡人……”/260

第九章　一九九一年：一号灾祸大事记/288

第十章　一九九一年：二号灾祸大事记/328

第十一章　在自己雕像的阴影里/362

代尾声　戈尔巴乔夫机遇/377

第一章 根基与命运

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卫

为什么命运恰恰选中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卫去摧垮极权主义的歌利亚①？为什么几乎完美无缺、典型的共产主义体制的产物，体制的坚定拥护者，居然是比体制所有敌人加起来都更加危险的内部敌人？为什么那个能如此顺利地抵挡住外来军事压力和思想上的敌人的瓦解企图的体制，面对改革家们的方案时竟会解除武装、不堪一击？而改革家们“只不过”是力求改善体制、或者说得准确点是想挽救体制而已。

答案就包含在问题之中。一个由“惟一正确的学说”武装到牙齿、在全世界面前不可一世的体制，只能被内部的腐蚀、思想上的异端邪

① 据《圣经》传说，歌利亚系腓力斯人中的巨人，与大卫战斗时被杀。（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说所击败。不是败在外来的侵略,而是败在“天使们的起义”。而无所畏惧地领导起义的,自然就只能是那个自身无懈可击的人。只有真诚的信徒才能成为异教徒。只能是那个一切都多亏苏维埃政权、除自己而外不欠谁的情的人。他甚至没有那些希望解放本国人民并为之谋福利的知识分子所患的通病——潜意识的缺陷综合症。他并不属于“阶层”的一员,而是出身劳苦大众,因此也不怕再次置身其间。只有无产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不怕降职,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作者的预言,最适合充当生育他自己的制度的掘墓人。

在这位斯塔夫罗波尔小伙子身上,究竟是什么更多一些呢?是他那个阶层、朋友以至整整一代人普遍共有的东西呢,还是决定他要起自己尚不知道的历史作用的非同寻常的东西?他的性格、基因、天性中肯定具有一些绝无仅有的品质!尚在有生之年就获得本世纪伟大政治活动家之一的称号,这可不是人人有份啊。为了解释他的业绩,总不至于再次拜倒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和《简明教程》面前吧,按照它们的说法,历史上并没有杰出的个人,只有“本阶级的代表人物”。

即使那些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也绝非全都青史留名。人人皆知,历史是一个大抽彩,它使许多人青云直上、直达巅峰。因此,只有到了事后,历史学家们在悉心研究家族史、性格特征和友人的回忆录时,才能在历史的宠儿身上找到那毫无疑问的伟大的标志……

从全部情况来看,1932 年 3 月 2 日米沙①·戈尔巴乔夫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并无这样的标志。尽管他出生时的环境就其简朴而言,一如《圣经》传说,是在普里沃利诺耶村边的一家农舍里,他的床头上方却并未闪耀着伯利恒的星辰。惟一可以算得上说明他具有特殊使命的标志,大概就是当他严重谢顶以后额头上那块著名的明显胎记,以

① 本书传主的全名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有时为行文方便,不称“戈尔巴乔夫”(他的姓),而称“米哈伊尔”(他的本名)。“米沙”则是“米哈伊尔”的昵称。

及那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他的祖父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在列特尼茨基村教堂里给孙儿施洗时，将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多”改为“米哈伊尔”，也许这一不小心，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失去成为“胜利者”[1]的机会，使他注定遭受“类似上帝”的孤傲。

此外再无上苍赐予的标记。不过另一方面，这个农村小伙具有与生俱来的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没完没了的精力，如他自己坦承，从小就幻想“干出一番事业。要让父母亲和同龄人都大吃一惊”。这里还应加上两个在普里沃利诺耶落地生根的移民家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混杂血缘：来自沃罗涅日的戈尔巴乔夫一家和来自切尔尼戈夫希纳的戈普卡洛一家。不仅是血缘的混杂，而且是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的政治素质的混杂。

外祖父潘捷列伊·戈普卡洛满怀热情投入革命后的生活，入党，积极参与集体化、“余粮征集”，并且充当新政权的化身，起初担任粮食收购的特派员，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被赋予特命全权，后来又担任他自己创建的集体农庄的主任。

祖父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则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仿佛是特地为了对比才加到家族传说中来的。他是个坚定的个体农户，竭力抵制集体化，他那积攒的财物和收获的粮食不仅不愿与苏维埃政权分享，而且不愿与申请加入农庄的亲生儿子谢尔盖分享。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典型的阶级斗争的戏剧性场面，有一次祖父和父亲为祖父安德烈藏在阁楼上的粮食，几乎到了拳脚相向的地步。后来，到了战争期间，德寇在普里沃利诺耶盘踞数月，正是非党员安德烈挽救了自己那入党的儿子，这次他藏在村边上的猪圈里的不再是粮食，而是自己12岁的孙子米哈伊尔，当时传出消息说，德寇决定在撤退前惩处共产党人的家属。

尽管米哈伊尔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政治上有分歧，苏维埃政权的清洗机器却对他们来了个“一刀切”。苏维埃政权的坚决拥护者外祖父

① 在英文中维克多(Victor)意为“胜利者”。

在1937年大清洗的脚本中摊到的角色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祖父则因未完成谷物播种计划而扮演了不大起眼的角色——“怠工者”。对两人的判决也各不相同。外祖父奇迹般地躲过了死刑，因“职务犯罪”被判徒刑，不久获释；祖父则在西伯利亚当了几年伐木工。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也就是米哈伊尔当年尚不认识的未来妻子赖莎·季塔连科的外公，同样难逃厄运。1937年，根据“三人小组”的一纸决定，他在阿尔泰被处决。尽管戈尔巴乔夫父母双方的家庭在斯大林体制的两种清洗（旨在除掉党务干部的政治清洗和旨在形成无偿劳动力大军的经济清洗）中均未能幸免，然而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不认为斯大林应当对此事负责。在他们眼中，“罪魁祸首”自然是过分热心的地方执行者，甚至是“破坏分子”。于是，形成了相互猜疑和彼此指控的怪圈，领袖启动的全国恐怖的机制，在所谓“全民支持”的助威下不停地运转。后来，未来的“加里宁助学金”获得者（没奔上“斯大林助学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思考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说道：“斯大林主义不仅教坏了刽子手，也教坏了他们的牺牲者。背叛成了一种通病。”①

他所受到的政治多元化和宽容态度（他称之为“温文尔雅”）的启蒙教育，不仅来自祖父和外祖父截然相反的政治气质，而且来自家庭内部的生活方式：外祖父家中的一个角落桌上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另一个角落则是外祖母从伯乔拉修道院带回的圣像。

戈尔巴乔夫家族不仅为全国性的恐怖付出代价，而且在战争中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普里沃利诺耶村中心为阵亡者树立的方尖碑上，有七个人姓戈尔巴乔夫，占了整整一行。米哈伊尔和母亲一起，既经历了同父亲的告别（父亲当天给儿子买了冰淇淋，还买了巴拉莱卡

---

① 此处及以下的引文，均摘自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回忆录、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文件以及作者同他、他的助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原苏联领导成员的谈话。——作者注

琴，大概是留作纪念吧），又经历了悬心吊胆的等待——等待来信，甚至还经历了阵亡通知书，幸亏它很快就被父亲的前方来信推翻了。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度过的童年时代，给米哈伊尔本人留下的印象同那个时代千百万农家孩童的回忆毫无区别。果园，奶牛，农舍里的泥土地面，冬天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以免冻坏，“抱窝的母鹅也在屋内”，饥饿。这实质上是农奴生活的周而复始，年幼的米哈伊尔早就想冲出这个樊篱。

不知是不是有意识的，反正他摸到了一条通往他当时尚不知晓的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学习的道路。米沙·戈尔巴乔夫沿着这条道路，包括十分具体的从普里沃利诺耶村到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镇区中学的若干公里的地界，一步一步地走向知识。他小时候性格好动，不过重要的是，他当时就求知欲强，锲而不舍。他是“见什么读什么”。他说，有一次他几乎三天不见人影，搞得母亲心神不定，原来他是独自一人躲在阁楼上读迈因·里德的《无头骑士》。

要是他什么地方没弄明白，就先撂下，过后再读。米哈伊尔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一下子对物理、数学、文学全都很感兴趣。诗歌是他的一大发现，他大段大段地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至今在心情好时还会兴致勃勃地朗诵上一段。他对别林斯基的著作特别入迷，读乡村图书馆里的别林斯基文集读上了瘾，到米哈伊尔成为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普里沃利诺耶村民时，同村人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米哈伊尔照例爱上了同年级的一个女孩，两人曾在学校剧团一起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雪姑娘》。他戴上假胡子扮演剧中的米兹吉里。他热爱舞台。至于其他的角色，如今戈尔巴乔夫通常会想起他在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中扮演的兹韦兹季奇。很难说是什么对他的吸引力更大：是那种再现、更换面具、演戏的机会呢，还是观众的注意、投向他的目光、满堂的掌声？反正他曾一度认真地考虑过日后去当个演员。多年之后，在完全另外一种活动环境中对他进行观察的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两人虽相去甚远，却十分难得地一致认为：戈尔巴乔

夫无疑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演员。此话不假,也许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了杰出的演员,只不过是在特殊的政治剧院里罢了。

他在中学时代曾经初试身手的,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坚持原则的共青团干部。有人还记得米哈伊尔对开会迟到者严加责备,对他的"雪姑娘"也不例外;也有人记得他从许多方面古风犹存的农村生活习惯中带来了对长者的尊敬、与同学交往中的和蔼可亲和善意。使他在学生中鹤立鸡群的,当然是年方十七就因与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并肩劳动而荣获劳动红旗勋章。他从 14 岁起就开始帮助在联合收割机上当机械师的父亲干活,对一个农村孩子说来,这是家庭义务的自然延续。同成年人一样,冒着大雨,顶着 37 度的高温,投入每年的"龙口夺食"大战。

看来,就在这种如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所说的"农奴式劳动"中,父子二人那男子汉般亲密无间同时又温情脉脉的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他热爱父亲。在对父亲的回忆中字里行间透着真正的温情。父亲身着士兵服的相片摆放在总书记别墅的办公桌上。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农民阶层中并不多见的"*在女人面前的骑士风度*",这是戈尔巴乔夫之女伊琳娜从爷爷身上观察到的。

他同母亲玛丽亚·潘捷列耶夫娜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一些。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她时都是一带而过,仿佛有些不大情愿,每次都强调说她"为人果断"。同村人都说她同性格较为温和、"带点知识分子味道"的丈夫比起来稍嫌粗暴一些。有一次在谈话中说到自己"总是心存疑虑"时,戈尔巴乔夫冒了一句:"*我母亲可是从来没有疑虑。她没上过一天学,她总是什么都挺明白。*"在丈夫去世后守寡期间,这位确实是精力充沛的女人仍然按照铁定不变的生活原则操持家务,在菜园里干活,对于从住着舒服的地方迁出的种种方案拒不讨论。

与此同时,生活使儿子离她愈来愈远。婆媳之间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将年轻的妻子带回普里沃利诺耶的老家时说道,父亲当下就对赖莎疼爱有加。关于母亲则只字未提。婆媳两人在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而她们希望得到其关爱的男人却是一

个——米哈伊尔。在这种相当常见的情况下，往往是儿媳妇占优。尽管在民风淳朴的农村对母亲都是毕恭毕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之间的相互理解愈来愈难，彼此交往的由头也愈来愈少。

“奶奶是个平平常常、十分普通的农村妇女，”伊琳娜[1]回忆道，“她当然对父母亲行为中的很多东西都无法理解。比方说，为什么星期天他们不像农村里通常的那样‘休息’，不是坐到餐桌旁美美地吃喝一通，再唱唱歌曲儿，到邻居家串串门儿，他们把时间都花在每天必有的长时间散步、没完没了的阅读和讨论读后感上面。”其实，当兴之所至、在场伙伴也不错时，戈尔巴乔夫倒是喜欢来上一支“发自内心”的歌曲或者动人的抒情歌曲，而且照例是从不推辞。他所喜欢的抒情歌曲中，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可以举出屠格涅夫的《雾蒙蒙、灰蒙蒙的早晨……》。

照伊琳娜的说法，他父亲尽管长相酷似生母，内心里却更接近爷爷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论文化水平爷爷比奶奶略胜一筹（只念了四年级），却终生对任何新鲜事物都饶有兴趣，天天看报看电视，随时准备就所见所闻与儿子进行讨论。

自从米哈伊尔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迁到莫斯科后，他的母亲就由边疆区党委和村领导来照料。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给她的房子进行了装修，铺了柏油路，装上了电话，还在旁边设了卫队。不过玛丽亚·潘捷列耶夫娜同儿子见面和说话的机会愈来愈少了。伊琳娜仍然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系桥梁，她早在爷爷在世时就经常夏天来普里沃利诺耶作客，并且定期给奶奶打电话。

1991年福罗斯事件[2]发生时，有那么几天显得特别地漫长，连总统的母亲对儿子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通讯联系恢复后，戈尔巴乔夫完全卷入了紧张忙碌的戏剧性事件当中，竟未从克里米亚给她去个电话。“没顾得上，我至今感到难受。”后来他在《八月政变》一书中这样

---

① 戈尔巴乔夫的女儿。

② 指1991年八·一九事件。当时戈尔巴乔夫被困于克里米亚的福罗斯。

说道。

也许，是下面这个情况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吧：母亲对小儿子萨沙这个比米哈伊尔小16岁的老末儿照顾和爱护得更多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米哈伊尔在自己引退时也曾嘱托弟弟对母亲多加照顾。母亲家的卫队自然马上撤掉，当地政府的照料也停止了。她将自家的房子卖给了当时全俄闻名的“温和五月”组织的头头、同村人安德烈·拉辛，却并不急于离开本乡本土，两个儿子也少有想到她。直到1992年，戈尔巴乔夫引退后第一次回老家，才劝母亲离开她度过了整整一生的村子，迁到莫斯科来。她迁来后不久即与世长辞。后来安葬在普里沃利诺耶她丈夫的旁边。

那还是许久之前的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中学即将毕业（因战争耽误了两年），他请求父母亲同意他继续上学。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严肃的话题最先是同父亲讨论的。父亲的话言简意赅：“你要能录取，我们尽量支援你上。要是考不上呢，那就还回来开康拜因，我们一起干。”著名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在莫斯科工作多年，写过一本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书，他认为一个农村小伙从边远的斯塔夫罗波尔进入久负盛名的大学这件事，几乎就是天意。“这无异于一个来自哈莱姆[①]的黑人少年终于考上哈佛大学，”他这样向美国读者解释说。

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自己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这件事的评论就平淡得多了：“战争夺去了千百万年轻人的生命，国内业务熟练的干部奇缺，只要你想上大学就可以上。我们学校就连那些学习比我差得多的人，也几乎一个不落地全都上了大学。”接着，为了不把自己的第一次“丰功伟绩”太贬得一钱不值，又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我国的罗蒙诺索夫[②]毕竟从来没有绝迹嘛。”

尽管如此，免试入学（他当时就是如此）必须是奖章获得者。米哈

---

① 哈莱姆系纽约一黑人住宅区。

②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 俄国第一个世界驰名的博物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奠基人、美术家、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伊尔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德语弄了个四分")。他对学习的渴求和奔向大世界的想望都十分强烈,他甚至准备同时报考五所高校:他当时对所有的一切都同样感兴趣。起初盯上了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学院,后来又瞄上外交官仕途,最终才将档案寄到莫斯科大学。

经过苦苦的等待甚至向校方询问(他失去耐心,发了一封电报)之后,未经面谈就得到了"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的答复。除了奖章之外,完全可以对招生委员会的决定产生影响的,还有他那并不多见的档案材料:虽然他属于"中学生"而不是前线战士的范畴,工农出身、尤其是勋章这块主要王牌却使他与众不同。除此之外,他19岁就在中学里成了候补党员。

1950年9月,戈尔巴乔夫提着母亲为他收拾好的皮箱,身穿惟一的一件西服,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他初次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奔向(这回已不是在幻想中)尚不知晓、因而也更具吸引力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中断了同老家、乡间生活和整个生活方式的联系,自此之后,这一切与其说是他禀性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他的一段回忆了。尽管时隔5年之后,他又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并在家乡度过23年,然而那已是判若两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此次出行无异于第一次出国,因为那确实使他离开了那个惟一熟悉和习惯的世界。他后来又不止一次地乘火车跨越这1500公里的路程,沿途经过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奥廖尔、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只有离开了同他家乡村庄一样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斯塔夫罗波尔,这位"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罗蒙诺索夫"才开始发现这个依然遍地废墟、他还不大了解的国家真正艰难的实际情况,这是时隔35年之后他将要领导的国家。

从斯特罗门卡到莫霍瓦亚

直至退休之后，可以作个回顾，也初次感到时间十分充裕了，戈尔巴乔夫这才在回忆录中回到自己的本源，他说："为了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就必须经历我所经历的生活，必须目睹我所目睹的一切。必须来自一个经历过集体化和37年大清洗悲剧的家庭。必须上莫斯科大学——她应该用黑体字标出。"

即使在50年代，当时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莫斯科大学，也堪称通往真正知识世界的窗口，思想上因循守旧荒原中的文化绿洲。法律系教员中还保留有革命前的教授。除了必读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而外，学生们还要研读罗马法和拉丁文、政治学说史，研究从美国开始的各主要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学习演讲艺术。据戈尔巴乔夫的同年级同学鲁道夫·科尔恰诺夫统计，在该系学习期间，他们共通过53次考试，考查不计在内。

即便是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不仅仅限于斯大林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是规定阅读原著，这对于年轻人的头脑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而必须研究经典作家曾经批驳和与之争论过的所有思想对手的著作（经典作家几乎同所有当时善于思考的杰出人物都争论过），又使法律系的年轻学子们越出官方教条的界限，来到非正统思想甚至被禁思想的广阔天地。"我们宿舍里（一年级时一间房住了15—20人）日日夜夜都在进行异常激烈的理论争论，"科尔恰诺夫回忆道。"我们不断地分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派别。有人引用托洛茨基的语录，有人可以为布列斯特和约批评列宁，甚至批评斯大林本人，比方说为他表述哲学思想时所使用的肤浅方式。我本人是司徒卢威的崇拜者…… 当然，我们都是些傻傻乎乎、疯疯癫癫的孩子，很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高年级有几个人因这样的辩论判了10年

刑。不过我们很走运，没有人告密。”

戈尔巴乔夫下车伊始，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情绪激昂、善于思考的圈子。“大学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内在潜能。开启了思维的过程。激情和好奇心演变成了对哲学、政治、理论的恒久不变的兴趣。至今依然如此，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理论家。我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戈尔巴乔夫重复道，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一边说着一边挥动了两下拳头。

年级里的人五花八门，大部分是刚刚脱下军装的前线战士，中学生不多，而且实际上全都是奖章获得者。戈尔巴乔夫的银质奖章是在农村中学获得的，虽然在知识上他比前线战士略胜一筹，然而在城市里的同龄人面前就大为逊色，尤其在刚入学时。年龄稍长——19 岁、自然还有上面提及的奖章勋章都帮了他的忙。不过那只限于一年级，再往后就不宽容了，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戈尔巴乔夫挺住了这次考验：这个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来到首都，下定决心 5 年之内不搞“风流韵事”。“我们往往只需花上一两个小时的东西，”同年级的同学这样说道，“他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学习起来如醉如痴，不遗余力。他对知识的渴求令人吃惊。”还不能说他在这点上很突出。对于经历过战争、竭力将失去的东西补回来、竭力拉近自己与正常的和平生活的距离的那一代人说来，如饥似渴的学习就是很自然的选择。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区那个惟一的阅览室坐位不够，学生们便不分昼夜地轮班学习。夜里两三点钟来到阅览室的同学，完全可能遇到正在埋头苦读的戈尔巴乔夫。

其实当时他的成绩并不突出，年级里还有更加耀眼、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并不是职业的组织家和“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却在同年级同学中享有公认的威信。他被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是系团委书记。1952 年，他成为正式党员。尽管当时同龄人中没有人料到他会成为杰出的领导人，命运却对他特别青睐：在《共青团真理报》每年刊登的莫斯科大学 1950 年级新生的礼仪性照片上，戈尔巴乔夫在一大群新生里位居正中。

许多人认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五光十色的法律系学生中间有何突出之处的话，那首先当推他那开朗、“热心”、好交往的性格。其次是对一切新的未知事物的痴情的向往，那种了解和吸收首都生活能够给他的一切、克服与同龄人在知识和印象方面的差距的愿望。而且，按照他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缺陷情结，从来不因自己的外省出身而感到羞怯，他总是会问：“这是什么？”“有一次他向我打听关于芭蕾舞的事情，要我带他去大剧院。”到下一次，也许就是足球赛或者空军节了。

对生活的兴趣自然就演变成对于人的兴趣，尤其是对于杰出的、与众不同的人的兴趣。“所以他总是有很多朋友，”科尔恰诺夫说。看来，姆雷纳尔日在戈尔巴乔夫眼中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一扇通往另外一个尚不知晓的世界的窗户。外国人，尽管姆雷纳尔日来自友好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博闻强记，出身富裕人家，却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反过来，戈尔巴乔夫身上对姆雷纳尔日具有吸引力的，多半正是他所欠缺的，即坦荡开朗、自生自长、自发的民主主义。在他眼里，这位俄罗斯朋友仿佛成了抽象的、书中所描述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代表的活生生的化身，姆雷纳尔日打算终身为劳动人民服务。他俩在整个大学期间都形影不离。

戈尔巴乔夫身上博得姆雷纳尔日好感的，还有他与大多数同年级的孩子不同，是个经典的、“没有变浑”的从俄罗斯南部边陲来到莫斯科的外省人。他所跨越的距离（从普里沃利诺耶村边的老屋到苏联头牌高校颇有名望的法律系），乃是现存体制现实的民主主义的活生生的独特佐证，自然也是体制所塑造的人那出类拔萃的个人品质的佐证。

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成了非莫斯科人的家，它将战后青年那五光十色、嘈杂喧哗的群落融汇并联合成为统一的机体。这个苏联式寄宿学校位于先前的一座军队营房内，营房建于彼得大帝时代，其建筑和布局中的军营气息，始终没有飘散。直至学生们迁至列宁山上当时可谓豪华“宫殿”的莫斯科大学高楼之前，他们许多人住在一间房里，室

内除了床铺再无其他家具，个人衣物就放在床下的提箱里。在整个黄色建筑物内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谁要是在烟味呛鼻的房间里呆厌了，便到走廊上来，仿佛是到这个终日喧嚣不已、几乎从不入睡的学生城的主要大街上来散散步。

还有一个集体度过时间的地方，那就是——厕所。由于战后的破坏，厕所里已没有隔舱和小门，只有一字排开的马桶。厕所不仅用于纯实用的目的。政治辩论和理论辩论往往在这里继续进行，你可以见到一个学生正手持铅笔，埋头阅读哲学论文，或是像罗丹[①]的《思想者》那样作沉思状，只是姿势欠佳，不大符合美学要求罢了。

严格的集体宿舍生活自然立即揭示了每个人的个人性格特点。戈尔巴乔夫（这里看来表现出他所受到的古风犹存的乡间教育）自然加入了这个"大学生集体农庄"：家里不时带来的吃食和小礼品，他马上分给全室的人，他当选室长后不久，该室即获得模范宿舍的称号。得自父母的乐于助人品格可以使他在冬天夜间起来，把自己的厚大衣给赶赴车站迎接外国代表团的朋友穿上。"当时是谁有什么都大家一起分享。大学生从来就没有个人的衣服，"多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自己当年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生活时，这样说道。

从宿舍到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校本部，通常都是从索科利尼基站不买票坐电车去，早上电车的踏脚板甚至车厢连接处都站满了学生。大家总是特别殷勤地将女孩子往车厢里推。然而，到往回走的时候，不必匆忙赶路了，法律系学生便三五成群地徒步走回斯特罗门卡，要是兜里有俩钱，就到路边的小吃店：买上一份凉拌菜和一瓶酒（多半是伏特加），三四个人分食。戈尔巴乔夫经常参加这类简朴的酒宴。

随着赖莎的出现，他那学生生活方式中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起了变化。

---

① 罗丹（1840—1917） 法国雕塑家。

一个苹果的两半

这位发现莫斯科的19岁南方人，在赖莎进入他的视野之前，自然也曾有过恋情甚至风流韵事。据同年级同学说，至少有两位法律系的姑娘曾经引起他的注意，两位姑娘对于这个当时头发蓬松的黑眼睛斯塔夫罗波尔人也并非无动于衷。其中一位举止高雅，乃教授家中的千金，她很乐意地“让他养成文明习惯”：让他熟悉莫斯科的生活，带他去看戏、听音乐会、参观展览。据说戈尔巴乔夫还真的上心了，当关系中断时，他难过了好一阵子。戈尔巴乔夫倒是讨人喜欢，可不知是姑娘本人还是她家庭觉得他毕竟来自完全“另外一个圈子”，显得有点土气。他第二次爱上的是系里最漂亮的女孩之一，在众多崇拜者中，女孩显然对他情有独钟。恋情开始了，本可继续下去的，如果不在这时遇到赖莎的话。他和赖莎都有一种感觉，仿佛彼此都找到了所缺少的、“珠联璧合”的“*苹果的另一半*”(戈尔巴乔夫语)。

赖莎尽管比戈尔巴乔夫小一岁(入莫斯科大学时她年方十七)，中学毕业时却获得金质奖章，在哲学系学习，比他高一个年级。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区，哲学系学生和法律系学生比邻而居，每个系的特点都给该系的学生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法律系学生毕业后都在检察院机关、法院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民警机关工作(在斯大林当权的50年代，未必有人会认真考虑去当律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前线战士、公职人员和打算担任公职的人。哲学系学生最好的出路是在中专和高校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入该系的是具有特殊气质的青年，照科尔恰诺夫的看法，他们“*多少有点神经不正常*”，他每天都能在宿舍里观察到这些思想家同僚。一个女孩子，又像赖莎那样来自偏远省份，尽管有个金质奖章，要跻身在他们中间，肯定得是个非凡的人物。当时赖莎并未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身材很瘦，特别内向，这是同年级同学对她的印象，同学当中有未来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名人梅拉布·马马尔达什韦利和尤里·列瓦达。当年赖莎虽说很有魅力，却不显得刻意造作，更不会卖弄风情。在那食不果腹的年月，经济拮据也使得她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赖莎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母都是铁路工人，养了三个孩子，为了使他们长大成人，受到教育，只得节衣缩食。据她对女儿说，别说是多添一件衣服，就连冬天的棉衣也不舍得买，在滴水成冰的季节穿着薄薄的鞋袜四处奔波，看来就此落下了关节炎。然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丝毫也未使她感到苦恼（她可能也属于那种“多少有点神经不正常”、反正是沉迷于自己那非凡的科目的“一族”吧），她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生生活上的困难。就连作为一个颇有魅力的少女十分自然的对于自己容貌以及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的关心，也不属于她的性格。据戈尔巴乔夫说，她是到30岁才开始涂口红的。

是什么使得赖莎和戈尔巴乔夫走到一起，并且相伴终生的呢？因为凡是对他们进行观察的人无不确信，这的确是罕见的、和谐的结合，是属于“天作之合”的婚姻。尤里·利祖诺夫系塔斯社的摄影师，经常陪同戈尔巴乔夫夫妇出行，这位经验丰富的相面者和他所有同行的说法一样：当他俩在一起时，“两人的眼神就完全变样”。他俩为何如此亲密无间？如果撇开什么是爱的结合的奥秘话题，他俩有许多惊人地相似之处。“他们甚至长得也相像”，他们的女儿这样认为。

首先，他俩都是半俄罗斯人、半乌克兰人，只不过戈尔巴乔夫这边母亲是乌克兰人，赖莎那边父亲马克西姆·季塔连科是乌克兰人。两人都出身于普通的劳动家庭，不属于因为家道殷实或者父母的特别关心而宠得娇生惯养的人。两人自小就学会了劳动，并且将学习看作这种劳动的惟一继续。伊琳娜利用现代术语，称他俩为“自学系统”。最后，两人在莫斯科都算外乡人、外省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首都所能提供的一切，然而却始终未能成为首都居民，在这个属于大家所有、却只是少数人的故乡的城市里，他们始终未能成为自己人。

他俩在喧嚣忙碌的莫斯科生活中彼此发现了对方，看来是感到自

己置身于一个单独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岛上，周围则是汹涌澎湃、他们感到陌生的大海。至少从二人 1951 年相识之后，他们对外交往的圈子一下子缩小了。“他们并未疏远任何人，并未同谁断绝来往，恰恰相反，两人都富于同情心，性格开朗，仍然保持着所有的朋友关系，只是可以看出，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内部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科尔恰诺夫如是说。

他俩的习惯、对生活和学习的态度原来就很相似，如今竟不知不觉地开始相互适应了。原来，两人都很喜欢户外散步，这个习惯成了神圣的仪式，担任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及后来担任总书记和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何时下班回家，都始终坚持，从未间断（母亲去世后，女儿伊琳娜将晚上同父亲散步的传统继承下来）。戈尔巴乔夫认为，两人都是“极端主义者”，他解释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始终未变，我因为所从事工作和五花八门的问题的特殊性，不得不变成‘搞妥协的人’。”

就性格的坚强、条理性和近乎迂腐的组织性而言，赖莎往往比戈尔巴乔夫强得多。在赖莎多年的社会学实践、经常进行的无数次调查和教学工作中，她的这些特点也许变得更加突出甚至过分突出了。家庭藏书都是她严格按字母表顺序亲自摆放的。大学期间，如果考查前必读的哪本书尚未读完或者尚未写出提要，她会在观看演出时中途退席。在斯塔夫罗波尔也同样如此，她在接待莫斯科来客时，会说声“对不起”，然后到厨房去备第二天的课。

最初几次出国，临行前她像准备课堂讨论一样地“博览群书”，去博物馆必定带上参观指南，离馆时笔记本上总是写得密密麻麻。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经常出国访问时，每去一个国家和城市，赖莎都要在地图上标出。1978 年重返首都之后，戈尔巴乔夫夫妇按照赖莎制定的计划较为详细地了解莫斯科：利用星期日，从建城之日起开始按照时代顺序遍访莫斯科的名胜古迹。从中可以看到那始终未能消散的外省姑娘综合症的表现，外省姑娘凭着自己忘我的劳动、极端的组织性和内心纪律性，强迫自己补上知识方面以及家庭和环境未能及时给她的“广博文化”方面的不足。然而这里也表现出她那毫无疑义的性格力

量、一往无前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极端主义，她不肯满足于敷衍办法、替代品、“概略的知识”、四平八稳的空泛词藻。难怪戈尔巴乔夫将自己的赖莎戏称为家庭党支部书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大学期间，她就认为自己绝不可仅凭教学参考书或者大纲准备考试，一定得读原著，读黑格尔[①]、康德[②]、费希特[③]等人的著作。1984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夫妇首次访英期间，陪同他们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发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十分在行地评价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哲学著作，不禁目瞪口呆：他很难相信她并未事先特意作过准备。当年在戈尔巴乔夫大学毕业后分配去的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赖莎压根儿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苏维埃超级大国的“第一夫人”，她为在农学院讲授的科目认真备课，潜心阅读发给党的高级干部的“印数有限”的“内部”哲学书籍的译本。伊琳娜在这些书籍的包围之中，在经常性的家庭政治争论和哲学辩论的氛围中长大成人，她可以证实，萨特[④]、海德格尔[⑤]和马尔库斯[⑥]的名字从小就在她的耳边回响。

不过，即使当上高校的教员和副教授（曾一度被推荐为教研室主任候选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并未变成女学究。对于新老哲学家“晦涩难懂”甚至空洞抽象的律法经典的极大兴趣，并未妨碍她不仅保持善于思考的职业学者的外表、而且依然保持富有魅力的现代妇女形象。她怀着同样的兴趣注视着国外政治思想的趋势以及时尚的潮流：对季节的时装、式样、流行色和裙子的长度了如指掌。

---

① 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哲学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辩证法理论。
② 康德（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③ 费希特（1762—181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代表人物。
④ 萨特（1905—1980）　法国作家、哲学家、政论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领袖。
⑤ 海德格尔（1889—1976）　德国哲学家，德国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⑥ 马尔库斯（1898—1979）　德国和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

这也许就是西方媒体在既发现改革又发现戈尔巴乔夫夫人时，将这一切变化称之为"赖莎现象"的缘故吧。赖莎在土里土气的斯塔夫罗波尔度过了23年，只是间或去去莫斯科，很少出国。她像一只鲜艳的蝴蝶，从毫无个性特点、使人失去自我的体制的茧子里振翅飞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风度高雅、独立不羁、充满自信的现代女性，她恐怕在自己丈夫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家领导人之前，就已经成为苏联的"第一夫人"。

不过戈尔巴乔夫在50年代初期，自然无从知道自己未来妻子的这些独特的品质。对他以及她本人说来，这些品质还有待发现和发扬。然而同这位相当不凡的姑娘相比起来，他也决不是"僚机驾驶员"。尽管赖莎比他高一个年级，他这个法律系学生，具有丰富的劳动与生活经验、党龄和初露端倪的共青团背景，俨然一个独立而成熟的男人。赖莎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选定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和口头讲述中，不无得意地回忆起成群结队地围着她转的那些崇拜者："物理系学生"，来自拉脱维亚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南斯拉夫人，不知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赖莎最终在他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赖莎按照两人出生的家庭和环境的常规，让自己后来的生活服从于丈夫的计划。

经过两年的"友谊"之后，他们终于在1953年结婚，在宿舍里举行了大学生婚礼，所需费用是戈尔巴乔夫暑假期间在家乡的拖拉机站干活挣来的。新婚之夜就在他的寝室里度过，室友们特别殷勤地把房间给他让出来，各自去"打游击"。然而从第二天开始，新婚夫妇就只好重新分别居住于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的男生区和女生区，即使有了可以充当进入赖莎房间（房间里另一位室友就是姆雷纳尔日未来的妻子）的通行证的正式结婚证，夜里11点以后他也不可在妻子那里继续逗留。

真正的蜜月姗姗来迟，那是他们可以搬到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研究生宿舍之后的事情。这里的"家庭式房间"，具有当时闻所未闻的舒适度：两家人共用一个淋浴设备和一个卫生间。赖莎此时已经读完本

科，学校推荐她留校做研究生，这再次证明她对所选择的道路的严肃态度。她在等待着学业结束，等待着丈夫分配。年轻夫妇当时并未考虑到任何不同寻常的前程，更遑论政治了。

他们和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当然为斯大林之死感到震惊，而且像他的捷克朋友姆雷纳尔日一样，不知所措地自问："如今我们可怎么办？"不过，据朋友们证实，戈尔巴乔夫既未表现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也未表现出羞羞答答的反斯大林主义。他同大伙一样伤心难过了一阵之后，便转到刚刚开始的独立生活中更为迫切的问题上来。他那自发的反斯大林主义，较之三年之后对个人崇拜的官方诅咒，理由要充分得多，这种反斯大林主义，在对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忍无可忍的反应中开始表现出来，时间还要晚得多。不过，1953 年夏天这位斯塔夫罗波尔检察院的实习生、未来的总书记就在致赖莎的信中写道，他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令人作呕"。只是他的批评当时尚未涉及到较高的级别，更未涉及对体制或是对已故领袖的所作所为的评价。

"我们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后来他在同日本政治和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的谈话录中写道。就连他俩的三位祖辈（包括赖莎的祖父）在 1937 年大清洗中的不幸遭遇，当时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领袖的崇敬。"我把自己家的历史与斯大林主义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那是在已经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并且得知赫鲁晓夫报告之后的事情。"大概只能从这时起而不能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将戈尔巴乔夫归入"六十年代人"[①]——"战争和二十大的儿女"……的一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尽管戈尔巴乔夫毕业论文答辩的成绩评为"优秀"，分配却是一波三折。他未能像赖莎那样留下来做研究生：他想去"重要"的教研

---

① 六十年代人：指其世界观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组——国家与法教研组，却让他这位来自农村的人去研究集体农庄法。最初的分配到苏联检察院中央机构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初出茅庐的法律工作者成了非斯大林化过程的独特的牺牲品：国内开始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政府的内部决定明令禁止录用法律高校毕业的“不成熟的”年轻人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因为当初此类人员曾经十分起劲地为斯大林大清洗卖过力。

人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在托木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塔吉克斯坦或者莫斯科郊区的斯图皮诺等地的检察机关中间作出选择，如果去斯图皮诺的话，还有留在首都的机会。不过，看来他当时的极端主义和不肯为了莫斯科牺牲专业的想法在这里起了作用。有一种怀疑是很荒唐的，说他和放弃研究生学业随丈夫前往外省斯塔夫罗波尔的赖莎，可能是提前 20 年就算好了该地有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党内飞黄腾达的机会。当时既无有保障的工作，又无住房，更无向戈尔巴乔夫承诺迅速升迁的地方庇护者等待着他们。某些俄罗斯或者国外的戈尔巴乔夫传记评论家事后作这样的推断，说明这些人忽略了他俩并未坚持留在莫斯科、他俩在首都仍然觉得自己是外人的事实，忘记了那个时代，忘记了充满了希望和肯定自我的愿望的那一代人，最后，也忘记了他俩当时都很年轻，对于自己和对方都充满信心，因而也很幸福。他俩觉得（看来实际上也是如此）其余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将他们在莫斯科积攒的主要财富——书籍作为行李发走，二人带着对首都的丰富印象，带着知识（他带的是罗马法和拉丁文入门，她则带的是世界哲学）于 1955 年前往斯塔夫罗波尔，颇像上个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或者“民粹派”。他们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平民知识分子”——来自人民、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幻想用以改善本国人民命运的新阶层的代表。对他们说来，重要的是两人有了一起开始独立生活的机会，至于这种生活得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们倒并不在意。

“总不安分”

按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到民间去”得从跑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开始。他这个来自莫斯科的年轻专家很快就明白了，斯塔夫罗波尔检察院并未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他。莫斯科大学的毕业证书和毕业纪念章并未给当地法律界留下印象，多半是恰恰相反，尽管是老乡，这个外人却令人恼火，有可能破坏当地那种四平八稳、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多余的教育程度”只会碍事儿。

斯塔夫罗波尔，在希腊语里意为“十字架之城”，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为抵御土耳其的入侵而建，它在50年代显得“过分土气”（赖莎语）。诚然，城里有自己的卡尔·马克思大街和必不可少的巨人电影院，却没有集中供水系统和下水设施。据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大陆》杂志出版人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证实，斯塔夫罗波尔是一个顺着一条主要大街延伸的、典型的外省小城，他当时在该市一家青年报纸当记者。这里实际上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个人交通工具更是无从谈起。无论前往机关、商店或者去作客，市民主要是靠步行。如果说因为从小习惯于家乡的普里沃利诺耶村，当初在戈尔巴乔夫眼中斯塔夫罗波尔仿佛成了城市现代生活的象征的话，那么从莫斯科归来后，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戈尔巴乔夫不久前曾经在当地检察院实习过，并且从该处给赖莎写信揭露过“官员的厚颜无耻、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检察院无异于劈头浇了一瓢冷水，促使易激动的他亲自来安排自己的前途，并且将他的“赖伊琼卡[1]”从莫斯科“勾引过来”。他特意事先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为她的到来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戈尔巴乔夫记得赖莎的父母

---

[1] 赖莎的昵称。

怎样阴沉着脸接待他们，那是他们在学业结束后向二老通报：丈夫要让赖莎中断研究生学业，将她带到偏僻的省份去。

当务之急是工作安置，于是戈尔巴乔夫在同朋友们对情况进行讨论之后，前往边疆区团委。他把自己的王牌全都亮了出来：党员，在村里开过康拜因，因此获得的勋章，大学毕业文凭，在年级和系里做过共青团工作。刚毅的小伙子给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多·米罗年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边疆区检察官也无意将新分来的大学生把住不放，于是按照与区检察院的约定，戈尔巴乔夫就被推荐给米罗年科。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未及从事同五年寒窗苦读的专业有关的工作，就开始了一种主要不是需要专业知识，而是需要诸如干劲、善于完成任务、动作麻利、善于找到与人接触的方法之类特殊品质的工作。米罗年科是这样解释为何让他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有头脑，了解农村，口才也好。还要什么呢？"

"总不安分"帮助戈尔巴乔夫迅速投入了整个苏维埃时代、尤其是赫鲁晓夫时期党团机关生活的那种不停的运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创举、地方的倡议和中央的硬性指示，迫使机关的轮辐昼夜不停地转动。每天都得对一切做好准备：从讲明个人崇拜的恶果到派青年人去参加"大化工"以及宣传玉米。在赫鲁晓夫发现鸭肉有无可比拟的营养价值之后，边疆区团委就以老同志为榜样，改行当起了"养鸭专家"。边疆区青年报纸在第一版严厉地问道："共青团员，你昨天为鸭子做了什么？"一时之间，大量繁殖的鸭子铺满了所有的水域，造成了又一个生态问题，由于加工能力不足，最终鸭子都闹哄哄地死去：好在首都又及时提出了新的倡议。

戈尔巴乔夫那轰轰烈烈的活动令所有卷入活动范围的人都有一种感觉：似乎每天都在处理国家大事，而主要是一直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以自己的方式响应从莫斯科飘来的"赫鲁晓夫解冻"的气息，1956年，在斯塔夫罗波尔尝试组织了以大逆不道的"谈谈兴趣"为主题的首批共青团辩论俱乐部。当辩论从关于时髦的问题转向政治时，这些俱乐部就像关于鸭子的创举一样，只得关门大吉。

不仅是热心，而且还有明显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可以不用讲稿就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的本事，使得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干部中脱颖而出，也引起了党内领导人的注意：他沿着机关的阶梯快步攀升，往往一跨就是两个台阶。1958 年 4 月，他已成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而到 1961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的幸运月份）已当选为区团委第一书记，并自动跻身边疆区官员的“上层”。

与此同时，赖莎起初远非事事如意。她因学问太多，比戈尔巴乔夫受到更多的磨难：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红色毕业文凭”对许多人起了类似一块红布对公牛所起的作用。她整整四年实际上没有固定的工作，靠偶尔的打工度日。有几次她尚未正式录用，就因精简机构被裁掉。最后，她开始在医学院、接着又在农学院做教员，戈尔巴乔夫也在该院经济系当过函授生。

他们的生活条件在不紧不慢地，随着戈尔巴乔夫职务上的升迁而得到改善。他们起初是向退休者租用一间带烧木柴的火炉的 11 平米小屋，打水上厕所等问题都得在院子里解决。这里不久就显得拥挤不堪：1957 年 1 月，女儿伊琳娜出生。两年之后，迁至几家合住的住宅，他们占用了其中的两间。至于分到第一处单独的住房，那已是戈尔巴乔夫当上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之后的事情了。

这个地位在他面前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天地。他具有了新的身份之后，不仅边疆区“精英”定期会议和非正式会晤必定参加，而且不计其数的共青团全苏会议、大会和中央全会也必定出席。他经常去莫斯科，与来自其他州和共和国的同僚交往。在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格鲁吉亚邻居”、共和国共青团领导人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初次相遇。

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经常应邀参加“成年人”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作为斯塔夫罗波尔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在 1961 年 10 月投票赞成将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中迁出。“当然，我也举手了，”戈尔巴乔夫讲到此事时这样说道。旷日持久的会议终于结束，他匆匆从斯帕斯基门往外走，要去替当时的党内上级费·

达·库拉科夫办一件急事。一群代表在过道里被挡住去路，请他们暂时留步。等了好长时间。通常都没有耐心的戈尔巴乔夫试着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拦住他们去路的哨兵说道："我们这是在执行你们关于斯大林的决定。"果然，军人和工人在团团围住的陵墓旁边忙个不停，他们正在安葬领袖的木乃伊。

戈尔巴乔夫在外省的总背景下显得十分突出，很快便进入1960年新到斯塔夫罗波尔走马上任的边疆区党领导人库拉科夫的视野。正是他促成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一年后即让戈尔巴乔夫改任边疆区党委的党组书记，时隔一年，1963年1月，又让戈氏出任关键部门——组织部的部长。"库拉科夫粗鲁，专横，要求严格，是'施压'行政管理学派的典型代表，"戈尔巴乔夫回忆道。"他当然既能厉声训斥，又会张口骂娘，这是俄罗斯的习惯。不过他工作起来十分投入，事业心强，而且从未向我布置过模棱两可的任务，可是我知道，他对其他人会提出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要求。"

看来，在这位勤奋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和精力充沛的党的书记身上，从年轻时即已显露出这个阶层中非同一般的品质，诸如真诚的坚定信念、个人的人格尊严和内心的一贯性，这些品质使上司不会向他布置模棱两可的任务，也使他免受机关幕后活动的腐蚀。就凭他的党内同僚在酒宴上学会了尊重他、没有死乞白赖地非把他灌醉不可这一点，上司不敢在他面前太放肆，不敢像在其他下属面前那样为所欲为。仿佛他们都在保护这棵精心呵护的幼苗，不让他看到生活的黑幕。

为什么像库拉科夫和安德罗波夫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以及其他相当典型的苏联领导人，在戈尔巴乔夫不同的升迁阶段都赏识他、支持他，而且几乎像接力一样地让他步步高升呢？这是一批庇护者，准确地说是一批为这位秩序的未来破坏者精心地充当向导的人，而他们自己曾经为维护这个秩序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其中有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戈尔巴乔夫具有飞黄腾达的才能，趋附迎合、及时地随声附和和讨得任何一个领导欢心的本事。总之是归结为他"把所有人都给耍

弄了”。然而，对于所有这些经验十分老到、丝毫也不幼稚、经过独一无二的斯大林式锻炼的政治家说来，这个说法未免太简单化了。

较为可能的倒是另外的因素：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见风使舵——在这方面他恰好可能与成千上万党的工作人员、与著名的斯大林所说的体制的“螺丝钉”毫无二致，而是使得他出类拔萃、令人刮目相看的东西。有些人（老家伙）在看到这个年轻、热情、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只是比他们更有文化的斯塔夫罗波尔才俊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同戈尔巴乔夫交往时，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正在成长中的可靠接班人，如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小灌木丛”，一批精力充沛、令人信服的年轻领导干部。他们不能不抱这样的幻想。有些人（库拉科夫也多半属于这种人）则认为在未来不可避免的党领导人大换代中可以依靠他。库拉科夫因在搞掉赫鲁晓夫的行动中表现得忠心耿耿、被勃列日涅夫调到莫斯科以资嘉奖，此后他为什么会继续呵护自己一手栽培的戈尔巴乔夫呢？其原因就在这里。库拉科夫设法先让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又设法让他当上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一举将37岁的戈尔巴乔夫带领到了最后阶段，带领到了通往大权在握的“边疆区当家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交椅的道路上。

不能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迅速飞黄腾达的阶段一帆风顺，也不能说他的青云直上仅仅归功于个人的有力庇护。无论边疆区党委将戈尔巴乔夫派到哪里，他都不遗余力，辛勤耕耘。他脚踏泥泞跑遍各区，宣布开展突击运动，时而对养羊业、时而又对“田野之王”玉米的种植进行辅导，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进行斗争，训斥犯错误者。总之，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履行机关的职责。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并未打过个人的小算盘。

在他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城市大为改观：出现了集中的供水排水系统，住宅建设热火朝天，开办了几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通了无轨电车，建起了游泳池和图书大厦。他不顾当时按居民人数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对城市进行排队的规定，设法在卡

尔·马克思大街上建起了马戏院，而斯塔夫罗波尔本来是没有资格拥有马戏院的。

应当指出，特别是库拉科夫调走之后，有几次由于同上司的龃龉，戈尔巴乔夫党内仕途的直线曾有可能来个急转弯。

他曾一度在机关日常琐事的泥潭中感到苦闷，想起了大学时代和未实现的理想，便决定放弃党内仕途，改做科研工作。他埋头苦读，通过了副博士必修课的考试，打算撰写论文。看来，赖莎的榜样也对丈夫起了激励作用。当时，她已在乡间道路上前后奔波了不下一百公里，加工整理了三千多份调查表和社会学问卷，她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农民家庭日常生活特点。全家都动员起来帮她对搜集的材料进行系统整理，据伊琳娜回忆说，工作总是进行得“井井有条”。家中地面上铺满了调查表、纸片和表格，不光父亲、连她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也趴在地上，根据有关表格的栏目对答案进行分拣。

戈尔巴乔夫的学术理想未能实现。成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之后，他离已完全可以称之为政治职务的东西不过咫尺之遥。出现了跻身中央委员行列的前景，既有已经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库拉科夫这个有力的靠山，又有诸如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之类重量级同乡（他于1969年安德罗波夫前往矿水城时与之相识）的赏识，戈尔巴乔夫此时信心十足。一年之后，莫斯科认为前途远大的第二书记已经成熟，可以独当一面了，在这个问题上库拉科夫肯定施加了压力。于是，库拉科夫的接替者叶弗列莫夫调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经过在中央委员会几个办公室的“相亲”之后，于1970年4月在最后批准之前来到总书记的办公室，他当时并未料到，时隔15年之后，他将成为这个房间的主人。

在勃列日涅夫的近卫军中

戈尔巴乔夫39岁当上就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言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大的边疆区（论面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等于比利时、瑞典外加三个卢森堡的总和）最年轻的领导人之后，他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像他这样的“党内大佬”，尽管从理论上讲莫斯科仍然在盯着他，他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统治权。当然，中央委员会的“惩罚之剑”——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组织部门都睁大了眼睛，对于各州和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比对于像诸侯一样独霸一方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盯得更紧。尽管如此，达到地区第一书记级别的干部都知道，此后他们就属于“不可触动者一族”，检察院甚至克格勃都不得动他们一个手指头，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内部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黑材料”，除非总书记亲自点头，否则就派不上用场。由此就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要对最高领导者表现出忘我的个人忠诚，就可在你的领地上为所欲为。

戈尔巴乔夫进入这个党的全权代理人队伍时，勃列日涅夫与第一书记们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归结为这些人刻意表现得奴颜婢膝：距对于这位《小地》、《复兴》的作者和杰出的军事将领的歌功颂德大合唱[①]还有十来年的时间。这种关系建立在互利原则的基础之上。当然，总书记的好感不仅对于每个书记的个人安危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戈尔巴乔夫所管辖的州也至关重要。不过据他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初期“还不像漫画式人物”，在将总理柯西金排挤到次要地位的纵横捭阖的斗争中，总书记需要忠于他本人的中央委员的支持：在搞掉

① 《小地》、《复兴》均系勃列日涅夫的“作品”，这个在卫国战争之后仅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人一跃而为苏联元帅。

波德戈尔内之后，柯西金依然会不合时宜地让人想起以“集体领导”为代号的倒赫（鲁晓夫）行动的“三驾马车”。

库拉科夫显然向勃列日涅夫推荐了戈尔巴乔夫，不仅将他当成大有前途的边疆区领导人，而且无疑将他当成中央委员会中“勃列日涅夫帮”的可靠的难得的补充人员，勃列日涅夫可以放心大胆地依靠这批人。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对后起之秀倍加关怀的缘故，他抽出几个钟头的时间，在老广场办公室从容不迫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以一种信任的口气，显然是想尽量博得对方的好感，他愿意平起平坐地与戈尔巴乔夫讨论包括经济、干部甚至外交政策在内的一切问题。在总书记那里进行了委婉的面试之后，勃列日涅夫私人近卫军的新兵“招募”作业以将戈尔巴乔夫领进第一书记、中央委员的特权圈子的仪式作结。这批人组成了以库拉科夫殿后的“快速反应集团”，只要库拉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在必要时就得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批评柯西金的政府，以此巩固勃列日涅夫的阵地（后来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联手恢复了这个屡试不爽的做法，其时他本人能否当选总书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不过进入这个已是公开秘密的“支持集团”的仪式让戈尔巴乔夫草草地结束了，他不肯一口气将满满一杯伏特加喝掉，这使得大家对他心存戒备，戈尔巴乔夫又讲了自己同总书记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才消除了这帮人在政治上对他的怀疑。

尽管如此，在登上至少当时与他同龄的党的干部根本无法想像的仕途巅峰之后，戈尔巴乔夫感到自己并不舒服。与将他接纳到自己家族中来的列位第一书记不同，他始终在很大程度上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不仅仅因为他属于另一代人，年纪最轻，不够稳重，尽管已经悄悄开始谢顶和发福，而且因为他已经受到传染和“毒害”，其来源是大学以及莫斯科“解冻”影响下的校园气氛，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六十年代人现象”的一切。促使他离开忙忙碌碌的党的工作、重温读书和撰写论文旧梦的，不仅是关于斯特罗门卡大街大学生的自由天地、法律系里的兄弟情谊以及几乎淡忘了的罗马法的回忆，而且还有所有读过的

书、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晚间争论、同密友姆雷纳尔日的谈话、与赖莎关于普列汉诺夫和康德的家庭辩论。

早在成为边疆区的第一把手之前，戈尔巴乔夫在跑遍全区的山山水水时即已发现那些干重活者的生活条件是何等的原始。他的脑子里冒出了“大逆不道的想法”。不过据他自己坦承，“顾不上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日常琐事把人给坑了。”此外，当戈尔巴乔夫勤勤恳恳、大概也是满腔热情地工作在不同的地段上时，每每遇到令他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就在致赖莎的信中讲自己的感受（他定期给她写信，在边疆区内出差期间也是如此），年轻气盛地揭露“无知官僚的妄自尊大和因循守旧”。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他愈来愈感到自己是这个“长官骑士团”的一员，于是，尚存的怒气就得首先往自己身上发泄了。

他可以做些什么，他要如何表现，才能做到不背叛大学的过去，不背叛与赖莎的共同观点、立场和希望，怎样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像外省“领袖们”那样自由散漫，做到不被同化，并且既不树敌、又不自我孤立呢？能否在外省而不是莫斯科依然做个“六十年代人”呢？何况你仍在为政权尽职、你在人们眼中是政权的一部分，因而也得为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分担责任。

戈尔巴乔夫与赖莎彼此之间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六十年代人”的评价，他说：“这些人一心想搞变革，搞改革，却很长时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1]在答法国《解放报》记者问中谈到戈尔巴乔夫现象及其一代人时，说了如下这番话：“他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试图将他们的议论和理想变为现实。”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将60年代政治浪漫主义者那多半属于神话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的企图，是否就是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对于改革表现出嫉妒和不信任的原因呢？

---

① 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1925—1997）　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主要作品有《审判正在进行》、《柳比莫夫》。1966年在“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件”中因在西方发表讽刺性作品受到从事反苏活动的指控，并被判刑。1973年起在巴黎生活。

戈尔巴乔夫并未像六七十年代的莫斯科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他的同年级同学）那样，注定要在厨房里流露感情、用枕头盖住电话机、无可奈何地诅咒克格勃和抱怨书刊检查制度。他拥有边疆区第一把手的级别，已经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之上只有总书记、上帝，大概还有当年比上帝本人还不可侵犯的体制吧。即使身为第一书记，是否可以在不触及体制的情况下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呢？可以，而且可以做不少事情。起初，他们尽量不去改变久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尽量使自己的行为不受所担任职务的约束。对戈尔巴乔夫夫妇来说这并非难事。在共同生活期间所养成的习惯，他们都倍加珍惜，无论职务发生怎样的变动都不会牺牲掉这些习惯，诸如形成传统的对当日事件的分析，讨论读后感。

戈尔巴乔夫有了专车，却仍然步行上班。市民们习惯在沿途暗中守候他，以便直接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这是他的街头接待室。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了 23 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避免去州党委的内部供应商店，宁可进普通商店。根据家庭会议的决定，女儿伊琳娜原则上不进所有当官子女都去的惟一的英语特别学校，而是上了最普通的学校。是否用公车送她上学的问题，根本不予讨论：认为那样做并不体面。

当然，在晚期勃列日涅夫主义时代党内显贵根深蒂固的习惯的背景下，这一按照戈尔巴乔夫家庭标准看来顺理成章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挑战、示威性傲慢的表现，也许实际上就是挑战。是抵制合法化的党内贵族习气的一种方式，与其他官员区分开来、保持自己本来面目的一种方法。据伊琳娜的说法，妈妈无论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莫斯科，原则上不去特供商店、服装店，于是更新衣服的任务只得由经常外出的父亲来分担，赖莎信得过丈夫的鉴赏力。

赖莎在物质问题上的墨守成规，再加上书呆子气，使她从年轻时代起就从不欠债，她在个人档案中保存着所有在区党委食堂订饭的付款单据。到莫斯科后，身为总书记兼总统夫人的她，同样极其仔细地留意将戈尔巴乔夫出国访问时获赠的礼品上交国库，丈夫引退后，她

更设法弄到上交礼品的收据。她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叶利钦在政变后暗示说戈尔巴乔夫应当自己悔过，同时她也担心有人会怀疑他们侵吞国家财产。

如果说赖莎关注全家人的行为举止和丈夫的仪表（她认为丈夫任何时候都应该衣着入时、神态端庄）的话，那么他俩关于周围的外省世界要有所改变的共识的主要部分，自然就得由戈尔巴乔夫来完成了。很难设想，他在斯塔夫罗波尔任书记的15年间，主要的动机仅仅是力图在全苏的范围内表现自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登上更高的职位。

莫斯科可望而不可即，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尚未衰老而且仿佛永恒不变，戈尔巴乔夫那充沛的精力需要立即释放出来。那种估计好自己体力和长距离赛跑进度表的长跑运动员战略，当时对他说来还很陌生。“*活着一天，就会有思考所需的营养材料，就会有作出决定的理由。*”至少这是他当年的生活信条。他的官位的特点只是加上了一条：过去身为共青团领导人和党的中层干部，他几乎每天都要受领上级的“早上任务”，如今这些任务他必须自己琢磨出来并且往下分派。好在他所面临的任务是由斯塔夫罗波尔土地的特殊性及其不稳定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其时由中央发布指示的做法已经过时，戈尔巴乔夫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想像“将边疆区带入先进行列”。

他精力充沛地干了起来，库拉科夫早就发现他具有“穿墙过壁的本事”。他进行了土壤改良，他设法争取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立项，在他的坚持下大运河被列入共青团突击工程。开展了安装煤气设施的工作，宣布进行自己的第一项“大改革”：当时给畜牧业集约化发展计划起了个如此热情奔放的名字。他让自己和别人都迷上了对收割任务实行承包的“伊帕托夫工作法”，该工作法是建立在农庄庄员对劳动最终成果直接物质利益拥有的基础之上。

进入戈尔巴乔夫视野的，还有对边疆区说来十分赢利的葡萄酒酿造业：根据边疆区党委的决定扩大葡萄园种植面积，提高佐餐葡萄酒甚至名牌葡萄酒的产量。他当时会不会料到十年之后，根据另外一条

党的决议，也是根据他本人的倡议，斯塔夫罗波尔的葡萄园将惨遭砍伐，被反酗酒运动夷为平地呢？设若他此时仍在边疆区党委书记的任上而且不听招呼，那么因背离党的总方针而受到警告乃至撤职处分就是铁定的了。

每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穿墙过壁"的任务。这里，对他和任何一位州委书记说来，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当地党的发号施令和向中央争取额外拨款的斗争。这套法术戈尔巴乔夫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例如，为了兑现"伊帕托夫工作者"较高的奖金，边疆区党委就专门作出决定。在干旱的年份，因饲料不足牲口存栏数面临威胁，就动员城里人储备饲料。其中有中学生，往往将斯塔夫罗波尔那不计其数的休养所、疗养院中的休养者也动员起来。应当说，这些没完没了的"提高粮食产量"、"提高牲畜存栏数"、"发展养禽业"的战役，实际上不是为了对付不良气候条件，而是为了对付全天候的体制，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地段上往往能够取得突破。

反正他是个幸运儿，难怪连老布什也惊诧莫名：那是在戴维营的郊外官邸，布什所钟爱的游戏戈尔巴乔夫自然从来没有玩儿过，可他第一次将马掌扔出去，就牢牢地安在了倒刺钉上。有时是他的精力救了他，有时则是上帝：在那个最干旱的年份，终于下起了救命雨。更多的是靠与莫斯科高官们的良好关系。所有的地方党领导人自然都依靠与高官的直接接触、依靠经常出入于党中央和政府的办公室，人人各显神通，一再地邀请、招引某个政治局委员去自己管辖的地段，如果走运的话，可以请到总书记。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诸如利用老乡关系、建市的周年纪念日、其他纪念日、向共和国和州授予勋章和流动红旗等等，全都利用起来了。

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另外一个"疗养地书记"同僚说来，这张苏联体制的王牌是自己送上门的。高官到他所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矿水城和多山的栋巴依来的次数，比去利加乔夫的托木斯克州或者叶利钦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次数要多得多，至于几已淡忘的维亚特卡州书记或者诺里尔斯克州的书记，就更不在话下了。在对休养的领导

人的接待和服务方面，戈尔巴乔夫的竞争对手是克里米亚人，特别是他的主要邻居兼竞争对手、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书记谢·梅杜诺夫，索契的疗养院都位于该边疆区的境内。梅杜诺夫充分利用了黑海沿岸地区给他带来的“政治年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大多数人（连同家属）都经常光顾他的酒宴、宴会和澡堂，临走时再带上丰厚的赠品，他们为这位殷勤好客、把边疆区当成自己庄园的书记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层，使他免受党内的侦查和刑事追究。

到戈尔巴乔夫这里作客的则是另一批人：人们到矿水城，不图纵酒作乐，而是来此治疗，随着政治局委员的年事愈来愈高，他们、他们的随从、各色各样的部长到他的领地就来得愈来愈勤。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跻身于前途远大的地方领导人行列，凭的是自己的各种创举和经济试验的话，那么同诸如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之类当时政治上的关键人物的私人交往，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矿水城和栋巴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喜欢在该地休养）。

这些人在休假中，摆脱了自己的办公室、接待室、吉尔车和高不可攀的秘书，换上便装，在心理上也是如此，他们变得平易近人，乐于突破礼节性交往的框框。之所以可能同中央首长进行非正式的甚至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是由于这些日渐衰弱和多少都有些病痛的人与光顾克拉斯诺达尔斯克的客人不同，既不想开怀畅饮，也不想同殷勤周到的共青团女积极分子一起在澡堂嬉戏取乐，他们力图远离多年国事工作中业已厌倦的单调生活，谈论谈论抽象的事情。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赖莎都是他们理想的交谈者。尽管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斯塔夫罗波尔对莫斯科高官的接待时，把那当成不胜负担的差事，她说就家庭而言这种殷勤接待“不合算”，然而，戈尔巴乔夫夫妇与勃列日涅夫晚期的许多大人物正是从那时起才彼此相识，甚至“全家都很要好”的。

在年轻而有文化的夫妇面前，这些实际上大半生已经失去了正常人际交往的人“摘掉领带”，“变随和了”，将自己天性中身边的人早已忘怀或者压根儿不了解的那些方面袒露出来。例如戈尔巴乔夫夫妇

了解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不仅会写诗，而且还熟知大量的哥萨克歌曲，自己也很喜欢唱；“干巴木头”柯西金尽管年事已高，狐步舞和探戈依然跳得很棒。有一次，柯西金“眼含热泪地”向戈尔巴乔夫诉说：他无法原谅自己的是，为了11月7日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一起在陵墓主席台上亮相，他竟离开了病入膏肓、卧床不起的妻子。妻子告别人世时，他不在身边。

在可以当着年轻书记放松一下的“莫斯科领导人”看来，这种交往是推心置腹的休息，而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却依然是工作。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当年的宫廷礼甚至不是作为决定政策的方式，而仅仅是作为在官场内生存下去的方式确立起来的。*”自此党内仕途的硬性限制也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不仅必须让老同志开心、听他们诉说衷肠，而且必须当众向整个党的领导层及其具体代表人物深表敬意。当然不难摘录他当年对苏斯洛夫的溢美之词，苏斯洛夫系专程前来为斯塔夫罗波尔建城200周年向该市授勋，同样不难摘录在对勃列日涅夫的文学杰作大加吹捧的时期颂扬“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①的话语。今天在重读这些文字时，应当公正地说，戈尔巴乔夫在当时必不可免的阿谀奉承中，至少没有力图去超过其他的同僚，尤其是来自外高加索共和国的同僚。

尽管戈尔巴乔夫对这类叽叽喳喳的话语大概并未特别在意，认为此乃令人懊恼却又无法躲掉的差事，他这个正常人的内心深处却愈来愈感到恼火甚至愤怒，因为他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们只是注定要听明摆着的无稽之谈，可他必须亲自积极参加这一蹩脚的演出。如果考虑到他自己家中的情绪（据伊琳娜证实，“*家里的气氛是对此类陈腐习俗无法接受，对现存秩序之荒谬绝伦洞若观火*”）的话，那么就连戈尔巴乔夫这样天生的演员，也愈来愈觉得参加此类“演出”是一大累赘。

与此同时，当时尚未预见到任何前往正常世界、出去“呼吸新鲜空

---

① 指勃列日涅夫。俄罗斯人的姓名分三部分，即：本名＋父名＋姓，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名＋父名”通常用于尊称。

气”的现实可能性。看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已使自身的自然规律发生效力，并且成为带有其必要仪式的国教。同任何一种宗教仪式一样，它们不仅要求做祷告和颂扬上帝（体制及其在人世间的全权代理人），而且要求揭发（并公开）异端分子。戈尔巴乔夫不怕回忆起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不久，国内开始卡紧了，他作为一名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参加了对于斯塔夫罗波尔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德科夫教授的讨伐，此人胆敢对“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分子”（当时戈尔巴乔夫大概未将自己算作修正主义分子）亦步亦趋，发表了自己关于完善制度的“处方”。“我们当时把他批得体无完肤，”戈尔巴乔夫说道，他承认，后来只要一想到那个讲出了未来改革的许多想法的可怜的萨德科夫，就感到自己“良心受到谴责”。

是不是这个“痛苦的良心”最终成了各方面都堪称典范的边疆区第一书记内心的主要缺陷，成了他基因密码中那个后来演变成为不可救药的异端病的缺损呢？不过在斯塔夫罗波尔时期，即便戈尔巴乔夫身上有这种病毒，也还处于休眠状态，尚未表露出来。需要特殊的附加条件，才能使病毒苏醒过来。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的最初几次出访，就可以归入这样的附加条件。

就他和他的许多同龄人而言，对于外部世界即非苏维埃世界的发现，超乎斯大林的另一个宇宙的存在，那都是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青年与大学生联欢节期间的事情。1957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同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一样，都动员起来给齐集首都的“世界进步青年”的代表作辅导员。他摊上的任务并不简单，是保证五光十色、恣意作乐和不守秩序的意大利代表团参加联欢节活动，意大利人关于规矩、纪律和时间的观念都很特别。戈尔巴乔夫从中学时代就习惯于当众批评那些开会迟到的不自觉的团员，意大利人肯定给他上了政治多元化的第一课。

至于他自己出国旅行，那已经是当了共青团干部之后的事情。最先去的照例是社会主义阵营：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对于这些将苏联

同志当"老大哥"接待的"兄弟国家"的访问,未必给他的"政治素养"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许多必定有参观活动和为友谊热情干杯的此类旅行,让人联想起影片《库班哥萨克》里的镜头。本身就是斯塔夫罗波尔哥萨克的戈尔巴乔夫,早在大学年代即向自己的朋友姆雷纳尔日说明这部影片纯属弄虚作假。

不过,以党的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西方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的最初数次旅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陪他去"休息和疗养"的赖莎说来,才是真正到了开阔的国外宇宙空间。戈尔巴乔夫至少会有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原来苏联人远非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党的宣传机关总是十分卖力地作这样的鼓吹)。热情接待来自社会主义祖国的使者的,不仅有照例靠剥削劳动人民致富的剥削者,而且还有被剥削者本人,至于被剥削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那么苏联的领导阶级只有在梦中方可得见。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发现是,那个使我国人民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节衣缩食的帝国主义包围圈,到了近处一看,非但并不是那么充满敌意,而且有时还相当地友好。总之,多亏法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好客,戈尔巴乔夫夫妇有机会坐在对方提供的雷诺车上,从巴黎到马赛跑了数百公里,他们不仅可以鉴赏法兰西的美景,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人们的善意,感受到令来自严酷的苏联现实生活中的人觉得不大习惯的无拘无束、轻松自然的气氛。

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是首次碰到"德国问题",多年之后,他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他喜欢讲联邦德国一个加油站老板跟他聊起了关于自己被分裂的国家的话题。政治上训练有素的戈尔巴乔夫论据充分地向他解释说,分裂的责任应当由发动战争的德国法西斯来承担,并且顺便提醒说,与其说是斯大林,还不如说是盟国的首脑太"爱"德国了,他们认为德国最好是至少分成两半儿。然而即使在作了照他的说法是完全公正的批驳之后,接下来提出的问题依然无法解答,德国人问道:"*那要是把你们的国家和首都分成两半儿,你们又该怎么生活呢?*"

最初的几次出国访问,赖莎都是满载而归,不仅是在博物馆里写

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巴黎和罗马所留下的极其兴奋的印象，而且还有关于使她惊讶不已的加里波第[1]“双纪念碑”的回忆：与这位统一意大利的伟人并肩而立的，是他妻子阿尼塔的雕像。当时这一不可分割的家庭与精神同盟的象征只不过是印象镶嵌画中的一根线条而已，然而后来，这个意大利民族英雄妻子的石雕像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脑海中浮现，看来也绝非偶然。

尽管有了前程远大的开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使戈尔巴乔夫青云直上、几乎到达“政治苍穹”的迅猛起飞，至70年代中期，他的党内仕途的风帆耷拉下来了。国家进入了晚年勃列日涅夫的风平浪静时期，像他这样年轻、充满活力、多少还有点信仰的州级领导人，对于这一由上面决定的风平浪静之不合常理感受最为强烈。其实他们的人数并不太多。罗伊·梅德韦杰夫说得对：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地方官员的衬托下，看起来像个“非典型的书记”。而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南部各州的邻居——克拉斯诺达尔的梅杜诺夫或者罗斯托夫的邦达连科，就显得典型多了。他们及时地向莫斯科报告成绩，也不拿多余的倡议去麻烦中央，他们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央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英明领导，以换取事实上的完全逍遥法外。其结果，任何申诉，来自地方的有关这些大公采邑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信号，都原封不动地转到了当事人手中，以便“采取措施”，而党的监察委员会业已开始的例行“检查”也平安地半途而废(个中原因也包括地方当局为莫斯科监察人员所设下的酒宴)。

戈尔巴乔夫并不因为他在这些人的衬托下显得标新立异而感到难为情。他当然是按照一般的游戏规则行事，并不逃避像劳役一样给所有党的机关分派的差事，使用的也是苏维埃和党的官员那种特殊的官样文章的交际语言。不过在参加当时人人有份、早已被当成无法避免的背景噪音的宣传鼓噪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尽量不过分卖力，尽量不超出党员最低要求的界限，并且突破形式上的礼仪的框框，敢于“顶

---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　意大利民族英雄。

撞”上司（当然不是最大的上司）。“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一个劲儿地对上司随声附和，不能老是发出‘伊万·伊万诺维奇，您的想法和说法真是太精辟了！’之类的赞叹。”他这样说道。他同要求下属毕恭毕敬地老实听话和作崇敬状的基里连科、契尔年科之流“没有搞好关系”，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吧。与此同时，这位胆大包天、却“为事业操心”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引起了政治局中地位同样显要的人物如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等善意的兴趣。

对他颇为赏识的还有当时尚未进入半昏睡状态的勃列日涅夫本人。勃列日涅夫将戈尔巴乔夫写的报告分送各政治局委员，在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前夕表示一定支持他，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说“应当支持具有首创精神的年轻人，既然我们把他们提拔上来了”。不过随着总书记日益衰老，他对“来自下面”的想法也愈来愈没有兴趣。何况在同总理柯西金的角逐中彻底确立了自己无可争议的威望之后，上面提到的“快速支持集团”对勃列日涅夫说来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机关权势集团感觉到了勃列日涅夫对其“被庇护者”渐渐失去兴趣，便起劲地制止这个“暴发户”。他们明显地向戈尔巴乔夫暗示没有必要“忙乎”，并且颇具示威意味地将他归入中央委员会“后排议员”的范畴。他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八年间，从未获得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权利，尽管每次都认真地报名发言。“老是让‘可靠的人’发言，”他抱怨说，“无非是来自罗斯托夫、萨拉托夫、秋明的书记，事先就知道他们要讲什么。”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觉得这个“非典型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是个异己分子，他们尝试过拆他的台。当初权倾一时的内务部长、勃列日涅夫全家的好友晓洛科夫希望找到诋毁戈尔巴乔夫的材料，便开始整他，由于晓洛科夫的部下擅自行事，戈尔巴乔夫与他发生了冲突。这位部长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自己的亲信说：“要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而黑材料没有找到，至于策划更大的专项行动，晓洛科夫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勃列日涅夫每况愈下，极端节制的安德罗波夫时代即将来临，戈尔巴乔夫明显地深受未来总书记的宠爱，他得到了从中央委员会的后排挪到前排的机会。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的老后台库拉科夫，也经常提起这个自己一手栽培的人。戈尔巴乔夫曾写出关于农村问题的详尽报告，长达 70 页，"未经梳理"，库拉科夫吩咐砍掉一半，并在事先征得勃列日涅夫同意的情况下，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这份文件并未在当时的农业中引起一场革命或者像样的改革，它被平安地送到党的档案馆收藏，然而这篇署名报告"规定印数"的事实本身，就无疑提高了作者在其他中央委员眼中的地位。

1978 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终于得到登上主席台的机会，他"后脑勺感觉到"主席团那充满怀疑和警觉的沉默，他讲出了去除人们疑虑的、关于如何使农业摆脱令人难堪的受抚养者的地位的主要想法。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这是在申请发表非正统的意见）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他在党的机关面前的公开亮相。行家们立即摆开了官场的纸牌卦，试图算出上面有意让他担任什么职位。至于几个星期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猜到。

苏共中央书记库拉科夫显然已在自己的身边为戈尔巴乔夫物色一个显著的新位置。库拉科夫当时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不时"玩弄"一下自己可能登上梦寐以求的总书记宝座的想法。应当开始为这个哪怕相当遥远的前景组成自己的班子。在很多方面都多亏了他的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应当在班子中占据中心的位置。然而一个人，即使身为政治局委员，也顶多只能推测推测，至于能否实现，全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库拉科夫在将自己的"继承人"弄进中央委员会之后，他可以做到的，莫过于将自己在克拉姆林宫领导层的职位让给此人。为此就得腾出这个位子。果然如此，数日之后，库拉科夫由于命中注定的"违反作息制度"，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猝然去世。神圣的位子空了出来，戈尔巴乔夫居然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第二章 “牛头不对马嘴”

“小灌木丛”

1978年12月，米哈伊尔和赖莎迁往莫斯科。迁往自己的莫斯科：莫斯科使他俩相识，又送他俩踏上幸福的家庭航程。然而谁都知道：不可两次进入同一条河。23年如过眼烟云，这里的一切都起了变化，首先是他们自己变了。米哈伊尔变成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变得稳重了，已经谢顶，头上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已经拥有顺利而自信的党和共青团工作的经历。这位全国主要地区之一的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学会了如何去打开莫斯科主要接待室的大门，也摆脱了面对明光耀眼的办公室的主人时诚惶诚恐的感觉。他并不认为调到莫斯科是个什么意外的礼物，并不认为应当为此感谢命运、感谢每个政治局委员，而认为此乃理所当然。他丝毫也不因自己成为最年轻的苏共中央书记而感到难为情，这倒莫如说是个证明，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证明他对于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种种机会作了最佳的安排。

赖莎也已判若两人。当年那个一往无前的哲学系女生、无数次大学辩论的积极参加者，如今成了充满自信的年轻妇女，有志从事独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不愿以丈夫的仕途命运为转移。只是后来，已到了莫斯科，赖莎才不得不逐渐退至戈尔巴乔夫的身后，尽管不是马上，但她意识到，开导丈夫，为他提供咨询和保护，倒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眼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正在不无遗憾地同有条不紊的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夫人"的生活方式告别，迫不及待地准备同莫斯科相会，并且预感到她的米哈伊尔也将面临新的、尚不知晓的命运。

尽管戈尔巴乔夫夫妇多年工作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却很难将他们归之于外省人的范畴，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年轻时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且正值具有转折性的50年代。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自学。为了与他那个农业边疆区的行家们——农业区的书记、农庄主任、机械师平等交往，除了法律系毕业文凭之外，他又多了一份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毕业文凭。

如果说继续学习的动力来自工作上的需要，来自大学所激发出来的对新知识的渴求，那么对于国外政治书籍译本（向小范围官员提供的信息）的阅读，就是所谓的出于个人兴趣了。他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诸如葛兰西[①]、陶里亚蒂[②]、波法[③]之类马克思主义"异己分子"的著作。在这里，他和赖莎又一起阅读了当代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哲学家——萨特、马尔库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

出国访问也有助于戈尔巴乔夫开阔视野。有一次出访归来，赖莎甚至向丈夫提出了一个显然是反苏的问题："米沙，为什么我们的生活

---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著作多种。

②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　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共创建者之一。

③ 波法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苏联史》（两卷本）、《从苏联到俄罗斯》等。

不如人家？"这个问题在斯塔夫罗波尔找不到答案。只有寄希望于莫斯科了。

在过去的20余年中，变了的岂止是戈尔巴乔夫夫妇，等待着他们的莫斯科，也已今非昔比。这已不是他们所记得和熟悉的那个斯大林时代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时代的莫斯科，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莫斯科。此外，他们也不会降落在斯特罗门卡大街那古老而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学生宿舍，而是降落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党的高级官员的"居留地"——停滞王国。

这个尖刻的术语（停滞）本身，同任何一种到改革时代得到官方首肯的陈词滥调一样，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它既不反映苏联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不反映社会中所积聚的未来变革的征兆。就连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初期，也与晚年许多笑话中的人物毫无相似之处。

1964年10月关于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被解职的消息，在国内、当然也在党的机关引起的那种喜忧参半的心情，如今人们已经不大记得了。新上台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宣布"集体领导"为自己的信条。起初，特别是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许多不仅把党搞得沸沸扬扬，而且如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那样也把世界搞得沸沸扬扬的反常行为之后，乐观主义者几乎把这当成是苏联民主发展中的最新成就。

当然，其时已对赫鲁晓夫感到厌倦、尽管对他仍心存感激之情的"六十年代人"，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总理柯西金的身上，以为恰恰是柯西金会成为"三驾马车"中的"辕马"，由于他十分在行，讲求实效，而且显然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可以让党的官僚无法接近治理国家的杠杆。然而，就连总理最初那些可能削弱党对权力的垄断的新举措，也迫使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剑拔弩张，"三驾马车"中的全权代表——勃列日涅夫当即加以利用。

其实，新上任的总书记本人也绝非党的官僚所安插的毫无个性特点的代理人。他也有自己的癖好，并具有一个阅历丰富者的清醒理

智。例如，戈尔巴乔夫回忆起，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预算资金分配问题，乌斯季诺夫和戈尔巴乔夫分别代表“国防与面包”相互冲突的对预算资金的需求，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勃列日涅夫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明确暗示（至少在那个阶段）将面包放在第一位。

然而，本来善于搞妥协的勃列日涅夫，他那小心翼翼的清醒理智到转折关头必然成为体制和权力的最高逻辑的祭品。因为保住体制和政权是老广场灰色大楼住户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个比“糊口粮食”和国防更为重要的概念。因此，凡是胆敢挑衅体制的人，均受到政权的残酷镇压。例如，仅仅时隔一年之后的1965年，起初曾试图呈现自由主义色彩的体制就将铁拳砸到了两位危险的“离经叛道者”——西尼亚夫斯基和尤·达尼埃尔[①]的头上，他们竟敢无视禁令，在国外发表自己的讽刺作品。

不过，“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才是新政权同政治经济改革思想调情的真正结束。“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一离经叛道的构想，在莫斯科看来就无异于可与北约侵略相提并论的战略性威胁。“我们不会让你们离开的，”勃列日涅夫像老师对学生一样向杜布切克解释全球社会主义的引力规律。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还是坦克。（借助克格勃“不让”千万个“拒服兵役者”“离开”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时隔十年之后，实际上用同样的语言——“我们不可失去阿富汗”来证明体制规律的作用，同时也为自己在开始阿富汗战争的决定上签字开脱。）

读者已经熟悉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的同窗好友姆雷纳尔日，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的领头人之一。大学毕业后他们多年没有见面。1967年，戈尔巴乔夫已经是个著名的党的干部，姆雷纳尔日利用自己到邻近的格鲁吉亚访问之便，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看望老朋友。戈尔巴乔夫在矿水城机场迎接他。整整两天，他们在山中漫游，为姆雷纳尔

---

① 尤里·马尔科维奇·达尼埃尔(1925—1988)　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和《赎罪》。1966年在“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件”中因在西方发表讽刺性作品受到从事反苏活动的指控，并被判刑。

日采集甲虫，知心的话儿说个没完。客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讲述了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当权、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触即发的形势。回到家里已是夜半时分。赖莎因他们“到处流浪”和野餐之后不大清醒而感到气愤，差点没有将两人关在门外。“姆雷纳尔日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比国内的任何人都亲近，”戈尔巴乔夫有一次承认道，“我们还一起去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呢。”对他俩说来，这次葬礼可说是延续了整整一生。

1969 年，戈尔巴乔夫与当时托木斯克书记利加乔夫一起，作为党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队队员来到布拉格，协助进行“正常化”工作，他已见不到姆雷纳尔日：照当时的说法，姆雷纳尔日已被“除名”，也就是开除党籍，这位原来的党的思想家在博物馆当管理员，自然属于“不可接触者”一族。姆雷纳尔日亲身体验到了体制的凶残性，可他还曾经梦想完善体制以便将其维持下去呢。他从未因戈尔巴乔夫将他从电话簿上除名而责怪过老同学。他本身就是党的工作人员，不久前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看来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他的苏联朋友随着步步高升、一步登天，其生活已渐渐受到严格的限制，他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不会忘记他的。果不其然。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无需再向上面汇报他的社会关系了，就自己四处寻找这位失宠的同学，其时姆雷纳尔日已经以政治侨民的身份在奥地利定居，他应戈尔巴乔夫的邀请来到莫斯科。不过即使有了新的地位作保护，戈尔巴乔夫也依然不事声张地接待了他，以免招惹苏捷两国的某些人。姆雷纳尔日想必是甚感遗憾：他的这位大学室友为什么不在 20 年前、也就是 1968 年春天就入主眼前这间办公室呢。因为当时谁都清楚（也许“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除外），根据社会主义的自然规律，只要体制在其中心——莫斯科的坚冰尚未打破，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在“单独的一个国家”获胜。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义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迅速倒退。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在冻结体制下过太平日子的梦想开始实现了。泱泱大

国如同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大船，已操帆停泊。愈来愈显而易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完全是依靠核武器维持着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其他指标，它已迅速接近二流国家。

自然，要冻结两亿人口大国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种生活按照自身的逻辑，正裂解、分开、分离为现实与假象两个部分。在这个愈来愈大的缝隙中，非官方的影子经济和并行的隐蔽政治各得其所。宣传鼓动部门的宣传愈来愈难以抹平现实生活与其宣传画形象之间日益扩大的间隙。

随着国家领导人渐入老境，他们愈来愈愿意从现实世界进入虚幻世界。为了适应订货人的需求，作为体制仆人的党的机关的职能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主要任务一贯是捍卫体制，使之免受震荡，免受外部世界变革的影响，这种变革可能动摇和削弱体制。如今对党的官僚来说，这样的“外部世界”渐渐地不是国外、西方，而是本国了。

党的官僚感觉到，像原先那样依靠尚未消失的公民对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信仰以及斯大林式的恐怖来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已不可能，于是便开始营造自己的可以堵住外来过堂风的官员小天地。模拟生活和向上面传递安慰性的信息就成了机关的第一要务。同当时的一则笑话完全吻合：一群苏联领导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静止不动的火车车厢里，他们“放下窗帘”，准备把为他们服务的列车乘务组的热心喘息声当成机车噗噗的喷气声。假装摇晃的列车愈来愈让人想起卧车车厢。

中央对地方的惟一期望就是报告“劳动成果”，而集中在党的智囊团——中央委员会以及为之服务的科研机构内的官僚精英，则终日冥思苦想，为总书记在党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硬凑出新的提法。不仅国家政治生活、而且包括其他生活领域的日历，已渐渐地不是按照四季交替甚至不是按照日出日落来确定，而是按照总书记的公开讲话以及他那愈来愈少的国内巡视来确定。

当局已无法去阻止“窗帘外面”的生活洪流，于是便尽量封锁来自“山那边”的消息。出国几乎成了主要的职务特权。进入图书馆的珍品部和专用阅览室，同进入特殊供应商店一样受到严格控制。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和全球通信联系飞速发展的时代，当局通过克格勃对复印和传真严加禁止。电话簿上带有“用于公务”的字样，地图和大城市的平面图出版时故意出错，以便迷惑潜在的侵略者。

问讯处禁止向普通公民提供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对“敌对之声”的无线电干扰开到最大功率，苏联曾经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葛罗米柯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一条主要外交倡议却是禁止卫星电视广播，因为据说它侵犯了国家的边界。安装卫星电视天线自然被定为政治上持不同政见、也就是刑事犯罪的一种方式。苏联两位70年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均被放逐：一位放逐到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和收留索尔仁尼琴的作家亨利希·伯尔[①]得知他被放逐时，飞机已经起飞），另一位放逐到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均不得进入的保密城市高尔基。

尽管如此，拼命控制一切的体制却无法摆布主要的时间——生物时间。日渐衰老的领导人别说是拉紧缰绳，就连拽住缰绳都已力不从心。勃列日涅夫愈来愈对管理党和国家不感兴趣，甚至几次提起自己打算退休的话题。然而，党的王位周围的“同志们”不肯让老爷子退休。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摇摇欲坠，把体制的稳定当靠山，二是那些内心里设想过黄袍加身的可能性的接替者，不愿意让自愿退休的先例对权力终身制原则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愈来愈变为15—20分钟、让每个人都感到累赘的仪式。勃列日涅夫早已不再同乌斯季诺夫争论面包与国防何者优先的问题，他完全放开了军工综合体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院外活动

---

① 亨利希·伯尔(1917－　)　联邦德国作家，短篇小说大师。著有反法西斯社会批判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九点半钟的台球》、《一个小丑的看法》、《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像》。

分子和共和国书记的手脚。需要立即作出反应的问题由“小范围”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的忠实侍从——中央总务部长契尔年科处理。契尔年科从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当书记时就如影随形地陪伴左右。愈来愈多地出现这样的场面:正是他站在勃列日涅夫的身后,躬下身子,将头部贴在总书记的耳边,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翻弄摊在桌上的文件,宣布对某个议题的表述。

整个讨论程序(应该说是批准程序)往往仅仅归结为与会者“全明白了”的一片讨好的喊叫声。据戈尔巴乔夫回忆道,为了装装门面而邀请到会的部门领导人,往往刚到门口就得向后转,如果处于半衰竭状态的总书记对某个问题感兴趣,那么讨论也仅仅限于在勃列日涅夫旁边就座的几位“资深”政治局委员之间进行,坐在长会议桌另一头的人很难听清其中的内容。勃列日涅夫“贵体欠佳”时,就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医院为他搭建了一个接待室。为了简化手续,往往由契尔年科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将需经政治局委员批准的文本分发各位,然后在并未举行的会议的记录上加盖病病歪歪的总书记的橡皮签名,再将这一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决议正式颁布。

这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常规,对于占政治局绝大多数的总书记的同龄人肯定起了安慰的作用,却未必会使下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战地领导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州委书记感到满意。与克里姆林宫那些老爷子不同,他们不能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们这些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如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或者叶利钦,对于完成计划、及时收割庄稼、“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和冬季取暖均负有个人的责任。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国家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日夜辛劳,其中许多人对于莫斯科那些头面人物的镇静自若,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

在致赖莎的信中,戈尔巴乔夫对“麻木不仁者”的权力体制进行了思考,他挖苦起来毫不客气,谈到效率低下、高度集中、滥用私人关系和任人唯亲。他举出了诸如对任何新事物的本能的不接受、中央关于地方情况的扭曲信息(“虚报成绩和地地道道的弄虚作假比比皆

是”)、机关的一窍不通等等现行秩序所滋生的弊端。这也并不奇怪：地方上选拔党和苏维埃干部时，先看是否具有为自己和外来的上司安排打猎、垂钓和光顾澡堂的本事，并不自今日始。

以下是又一位第一书记（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的叙述，此人无论性格还是生活经验都与戈尔巴乔夫迥然不同，他说：“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走下坡路。其特点是巨额军费用于军工综合体。劳动生产率日益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工艺方面的距离日益加大。”一个经历过与改革有关的希望和失望的人所说的这番话，作为苏联官员中最积极的阶层的典型情绪的反映，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党的机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表现出来，那就是“社会电梯”完全陷于停顿，即干部的上下流动大大减缓。由于实际上的党的寡头的王朝式统治，干部流动系统受到破坏。那堵塞党和国家血管的血栓，不仅使中央临床医院的主顾、而且使整个体制都开始面临梗塞的危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几乎相信自己长生不老的党内高层，迫于子孙的压力，悄悄地开始将国家别墅，甚至位高权重的职务即权力本身也遗留给后代。

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体制所培养的最有活力、最骄矜的人的提升，是通过定期进行的、可以创造新的空缺的“清洗”和迫害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停滞时期，职务升迁的机会就得等上几十年。尽管如此，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僚（定期举行的会议、代表会议和党校学习班甚至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为安德罗波夫所说的体制的‘小灌木丛’的组成人员提供了无数次见面机会），当时都没有把总的形势看成体制的危机。”大多数人以为，只要让早该退休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退下去，国家的问题即可较快地得到顺利的解决。

不错，安德罗波夫在矿水城休养期间，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稍稍提到了这个想法，原以为可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安德罗波夫却毫不客气地制止了这位年轻的同乡，还给他上了一堂传授官场奥秘的课，

他说："米哈伊尔，要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此事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稳定，也关系到国际的稳定。"身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安德罗波夫几乎将这神圣的稳定当成真正的宗教，他当然不可能知道，时隔不久，对他这番谆谆嘱咐洗耳恭听的戈尔巴乔夫，就将神圣的稳定不当回事了。

当然，戈尔巴乔夫那时同样没有料到这一点。十年之后，原苏联总统在访问斯坦福俄罗斯研究中心时，决定从问题开始与专业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对话，他的问题是："十年前你们能够想像到苏联会发生这样的事变吗？"全场哑然，后来一位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教授以问作答："那么您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平素随机应变的戈尔巴乔夫当场竟一时语塞……

成长中的党的接班人尽管经常在他们的"男子聚餐会"上（共和国和州委第一书记中无一女性）大发牢骚，甚至可以讲那些稳如泰山的政治局委员的坏话，但是自然谁也不敢公开地提出批评。当然，在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没有哪个进入"官名录"的人会担心夜间被捕。不过也很清楚，党的"大臣"们所受到的相当无拘无束的待遇，是以他们绝对的、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忠诚作交换的。大家对1957年的事件还记忆犹新，当时向赫鲁晓夫挑战的几个政治局同僚，一夜之间成了"反党集团"。毫不客气地先后被赶下台的，还有神奇的元帅朱可夫，号称"铁腕费利克斯"②的继承者"铁腕舒里克"——积极得令人生疑的谢列平③。

---

① 指勃列日涅夫。

②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曾任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任。因此有"铁腕费利克斯"的别号。

③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18—1994)　政治活动家。曾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党中央书记等职。后来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排挤。"舒里克"系亚历山大的昵称。

虽说所有这些按斯大林时代的标准看来还算温和的清洗所涉及到的人，要么敢于对党内头号人物的威信提出异议，要么被视为有此种能力，却没有哪个新提拔的干部愿意去冒这个险。此外，别看老爷子（人们愈来愈公开地这样称呼勃列日涅夫）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所代表的体制之残酷无情，已在其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况且在第一书记们眼中，总书记尽管每况愈下，也依然是机关的政治领袖，多亏了他，机关才在赫鲁晓夫"唯意志论"阶段和"三驾马车"明争暗斗的动乱时期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戈尔巴乔夫肯定也要遵循党内生活的这些简单的规则。此外再无其他的规则。如果不去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党内"上帝"的忠心教士的"成熟"，他就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飞黄腾达。雅科夫列夫提醒说："如果与体制作对，任何人都休想挤进政权机关。任何人，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这位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明白，他的提升并不归功于边疆区党组织，更不归功于当时毫无影响可言的选民，而是归功于总书记的好感，自然就不能辜负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党和人民的信任"。

在那个将随波逐流、毫无特点而不是鲜明个性当成主要政治美德的时代，戈尔巴乔夫本来就突出得有点危险。一是他年轻得"不成体统"。按照基里连科在勃列日涅夫生日庆典上含有奉承意思的说法，国家领导精英的"平均年龄"为 70 岁，而戈尔巴乔夫挤进这个圈子时还不到五十。二是生平中几乎应该受到指责的、使他与党内其他头面人物相去甚远的事实——文化程度。持有两个毕业文凭的他，俨然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苏联领导成员的眼中，这简直是个令人生疑的身份，因为其他人通常都是工农速成中学、党校、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或者顶多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

在中央组织部看来，只有戈尔巴乔夫的工农出身可以作为原谅他"文化程度过高"的理由。在大学期间入党时，区委的人劝他这个世袭的农民在履历表上填"工人出身"，因为他当联合收割机手不是在集体农庄，而是在国营农场，也就是国营企业。当时区委的这些教导员还

建议戈尔巴乔夫关于自己那曾受迫害的祖父外祖父“少说为佳”，以免有损自己的“履历”和他们的报表。

还有一个情况对他的党内声誉很有利：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自愿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诚然，那多半是哥萨克性格的一种表现，后来却被不怀好意的人说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期望平步青云的向上爬的步骤。不管怎么说，如今勋章获得者戈尔巴乔夫凭他洁白无瑕的履历、党和共青团的神童的任职清单，俨然一位前程远大的党的后备干部代表。他的表现也与这个形象相符，既表现出被生活弄得精疲力竭的党的领袖们所期望的充沛活力与首创精神，同时又表现出对他们的毕恭毕敬和耿耿忠心。

世界一分为二，它仿佛并不均等地分为日常的、工作的部分和纯公事型、装潢门面的部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数百名同僚都认为此乃不可动摇、牢不可破的事实。因此，这个“机关一代”中的人们，就可以当众吹捧《小地》一书的作者、颂扬这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的英明，到了私下里、远离旁人的耳目时，就会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一样，对国内的情况表示愤慨，一致认为“*一切都烂透了，也不可能长此以往*”。至于这个“长”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人人都首先把希望寄托在自然规律上（此外再无可以寄托希望的东西了），并且指望可以活到发生当时还不清楚、却反正是所向往的变革的那一天。自然规律、或者说是命运并未使戈尔巴乔夫失望。费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的去世，为他敞开了通向已经不是象征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走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大门。

负责选拔党内干部的卡皮托诺夫将库拉科夫可能的接替者的名单（除戈尔巴乔夫之外还有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波尔达瓦边疆区第一书记莫尔贡）放在“小范围”的诸位政治局委员的桌上，当时的政治局“大公”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戈尔巴乔夫。

然而，提拔高级政治领导人的生产程序要求当面"相亲"，哪怕是象征性的也罢。"相亲"的机会也来得正是时候：勃列日涅夫要前往他的一个宠爱者阿利耶夫所在的阿塞拜疆进行早已许诺的访问。专列需经过矿水城，途中理所当然的停靠就可用来举行哪怕是走走过场的与当地领导人交往的仪式。除了斯塔夫罗波尔领导人之外，前来迎接勃列日涅夫的还有正在矿水城休养的安德罗波夫。也不排除他是"相亲"舞台调度的导演之一，他为戈尔巴乔夫提供庇护，此次亲自出马，为的是保证仪式善始善终。

矿水城车站会晤后来几乎具有了神秘的性质：专列在车站停靠时，四位（！）总书记在站台上相聚，一位是现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还有三位是未来的总书记——前来作陪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以及戈尔巴乔夫。在驱车前往车站的途中，安德罗波夫仿佛是在将自己一手栽培的人往前面推，他嘱咐道："谈话就得靠你来掌握了。"可谁知谈话居然无需"掌握"：压根儿就没有怎么交谈。随从毕恭毕敬地稍稍落在后面，以总书记为首的四个人在站台上漫步。勃列日涅夫心不在焉地听着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汇报，几乎毫无反应，直到抓住车厢扶手时，才突然向一位陪同者提了个问题："讲话如何？"戈尔巴乔夫起初感到莫名其妙，以为总书记说的是即将在巴库发表的讲话。直到后来才有人对他解释说：勃列日涅夫在中风之后，曾一度失语，因此他对周围的人能否听懂他的话没有十分的把握。

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通常总书记作了介绍之后没有人会提任何问题）之后，新当选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满怀热望地去晋见勃列日涅夫，以便讨论工作的主要方向，谁知谈话却与矿水城站台上的那次一样地干巴：总书记默默地听着这位刚毅的新手的表白，他脑子里更多地考虑的是永恒的问题，而不是日常琐事，总共只说了一句话："库拉科夫真可惜啊。"恐怕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值得惋惜的，是因为假装从事国事活动而折寿的勃列日涅夫。然而首先值得惋惜的，倒是由他这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甚至已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的人所领导的国家。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选出新的中央书记的消息倒是在西方引起了比莫斯科更多的激情。在美国举行的关于苏联形势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最勤于思考的苏联政治研究者、牛津大学教授阿奇·布朗说道："昨天莫斯科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新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布朗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这番意味深长的话，其实并无任何根据。不过是一种预感而已。然而他有先见之明。

"别急于求成，米沙"

等待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的书记生活，是给他派的贴身警卫、停在大门口的吉尔车以及老广场上那间内设接待室和休息室的宽敞的办公室。开完中央全会回来，门口肯定已经挂上写有办公室新主人姓名的牌子，这是不成文的规定的要求。此外，在"书记成套待遇"中，还有莫斯科市内住宅和郊外别墅，配有与卫队同属一个机构的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两名轮换上班的秘书；1—2 名助手；大名鼎鼎的卫生部第四总局及其属下的门诊部、医院和疗养院；"克里姆林宫特供点"——食堂和食品店，它们所供应的东西，照当时的标准看来堪称神话般的美味佳肴。

戈尔巴乔夫来自食品充裕之乡，加之他又是像农民一样对食物不大挑剔（他在周游世界和与国王、总统的交往中，始终没有培养起对于精美食品的兴趣），勉强凑成的中央委员会的美味佳肴并未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不过作为一个从户外来到久未通风的室内的人，他立即感到缺氧。公家的别墅里，弥漫着军营的气息，至于其中的住户，尽管被认为是泱泱大国的执政者，本人却实际上置身于自己卫队的"罩子"之下。夫妻俩只有在别墅小径上散步或者休养中护送他们的"贴身警卫"毕恭毕敬地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时，方可就稍微随便的话题进行密

谈，这绝非偶然。至于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就连中央书记之间就微妙的问题交换意见，也是通过交换便条的方式来进行。其结果是，跻身党的高层、从而实现了大多数党的干部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后，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说法，他开始感到“比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自由少了”。

赖莎对于所发生的变化感觉更加痛苦，也许是因为她对返回莫斯科寄予特别的希望。她为丈夫的升迁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活和教学工作，她起初曾指望给自己找个什么事儿干干。这位精力充沛、独立不羁、主要是年纪轻轻的女人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于她所进入的圈子的一种挑战，这在中央委员会的“贵妇人”中间引起了完全可以解释的反感。必须让这个外省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而且说到做到。在最初参加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风度优雅的赖莎由于不懂得莫斯科的规矩，站到了按自己丈夫的地位不该站的地方，基里连科夫人当即向她指出。这次找碴儿骂人把赖莎搞得目瞪口呆，她事后不知所措地问丈夫：“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为克里姆林宫的习俗挨了一顿训，诚然，这次没有那么令人难堪，因为那是来自对他宠爱有加的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安顿下来之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最先邀请安德罗波夫偕夫人前来作客，他以为就他们多年的同志关系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令他大为吃惊的是，安德罗波夫不但婉言谢绝，而且还给这个自己一手栽培的人上了一堂课，解释说今后他们之间的接触都是官方性质的，“意外的”会面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我还没有出门(他住在与戈尔巴乔夫一墙之隔的别墅里)，那边就该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作为克格勃首脑，他深知其中的厉害。

他还给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宝贵的忠告，这次是政治上的：要清楚地表明自己在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明争暗斗中的立场，这场斗争当时几乎已进入公开化的阶段。晋升为党内“将军”，就需要以实际行动报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柯西金倒是给戈尔巴乔夫帮了忙，他以自己惯常的冷淡态度，对这位新任中央书记关于向农业增加拨款的要求反应

消极，他毕生致力于发展工业，对于通过国家输血来振兴农业的想法表示怀疑，认为这是白糟践钱。作为血统农民的戈尔巴乔夫，就与柯西金争论起来，身为主管此项工作的中央书记，他要为农业争取新的拨款。

不久他们两人之间（当着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面）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有一次柯西金就此问题说了一番刻薄的话，戈尔巴乔夫火冒三丈，而且不合身份地冒昧提出让柯西金试试由部长会议机关而不是党的机关来抓各地的收割工作。他公开向一位政治局大佬挑战，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不料戈尔巴乔夫不仅选对了反击的对象，也选对了反击的题目——维护党的机关，于是勃列日涅夫当场站到他的一边，对柯西金说："阿列克谢，你毕竟对收割工作不大了解嘛。"戈尔巴乔夫为此事深感内疚：他一向尊重柯西金，十分珍惜他俩之间仿佛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时期即已确立起来的私人关系。不过柯西金很快就亲自打来电话，主动表示愿意和解。

经验老到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将戈尔巴乔夫此举解释为当众向总书记表忠心。此事之后不久，立刻看出门道的中央组织部选中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只是处事谨慎的苏斯洛夫稍加阻拦，依他之见，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利益出发，当个候补委员足矣。

照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说法，他对于调往莫斯科工作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提出问题："我能否使情况确实有所改变？"自然，年轻、自负和天生的乐观主义都促使他向所有的人证明：他一上任，苏联的农业就会改观。他每天下班很晚（据利加乔夫回忆说，到莫斯科来的书记们知道，晚上九点甚至十点都可以在办公室里见到戈尔巴乔夫），成天"倒腾"数不清的报告、报表、分析材料和参考材料，脑子里掌握了一大堆数字。召开会议，会见学者——农学家、经济学家、甚至社会学家（他就是这样同扎斯拉夫斯卡娅认识的）。他时而从这个角度、时而又从那个角度来到粮食问题这辆"车子"面前，希望推动它。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改革农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最终都退居次要地位，

依然是重复他的所有前任那些习惯性的奔忙:冲销农村的债务,为农村争取更多的贷款和购买国外的粮食。

至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已经相当适应了,通过观察自己那些充当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同僚的活动,首先是代表欲壑难填的军工联合体的乌斯季诺夫的活动,他明白了自己也只有如法炮制。惟一情有可原的,大概就是他与乌斯季诺夫不同,他是为黄油争经费,而不是为大炮。不过他已经开始明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非一日之功。由于他的坚忍不拔,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仅支持召开专门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而且同意"亲自"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按照机关的游戏规则,能够将总书记请到讨论你所分管部门的问题的中央全会上来,就是一大胜利。尽管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庄严地提出粮食纲要的同时对戈尔巴乔夫主要的实际建议置若罔闻,戈尔巴乔夫却在威望方面大大得分。

然而帮助戈尔巴乔夫迅速加强在党的领导层内的地位的,主要的毕竟不是苏联农业中的进展——这点他始终未能做到(不过说老实话,谁也没有指望他创造这样的奇迹),也不是他的无可争议的外交才能——那是包括苏联官场在内任何一个朝廷都不可或缺的,而是对他另眼相看的命运。命运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自己宠儿的好感:它将日薄西山的政坛巨擘从棋盘上一一拿掉,从而为他腾出了起初直取"后"、然后直取"王"的通道……

1982年1月25日苏斯洛夫去世,貌似永生不死的政治局的磐石上出现了明显的缺口:离去的可是权倾一时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国王制造者",是他将勃列日涅夫送上权力的宝座,只要他活着一天,就可以保证勃列日涅夫手中的权力不失。苏斯洛夫的去世不仅使其他政治局委员、他的同龄人想到自己生命的短暂,而且提出了总书记接替者的问题。

舰桥上可能出现的船长更换,不应影响到航船惟一正确的航向。实际上这就是说,总书记或者第一书记的职位由第二书记自动继承,

而且换班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就不致惊动国家，也不会使紧张劳作的人民分心。这个理论上的公式在实践中就意味着真正的利益和野心之争、或者说夺权斗争，理应在确定党内正式的第二把手——苏斯洛夫接替者时展开。正因如此，这位享年 76 岁的“忠诚的列宁主义者”生命的结束，就在因这一噩耗而感到哀伤的其余同样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中间掀起了一阵互通电话的热潮。

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接到安德罗波夫的电话（调到莫斯科后他们实际上每天都在交谈），谈到葛罗米柯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电话。安德罗波夫说：“米沙，你知道他想要我干什么吗？他让我跟列昂尼德·伊里奇说说，由他来当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他说苏斯洛夫和他一样都管国际事务，就是说，完全可以胜任那个部门的工作。”“您是怎么回答的呢？”戈尔巴乔夫问道。“我说：安德烈，这是总书记的事情。”“真是绝妙的回答，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尔巴乔夫赞叹道。这个回答的确是很精辟，它不仅给外交部长上了一堂关于机关外交的课，同时也是含蓄委婉和诚实正直的榜样：安德罗波夫本人希望重返中央委员会，他是 20 多年前从中央委员会“派”到克格勃去的。

前些年，戈尔巴乔夫感到安德罗波夫为完成这个艰苦部门的工作搞得心力交瘁，每当同他谈起此事，安德罗波夫通常都是避而不谈，不过有一次，他出乎意料地忿忿地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此处“你们”指的是中央委员，自然首先是指勃列日涅夫。因此，安德罗波夫刚刚察觉到从总书记办公室吹来的、风向对自己有利、暂时还较微弱的风，就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苏斯洛夫去世后不久向他提出的建议：在传统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大会上作报告。这使他可以提醒人们，尽管在卢比扬卡①呆了多年，他并未从一个党的活动家变成目光短浅的职业肃反工作者，也使他可以展示对于苏联社会中的进程的个人见解，自然不会超出时代的意识形态框框。当然，只有苏斯洛夫在维护体制稳定方面的惟一竞争对手——克格勃领导人，才敢于有这种近

① 卢比扬卡系克格勃总部所在地。

乎挑战已故党的思想家的正统构想和僵化公式的勇气。

戈尔巴乔夫在得知报告人的选择后，当即打电话向安德罗波夫表示祝贺："我的理解是，第二书记的职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对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米沙，别急于求成，"安德罗波夫答道，几乎整整一生他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然而，他还是不能"探出身子"、不能急于求成：他还有比葛罗米柯更加厉害的竞争对手，排在第一位的是契尔年科，此人具有对勃列日涅夫的最终决定施加影响的一切资源。勃列日涅夫当然明白，讲出苏斯洛夫接任者的名字，就是向全党宣布自己的继承人。尽管疾病缠身、几乎瘫痪，他并未沉迷于"酬谢"契尔年科为他所尽的犬马之劳的想法，仍然选择了安德罗波夫，这要算做他的功劳。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资历最浅，按理说，仅仅凭这一条，他就被排除在可能的新的权力纸牌卦之外，然而，他在自己的后台可能搬到中央委员会楼群的一号门第五层的问题上，并不掩饰自己的热情。"您不能逃避这个职务，"他劝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同志道，尽管安德罗波夫并不打算逃避，听到这话也是舒服的。如果可以用"友谊"来表示他们之间无疑是特殊的关系，乍一看这个术语难以解释，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年龄上的差距，自古存在的、按照机关的标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政治局委员与外省党的书记之间的差距，以及无法相比的生活经验的话。如果认为这是克格勃首脑对年轻的同乡的个人喜好，或者对于在基斯洛沃茨克接待过他的机灵、殷勤的"疗养地书记"的好感，那就未免太浅薄了。像这样事先就准备竭力表现出殷勤好客、围着前来疗养院康复的党内大臣转的"同乡"，难道还少吗！有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使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人亲近起来。

也很难设想戈尔巴乔夫已经有了成形的升迁打算：安德罗波夫的清心寡欲和墨守成规是众所周知的，况且并不拥有直接对戈尔巴乔夫的升迁施加影响的资源的克格勃首脑，未必能够促成他的提拔。很可能恰恰相反，正是起初这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年龄和工作范围方面的巨大反差，才使他们相互接近的。他们相识于 1969 年，时任斯塔夫罗

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叶弗列莫夫派自己的“二把手”去基斯洛沃茨克完成例行任务——向在此休养的政治局委员表示敬意，作为走过场介绍一下边疆区的情况，并回答对方作为走过场提出的问题。让戈尔巴乔夫大为吃惊的是，他碰见的这个人许是由于理所当然地脱离苏联边远地区的生活吧，居然不厌其烦地详细询问起这方面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对这位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感兴趣，也许起初是把此人当成一扇独特的通往现实世界的窗户，或者按照他那个部门的术语，当成提供关于日常生活的可靠信息的宝贵“来源”，他从在编情报人员那里得不到这样的信息。他们的见面渐渐成了定期的、非正式的交往，不过仅限于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地面上，“从未在莫斯科进行过，”戈尔巴乔夫证实道。他们两人或者两家在一起长时间地游玩，去野外，搞野餐，这时他们可以“又喝又唱”，玩多米诺骨牌（玩牌时安德罗波夫总是坚持他们两人搭档去对付别人），听维兹布尔和维索茨基演唱的歌曲，自然，还“讨论一切问题”。在一次两家一起出游时，安德罗波夫对大学生的思想状况颇感兴趣，便向职业社会学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详细打听这方面的问题，谈了两三个小时，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都退到一旁，以免打扰。

然而，安德罗波夫对与戈尔巴乔夫交往的认知和实用方面的兴趣，当然不足以说明他对于自己在外省发现的这位党内天才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几乎是慈父般的眷恋。可能当时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吸引他，不仅是因为本人的个人品质、开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无论从出身、教育程度和所走过的道路来看，均堪称体制的示范产品，而安德罗波夫本人为巩固这个体制，可说是做到了呕心沥血。有些类似神甫卡尔洛用一块无生命的木头亲手凿成的布拉基诺突然开口说话；或者是已经倒地、日益干枯的树干突然冒出绿色嫩芽，连守林人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个显然气数已尽的制度的领导人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像这样年纪轻轻、充满活力、比他们自己更有文化、而且还相信体制的合理性

及其潜力的接班人吗？领导人对于自己毕生事业的前途可不是无动于衷。这个“小灌木丛”在他们眼中应当是希望的化身，与此同时，应当不仅不辜负他们付出的精力，而且也不辜负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和良知所作的妥协，像安德罗波夫这样的“党的战士”，就是在妥协中度过一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仿佛是不让自己一手栽培的人过早地感到失望，安德罗波夫在两人多年的友好交往中，几乎从不涉及国家活动中的那个“阴暗面”——他所掌管的克格勃的警察职能。“谁都知道，”戈尔巴乔夫说道，“他并不是天使，他的机关也不是幼儿园。”

到莫斯科后，他们的交往变得一本正经：没有野餐，没有维索茨基，没有家庭聚会，更没有多米诺骨牌，成了电话的交往（那是安德罗波夫仍在领导克格勃的时候）。自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后，就面对面地接触了。戈尔巴乔夫有时一天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里呆上几个小时。回首无论性格还是行为方式都迥然相异的两位政治家这段独特的“公务罗曼史”，只能对历史的嘲弄叹为观止。结果是，安德罗波夫上班时四处搜寻体制的敌人和反对派，并往往采用最强硬的方式将其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在下班后精心培育、反复训练、准备让其充当自己接班人角色的，也许就是那个惟一真正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此人如同年幼时曾被人搭救免遭袭击的赫拉克勒斯①一样，到时候就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功勋。

难怪《圣经》至今仍被奉为书中经典：教人如何不回想起希律一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他下令将伯利恒所有的男婴统统杀掉，然而，尽管如此，那个根据命运（历史）的判决要成为犹地亚国王的人，居然被藏匿起来，免于一死。离奇之处就在于，命运将培养未来国王的重任交给了充当希律一世手中宝剑角色的人。

苏联解体数年之后，有人问后来的克格勃领导人之一克留奇科夫：这个无处不在的组织，居然把那个他称之为钻进党的队伍的“叛徒”、曾就其“有计划瓦解苏联”的行动同华盛顿密谋策划的人给漏掉

---

① 赫拉克勒斯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穷，功勋卓著。

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克留奇科夫的回答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能逮捕苏共中央总书记（1991年8月实际上苏联总统还是被逮捕起来了），不过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同谋者所得到的行动自由，可以看成我们机关的严重失职。"

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说法，他与政治局中另一位"颇有权势的人"乌斯季诺夫之间的关系，岂止是亲密，应当说是"真诚"。正是乌斯季诺夫仿佛预见到这位年轻政治局委员的远大前程，有一次他对已经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戈尔巴乔夫进言："你就来领导我们吧。勤开着点儿会。"也可能这是作为回报的恭维话：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戈尔巴乔夫在同他谈话时就保证说，只要提到选举乌斯季诺夫担任总书记，自己一定支持。

大概戈尔巴乔夫只同一位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处好关系。那就是基里连科。令这位机关的元老感到恼火的，是"娃娃书记"那放任的举止以及如戈尔巴乔夫本人所说的"本性决定的不会"在老前辈面前唯唯诺诺。当然很难设想基里连科会像安德罗波夫那样，从哲学的高度来对待戈尔巴乔夫同他的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的原话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无论您还是您的同龄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你们想将党和国家交给谁呢？"不过这位外省苦难圣徒的心直口快、他的举止往往给迅速衰老的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因此大为感动，有些人则信心倍增，他们一直在考虑继承问题：既然如此充满活力、急不可待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就不愁后继无人了。

总之，用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党的宠儿"来形容我们的主人公是再恰当不过了。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成就率很高，中央组织部定期取出他的登记卡，建议让他担任中央机关的领导工作。由于组织部人员每次都在他的履历中看到法律专业背景，推荐时就主要侧重于司法部门。不是建议让他当总检察长，就是建议让他当最高法院院长。却不知为什么哪次都定不下来。最后，当戈尔巴乔夫被推荐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当家"的基里连科不满地嘟囔了一句："瞧，又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会给他派上

别的用场的。”

戈尔巴乔夫也确实派上了用场,作出决定的却不是基里连科,而是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上台的安德罗波夫。他在 12 月即亲手替基里连科写好了退休申请(其时基里连科自己已无法履行这一手续),由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就成了第二之“第二”书记:排在契尔年科之后。基里连科多年来一直稳坐这个位置。

从第二之“第二”到总书记

其实安德罗波夫早就在开始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范围了,那是在 1982 年 7 月他本人终于稳稳地坐上中央第二书记的交椅并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事情。一切都发生于勃列日涅夫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之后,总书记认为时机已到,他最终打定主意,让安德罗波夫担任这个职务,同时也确立了其正式接替者的地位。在此之前,情况始终不明朗,书记处会议时而由契尔年科主持,时而又由基里连科主持,反正两人都扮演了拾起无主指挥棒的资深党内调度员的角色。在得到总书记的首肯之后,安德罗波夫精神百倍地开始整顿秩序,据目击者回忆,他有时在会上将“*挨申斥者吓得魂不守舍,让人觉得怪可怜的*”。交给戈尔巴乔夫的任务可谓五花八门,且往往意想不到:从检查莫斯科的蔬菜水果供应情况,到为重要的干部调动作准备,或者就中央得到的关于腐败的信号(例如克拉斯诺达尔书记梅杜诺夫一案)进行调查。

短短数月时间,安德罗波夫即确立了自己作为主宰者和无可争议的领袖的地位,因而在 1982 年 11 月 10 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再也无人对于谁将成为下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表示过怀疑。尽管契尔年科希望保住自己的阵地,他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试图以死者的遗嘱见证人的身份就所谓“集体领导”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态度”

向新的总书记进言，但人人都很清楚：新的时代来临了。按照苏联的传统，与其说这必将在全新的行动上，倒不如说必将在新的任命上表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断言，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了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和瓦吉姆·梅德韦杰夫，他们在诸如经济、科学和党的组织工作等重要部门将勃列日涅夫的老近卫军排挤出去。

戈尔巴乔夫较少提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这样的人物之能够出现在莫斯科的地平线上，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不愿提及此事，多半是因为他后来同其中每个人的关系都很不简单。而且，如果说在将时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的鲍里斯·叶利钦调到莫斯科一事中，利加乔夫所起的作用更大的话，那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国外“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就是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的直接结果了，他于1983年5月去考察该国的农业（除戈尔巴乔夫之外，格·阿·阿尔巴托夫也曾在安德罗波夫面前替雅科夫列夫说情）。当时两人之间出现的政治上接近的感觉，使时任驻加大使的雅科夫列夫数月后进入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朋友的圈子，后来又进入政治局和总统委员会，再往后两人又长时间分道扬镳，在他们关于共同经历的历史性事件的记忆中留下烧毁的友谊的灰烬。

随着安德罗波夫入主中央委员会和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必然有所变化。在党的廷臣们眼中，他几乎成了继承王位的王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1983年春天在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下，正是戈尔巴乔夫受命作纪念列宁诞辰的报告。大家对一年前报告的象征意义都记忆犹新：当时作报告的安德罗波夫一个月后即当选为中央第二书记，年底又当选为总书记。

对于这位顺利地从党的孵化器中破壳而出的领导人来说，似乎一切都十分美满。他准备上前扶住危险地向下倾斜的红旗，时日无多的老人们已经不再扛大旗了，倒不如说他们是以红旗为依靠，将旗杆当拐棍使。真想不到，就在走向起点前进行准备活动的决定命运的这几

个月，党的王子却开始产生了纯哈姆莱特式的疑虑。

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时期就发现了体制那冠冕堂皇的词藻与隐藏在背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对于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的表现义愤填膺。顺便说说，仅凭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就足以让“党内寡头”注意到他，寡头们朝思暮想的是寻找为理想献身的继承人。对于他政治上的成长说来，除了农民生活所培养起来的健康的道德品质之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那就是他大部分积极活动的时间都在莫斯科之外的外省度过，而平步青云的迅速升迁，一方面将质朴的情感和清醒的理智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却又不给他以变得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所需的时间。然而仅凭这些在首都官场小天地里绝无仅有的品质，却仍然不足以向自己提出最尖锐的问题并作出回答。1983年，戈尔巴乔夫距全国最高权力宝座仅有一步之遥，他也意识到与之相应的责任，这时他开始考虑如何回答了。

很难说是什么对他当时的思考影响更大。一是起草“节日报告”，当时他读遍了所有的列宁晚期著作，也跟在列宁之后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要用新的政策来改正错误。二是加拿大之行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发现，这次已不是旅游观光者所看到的西方世界的门面，而是它的根基——高效的经济，包括高效的农业。作为一个农业地区的书记，曾有几年时间致力于“收割战役”的动员以及对农村劳动者不断的鞭策催促，他很难弄明白加拿大农场主的“自我经营机制”：既无需生产队，也无需区委的特派员。

也不排除如下最简单的、大概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将一个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和清醒理智的人（戈尔巴乔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变成了对荒唐体制构成威胁的怀疑论者甚至论敌的，肯定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山冈上一览无余的本国的悲剧性现实，而不是国外的海市蜃楼。（加拿大人曾偷听到这位俄罗斯客人在离开所参观的农场时含糊不清的话：“这个我国再过50年也做不到。”）

充当安德罗波夫的政治帮手和实际上的第二书记角色的工作阶

段，只持续了几个月。有一次二人在中央委员会见面（最后几次见面已是在医院进行）时，安德罗波夫说道："米哈伊尔，你知道吗，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要像哪一天让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这番话是1983年夏天总书记病情急剧恶化之前说的。戈尔巴乔夫当时自然没有料到他生活中的新阶段会开始得如此之快。

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看来他是壮志未酬，也未能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位值得信赖的担负党和国家领导重任的人。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干得更加负责和有效。不过也不可否认，安德罗波夫短期上台执政的主要结果，是他吸引了新的一代来担任国家领导工作。他在戈尔巴乔夫周围集聚了尽管在观点上五花八门的一批人——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到雅科夫列夫。表面上郁郁不乐、谨言慎行的安德罗波夫，在誓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一刀两断的人起跑时推了一把，这些人在这方面可以比他自己走得远得多，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也不必为过去的事情负责。

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处境立刻变得复杂化了。不仅因为他与勃列日涅夫的这位"副官"之间的关系和他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这种相互关系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党的这位新领导人太没有主见。顺便说说，是契尔年科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不知是为了感谢戈尔巴乔夫没有挡住他前往克里姆林宫宫墙坟墓的去路呢，还是他深知没有新的支撑，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就会坍塌。

另外一个现象倒更为重要，那就是契尔年科当选后勃列日涅夫时期膨胀起来的整个官场又重新活跃起来，没精打采的原领导成员也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戈尔巴乔夫在新的情况下却由一个几乎正式宣布的王位继承人降为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赐予"他的主持书记处会议的权利受到公开和非公开的非议，前景又变得不明朗了。

明显受到总书记鼓励的吉洪诺夫带头反击。紧随其后的有格里申、罗曼诺夫、多尔吉赫、扎米亚宁。这帮人很清楚契尔年科的健康状

况不佳，便竭力甩掉安德罗波夫一手提拔的人，以便为将来的决定性搏斗——夺取下一任总书记职位的斗争扫清登陆场。然而，这支忠实的勃列日涅夫分子小分队在指挥上出了问题。曾不止一次地将戈尔巴乔夫叫去进行“坚决的谈话”的契尔年科，照例是只要戈尔巴乔夫建议考虑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意见，便败下阵来。最终是乌斯季诺夫以他的威望瓦解了反戈尔巴乔夫的“小型政变”。乌斯季诺夫作为大名鼎鼎的“小圈子”的资深成员，得知有人再次试图取消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会议的资格，便找总书记进行了一次个人谈话，然后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谁都明白，主要问题（接替者）只有靠时间来解决。戈尔巴乔夫将时间用于在那些将在历史性的哀悼全会上投票表决的部长、将领、州委书记中间加强自己的地位（至于全会何时举行，只有天知道）。

他的政治上自我教育过程也在继续，国际交往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据他自己坦承，非正统的、宣传大逆不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对他影响甚大。他在前往罗马出席贝林格[①]葬礼时会见了这些领导人，而且事先就阅读了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和陶里亚蒂写于雅尔塔的政治遗嘱。

对他说来，在对必然变化的期待中度过的这一年，似乎是就内外政策进行紧张思考的时期。撒切尔夫人的印象就是明证。1984 年 12 月，她见到戈尔巴乔夫时不胜惊讶：她发现面前的这位并不是苏联体制冲压出来的又一个机器人，而是一个具有自己见解的现代政治家，与这样的人不仅可以进行讨论，而且“完全可以干事情”。上面提到的布朗教授那番半是预测、半是预言的话语，在她与戈尔巴乔夫的唐宁街会晤中得到了印证（戈尔巴乔夫抵达前夕，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郊外官邸召集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开了一整天会，她再次听到布朗教授关于要“十分注意”这位西方尚无人知晓的年轻苏联领导人的忠告）。

---

① 恩利克·贝林格（1922—1984）　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72 年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正是“铁娘子”的最初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密友罗纳德·里根为次年 11 月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所作准备的性质。

赖莎也发现了世界，并且愈来愈引人注目地向世界展示自己。对于自己的伦敦之行，她像准备重要考试一样地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准备。给西方公众留下良好印象，她认为这是自己对于访问成功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正是那些使她在“克里姆林宫夫人”圈子里显得鹤立鸡群，并且使她的莫斯科生活大大复杂化的品质给她帮了忙，这里有大学文化程度，教师的有条不紊，一个发现世界的外省女人的兴趣和骄矜，当然还有与生俱来的品位。结果，对于以其近乎巴黎式的优雅风度令英国人倾倒的赖莎的“发现”，成了英国报刊报道访问时的独立话题。她在英国人面前的亮相也成了苏联报刊的一个特别话题。诚然，当时记者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她的化妆品系自何处购得、是否确实在英国商店用神秘的“金卡”付费。(当时我们离后苏联时代新俄罗斯显贵绝非神话的纵酒狂饮是何等地遥远！)起初，几乎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清心寡欲的赖莎还感到愤愤不平：“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们在伦敦访问期间，乌斯季诺夫去世，噩耗传来，戈尔巴乔夫匆匆结束访问，提前回国。契尔年科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也使另一出戏的结局提前到来，顺便说说，远在千里之外的英国医生在观察重病缠身的契尔年科时，已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警告。他们的预测误差仅为两个星期。

胜利前夜

“您是什么时候最先意识到自己会当上总书记的呢？”即使今天戈尔巴乔夫在碰到这个问题时，也依然是那个事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是在契尔年科去世以后那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晚上。”无论这个答

案的真诚程度如何，它说明戈尔巴乔夫又很好地领会了安德罗波夫以身作则给他上的两课：忠诚和耐心。安德罗波夫正是遵循这两则机关的关键戒条，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职位。也是由于这两条，他等待这个机会几乎一直等到灯尽油干，当时已经无法将某些设想付诸实施了。

戈尔巴乔夫比较走运。他在距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仅一步之遥时正值盛年，大可不必急于求成。此外，他如果尝试急于求成，那就得冒失去一切的危险：因为他登上巅峰之前的最后一步，取决于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他们尽管自己打算不久也步契尔年科的后尘，却完全可以剥夺掉戈尔巴乔夫的生存机会。

然而许多事情证明，他在千方百计地表示对于奄奄一息的庇护人的耿耿忠心、对于一年多以前选举契尔年科的政治局全体同仁的必不可少的崇敬的同时，也在为日益临近的"战役开始日"加紧准备。事实上的第二书记的地位（惟一让他不能继承这个称号的障碍就是不能坐进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契尔年科以种种借口从中作梗），再加上"第一把手"的无所事事，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将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所有关键方面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例如，不久就有扎斯拉夫斯卡娅、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博戈莫洛夫、韦利霍夫、阿尔巴托夫、萨格杰耶夫等院士进入向他提供分析报告和建议的专家圈子，后来又加上雅科夫列夫。根据可以理解的原因，"安德罗波夫的红人"的名声，又使他可以指望得到来自包括切布里科夫在内的克格勃领导人的支持和宝贵的情报服务。

眼下重病缠身的总书记名义上执掌着党和国家的大权，未来王位继承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围绕着党内王位的明争暗斗仍在进行。契尔年科本人有意让正式的党内二号人物问题处于不明朗的状态：不知他是以为这样可以巩固自己日益具有象征意义的地位呢，还是本能地把权力当成命根子紧紧抓住不放，抑或不过是没本事顶住那些将戈尔巴乔夫当成潜在威胁的人的压力。这里首先指的是吉洪诺夫和格里申。

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行将就木的总书记固执地拒绝将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正式让给任何人。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将他抬进会议室，扶他在摊开公文的桌子旁边坐好，然后再让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入场。有时则直到最后一刻才由助手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以总书记的名义请他“越俎代庖”。多亏第四局局长恰佐夫提供的情报，戈尔巴乔夫可以对契尔年科的实际状况了如指掌，他每次会议前都做好准备，以防万一。然而总书记或是他的亲信无谓的阴谋活动，却不能不令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

看来，1984 年年底试图取消实际上业已召开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也是由于竭力对他“稍加阻拦”的一种表现。戈尔巴乔夫准备以党的主要理论家的身份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他想借此表现自己，也想证明除了一个接一个的葬礼之外，体制还有另外一种前景。他击退了勃列日涅夫家族的这次进攻，充满自信地主持了会议，首次在报告中对自己未来政策的某些方面作了表述（《真理报》在刊登他的讲话时大加删节）。看来，自此之后契尔年科已丧失了最后的反抗力量和意志，他终于同意戈尔巴乔夫迁入昔日党的主要思想家的办公室。

然而，如果说总书记已经投降，那么他的亲密战友在快要收场时仍未善罢甘休。朝不保夕的老爷子甚至在病房里也不得安宁。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硬让契尔年科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上演投票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仪式，还硬让契尔年科几天之后从他手中接过代表证书。导演这一亵渎场面的人，显然是指望以此确立自己的总书记继承人的地位。

自然，已成电视系列片（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的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

党和国家精英的各个家族（从州委书记、各部部长和高级将领到

科学院圈子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那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希望同可能的新领导人联系到一起。不过，因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心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人，此人与其说是以外表和年龄，倒不如说是以行动纲领令人产生了走出困境的希望。

至1984年年底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可以切切实实地指望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余下的问题是攻克主要的“闭塞信号所”——政治局。表面上正是将政治局的推荐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而实际上是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根据党的尊敬官位高者的坚定原则，就连不同意政治局意见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敢于向官位高者提出挑战也是很难设想的（诚然，这样的情况出现过一次，那是1957年，当时赫鲁晓夫几乎已被“反党集团”拉下马来，是赶来救援的中央委员挽救了他）。

政治局内的形势却仍然不明朗。勃列日涅夫时期，系由政治局委员中的“小圈子”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小圈子”成员至今只有葛罗米柯一人健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他的意见可以在关键时刻决定整个棋局的胜负。于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试探性接触的线索从四面八方都立即集中到葛罗米柯这里来了：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克留奇科夫、利加乔夫都决定说服这位有名的“不先生”在必要的时刻对戈尔巴乔夫说“是”。在葛罗米柯儿子的帮助下，联系建立起来了，于是可以认为已经准备好了向政治局提交选举总书记的问题。余下的问题是将现任总书记抬走，这个任务交给大自然去完成……

按照这种情况下的通例，恰佐夫院士当即向党内第二号人物——戈尔巴乔夫报告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那是1985年3月10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戈尔巴乔夫和往常一样正在同妻子散步。两人感觉到了他们生活中的转折点已经临近，不过认为还是不说出来为好。戈尔巴乔夫一面吩咐通知政治局委员，一面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来到胡桃木房间里开会的苏联领导成员开始习以为常地讨论如何筹备葬

礼，其实每个人脑子里盘算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未来总书记的选举将如何进行？戈尔巴乔夫将当选总书记，这已是尽人皆知，其中也包括他不久前的论敌和竞争对手。因此对他们说来，问题不是执意进行辩论或者挑起政治纷争（纷争的结局反正已经确定），而是如何向未来的总书记表忠心，以及就向他颁发执政委任状的先决条件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广为传扬的所谓政治局会议上“斗争激烈”，“千钧一发”，所谓格里申、吉洪诺夫、索洛缅采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神话，其产生的基础是投票表决者都热中于将自己的贡献冒充为决定性的贡献，并以此提醒戈尔巴乔夫他的当选应该感谢谁，这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例如，利加乔夫就以其固有的直率向他出示了自己那张据说于1985年3月开出的票据。利加乔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声称：“那是令人忧心忡忡的日子。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存在这样的现实危险。我想对大家说，多亏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以及大批州委第一书记的坚定立场，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惟一正确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预见到可能出示这样的“帐单”，他不希望出现“债主”，便把事情办得让任何个人都无法将他“晋升为最高领导人”一事的主要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这样他就保证自己将来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在事关必不可免的人事变动和更加重要的未来政治方针选择等方面都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就打算“走得很远”（这是他从新朋友——欧洲共产党人那里借用来的说法），对于勉强当选——50%再加一票之类不感兴趣。“如果选举不能反映普遍的情绪，我就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正因如此，他并未急于“从格里申手中”接过早在3月10日即已殷勤地提出的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的建议，按照传统，这个主任人选的确定就预先解决了总书记的问题。10日夜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将要按照他的建议“充分考虑”，这个夜晚将为他助一臂之力，保证

次日选举的胜利，而他只需对选举结果表示同意。

对他本人说来，这个夜晚十分短暂。他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已近凌晨四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自然没有合眼。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他们来到户外，相信这里不会受到窃听。两人久久地散步，讨论着像潮水一般向他们袭来、不留下动摇余地的事情。有一点很清楚：往日的生活结束了。不管怎么说，往后退却为时已晚，而且不符合他们的性格。此外，新的一天开辟了新的前景，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成功的光辉，而且还有绝无仅有的试图实现他俩梦想的机会。话语连绵，直至天明。“只要推荐，就不推辞，”这是戈尔巴乔夫对于“家庭支部”讨论所作的总结。

他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当然，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支持者都没有天真到完全相信政治局委员的清醒理智和责任感的地步，因此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利加乔夫在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说：受到 1957 年那一幕激励的“伏击团”在他的接待室里集结待命，这是一批充满战斗豪情的中央委员、第一书记，他在必要时可以与之联系。不过采取“备用方案”已无必要。戈尔巴乔夫在开会前 20 分钟与葛罗米柯见面，提出与他一起工作，其中也包括“在另外的岗位上”工作。戈尔巴乔夫合上开关，链条连上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想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描写的俄罗斯一个外省城市省长换届的场面，该市的官员们同时表示了例行的“因失去一位可爱官长而引起的忧伤和因获得如此可爱的新长官而引起的喜悦”。葛罗米柯一上来就提出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人选，直至最后一刻仍在指望阻挠戈尔巴乔夫担任此职的人——吉洪诺夫和格里申随之发言，以免有不忠之嫌。其余的人也争先恐后地起来表态。

“我们根本没有别的人选。”索洛缅采夫总结说。切布里科夫在讲到肃反工作者委托他提出戈尔巴乔夫的人选时，为了更具有说服力又补充道：“大家都明白，肃反工作者的声音，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接下来的讨论对于大家都失去了意义，只有那些希望在会议记录中无论如何记上自己对新领导人的忠诚的人除外。

一小时后，政治局的决定将要得到全会的“批准”。估计到绝大多数全会参加者的情绪，全会是不会出问题的。全场的气氛起初是等待和担心（满有经验的中央委员以为政治局的“老爷子们”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当政治局委员在戈尔巴乔夫带领下依次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家顿时情绪高涨，喜气洋洋。

党内生活的日历里有着自己的征兆，那就是：领导人在陵墓主席台或者正式照片上的排位、迎来送往时握手的顺序、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期间主席团委员出场的先后。党内的征兆与民间的征兆不同，从来没有不灵验的时候。当葛罗米柯在不用讲稿因而显得更加感情充沛的讲话中，向中央全会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时，全场掌声雷动。

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登基演说选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勃勃生机”。他自然对自己的前任讲了一通礼节性的套话，并发誓贯彻执行上一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他向帝国主义发出威胁，并保证加强国防力量。他惟一的创新，是呼吁“加快”社会经济进步，保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故意引人注目地绝口不提“发达社会主义”，这使大家都很满意。

“勃勃生机”是最低纲领，这不仅是一致投票表决的中央委员的期望，而且是举行国家领导人就职仪式的大理石墓室外面千百万同胞的期望。这个术语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作出解释。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被授予治理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全权时，未必能够破解其中的含义。

对他说来，这一天是他实现生活目标的著作的第一卷的结尾，后来证明，这远远不是最复杂的一卷。他还会不止一次地修正这个目标。对米哈伊尔二世（如果将罗曼诺夫王朝的奠基人①当做一世的话）说来，攻克克里姆林宫权力城堡相对而言还算轻松，他不必像亨利

①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1596—1645)　俄国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个沙皇。

四世[1]那样为此背叛自己的宗教。至于说他打算走得更远,也就是离经叛道,那是以后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由于命运的安排,由于准确的战略选择和一系列考虑得当的战术上的步骤,他拥有了对于一个泱泱大国的独揽权力,并且获得对世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机会。余下的问题就是决定如何来支配这一切了。

---

① 亨利四世(1366? —1413)　英国国王,兰加斯特王朝创建人。

第三章 普通的"锡匠"?

国王的随从

于是，举行了选举国王的仪式。周围的人都高声向他表示祝贺。他的那些前任顿时被忘得一干二净。要有一批随从，众所周知，没有随从就没有真正的国王。选举他时的完全一致甚至高高兴兴的一致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他明白，他的许多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同僚投他的票，是不得已而为之，棋局中往往就有这样的情形。

戈尔巴乔夫说，他对于契尔年科的亲信一年前阻止他上台执政一事并不感到惋惜。他这样说也许并不是要滑头。当年曾为安德罗波夫当助手的沃尔斯基证实说：他到医院去取应以安德罗波夫的名义在中央全会上宣读的发言稿时，看见安德罗波夫亲笔添上如下的建议："委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我被迫缺席期间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难猜到，沃尔斯基在将发言稿送交总书记秘书处时，并未忘记向戈尔巴乔夫通报这段附言。据沃尔斯基的

说法，安德罗波夫发现在以他的名义公布的发言稿中缺了这段话，便从医院里给助手打电话，以恼怒的口气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沃尔斯基只能回答说，在将发言稿交到契尔年科手中后，便对发言稿的命运一无所知。（曾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任中央总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卢基扬诺夫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断言安德罗波夫认为可能接替自己的人是罗曼诺夫，不是戈尔巴乔夫，然而他的说法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证实，由于可以解释的原因，不妨认为此说带有偏见。）

按照沃尔斯基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此事的：他显然没有急于求成。他的对手通过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来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绝望做法只会对他有利："他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当选就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了。"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用第三人称来谈自己。尽管他年纪"不大"，他像一个异常勤勉的见习修道士，就算是以加快的速度吧，却经历了党内升迁所有必经的阶段，经受了思想忠诚性、敬重"老同志"的测试，又在等待自己的时机时表现出了"合乎党性的谦逊"。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传来，不仅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思念年轻"铁腕人物"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苏联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深表赞许。因为戈尔巴乔夫并未事先发表任何行动纲领（起初只归结为一句话："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各色人等将五花八门的、包括相互排斥的期望同他联系在一起。

不难理解他为何受到党的机关的"步兵"亦即各地书记的积极支持：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应付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外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青云直上

引起诸如叶利钦这样的人的嫉妒（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个更加重要的工业州的书记呢？"）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抱有希望的明证：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机关的中下层期待着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会带来变化……有些人（这种人占多数）希望进入必不可免的干部革命的主流并利用腾出来的空缺，另一些人则指望领导年轻化本身即可恢复党在社会中业已丧失的威信。

与此相反，莫斯科的党内权贵则惊恐不安。来自"旁门外道"的领导人的上台，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干部重新审查，为新的班子腾出位子。无怪乎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爱说俏皮话的人提出了新的俄国历史年表：在"彼得大帝前时代"和"彼得大帝时代"之后，是"第聂伯罗彼得时代"和"彼得扎沃时代"（指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1]）。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人们期待出现"斯塔夫罗波尔时代"。尤其感到不舒服的是昔日领导人的"贴身助手"和机关的差役，他们习惯于四平八稳的旧式生活方式或者说旧苏联生活方式：可以在小吃部不慌不忙地喝茶，手捧公文穿梭于中央委员会的走廊，在为全会和代表大会起草讲话时很少加班加点。

然而，作为国家两大支柱的军队和克格勃则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寄予厚望。据总参谋部将军们证实，军队指挥人员得知这一消息时欣喜若狂。军队总是渴望有一个威信高、办事果断的最高统帅。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不能算作这样的人。安德罗波夫在自己那个秘密"公司"里以独断独行的性格著称，军方人士同他的关系总是疙里疙瘩。让军方人士把与军队竞争的克格勃的首脑当成自己的领导人，比让他们习惯性地以立正姿势站在党的领导人面前要困难得多。此外，全国范围的停滞也波及到军队，对它起了大概是最具破坏力的瓦解作用。新的最高统帅上台，不仅预示着早已迫在眉睫、总参谋长 H. 奥加尔科

---

① 勃列日涅夫曾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书记，安德罗波夫则曾任彼得扎沃茨克市市委书记。

夫元帅力主必须进行、职业军人也公开表示必须进行的军队现代化，而且要求军队自身“振作精神”，“去掉闲散生活造成的将军肚”，这自然受到军官们的欢迎。

作为新的政治庇护人，戈尔巴乔夫也很合克格勃人员的心意。他们知道自己原先的领导人多么赏识“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才俊”（安德罗波夫有一次曾经这样充满激情地谈到戈尔巴乔夫）。切布里科夫实现这一遗愿的独特方式，大概就是毫无保留地以戈尔巴乔夫为楷模，他对于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贡献是给格里申的野心泼了冷水，据说正是克格勃向政治局委员提交了有关这位莫斯科书记的亲信大肆贪污受贿的“预防性材料”。

俄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政权的官僚主义机关以至惩罚性机关的最现代部分的期望，往往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意向和希望不谋而合。他们对于党的新领导人的小心翼翼的赏识是不难解释的。这些知识分子早已久违满腹经纶或者具有起码文化水平的执政者，他们已经学会了在厨房里表现自我和以讲笑话的方式表示抗议，对于“列宁时代之后第一个”具有大学文凭、可以不看讲稿不出语病地表达合理想法的党的领袖，他们在赞叹之余，又不免有些害怕。因为克里姆林宫那些走马灯似地彼此替换登场的老者，在令人习惯性地感到失望的同时，又因他们很快就会前往另一个世界而使人感到宽慰。如今上台的是一位年轻的、看来像是坚定不移的执政者，不能指望他会很快被撤换，于是只好猜测他是属于仁慈的沙皇呢，还是残酷的沙皇，而且在国家更需要什么样的沙皇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中间照例是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还有一伙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新的苏联领导人，他们是外国政治家。如果撇开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赏（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富有魅力、能言善辩、应对自如的斯拉夫人），那么西方预测的总的调门是怀有戒备和保持克制。他们在回忆起不久前几乎成了公开嘲笑对象的勃列日涅夫时，竟多少有些伤感，因为这个“聪明而严厉”的新领导人可能带来的，恐怕主要

是麻烦。此外，西方也让葛罗米柯的那句神秘莫测的话搞得惊恐不安，葛罗米柯在向中央委员介绍戈尔巴乔夫时，曾说这是一个“面带微笑、满嘴钢牙”的人（翻译就是这样将俄文里的“刚毅果断”译成英文的）。既然如此，人们以为他很可能会像安德罗波夫那样采取加强纪律、试图提高僵化体制的效率等等措施，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此外美国媒体还忧心忡忡地发现，苏联出现了一个领导人，此人可以在罗纳德·里根自诩为无法超越的专业人士领域向美国总统发出挑战，那就是：公众政治家的角色。“伟大的传媒工作者”（人们喜欢这样称呼先前的演员）首次遇到了实实在在的竞赛对手，而且比赛肯定扣人心弦。当然，就纯演技而言，曾在普里沃利诺耶中学舞台上欣然出演的戈尔巴乔夫比不过这位好莱坞影星，但在气质上明显地超过对方。自苏联领导人上台之日起，里根的谋士就警告他说，他独霸西方新闻界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纽约时报》1985 年 3 月这样说道：“近几周内，戈尔巴乔夫可能发起‘和平攻势’。”

美国人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换岗”，而是重要得多的事件：在莫斯科上台执政的不仅是他们对其“观念”尚不知晓、比他们的总统小 20 岁的官员，而是新一代苏联政治家，并且眼下就得把关系弄清楚。“里根不喜欢苏联人，也不信任他们，”美国总统的一位亲密顾问说道，“不过近四年来意识到了他毕竟得设法和他们打交道。”促使里根恢复美苏最高级会晤的还有他的夫人南希，南希担心的是她丈夫可能在未留下任何重要的外交成就的情况下成为历史人物。

新的一轮“世纪竞赛”即将开始，苏联方面准备出场的是一名西方并不了解的竞争对手，这时政治天文学家们纷纷摆开了自己的纸牌卦，试图“算出”戈尔巴乔夫。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脚本，似乎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因此“订货人”像在商店里一样，可以凭自己的鉴赏力任选其中的一个。不过总的倾向很清楚：“苏联不需要一个像肯尼迪那样的民主主义者，”那年 3 月德米特里·塞姆斯这样写道，这位原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已成为华

盛顿的政治学家。“他们要的是一个果断和威严的领袖。”“这一届政治局选举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为了使苏联共产主义趋于自由化，而是为了迫使旧体制运转得更加有效，为了从居民中挤出新的牺牲品。”《时代》杂志的预测结果证实了塞姆斯的看法。

当然，首先引起西方好奇的，是总书记与军界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是党和克格勃，”当年曾被迫移居西德的作家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这样认为，“如今他有两个支柱，他还需要第三个支柱——军队。对军队说来他还是个零。就是说，他会讨好将军，千方百计地向他们献殷勤。”

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军界在苏联体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戈尔巴乔夫的主观愿望如何，无法想像他敢于向军界挑战。”英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戴维·欧文如是说。

研究苏联内政和经济的专家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期望值也不高。“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华盛顿布鲁克林研究所的埃德·休伊特解释说，他后来成为乔治·布什在苏联事务方面的主要经济顾问。“当然，他对完善体制感兴趣，然而纵观他的言行，尚无法推断出他有比普通锡匠更加高明之处。他不会在主要方面去改变体制。”其他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悲观的预测方面走得更远：例如，根据他在12月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呼吁恢复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传统”，他们便预言这位年轻总书记在实践安德罗波夫的遗愿时，会对玩忽职守者大张挞伐，会使持不同政见者的日子更不好过。

苏联问题专家完全合乎逻辑地推论出的总结论不能令人宽慰：“戈尔巴乔夫不会去建设光辉的新世界，他会对现有的世界修修补补，尽管它已陈旧不堪。他不会提出对国家进行任何革命性的变革，原因很简单：现行体制的建造方式就是为了将这种变革拒之门外。”

这幅由堪称研究苏联体制老手的专家描绘的相当灰暗的图画上，也偶尔夹杂着那些在新领导人身上看到非典型特点的学者的“持不同政见”的评论。这些评论往往只是提到他年纪较轻、受过大学教育、他有个名叫赖莎的聪明而高雅的妻子之类。大概只有布朗教授在其言

论中仍然将他与体制内部的原则性变革联系起来。不妨回忆一下，撒切尔夫人以斩钉截铁口气加以肯定的，正是布朗教授上次的预言。还有一位英国工党党员，除了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而外，他在一切问题上都与保守党首相分道扬镳，他于1985年3月写道："在此人12月份的伦敦之行中，我与他共有八个小时的交往和谈话。同他的列位前任比起来，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其区别不仅在于年龄。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具有特殊魅力、颇具幽默感的人（此类评价很少出自英国人之口）。凡是曾与他在英国见面的人，所产生的主要问题是：如此和蔼可亲、真正有人情味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层中……他似乎是苏联体制内部那些有远见的、志在改革的人的喉舌，那些人位居党和国家机关的中层。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这个体制中那股留恋过去的势力肯定会拼命将他立即搞下台，至少也要使他所设想的改革毁于一旦。"这段有先见之明的文字出自希利的手笔，他曾在英国工党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未来的所有对手正满腔热情地（有人是做做样子，有人是发自内心）为新领导人投赞成票。他本人对于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还很模糊，数年之后，这场改革将要使拥戴他上台并保证愿义无反顾地追随他的统一联盟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不同阵营。

当选总书记后的第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一步，便是组建自己的班子，确切地说是组建三个班子。一个是政治局中新的大多数。因为至少在当选之初，他得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模拟恪守"集体领导原则"。余下的一个问题是：尽量迅速改变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平衡。这个国内的最高权力机构恩准他执政，然而它拥有一切权力，只要你想公开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它也可以将你罢免。

戈尔巴乔夫自己大概不会对于总书记那表面上的无限权威产生误解：他目睹了自己那些在首都的根基比他牢固得多的前任，学到了机关内部纵横捭阖和战略结盟的经验。他很清楚，许多投他的票的中央委员，是指望靠存入的"股"分得一点红利。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对自己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依靠谁？总书记的最初人事安排表明，他具有良好的"党的素养"。

早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即着手改变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对比，使自己的战友进入政治局。率先因其对"选举战役"的贡献而得到报偿的，是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他们成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到下一次全会，也就是七月全会，就该撤职了：格·罗曼诺夫离开了党的最高机构，他付出这个代价，是因为他让人们觉得他是除戈尔巴乔夫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不幸的是，他同样属于新一代政治局委员的代表，且来自第二首都——列宁格勒，而不是来自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此外，他是安德罗波夫生前奉召前来莫斯科的，就是说，在许多人眼中他可能像是同样合法的"继承王位的王子"。

一个生活细节使得政治上的棘手问题迎刃而解：罗曼诺夫有个"薄弱环节"，那就是他嗜酒成癖。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酗酒运动的情况下，总书记没有过多的客气，暗示说他们两人不能同时呆在政治局内。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罗曼诺夫"哭了一阵"之后，只好认输。

第二个离开很有权势的领导岗位的，是葛罗米柯，这次付出的代价不是逐出，而是晋升。他认真履行了自己的那部分协议，完全有资格指望因及时作出选择而得到报偿。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否认他俩之间曾经有过秘密协议，不过又承认他"*事后才得知*"葛罗米柯、雅科夫列夫和克留奇科夫三个人曾经背着他搞了一个什么协议。他十分爱用的"*事后才得知*"的说法，后来曾不止一次地使他摆脱（和陷入）困境。无论"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条约"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其所有条款均已得到认真的履行。

7月初，葛罗米柯登上契尔年科去世后空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对于葛氏继续照管外交部的渴望，如今是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出面毫不含糊地设下了限制。葛罗米柯本人指望让同他观点相近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Г. 科尔尼延科担任外交部长，此人与军方的关系不错。葛罗米柯早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习惯于在自己的教区里当家做主，他甚至已经对科尔尼延科即将就

任新职表示了祝贺。这时戈尔巴乔夫才初次展示了也是这位葛罗米柯替他做过广告的“满嘴钢牙”。他推荐接替此职的不是职业外交官，因为据说在这个范围内反正也找不到称职的葛罗米柯接替者，而是“著名的政治人物”——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此举令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如此出人意料的选择进行解释（许多人预测这位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顶多能当个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时，举了两条理由。一是他与谢瓦尔德纳泽在多年共同的共青团生活以及后来党的生活中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关系，他们之间可以做到“实际上无话不谈”。二是他认为恰恰是谢瓦尔德纳泽作为一个“天生具有东方人彬彬有礼气质”的人，能够胜任他打算为苏联外交提出的新任务。至于第三个原因，戈尔巴乔夫闭口不谈，但已是不言自明：他所需要的担任此职的这个人不仅与“不先生”[①]截然相反，而且过去与“不先生”没有任何职业上的关系或者私人的关系，更没有责任上的联系，所以就能够抵制“不先生”那明显的继续领导外交部的愿望。

听到所推荐的接替者的名字，就连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对各种意外情况均已司空见惯的葛罗米柯，也一时感到语塞。直至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那种曾使他顺利度过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种种波折的党内官吏的服从反应，才向他提示了一个就外交上的平稳而言无可挑剔的回答：“我不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认为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总书记并无更多的要求。戈尔巴乔夫往第比利斯打电话，所提出的建议简直让谢瓦尔德纳泽惊呆了，不过戈尔巴乔夫很快就用穿甲弹般的论据摧垮了对方的防御多面堡，那论据是：“葛罗米柯表示支持。”

党的领导机关中新的“戈尔巴乔夫多数”的其他成员，诚然不属于政治局委员一级，而是属于中央书记一级，他们是来自列宁格勒、应当接替罗曼诺夫的列夫·扎伊采夫，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叶利钦，

---

① 指葛罗米柯。

这颗星辰是在利加乔夫的积极庇护下开始升起在莫斯科的政治地平线上的，利加乔夫当时跑遍了外省的州党委，四处物色像他自己一样毫不留情的“红卫兵”，这些人可以在党的机关内部即将进行的清洗性的“文化大革命”中派上用场，他“发现”了叶利钦。利加乔夫看上叶利钦，大概是因为此人具有同他自己一样的特点：属于行政管理型，作风严厉，行动果断，善于雷厉风行地惩治那些玩忽职守或者毫无用处的人，能够如利加乔夫谈到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快速转动事业的飞轮，让好人觉得舒服，让坏蛋觉得发热”。在他的推荐下，叶利钦调入莫斯科担任中央建设部长。1985 年 7 月，一直在悄悄物色接替格里申的人选的戈尔巴乔夫，又让叶利钦当上了中央书记，尽管也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雷日科夫曾经劝阻过他。12 月，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加强了当时公认的“积极肯干、雷厉风行、对一切新事物很敏感”的总书记盟友的阵营。

随着格里申的去职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一个大残迹即总理吉洪诺夫被甩掉——雷日科夫于 1985 年秋天接替了他，戈尔巴乔夫搞到了政治局中的“控股权”，这样一来，在即将来临的开始改革的困难时期，就可不必担心受到来自“老同志”的恶毒攻击。

作为第二梯队中关键职位的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总务部长，分别由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担任。将戈尔巴乔夫与卢基扬诺夫联系在一起的，是如今已很遥远的关于大学生活的回忆（当时两人均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相差两个年级），不过当时实际上彼此并不认识，共同的母校也决定了某种精神上的接近。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是经瓦列里·博尔金介绍才见面认识的，博尔金说这位驻加大使“很有意思”。在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第一次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赴加“考察农业情况”的想法。在多伦多，雅科夫列夫连夜将从莫斯科带去的“死硬”讲话稿重新写了一遍，使之适合西方听众的口味，从此他便稳稳地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讲演稿撰写人的行列。如果谈到“戈尔巴乔夫智囊团”，那么其成员包括：从首长当选之日起就如影随形地陪伴左右的常任秘书瓦列里·博尔金，

早在担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期间即以其经济思想和学术威望引起戈尔巴乔夫注意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一年后，来自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格里戈里·沙赫纳扎罗夫加入了这个志同道合者的行列。

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渐入老境的“阿尔巴特街儿女”，他们同雅科夫列夫一样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既经历过日丹诺夫的精神恐怖，又经历过赫鲁晓夫解冻的道路泥泞季节和“现实社会主义”的霜冻，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实现自己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重新结合、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各国重新结合的梦想的最后机会。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依然保持着壮志未酬的“60年代人”尚未耗尽的满腔热情，当他们迫不及待地将戈尔巴乔夫推往激进主义的方向时，很难说清这是由总书记确实存在的优柔寡断所引起的呢，还是因为他们担心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又要后退、他们在有生之年已经无法看到改革的成果。有时，为了阻拦自己的“激进派”、给头脑发热的前线战士泼泼冷水，戈尔巴乔夫便请另外一位老战士——切布里科夫来帮忙，此人将“高处的辩论”降到地面上来，照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切布里科夫还给辩论加上了其中往往缺乏的“清醒理智和必不可少的小心谨慎”。

赖莎也经常参与到小范围的辩论中来。起初就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也感到不大习惯的现象——总书记夫人竭力干预男人的事情而且与其他人平等地讨论高层政治的问题，在她和戈尔巴乔夫看来却十分自然。就夫妇俩的关系而言，假如她满足于丈夫仕途上的成功，一头扎进女人堆里，那倒反而令人觉得奇怪了。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夫妇二人每天都在一起讨论一切：包括从新书到他工作上的问题。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就不打算出于某种陈规虚礼而让赖莎脱离他新的政治生活。不但如此，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不仅对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利益超出特供和治疗的范围感到不习惯的机关内部，而且在社会上，对于“党的第一夫人”开始扮演过分明显的角色这一点，人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他的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电台记者米哈伊尔·戈洛瓦诺夫，以老朋友的身份在总书记前往秋明油田视察期间对他说：“我

说米沙，你最好让赖莎别老是跟着你和电视摄像机往这些钻井和工地上跑，那样她会挤坏的。”不料竟碰了一鼻子灰，这才明白自己说错了话。

当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政治辩论，给丈夫的顾问班子造成了额外的心理负担。有女性在场，这不仅限制了男人们传统的俄罗斯自我表现的自由，而且在经典的公务气氛中增添了模棱两可的因素：既然人人都明白在任何政治和理论辩论中最后都是由“订货人”说了算、自己的即便是原则性的反对意见都应当在一定的时刻收起来，那么就不清楚应当对赖莎的论据作出何种反应，顺便说说，她往往都说得很在理。沙赫纳扎罗夫甚至为戈尔巴乔夫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充分听取自己妻子的意见”而感到惋惜呢。

例如，与所谓正是赖莎促使戈尔巴乔夫实行禁酒法令的流行说法相反，据博尔金证实，她从一开始就对反酗酒运动的极端主义方式持积极反对的态度，认为“禁止人喝一瓶酒简直荒唐已极”（总书记夫人的地位，使她完全可以免受利加乔夫对此类大逆不道言论实行的严厉党内制裁）。

赖莎经常因原则性的争论搞得面红耳赤，有时人们简直无法说服这位职业教员。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的顾问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为时间白白浪费而“感到难受”。这时戈尔巴乔夫便亲自介入，他通常都是温和地挽着妻子的手，将争论平息下来。“有时他背过身去，甚至神秘地冲男人们使使眼色，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向她让步。”

雅科夫列夫和博尔金，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忆起那幅堪称超现实主义的场景：1986 年 1 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夕，他们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召唤来到皮聪达，四个人坐在吹着冬日寒风的海滨凉亭上，几乎连头带身子都用方格毛毯裹起来，一连几个小时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阅读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稿。照博尔金的说法，润色加工几天下来，对原稿的修改意见，包括赖莎的修改意见在内，其篇幅竟几乎相当于原稿的三倍。

除了政治局内有保障的多数（当时戈尔巴乔夫尚不必考虑中央全会上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一批组成他的工作班子的志同道合者而外，他身边还有一支智力和文化部队，他尊重这些人的意见，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都力图博得这些人的好感。这个五光十色的混合体中有“官方知识分子”——受到中央委员会青睐的科研所所长、报纸主编和创作协会负责人、报纸观察员和电视评论员，还有颇有威望的学者、作家、导演和演员。

沙皇对于诗人的爱慕，诗人对此也投桃报李，这是俄国历史上人所共知的事情，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颂扬。“沙皇们”（从叶卡捷琳娜、尼古拉一世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总是想优待作家艺术家，或者与此相反，对他们搞书报检查，进行申斥。有时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创作者口中听到对自己的颂歌谀词的愿望，而有时则是希望将这些人划归自己的宫廷，一则可使宫廷平添智力的光华，再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以防未受到关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跑到不满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中去——真到那时，对他们的指导工作就只好请“暗探局”或者克格勃来代劳了。

在苏联晚期，驱使知识分子对党以及领袖本人的“慈父般的关怀”感激涕零的，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养成的恐惧心理，而且还有无法克服的不知是先决性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种力求得到上司器重的内心需要，至于已经多次描述过的御用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尤其是暴君的着迷综合症，就不在话下了。

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不能纳入这个习惯的公式。他并不使人感到恐惧，也的确不是暴君，他最初吸引尚未被严厉的苏联体制宠坏的知识分子并博得他们好感的，至少是他那同历届前任形成反差的外貌，当然还有行为举止——鼓励公开性以及释放萨哈罗夫。在抗拒他的魅力方面坚持得最长久的，是那些在自己被扭曲的命运中领教了极权主义体制的重拳、被迫移居他国或者驱逐出境的人。在他们那可以理解的对于前所未有的自然现象即民主派总书记的不信任中，掺杂了嫉妒，甚至还有恼怒，因为他们不停地抨击的那个体制，他们断言根据

裁定无法改革、只配扔进垃圾堆的那个体制，居然养育出无法预料的东西来，使得全世界、包括他们自己都大感意外。一群侨居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希望警告西方不要上改革的钓钩，他们证明在虚假的伪装下隐藏着的，依旧是那些不可改变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要求拿出他真心崇尚民主的证据来。他们认为明明无法通过的一个主要测试，就是关于将公开信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的要求。经过政治局长时间的争吵之后，该信在当时颇受欢迎的两家周刊——《莫斯科新闻》和《星火》上同时发表。怀疑论者当众丢丑。至于该信照例是根据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发表、两位主编曾经带上对该信的评论前往中央委员会“请教”之类的详情，读者就不必知晓了……

对戈尔巴乔夫说来，博得莫斯科知识精英的好感要比博得西方怀疑论者的好感简单得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被体制安排在体面的仆役地位的知识分子，不仅学会了向当局展现耿耿忠心和奉公守法，而且学会了展现热爱之情。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隐居生活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夫妇，自然急切地希望一解多年的文化饥渴。在斯塔夫罗波尔，他们对于当地剧院贫乏的剧目已经烂熟于心，往往同一部戏会在莱蒙托夫剧院看上好几次。除了昔日外省人这种十分自然的对首都文化生活的向往以及可以理解的结识莫斯科名流的渴望而外，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又加上了纯工作方面的考虑：他需要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各个生活领域的职业顾问。除此之外，他和赖莎从大学时代起，就对学术泰斗和科学院学衔十分崇拜。

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吸收科研院所参加撰写呈文以及对报告和全会的建议，最高领导人如能抽出时间就去听取有关院所负责人的意见，这在党的机关内早已公认为“良好的举止风度”。这种做法主要在领导人自己的脑子里造成了一种曾经大肆宣扬的现实社会主义与科技进步成果相结合的假象。戈尔巴乔夫率先从翻阅呈送中央的资料转为直接与代表新思想和新想法的人一起工作。从担任中央书记

之初，他即开始与院士们交往，尽管是通信交往。1982 年 9 月，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会上，来自西伯利亚科学城的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对国内农业情况提出尖锐批评。恰在此时，以她和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起草大逆不道的关于苏联经济现状的《新西伯利亚报告》。扎斯拉夫斯卡娅发言时，戈尔巴乔夫离开了会场，这使她大感失望，不过后来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奥夫钦尼科夫对她说，会后戈尔巴乔夫把她的发言稿要去了，并且仔细地研读过。

1983 年初完成的长达 180 页的《新西伯利亚报告》，被盖上"工作专用"的印章分别寄给范围有限的一些人，而在同年 4 月科学城举行的秘密研讨会上对报告进行了讨论。不久，《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该报告的详细摘要，照扎斯拉夫斯卡娅的说法，此后克格勃立即将报告统统没收，"整个研究所都搜了个遍"。只有两份没有找到，它们通过美国记者杜什科·多德尔流失到国外。这位著名的女社会学家坚信总书记读了这篇报告，因为他后来在自己的讲话中曾经几次实际上引用了报告。

当安德罗波夫责成分管农业的书记兼管整个经济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定期与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博戈莫洛夫见面。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从纯经济问题转到科技进步问题，于是与韦利霍夫和萨格杰耶夫关系密切起来，两人将他带入计算机、新工艺和宇航研究的天地。恰在此时，以韦利霍夫为首的学者和军事专家委员会正在评估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对苏联的实际威胁。

科学院的学者（彼·莫伊谢耶夫、劳申巴赫、沙塔林、格·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彼特拉科夫）渐渐成为总书记开始在自己周围建立的非正式的"智囊团"，戈尔巴乔夫力图突破中央委员会各部顾问经过反复琢磨的资料的框框，依靠那些内行的具有现代思维的人的独立见解。由其中的政治专家和科学专家组成了流动的智囊团，陪同戈尔巴乔夫遍访世界各国。

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日内瓦最高级会晤期间，该智囊团提供了

咨询服务，由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会晤曾屡屡陷入僵局。此外，这批“空降兵”还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在出国访问的随从人员中，除了国际问题专家和军方人士外，还邀请了当时“改革的工地主任”——作家、记者、演员、导演和经历过新的选举洗礼的代表。白天，戈尔巴乔夫夫妇按照官方的计划参加礼仪性的活动，这些人则为改革进行公关活动：在新闻中心举行辩论会，答记者问，“到人民中间去”，以自己的言论巩固苏联新领导人的阵地。

计划得很周全：他的陪同人员发出的多种声音，专家就苏联国内事务发表不常见的自由见解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让西方观察家看到了改革所唤起的澎湃激情，从而帮助戈尔巴乔夫驳斥西方怀疑论者的论调，那些人断言他发起的改革不过是对旧体制的一次装修，要么干脆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愚弄西方的宣传行动。

然而出访期间关于改革的主要辩论，并不是白天当着西方记者的面进行的，那都放在晚上，并一直持续到深夜。正是在访问的正式部分已经结束、与主人（总统、首相、国王）分手之后的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夫妇才邀请大家过来，边喝茶边谈心。对他们夫妇俩说来，同那些他们习惯当做知识精英、看过他们的书籍、文章和演出的人在一起度过的时刻，比官方招待会上的礼遇重要得多。当然，早已学会对党的领导人毕恭毕敬、对应邀加入陪同总统的行列万分感激的苏联文化巨擘均善于辞令，而且多半是发自内心地对改革首倡者竭力恭维，在预测改革必将迅速取得成功时也不惜过甚其词。

然而，喝茶聊天的基本情调也在逐渐起变化。国内愈积愈多的问题破坏了原有的团结一致气氛，辩论渐趋激烈，将参加者分成相互角逐的不同营垒，戈尔巴乔夫只得充分发挥自己的外交艺术，务使晚会在乐观主义的气氛中结束。不过对他说来，这些在与他抱着同样期望并且愿他成功的交谈者中间进行的喝茶聊天，不仅是增强自己战友斗志的日常教育工作的继续，他还可以从中得到休息，可以暂时摆脱莫斯科的压力，摆脱那些电话、问题，摆脱与他并无亲密关系的人，所有这些都是日益复杂化和日益令他感到苦恼的苏联现实生活强加给

他的。

赖莎更加看重晚间的聚会。在出国访问的两三天里，她成了政治沙龙的东道主，在临时的、时常迁移的、也许让她联想到童年时代流动小火车的国外的住所里，她得到了在自家的住所里无法得到的东西：在这里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决断邀请客人，当众发表自己的意见。

此外，在国外她可以不受莫斯科的的陈规虚礼和庸俗客套的约束，也无需躲到丈夫的阴影里。她终于可以对除了丈夫之外的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疑虑。赖莎特别重视这些紧张的精神交往聚会，她开始事先进行准备，这使得“国际问题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总书记顾问维塔利·古先科夫的生活复杂化了，在出访期间古先科夫要听她的指挥，她以其固有的细心参与制定应邀的苏联名流的名单。

她认为参与丈夫出访是他们共同生活中自己的那部分，于是在物色进入这些名单的人选时，力求做到不仅仅根据自己的好感，而且也根据每个这样的人物的社会价值，她真诚相信可以力求让自己的客人为共同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赖莎在确定了丈夫的客人名单后，便做起了“家庭作业”。就像她仔细地研究外交部和中央各部为她准备的有关她和丈夫所出访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资料一样，她也对自己的晚间喝茶聊天进行准备：浏览应邀出席的作家的作品，记住导演所执导的影片和戏剧的名字。

1985—1991 年间，有数十位改革初期知识精英中的各色人等曾出席戈尔巴乔夫在国外举行的家庭聚会。其中有当时已在思想立场上大相径庭的人，诸如格·巴克拉诺夫与Ю. 别洛夫，达·格拉宁与约·德鲁采，M. 扎哈罗夫与米·沙特罗夫，瓦·贝科夫与鲍·莫扎耶夫。还有记者：从 E. 雅科夫列夫和维·科罗季奇到 B. 奇金和 И. 拉普捷夫，还有神职人员。无论今天看来这样的“智力联盟”显得多么奇怪和异常，然而当时他们都很乐意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在他那声势浩大的政治剧中出演的建议，尚不知道这场政治剧不久即将演变成为叙事诗般的全民的悲剧。

他们当时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全国的

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改革已迫在眉睫的主张几乎万众一心的支持，依靠的是全社会积累已久的焦急心情以及改革在社会上唤起的充满希望的欣快感。当时未必能够把与改革有关的期望讲得清楚的千百万改革拥护者那高涨的热情，取代了宣传机关多年勉强凑成的虚构的“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在改革的头几年，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改革首倡者在国内的声誉稳居榜首，只是偶尔稍逊于彼得大帝和列宁。在达到与这些实际上的神话人物平起平坐的地位后，戈尔巴乔夫把对新的神话和对于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均盼望已久的国内公众的期望值提升得太高，以至再要防止必不可免的失望心情和节日后的头痛，就只有靠奇迹出现了。

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方案的“助跑阶段”，即雅科夫列夫所谓的“改革的白银时代”，更愿意玩班子的游戏，他聚精会神、饶有兴趣地倾听顾问和谈话对方的意见，自己讲得少，让其他人充分发表意见，“*不认为已经无所不知*”。当时国王身边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愿意与其说为他本人服务，倒不如说是为共同的计划服务，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个计划将是他们多年的共同事业。一旦并不清晰、因而人人都感到满意的改革意图从号召和赌咒发誓的阶段开始转向具体实施阶段，这种错误观念就必将烟消云散。

“我们要变革！”

第一个说“*俄国的过去不可预料*”的人，大概以为自己想出了一个恰当的离奇的警句。他错了。这不过是现实情况的记录而已。对于“*是否应当进行改革?*”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提出问题的时间不同而不同。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2000 年有 70% 的俄国人认为不应当。1995 年还有 40% 的人“赞成”。1986 年全国支持改革的人不下 80%。戈尔巴乔夫需要在 1985 年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实

际上，正是为了改革才选上他的。当我国仿佛在敬老院里度过了数十年之后，一个年轻、有教养、"活泼好动的领导人"在苏联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出现，便在仿佛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引起了新的希望的真正爆发。致戈尔巴乔夫的贺电和祝贺成功的信件纷纷寄往中央委员会。有些特别兴奋的公民还赋诗祝贺。

当然，对于一个飞快变成偶像的新国家领导人，千百万人都抱着某种希望，却不知道究竟希望的是什么。有人希望多一点秩序，有人希望少一点虚伪和国家谎言，还有人希望出现新人，希望开始某种运动。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摆脱那种因最高领导人的外貌和水平而蒙羞受辱的感觉，都期待着命运改变。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要求是：将这些向他发出的不清晰的、却很执着的全国信号译成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的语言。

几天之前，他和赖莎在寂静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漫步于别墅小径时，还在用几近耳语的声音相互说明必须有所改变。戈尔巴乔夫就此依次同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作了说明，正像赫尔岑与奥加廖夫一样，就是说顶多两个人，以免受到成立秘密团体或者反党集团的怀疑。这下可好，仿佛决堤一样。"我们要变革！"挤得水泄不通的体育馆里，年轻人同维克多·措伊一起高声唱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中央委员们仿佛一字一句地这样说着，他们起立向新总书记鼓掌致意，几乎所有未来的政变分子也在其中。"这样"不行了，那么怎样才行呢？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极其详尽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如何反向而行，却无人知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并不关心摆脱"发达社会主义"的出路，更遑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了。早已破釜沉舟，地图已经丢弃，记得道路的人已经除掉。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两位国家领导人——列宁和安德罗波夫曾在泛泛的水平上开始思考如何修正国家的政治航向，他们担心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两人在临终前都曾留下一半加上密码的致接替者的信，说明他们意识到危机的规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危机负有责任。然而，也许

正是因此他们才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自然他们提出的不是往后退，而是往前走，前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在斯大林的（或者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就连这个也可能被当做危险的异端邪说甚至敌人的诡计。

无怪乎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则笑话中，讲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因反苏宣传受审，说他在红场上向过路行人散发空白纸页。问他为什么上面一字未写，他的回答很合逻辑："有什么可写的，大家都一清二楚。"

勃列日涅夫时代晚期（决非斯大林时代）有一则奇闻几乎已被人遗忘，那就是不成文的禁忌：列宁的晚期著作不得再版，也不得"未经批准地"摘录。列宁口授的最后一批著作甚至曾一度放在专门保存处锁起来，勃列日涅夫演讲稿写作者中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几乎把"大逆不道"的列宁语录当成地下传单塞进了正式讲话稿。理想化了的列宁，被党内秘密的民主派首先用作抵制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工具。

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之前，并未研究过改革社会主义的理论，个中原因不说自明。斯塔夫罗波尔并不是苏黎世，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说它是什么都可以，惟独不是政治侨民的身份。至于他曾力图"在单独的一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切尔尼亚耶夫语），那又另当别论。当然，在自己的这一大胆果断的创举中，戈尔巴乔夫不时会碰到在全苏范围内起作用的体制所设下的框框和障碍。

说来奇怪，然而，思想陈旧、压制来自下面的任何首创精神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倒成了心理上令人感到适意的因素，各地的书记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在自己的级别上"认真的变革努力均属徒劳无益。当这个令人放心的解释消失不见、戈尔巴乔夫自己登上权力巅峰时，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从此再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也不能将停滞记在别人的帐上了。党的机关、克格勃、军队、社会舆论、甚至任性而胆小的知识分子，全都摆出立正姿势，有人是等待新的君主发出命令，有人是等待他的指示，准备再次完成"党和政府的任

何任务”。“头几年我真是无所不能。”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谈话中承认道。

问题在于他要的是什么。当然，他和所有人一样，要的是变革。然而又像包括他的前任在内的许多人一样，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除了在这方面给他留下没有写得很清楚的遗言的列宁和安德罗波夫之外，他在这个计划（不知是加速前进，还是与此相反、退到纯粹的、尚未被斯大林主义搅浑的源头的后退的计划）中的顾问，可以是“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也可以是他不久前才发现的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无论是哪种情况，暂时还不过是闻所未闻的“现实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共生，这里民主应当使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目。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身边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谁会提醒他，向他讲明：任何使现存体制具有人的面目的尝试都会导致整个体制轰然瓦解。最近一个试图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的人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然而众所周知，1968 年 8 月苏联坦克破坏了杜布切克所开始的试验的“纯洁性”。此时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未受到坦克的威胁，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试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当然，作为一个具有他的出身和教养、跟着自己的父亲认为“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一切”的人，还得经过很长的一段路，才敢于公开将产生自己的体制说成“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体制”。执政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正是以此对不容怀疑的经典作家进行批驳，宣布社会主义总危机时代、而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到来。

不可忘记，在戈尔巴乔夫上学和成长为一个政治家的年代，不仅像安德罗波夫这样的党的坚强战士，而且还有他未来的牺牲品萨哈罗夫院士以及许多莫斯科的“六十年代人”都认为，苏联体制可以大大净化、改善，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它可以同自己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相互趋同。戈尔巴乔夫拥有给他留下的遗产，就获得了宝库的钥匙，宝库里应当保存着他的政治前辈积攒的全部财富，这时他却发现，家业已挥霍一空，珍爱的箱子底部宝物全无，只剩草屑了。

由此就不难明白，为何在改革之初的大约三年时间内，列宁成了他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权威。老实说，甚至在往后的改革阶段里，当他实际上已经扮演反列宁的角色（就其行为的实际结果，特别是为达到结果所采取的方式而言）时，也依然处于列宁的强烈的精神影响之下，并经常阅读列宁著作。据博尔金证实，至少在头三年，总书记的桌上经常放着夹上书签的列宁全集，他会在十分具体的辩论中最出人意料的时刻插进一段列宁语录。

当然，鉴于苏维埃国家创建者列宁的言论之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他完全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百搭”[1]，由此戈尔巴乔夫可以在极其激烈的情况下“通行无阻”，借列宁的权威解除其论敌的武装。然而，他与列宁遗产的相互关系，如同与整个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相互关系一样，不能仅仅归结为随机应变的摘章引句，或是用以掩盖业已开始的内心思想蜕变的礼仪上的顶礼膜拜。

不仅在成为总书记著名纪念讲话的由头的十月革命 70 周年之际，而且在多年以后他退休之时，已经不必虚应故事地对着圣像画十字了（多半是恰恰相反），他仍然固执地反复说道，他认为 1917 年革命并不是一场国家悲剧，而是他的计划的源头之一。“起初我们都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也这么说过。现在我要说：这个论断既包含了真理的成分，也包括了谬误的成分。说它是真理，因为我们力图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古已有之、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思想：消除人与权力和财产的异化，将权力交给人民（从高层官员手中夺过来？），让民主扎根，确立真正的社会公正。说它是幻想，因为当时我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些可以通过完善现有体制来达到。”戈尔巴乔夫这样写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甚至依然认为，改革不过是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总的说来完全值得尊重的高尚思想的另外一种现代、灵活、总之更加有效的方式。就是说，目标表述得还不错，但是方式出了问题。

---

① 指扑克牌戏中可代替任何牌的“百搭”。英语中作 joker。

尽管如今尽人皆知，他的活动的全部历史结局，就是试图克服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后果，试图矫正由此引起的俄国历史的悲剧性脱位，他却依然固执地、不顾任何政治局势地断言和提醒：我们全都跑不掉，我们出身于十月革命。他额头上那块鲜红的胎记在这方面颇具象征意义。

在这种坚定不移的背后，似乎不仅是一个人的固执，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那些观点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这里还可发现他在试图保持对那个叫米沙[①]的大学生的忠诚，米沙同千百万自己的同胞一样，在1956年震撼之前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度又曾是真诚的赫鲁晓夫分子，直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开始成为他自己。其中也许还有古朴的、具有农民渊源的对于自己的祖辈父辈的观点和谬误的尊重，祖辈父辈可以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已经将其带进了棺材。

在列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无论思想开放的助手们怎样再三请求戈尔巴乔夫快刀斩乱麻，同那个已经向总书记举起革命司法的惩罚之剑的"列宁式政党"划清界限，无论人们怎样劝他大声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他早已没有资格将自己说成"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早已没有这个必要。他却依然一意孤行，搞起了消极防守，有时还拿老一套的话来敷衍："你们没有仔细读过列宁的著作。他的晚期著作蕴含了强大的改革潜力……"有时又以高加索人的方式大动肝火："不管你们怎么处置我，哪怕把我枪毙了，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列宁。"

切尔尼亚耶夫曾亲自目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探索过程，切氏自己则在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管的国际部多年"鼓捣列宁主义"，他找到了自己的解释，找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共产主义主要传播人之一列宁的几近非理性的眷恋之情进行辩护的说法：戈尔巴乔夫确曾反复阅读过列宁的著作，列宁让他着迷的，不仅是智力，而且还有令人敬仰的义无反顾地改变自己观点的本事，列宁只相信一个上帝——政治现实，

---

① "米沙"系"米哈伊尔"的昵称。

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理论教条和公式，包括自己的教条和公式。

我想，列宁对于戈尔巴乔夫具有吸引力的（他最终还能将俄国历史上的什么人作为自己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引路人呢，总不会是彼得大帝或者斯托雷平吧），是那个往往为戈尔巴乔夫充当“不在现场”证据的东西，他在这个不久前还毫无怨言、万马齐喑的国家里唤醒了社会自发势力。“不要怕乱。”戈尔巴乔夫有时会重复列宁这个神秘莫测的说法，仿佛在安慰自己，那是他放出的改革自发势力开始显然搞得过分的时候。这个说法听起来较为乐观，列宁的威望也应当有助于保持镇静。然而，毕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列宁呼吁大家在面临俄国爆发的社会灾变时不要惊慌失措，这种灾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布尔什维克的意志的，他们力图通过在全国整顿“革命秩序”来平息灾变。戈尔巴乔夫则是以其使社会摆脱“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体制”束缚的美好计划，客观上促成了“混乱”的出现，而且他打算仅仅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

在晚期列宁、很大程度上是假设的列宁（戈尔巴乔夫根据列宁的政治遗嘱几乎将其变成了马尔托夫式或者普列汉诺夫式的布尔什维主义叛徒）之后，赫鲁晓夫成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第二个来源和组成部分。他自己这样写道：“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行者……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遗产是斯大林主义威信扫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复仇图谋遭到失败。恢复斯大林时期的秩序未能得逞。这是开始进行改革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①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

对他这样一个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开始起步的党的模范干部来说，承认赫鲁晓夫的历史作用颇非易事。难怪以上的说法出自“晚期戈尔巴乔夫”的手笔，这时他已经从积极的政治中出局，可以较为超脱地纵论天下事了。即使在他当选为总书记之后，在他那个圈子里公开

---

① 指赫鲁晓夫。

赞美不知疲倦的赫鲁晓夫，也如同引用列宁语录一样，并非绝对安全。在这方面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有自己的一笔帐。反个人崇拜的斗争对他们说来相当不易，当时党遭遇了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滑坡”，对此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不但要自行消化，而且还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精神百倍地去向广大党员做解释工作。

戈尔巴乔夫回忆道，莫斯科下达的关于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指示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甚至不是因为“斯大林一手培育的党”的成员尚未摆脱各族人民领袖猝然去世所引起的悲痛心情，1953 年 3 月，包括戈尔巴乔夫及其好友姆雷纳尔日在内，人人都泪如雨下，眼泪当然早已干了。已经没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可怎么得了?”的问题。原来，即使在斯大林之后，生活也仍在继续。

应当考虑到：在莫斯科，秘密报告所揭露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尽管也在大会代表和干部中引起一定的震动（会场里有人感到不适），毕竟下面还有所准备。对于斯大林的大清洗，首都精英当然十分了解，他们曾经首当其冲、身受其害，他们认为最好是对此保持沉默。引起震惊的，是正式宣布的大清洗的规模，以及党和国家头号领导人当众（尽管是秘密地）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个事实本身。而且许多人将赫鲁晓夫的举措看成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夺权斗争的一种表现，而斗争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无需向机关作出解释。

据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讲述，在外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斯塔夫罗波尔人自然并未过上同影片里“库班哥萨克”一样的生活，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同所有苏联老百姓并无二致。然而，在谴责 30 年代主要针对党的干部、首都知识分子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恐怖大清洗方面，他们如同大多数农民一样，比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要克制得多。“我们边疆区的许多人对于所有这些‘清洗’即便不是赞同，那也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戈尔巴乔夫说道，“因为往往受到清洗的恰恰是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以及集体化时期欺压老百姓的那些人。”（他的外祖父潘捷列，这位虔诚的积极分子、热心集体化的人和多年的集体农庄主任，因“托洛茨基主义”判刑，该不是属于这个范畴吧?）

正因如此，当这位年轻、勤恳的共青团边疆区干部像投入播种运动一样投入非斯大林化运动，到各区去讲解中央决定的意义时，他所碰到的岂止是会上和基层组织中人们那不仅是感到困惑的沉默，而且还有含着敌意的沉默。赫鲁晓夫在其执政末期给外省的党员造成的困难也不小，甚至更大。他将全国分成一个一个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将党分成"城市党"和"农村党"，他要求超过美国：一会儿是在挤奶量方面、一会儿是在玉米种植方面、一会儿又是在弹道导弹方面。"我们边疆区的人对赫鲁晓夫感到厌倦，认为他走错了路，当他下台时，许多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反映了当年机关里的普遍情绪。直至经历了停滞年代，感觉到恢复极权制度复辟的实际可能性，并将自己改革的十分宝贵的头几年用于粉碎斯大林所建立的无所不能的体制的反抗，戈尔巴乔夫才得出结论："走向变革首先就意味着战胜自己身上的斯大林。"此后便将赫鲁晓夫列入改革的先行者和自己的前辈。

关于列宁的真正遗言、关于党的机构和党的干部心理中尚未根绝的斯大林主义遗产的理论讨论，显然令戈尔巴乔夫着迷，他高兴地让政治局委员一连几个小时进行这样的讨论，一来因为这些讨论对他说来是自我锻炼的方式，二来因为他在反复阅读列宁著作中不知不觉地开始将其当做儿戏，他力图将激烈思想交战的气氛引入他所继承的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那种气氛曾是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自然居住环境。

早在关键性的那几年，当他的计划刚刚在打基础、历史为他规定的时限以及人民的信任预期中的每一个月都十分宝贵时，就已显露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身上那个最终使他尚未建成的改革大厦一朝倾覆的特点：不愿从事千篇一律的、日常的、一贯的工作，几乎到了厌恶的地步。让他感到激动和着迷的，是"大事"，宏伟的想法，扭转乾坤的决定，远离（或者带着他离开）日常事务的计划。对他说来最有趣的谈话伙伴，是让他脱离平淡生活、枯燥的日常琐事，邀他进入高尚思想世界的空气稀薄的大气层的人。当时的政治局显然不适于进行雅典学派

式的哲学辩论，于是戈尔巴乔夫会乐意将自己的时间慷慨大方地花在其他人、非“法定”的谈话对方身上。

美国国务卿约翰·舒尔茨回忆道，有一次他同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关于导弹和弹头的约定谈判，两人不知不觉地转到全球性话题和关于未来15—20年世界发展前景的议论。结果，“枯燥无味的”弹头计算很快了结，交给专家们去做，两位交谈者专心探讨未来学达一两个小时之久，打乱了总书记的会谈日程安排。舒尔茨当然发现了苏联领导人这个值得夸奖的特点——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人初次到莫斯科就表现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求，于是大学教授出身的国务卿便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开导。在下一次去莫斯科之前，舒尔茨准备好了图表和曲线图，又同戈尔巴乔夫一起呆了几个小时，填补他知识上的缺陷，向他讲解了世界经济状况，情报学的作用，世界能源平衡、人口平衡、工艺平衡方面的主要变化趋势。他们的讲座式谈话中肯定有令人感动和非同寻常的东西，身为资深美国律师和教授的舒尔茨尤其乐意将其传授给自己意外得来的这个克里姆林宫学生，因为他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此类问题毫无兴趣，而且什么也不打算学习。

对此只能表示欢迎，如果人人必需、身居如此要职者更是必不可少的智力发展不致妨碍戈尔巴乔夫去处理大量日常的、刻不容缓的问题的话。按照一长制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急需管理，这些问题日益显得尖锐。此外还有改革的需要，改革只能靠上面的指示才能进行。不过，也许正是为了弄清应当作怎样的指示，就需要再去读读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经典作家著作，以批判的态度去审视自己的前任，倾听成绩不俗的对手的意见，以便确定颇具说服力的那个保障全人类幸福的计划，是在什么地方、哪个弯道上偏离既定道路掉进沟里的。

另一方面，新领导人实际上没有深思熟虑的时间了：全国上下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必须提出一个改革计划，即使这个计划并不存在。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许多研究者和已经出现的改革史专家便详细地、不止一次地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下除非按照最高层的决定，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起步。柯西金的例子说明，甚至凭

着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职位也不够。不仅因为一切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追求一长制的权力金字塔那完美无缺的匀称结构，而且也因为缺乏“来自下面”的、推动较为认真的改革的因素。

在苏维埃人的幸福受到党和政府“慈父般关怀”的年代，除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以及全民一致投票赞成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的联盟（人人都知道不听话者会有怎样的下场）之外，他们已经不会以其他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公民情怀了。此外，每天都受到宣传工具灌输的“基层群众”，自然不掌握有关国内真实情况的可靠信息。即使“高层人物”所获得的关于国内和世界真实情况的情报，也是支离破碎，有一定的“公差”，而且往往整理得面目全非。

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好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列队行进，人们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眯着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导引领着，向导不时高喊雄赳赳气昂昂的口号，并要求大家齐声高呼“乌拉”。安德罗波夫一不留神猛然冒出的一句话，印证了这幅超现实主义图画的真实性，他大概要算是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人了，上台伊始，便当众承认：“我们还应当弄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面。”

“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受到基层群众的压力、大规模不满情绪的表露或者最不愿看到的自发抗议的混乱状态等的推动，特别是对宣布改革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改革自有其优越之处。它使执政者有时间制定合理的方案和“规定剂量”的变革的计划进度表，也可以使人相信社会可以平稳地从一种聚集态过渡到另一种聚集态（从水变成冰或者推动机械的蒸汽），而不会出现质的飞跃和同过去的决裂。然而“滴管式改革”的这一切优点，都可能在面临人们的不满和焦急的压力时顷刻之间走向自己的反面，尤其是当唤起的激情没有及时地引向过去的执政者的时候，本可将欠下的债和多年的罪责统统推到那些前任的身上。

像宇宙一样古老的保住权力的处方，要求新领导人将一切都推到前任的身上，同时又保留前任惯用的对社会严加控制的方法。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继任者、首先是赫鲁晓夫（不过据说还有贝利亚）指望解

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国家的悲剧和体制的罪过都算在个人崇拜的帐上。勃列日涅夫和以他为首的“三套马车”修正了永远英明的政党的方针,摆脱了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安德罗波夫则只来得及将他所发现的勃列日涅夫体制的腐蚀斑点——纪律涣散和贪污腐败标示出来。

本来戈尔巴乔夫也是照例一上来就先揭露在他之前的“停滞”,久久盼望出现新人新语的社会对此表示同情,党和国家的官僚集团则表示理解,他们都准备参与到“交接班”中来。直到头两年过去,惊讶不已的机关和感到困惑的民众才发现他的意图和行为中所包含的,并非例行的较为有效的解决继承王位问题、也就是完善自己权力结构问题的办法,而是对体制进行真正改革的方案。改革要求首先必须屏弃维护体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实施所宣布的改革的一个主要杠杆,那就是强迫。

要紧的是开始!

戈尔巴乔夫决定去掉列宁时代就已套在社会头上、斯大林又再次勒紧的恐怖羁绊,并非由于他的天真幼稚或者缺乏经验(尽管独特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在这里起了作用),而是由于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不仅国家的经济、而且整个制度都会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

自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没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政治改革的逐月逐日地安排好的具体计划,或是“500天计划”。他们不得不仓促行事、即兴发挥,还因为善意对待党的新领导人的全国民众期待着某种业绩,就像前来观看魔术表演的观众一样地期待出现奇迹。而且是马上出现!“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现在!”亚历山大·巴雷金这样唱道,全国民众也凝视荧屏,打着节拍,狂热地随

着他唱。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农民经验的熏陶，喜欢重复“欲速则不达”这样的话，在由他亲自唤起的期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采用试验的办法，也就是犯错误的办法，愈来愈加快前进的速度。

既然无论“恢复名誉的”赫鲁晓夫还是反复读了三遍的列宁著作都未能提供解决80年代中期“发达社会主义”所碰到的问题的答案，那就只好去求教安德罗波夫了，安德罗波夫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这个时期国内的实际情况。结果，一面是政治的层面上正在开展关于国家今后发展道路以及关于暂且还拿列宁作挡箭牌的苏联社会新模式的理论讨论，戈尔巴乔夫也重新挑起了关于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的话题，一面是他当时的战友们在解决所面临的日常生活问题时，仍然试图依靠戈尔巴乔夫正打算彻底改变的那个体制。如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出现了“剪刀差”，只不过这次不是价格上的、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别，而是政治讨论的层面和方向与新政府的实际步骤之间的差别。

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捆住一切革新者手脚的客观原因：他们很快发现，要铸造未来，只得使用惟一可以搞到的、由过去组成的手边材料。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既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又让他讨厌“日常工作”并使他处于依赖地位，处处依赖那些负责解决日常问题的人。

1985—1987年间，他手下这样的实践家便是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两人也是在安德罗波夫时代登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并在他当选总书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个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第二书记，以中央书记处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果断地承担起管理党的机关的任务，因而又承担了起草大部分政治决议的任务。另一个身为总理，实际上将整个经济领域都置于自己的麾下。戈尔巴乔夫呢，不仅因为他对全球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偏好，也是因为性格使然：他作为一个善于搞妥协的人，只是偶尔利用自己的地位去遏制一下朋友，或是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要朝利加乔夫“跺上一脚”的重要理由，是这位第二书记于1988年3月批准发表堪称改革时期宣言的列宁格勒副教授尼娜·

安德烈耶娃的《不能放弃原则》一文。至于雷日科夫，在他的压力之下，总书记连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政治阵地也放弃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与1991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其时失去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后来，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在改革头几年的严重失误，是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严重“滞后”：一是将党一分为二，换言之，就是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人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方案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诚然，他没有讲清楚，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隙的出现，不仅是由于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是由于他们起初在这个领域干脆是在往后退。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转动的，依然是那个“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模式”的手轮，他们希望前任设计的发动机在去掉腐蚀和尘土之后最终能够启动，“船夫曲自己会响起来”。

他们和安德罗波夫一样，相信只需凭着强化纪律和秩序的行政措施、向领导人本身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及尚未道德沦落的年轻干部的无私热情，即可迫使理论上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永动机”卖力地运转。此外，在登上国家的领导岗位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勤奋地阅读各个经济研究所为数众多的“成品”（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早在1985年之前就曾光顾他的办公室、出席他主持的会议），他的经济助手尼·彼特拉科夫却认为，他本人的知识积累中可说是“囊空如洗”，得从零开始往里装东西。

除了借自安德罗波夫的整顿劳动纪律的处方而外，再加上承诺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的、未能实现的柯西金改革思想，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斯塔夫罗波尔土地上推广提高农村劳动者物质利益的“伊帕托夫工作法”的成功经验。结果就出现了“加速”经济发展的纲要，那与其说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改革构想，倒不如说是宣传性的口号。

实际上，除了“加速”，还有什么可以成为过去的停滞时代的对立物，成为他在决定命运的1985年3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关键

性概念“勃勃生机”的具体体现呢？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个词语的号召性和乐观主义的语调后面，至1987年夏天之前实际上并无任何具体的行动计划。经济领域个别偶然的决定相互之间缺少衔接，而且与日益积极展开的政治过程实际上并不协调。这方面有其简明的例子。比方说在一周之内，几乎是在同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了两个相互抵触的决定：《关于鼓励个体劳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同非劳动收入作坚决斗争的决定》，后面这个决定按照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斯大林时代盛极一时的传统，规定了私人住房、温室等等的硬性限额。

那几年通过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决定，诸如发展机械制造业的纲要、加快科技进步的措施、创建区农工联合公司或者实行对制成品的国家验收制度的做法等等，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中每一个各自领域的决定以及它们的总和，都是复活气息奄奄的行政命令经济、保持其结构（其中的军事工业过分膨胀）及赖以生存的规律的绝望尝试。

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相当准确地诊断出来的经济问题（“全国都在排队；我们始终生活在短缺之中：从载能体到妇女连裤袜都缺；只有军事部门在‘长膘’；工艺上对西方的依赖日益严重”等）是不可能的。总书记抱怨说，为了解决例行的短缺问题，几乎每次都得成立以中央书记为首的委员会啊。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去“生产”妇女连袜裤，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样的任务就落到继任者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电话总机室，担当起调度员的角色，在寒冷的1986年冬天向各地区分配短缺的燃料。

国家的新领导人不会看不见，岂止燃料储备或者食品储备，就连国家经济的整个行政资源也都极其紧张，但他们又像是置身包围圈中的一群狼，想像不出突破体制樊篱的任何办法。“起初我们全都沉迷于幻想之中，”戈尔巴乔夫证实道，“我们相信可以改善体制的职能。”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应当强迫体制运转。结果，一面是戈尔巴乔夫与

斯大林划清界限，往晚期列宁的方向靠拢并受到新经济政策的鼓舞，一面是党和国家机关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全力以赴地抓国家验收制度，建立了一支监督产品质量的大军，而不是让消费者来起这个作用，并且十分卖力地为新的闻所未闻的行政建筑纪念碑——国家农工综合体挖基坑。

1985 年春天宣布的反酗酒运动，成了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标志，它足以说明新领导人最初的实际步骤是怎样地考虑不周，其中包含了他的政治失误、经济失误和心理失误。果然不出所料，就连专制时代或者极权主义时代最果断的执政者都未敢尝试的、通过命令方式达到俄国人人清醒的做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它在国家预算中留下了第一个、不过也许是致命的窟窿，还留下了理所当然地冒出的生产和地下销售家酿烧酒和伏特加酒代用品的黑手党……以及数百则笑话，嘲讽的对象自然是“改革之父”。

这场运动必然招致的对新领导人声誉的损害（在这个苏联禁止出售含酒精饮料的年代，戈尔巴乔夫得到的最不具侮辱性的绰号是“果汁总书记”和“矿泉水书记”①），与千百万排队的人们所遭到的屈辱不可同日而语，官员们以惯常的热心和粗野强迫他们接受没有酒精饮料的婚礼和葬后宴以及诸如“白糖顶伏特加”和“一月顶五月”之类稀奇古怪的票证冲抵格式。城市街道上出现了反酗酒纠察队，以恐怖手段吓唬做客归来的行人，一度销声匿迹的告密行为又借尸还魂，苏联驻外使馆的招待会则门可罗雀。

如果说行政当局的这个荒唐决定还可以用一纸同样唯意志论的新命令中止执行的话，那么因砍掉葡萄园、拆毁酒厂和将一个强大的经济部门赶至地下等等所造成的危害极大的经济影响，就成为落在整个改革命运头上多年的沉重负担。反酗酒运动之考虑不周和荒谬绝伦实在太明显了，于是许多人便试图找出原因，一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本人（或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酒类简直深恶痛绝，一说是因

① 反酗酒运动期间，人们只好以果汁或矿泉水代替酒类。

为利加乔夫暗地里对于杯中物情有独钟，他就迫使整个国家和他一起同自己无法抗拒的诱惑作斗争。

实际上这两个说法都不对，这样就更糟糕，因为如此一来"矿泉水书记"更加无法自圆其说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贪杯。在他15岁时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他和父亲一起干活的生产队里的联合收割机手决定将他升格为真正的男子汉，给他递上满满的一杯，那不是伏特加，而是酒精。"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回忆道，"我就体会不出喝酒的乐趣，不过始终喜欢和亲朋好友坐到一起觥筹交错。"

夫妇双方各有一个酗酒成性的弟弟，自然都厌恶毫无节制的酗酒，也都明白这种已经成了病的恶习是多么地难以治愈。如赖莎所说，他俩不得不同其他亲戚一起背上这个"家庭的十字架"，同时他们当然尽量不让两个患狂饮病的弟弟的不体面行为张扬出去。赖莎的弟弟，一个才华横溢的儿童文学作家，成了医院的常客，只要邻居或者医院打电话来，就马上派戈尔巴乔夫的女婿阿纳托利去，他要让这个亲戚恢复知觉，有时还得到醒酒所或者车站的酒鬼中去四处寻找。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并非从旧礼仪出发对于酒类深恶痛绝。大学时代他并不避讳少不了喝酒的学生聚会，后来成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党领导人，也并非滴酒不沾。据他的同年级同学、多年在《劳动报》工作的P.科尔恰诺夫说，他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见面时，两人要喝掉一瓶一公升装的伏特加。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50年代末曾在斯塔夫罗波尔一家共青团报社工作，在证明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对民族说来十分微妙的问题上的态度方面堪称绝对的权威人士，据他说："开展反个人崇拜运动期间，戈尔巴乔夫经常到我们的编辑部来。我们坐在桌子旁边，打开一瓶酒，长时间地讨论政治问题。当时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得全国上下为之震惊，我们许多人都相信民主时代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喜欢回到反酗酒运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上来。他对于这个明显的政治失误的习惯性解释可以归结为：首先，反酗酒运动是他继承下来的"遗产"；其次，他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委托"给了利加乔夫和另一个也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人——索罗缅采

夫，他们又“热心过度”。他承认此事做得粗糙：“本来可以从长计议的，不应该突然改变人们的习惯。”然而，不知是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解还是加以解释，他又提到当时国内酗酒现象已经达到了民族灾难的规模，平均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不断下降，“男人快要死绝，后代也在退化”，还说最初有数千人，主要是妇女，纷纷致信中央拥护这个决定。戈尔巴乔夫在为改革时期出师不利的《关于杜绝醉酒和酗酒现象、根绝手工酿酒的命令》辩护时断言：“没有任何秘密的决定。国内有180个劳动集体讨论了决定，表示赞成。（仿佛忘掉了当年是如何保证做到人人赞成的！）甚至建议通过《戒酒法》。不过我坚决表示反对。在执行阶段把事情搞糟了。”

从他的评论中可以明白，他并未因以自己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感到十分后悔，他认为当时领导人的目标和意图都是美好的，又是方法出了问题。于是切尔诺梅尔金的伤心说法在这里就不适用了，那说法是：在俄国只要想尽量做好，就总是适得其反。

然而，即便是席卷全国的反酗酒旋风，也并未给逐渐铺开的改革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害：苏联人对于出现好转的期望实在太强烈了。此外，尽管流传着总的说来还无伤大雅的笑话，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威信并未遭到重创。他还不无得意地亲口将有些笑话讲给自己那些大名鼎鼎的外国客人听。例如他讲过这样的一则笑话：一个莫斯科人为排队买伏特加气忿难忍，便跑到克里姆林宫去，要往戈尔巴乔夫脸上吐唾沫。他很快就回来了，心情更加懊丧：“那边排的队比这边还长呢。”

在那个“改革的白银时代”，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准备原谅他，并非因为他当时已经有了什么重要的作为（他的所有业绩还在以后），而是因为他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还因为他丝毫不像自己的列位前任。当然不是指他本人一有机会就可以讲讲关于自己的笑话（当初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圈子里肯定也会这么干），而是指他愿意、也善于同人们交谈，不是念现成的讲话稿，也不是以他们的名义表达自己那并非总是明白易懂的愿望。当时他的能言善辩尚未让人们觉得是口惹悬河，而是令人神往，叫人着迷。

当然啦，新总书记的外貌本身（不仅仅是凭着与他的那位前任的反差）也对他的听众具有吸引力，可以博得人们的好感。年轻，有魅力，长着一双炽热的南方人的眼睛，对自己所说的话坚信不疑，因而也容易说服他人，总之，这是一位无可争议、不同凡响、多年来国家第一次不会因他而感到羞愧的领导人。据叶莲娜·邦内尔①证实，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的一次电视讲话时说道："这是第一位合乎标准的苏联领导人。"

对于正在起变化的工作节奏，机关也不得不去适应。领导身边的人为了迁就几乎从不上班的领导人的病情，早已习惯于原先的"卧床制度"，如今助手和工作人员开始每天呆到晚上九点：戈尔巴乔夫通常不会在九点之前回家。就连他的着装方式和显而易见的对于点缀物的关心，也在向身边的人暗示：新的时代到来了。博尔金早已习惯于那种"党的朴素的"、千人一面的工作服，他后来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工作如此繁忙，怎么能找出时间每天换一条领带，还要根据西服和衬衫来挑选领带呢？"依他之见，这里表现出一个外省人在贫穷的年轻时代未得到满足的对于"穿着讲究"的渴望。

人们没有十分留意他的领带，大概只记住了那顶华丽的圆顶帽，冬天这顶帽子使他在周围一大片麝鼠皮帽当中显得鹤立鸡群。至于夏天，戈尔巴乔夫头戴自己那顶平庸的、尽管质量上乘的灰色"费多尔礼帽"，即使在陵墓主席台上一长列官员中也不显突出。姆雷纳尔日在阔别多年之后初次见到他时，不禁高声喊道："米什卡，你戴上这顶帽子简直活脱儿一个赫鲁晓夫！"

当然，较之时髦服装更能突出戈尔巴乔夫的，尤其是在国内视察期间，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同他一起出席礼节性仪式，往往也出席公务会谈，次数之多令人感到不大习惯。有些人（这种人居少数）对此表示赞赏或者无动于衷；有些人（多为女性）对于她"到处抛头露

---

① 萨哈罗夫夫人。

面”感到愤愤不平。只有当她们看见有时戈尔巴乔夫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电视摄像机镜头,无意识地,显然是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挽起赖莎的手时,才会变得宽容温和起来。

与苏联党领导人那千篇一律的行为举止和奉为经典的有关他们的概念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令西方媒体惊讶不已,尤其是在头几年。1985 年 11 月,曾经出席戈尔巴乔夫日内瓦“世界首演”——他与里根首次峰会后的记者招待会的一位美国记者,怀着羡慕的心情对自己的苏联同行说:“你们有了一个杰出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能有什么作为,不过作为职业记者,我可以断言:他接见记者时,我国无论哪位领导人都最好别出现在他的旁边。”而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初次见面的舒尔茨,显然是被这位“克里姆林宫新理想家”的魅力所征服,他写道:“仅凭戈尔巴乔夫的乐观主义和坚定信念,就足以保证改革的成功。”果真如此就好了!

第四章 改革——什么?

冒上一次险

年轻的总书记在政治舞台上迈出的头几步所引起的欣快感甚至狂热渐渐地消失。新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蜜月”转瞬即逝。由于日常生活中并无明显的变化,即便是对新领导人显然具有好感的全国上下,也无法长时间地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变革征兆。

当然,经历了漫长的克里姆林宫老人当政时期之后,人们很欣赏戈尔巴乔夫那开放、直爽的举止风度:他最初的公开讲话变成了电视群众集会,使千百万人聚集到电视荧屏前面。习以为常的政治仪式失去了意义,人们已经对仔细端详迎送总书记时严格按照尊卑顺序排列的党领导人相片毫无兴趣。戈尔巴乔夫看来是有意“破坏这些规矩”,他可以随便挽起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手臂便走向飞机舷梯,于是在公开发表的大量照片上,整个官阶表都乱了套。

为党的圣像壁制造标准像的工业日渐式微。诚然,在刊登关于戈

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时配发的第一张正式相片上，自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对额头上的胎记作了修版，然而在电视上匆匆亮相之后，胎记又回到了党的“圣像”上。他本人对肖像持嘲讽的态度。一次出国访问期间，有人对他说一位当地的俄裔画家想要给他画像，戈尔巴乔夫甚至大发雷霆：“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只要开始给领导人画像，那改革也马上就得完蛋了！”

在全国巡视（最初几月他去了列宁格勒、基辅、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秋明）期间，总书记显然很乐意“到人民中间去”：交往交往，沉浸到一片欢呼、掌声、握手的气氛之中。

因为有关这些会见的详细报道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播送的，这类与人们“在镜头前的交往”同时也是他的教育工作的继续，使他可以一次再次地公开发表意见，“来到每家每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比听的多得多，而听到的又多半是他期待听到或者想听到的。有一次他从陶里亚蒂市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来到人们中间。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了。谁也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生活，人民有热情，有积极支持改革的决心。每个人都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但愿别往后退，往前走吧，我们都支持您。’”

然而，愈是往后，在不同场合伴随着他的这一片充满感激的赞许声中，愈来愈明显地可以辨别出不耐烦的音符。虽说举国上下并未期待出现奇迹，却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一味的许愿。人们希望看上去真诚得令人喜欢、值得信赖的领导人除了保证一切都会马上变好之外，能够提出一个可使国家迅速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的解救性纲领。然而纲领始终搞不出来。尽管在笼统的词句和选择主要前进方向方面似乎一切都很清楚：走出停滞就需要“激活”经济发展和“加强每个人的责任心”，主要的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从何入手？列宁所说的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个“关键环节”始终没有露头。继承下来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伸出好些个线头，他依次抓住一根又一根线头——机械制造业、科技进步、农工综合体、军工综合体，却每次都确信没有抓住关键，乱麻反而愈来愈乱了。

原来，无论“加速”的格言还是对每个人发出的“在工作中加把劲儿”的号召，均未改变当时的现实，更遑论改变生活的总结构了。新领导人并无一个完整的改革构想。注意力分散了，倡议一个接一个，多半使用的是从前的旧产品：当初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一起倒腾数百篇专家和科研院所的资料，起草了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契尔年科均未采纳的关于科技进步和可能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材料。

戈尔巴乔夫舍弃了突出某一个关键的加速方向的尝试，提出“全面出击”。在1985年6月轰轰烈烈地开过机械制造业的会议之后，注意力又转移到农工综合体上来，当时把这说成不折不扣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楷模”。几个月后已显而易见，这些单打独斗式的骑兵突袭一无所获，其原因并不在每个经济部门，而恰恰在政治方面。

促使戈尔巴乔夫考虑必须搞出一个总的改革构想的，不仅是出师不利，而且还有个性特点，那也将成为改革的政治计划的特点。从大学年代起就养成的对于构想性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兴趣，还有始终未得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促使戈尔巴乔夫从更高的层面——抽象的层面去寻求出路。很难说这仅仅是令人羡慕的超越日常现象、居高临下地审视具体情况、进行概括和典型化的能力，亦即战略家智慧的特征呢，还是精神上逃离陈规陋习和日常琐事的一种方式。况且，既然这两者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又有什么手术刀可以将它们截然分开呢？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这是向苏联社会宣布它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最好不过的讲台。戈尔巴乔夫的构想要由他的左右手来拟定，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那批一起冒上一次险以便一直走到底的志同道合者”。当时完全可以将经过重新整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归入此列。其中有（如果了解后来发生的事件，就很难相信）彼此相去甚远的戈尔巴乔夫的战友，诸如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和博尔金。叶利钦在这个阶段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弄清国家所处的历史时刻和对改革的哲学作出表述，于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

“理论家”就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他们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曾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宣传部副处长纳伊利·比克宁，以及总书记的助手瓦列里·博尔金。

他们冒的一次险——1986年2月26日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成了如此五光十色的“一批志同道合者”的追求的共同基础，报告并未预言官方世界观将发生重大革命。改革起始阶段的构想习惯性地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许诺回归“真正的列宁思想”。至于苏联社会中那些表明改革已势在必行的危机现象，则解释为质量尚不够完美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尚未完结。受到新领导人激烈抨击的困难和缺点，均归之于“社会主义还不够”，由此便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必须走向更多的、“更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离开它”。不仅在他的报告中，而且在一年之后苏美两国同时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样来表述改革的最初构想的。“对于生活提出的问题，”他在书中说道，“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其范围之外寻求答案……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及其个别组成部分，完全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

在这段无可挑剔的文字中，细心的耳朵仍然听得出最初的思想上的不谐和音，甚至是羞羞答答的不同政见的音符。原来，在苏联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尚有待于建设成“更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在顷刻之间，就从“发达社会主义”的地位降格为“欠发达社会主义”的范畴。同时宣布，衡量其是否完善、是否符合理想的标准，应当是民主的发扬。当然，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陷入此类思想上的异端邪说、受到距社会民主主义仅咫尺之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诱惑之前，还得认认真真地一一尝试激活苏联式社会主义即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的所有计划。

因此，按照传统，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强调了提高“效率与质量、劳动者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性。所许诺的对国民经济的“深刻改造”，就要求加强对经济的集中领导，这种领导应当

以奇妙的方式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范围”和扩大其自行销售计划外产品的权限结合起来。这些冒充理论创新的旧的经济核算处方，当然丝毫没有预言改革的全面春汛，不久，这场春汛就会呼啸而来，大有波及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觊觎新革命的地位之势。

如果说代表大会报告有什么革命性的成分，那就是由雅科夫列夫和瓦·法林共同起草的报告的国际部分，其中比内政部分坦率得多地声称要放弃传统的对世界局势进行“阶级分析”的做法，并且宣布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修正主义论点”，诸如世界发展进程的全球性质，在“万能”的原则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将各国人民甚至各种社会制度联合成为统一的文化。雅科夫列夫在评论未来“新政治思维”的轮廓时这样说道：“戈尔巴乔夫是想借助报告的这个部分向代表们和全国上下说明必须作出原则性选择：我们是继续闭关自守呢，还是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往。”

当然，为了设法将这些新的“全人类的观点”冒充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甚至列宁学说的真谛，（例如戈尔巴乔夫就曾在1986年说过：“按照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与民主二者密不可分。”雅科夫列夫与他一唱一和，说改革就是“回归列宁”。）要么得公开地耍滑头，要么得真正地陷入迷误。多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并不羞于承认：“我们当时全都抱着幻想……”然而，他只有在试图真正具体贯彻自己最初关于“真正列宁主义”的想法之后，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将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很快就要抛弃的幻想一一罗列出来，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有：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个体制整个说来十分可靠，它不必依靠强制手段和思想上的操纵，即可以“自然”的方式运作；关于苏联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忠实程度的幻想；以为在80年代中期可以重提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者们未能实现的意图——更新陈旧过时的体制，使之年轻化、现代化，将体制与民主联姻；关于当时苏联精英的成熟程度、现代化程度、通晓起码政治文化的程度的幻想，以为他们能够以文明的方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并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幻想、后来证明也是致命的失误在于，他无论对老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均估计不足。未来他将会感到失望的，还有他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像市场那只“无形之手”一样，即使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的自动调节器。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在民主发展方面传统性的长期落后而外，还得加上 70 年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

由于体制一味依靠强制手段，社会深层就不能不积聚起一股脱离装潢门面的社会主义、发挥保守主义和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应的潜在力量。因此，借助民主的“起子”将盛有发酵好的苏维埃“家酿啤酒”的密封瓶打开之后，溅洒出来的东西与改革首倡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当初在改革的“浪漫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为了将他预计要进行的全部变革统统纳入自己的“面目一新的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曾将社会主义的内容扩大到了广袤无边的地步。在描述这个至今闻所未闻、具有全球规模的突变体的特征时，职业的思想家兼宣传家雅科夫列夫前来给他帮忙（后来，到了同自己改革初期的神甫分道扬镳时，戈尔巴乔夫怒气冲冲地骂雅科夫列夫是“几朝元老的宣传部长，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到叶利钦时代”）。正是雅科夫列夫以他的词句算卦将社会主义的概念抻到了没有限度的范围，从而将其变成绝对理智和善良的王国的等同物。当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全部用光时，还把反面的证据请出来帮忙。“社会主义的世界观，”1988 年 4 月雅科夫列夫在向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讲话时解释说，“同领袖至上、贬低群众的作用、抹杀人的个性、反人道主义和不守法纪毫无共同之处。”他还用修辞性提问来解除反对者和怀疑者的武装：“不守法纪，愚弄人，原地踏步，经济上的衰退，社会相当一部分腐化堕落，理论思维陷于瘫痪，如此等等，难道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危险吗？”不难理解，在这样的解释下，社会主义也好，打算复兴社会主义的改革也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遍及各个生活领域并与当代世界发展紧密相联的有益过程”。

至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定义实际上已经丝毫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那又另当别论。这样，便以独特的方式，合乎逻辑地划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和理想的历史范围。这一颇具吸引力的社会理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很久即已出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抽象说教体系之中，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羞羞答答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新政治思维的"全人类价值观念"里，它几乎又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

如果将"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与"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当时精神上的联盟看成他们精神上有机接近的明证，那就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微差异。至少就雅科夫列夫而言，如果相信他后来的说法，那么对列宁和社会主义的礼仪性的顶礼膜拜，仅仅在初期反映了他那尚未克服的"错误观念"。"我们曾试图为了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耶稣毁掉教堂，当时还仅仅是模模糊糊地猜测到：我们的宗教是虚伪的，我们的耶稣也是伪造的。"然而，这种顶礼膜拜很快就变成了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其理由就是改革的计划"始于党内，只能宣布为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和党的阵地的倡议"。据他自己承认，到了结尾阶段，忠于社会主义的"游戏"对他说来就归结为政治上的"花招"，其目的就是避免与那个愈来愈显得好斗的保守派阵营发生正面冲突。

戈尔巴乔夫则与雅科夫列夫不同，这段时间他始终不停地试图赋予他认为十分珍贵的社会主义理想以现代的外貌，他真诚地相信只要去掉苏维埃社会肌体上的斯大林主义毒瘤，再对其余的恶性细胞施行大剂量的民主放疗，还是可以治愈的。正因如此，他在1985—1987年间才一门心思地追求"更好的社会主义"，才在那些怂恿他越出列宁主义框框、思想激进的谋士面前耀武扬威。"个人利益当然应当鼓励，但不能以损害社会主义作代价。归根结底，就连伊里奇[1]也曾经为将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殚精竭虑。"

---

① 指列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愈来愈空洞抽象的关于在不背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改变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日益局限于口头宣言和苏联领导层内部争论的范畴，它只能引起直接参加者的兴趣。至于在实际政治的范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效仿自己的偶像列宁的话，那么首先在于他是个绝对的实用主义者，（幸而）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结果，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几乎一切意识形态公式，其中包括他昨天还赌咒发誓对其矢志不渝的公式。如此“弹性”的行为举止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优越性：这样他往往可以把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追随者和对手搞得晕头转向，不管他们来自左边还是右边，因为他可以像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去思考，像一个地道的自由派那样去行动，暗地里却以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

后来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对于他那既表现出内心世界不断演变、当然也表现出极其巧妙的政治策略的多种面孔，对于这个仿佛是捉摸不定的“他的真正实质”，愈来愈感到恼火。其中每个人都有理由将戈尔巴乔夫当成自己在某个时期的志同道合者。“戈尔巴乔夫的话尽管讲得不错，”他的一位“志同道合者”利加乔夫写道，“却不过是说说而已……他在讲话中仅仅表明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却并没有为贯彻该立场而斗争。”时隔不久，利加乔夫又有了意外的轰动一时的发现：“他的立场中甚至（！）表现出某种两面性。”也好，尽管是稍微晚了一点儿，他正确地发现了总书记政治策略的特点：“为了安抚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他提出了某个论点，实际上却执行的是另一条路线。”

作为例子，利加乔夫举了戈尔巴乔夫在对待自己两个最亲密的、却又彼此相去甚远的战友——他和雅科夫列夫的态度上的所作所为。戈尔巴乔夫不知是为了用一个人来制衡另一个人，还是为了让他们互相掐起来，曾经一度让两个人共同负责意识形态。“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利加乔夫回忆道，“戈尔巴乔夫有时候支持我，有时候又支持……雅科夫列夫，尽管我俩的观点势不两立。这样的巧妙周旋符合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性格。”

这种巧妙周旋是否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版本的政治“狡诈”、极其巧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①]、党的君主那扭曲的禀性——以挑逗自己的廷臣互相争斗为乐事呢？总之，利加乔夫自问道：“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在什么时候“是真诚的”呢？作为一个看问题简单化、绝对化的人，利加乔夫从未有过深深的疑虑。他很难想像，他的上司恰好在其出尔反尔、前后不一方面才可能是真诚的，往往有时他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该听谁的：是听雅科夫列夫的呢，还是听利加乔夫的？因为他觉得其中每个人都表达了部分的真理。

而最主要的是他并不清楚：历史想要什么，历史究竟要把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开始的改革引向何方。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是遵循试飞员在进入超常规状态时的金科玉律（利加乔夫曾就读于航空学院，他把改革比作一架进入颤振状态的飞机）：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就什么也别做。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政治颤振的状态下，认为相信事件的自然发展乃是最明智的办法，他认为自己的作用就在于借助语言麻醉去安抚、平息、麻痹惊恐不安的社会，使外科医生——历史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

一位最具权威的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舒尔曼在对改革计划之诞生和改革初期的不坚定步骤进行分析时（诚然又是马后炮），对这一阶段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苏联的条件下，如果改变体制的尝试是由局外人、体制之外的人来进行，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体制可以利用其屡试不爽的镇压机关，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干掉。体制只能通过内部的人的努力加以改变，而这些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得遵守体制的游戏规则*。”他说的基本上都对，只是没有提到耸人听闻的微妙之处：未必有哪个改变体制计划的参与者会把彻底改变甚至摧毁体制当成自己的目的，哪怕是绝对保密的目的。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都是那个产生他们和培养他们的体制的真诚而狂

① 指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推行的政策：为达到统治目的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热的追随者。只不过不是那个实际存在的体制，而是更好的、理想化的体制罢了。

戈尔巴乔夫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他并未将他至少刚开始时不曾有过的革命意图算在自己的名下，这样他就比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更加可信，这两位都宣称自己几乎是抱着从内部炸掉无效的不人道的体制的明确意图参加改革的。这纯属多余。他们大可不必说自己早就“洞悉”历史（按照列宁的说法，要一五一十地预见历史进程，“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行”），由于他们有意无意努力的结果，他们合起来的历史作用已经相当大了。

有些人事后所作的表白同样没有多大价值，他们或是像1991年政变分子那样猛然醒悟，或是对于在自己的参与下开始的改革大失所望，却全都企图将罪责推到总书记兼总统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将在最高历史法庭上为以下事实共同负责：始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试验，在20世纪末总体说来是以文明的方式而不是流血的方式宣告结束。有人会为此感到自豪，有人则会尝试竭力否认自己曾经参与其事，不过都改变不了什么。

问题与其说在于他们的努力和意图，倒不如说是在于体制本身的特点。斯大林留下的这份遗产“完美无缺”，只需人们为它服务或者加以看管，却无需改进。在抵御任何从外面摧毁它的企图方面，体制可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却只有一个缺陷：它无法避免从内部对其“稍加修理”的企图。因此，任何人只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出于良好的动机提出完善体制或者使之现代化的计划，客观上都会变成体制最危险的敌人——“破坏分子”。领袖斯大林深谙此事，或者至少是有所感觉，因此，主要是出自正统的共产党人的“破坏分子”人数就愈来愈多，尽管对他们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很走运，至于体制本身，就不能说走运了。

“我会走得很远”

政治局内部以及戈尔巴乔夫挑起的公开政治辩论中，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探讨仍在继续，与此同时，新的现实的因素愈来愈积极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来。政治局诸委员不管是否愿意，只得从理论讨论的高度走下来，就数十个局部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决定。应当说，他们和中央书记在这里感到比在戈尔巴乔夫挑起的政治辩论中自信得多，也舒服得多。党的工作人员所经过的统一历练，使得他们处理起诸如粮食收割、准备过冬、消除各种短缺现象、调节经常出现的地区性社会与经济危机之类“具体问题”来，比进行关于政治理想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讨论要得心应手得多。

就连总书记本人也乐意介入到这样的生活话题，不知不觉地从新世界缔造者或者第二个世界超级大国首脑的身份又回到了边疆区党委书记的角色，对他所管辖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负责：从储备饲料到保证学生的课本供应。一个念念不忘自己曾经几乎每天都参加全体突击工作、清除行政系统血管中的血栓的书记的条件反射，迫使他时而分心去过问农村私人盖房所需的建材生产问题，时而又以自己的威望去支持中央书记比留科娃要求国家计委向消费品生产企业提供更多原料的申请报告。然而，他很快便猛醒过来，并力图利用此类局部的实例来进行概括，以此为基础，正如当年以伊帕托夫工作法或者其他什么“创举”的经验为基础一样，勾勒出自己新经济战略的轮廓。

实际上在整个1986年和1987年上半年，这些做法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如上所述，它们反映了当时他希望通过“*提高要求，加强纪律和在全国建立起码的秩序*”来启动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与此同时，早在那个阶段，在缺乏一个整体的改革构想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曾依靠政治局中最“先进部分”的支持，尝试哪怕去掉奉为经典的社会主

义经济中某些行政强制的枷锁。

诚然，这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最初的“牛刀小试”决不能算作革命措施。戈尔巴乔夫忠于自己“回归列宁”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也认为最好是回到列宁借助新经济政策和鼓励全面合作化来挽救社会主义的计划。然而，就连这方面迈出的最初步骤——鼓励农村中的个体农场、制定关于个体劳动活动的法律，以及后来的旨在去掉私人企业主头上铁枷锁的合作社法，也在政治局内受到敌对和充满警觉的对待。包括索洛缅采夫和切布里科夫在内的几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忧虑：他们担心鼓励个体农场会破坏集体农庄和“败坏”集体化的“名声”。

在1986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忍无可忍，他说道：“瞧你都说些什么呀，”他突然冲着索洛缅采夫说道，“你看，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都是说商店里空空如也。我们老是怕个体农场会破坏社会主义。空空的货架会破坏社会主义，难道我们就不怕了吗？”为了不让人家怀疑他大逆不道，他马上按照自己的习惯拿领袖的威望当挡箭牌：“列宁就不怕鼓励私人企业主，甚至还是在国家弱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即使什么地方私有企业主搞出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具有列宁的智慧，足以从容应付。”怀疑论者自然缺乏反对“列宁智慧”的勇气。“总之，”戈尔巴乔夫打着“列宁思想”的旗号，已经在发挥自己的思想了，“不能把个体活动宣布为所谓的寄生活动。即使偷盗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为了发财的偷盗，也有因为需要、由于短缺引起的偷盗。要是木板或者其他建筑材料没有卖的，谁家的屋顶又漏了，他反正要么设法搞到，要么去偷。”

当列宁的提法不足以为某种行为辩解时，戈尔巴乔夫便毫不脸红地发明自己的提法。主要的是给任何不正统的概念贴上安抚性的“社会主义”标签。戈尔巴乔夫在将列宁作为自己的盟友时，用以鼓舞自己队伍和反击当时还屈指可数的批评者的格言“不必害怕！”的的确确是一条语录，只不过是出自……保罗二世之口，其实他当时未必知道。至于说这两位20世纪末杰出的世界政治家不谋而合，用同样的字眼来表述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伟人心心相印”这条法国谚语言之有理的

最好例证。

成功地玩弄术语的做法扩大了纵横捭阖的空间，然而在巧妙的词句结构之外，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改革却进行得并不顺畅。如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解释是：最初数年，他和他的战友们自己并未弄清真正的优先方面，试图同时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以及全新的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惯性的作用，新领导在一段时间内试图保证国家“既有大炮，又有黄油”：关于削减对经济具有破坏作用的军事开支问题，始终未能进入实际操作的范畴。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根本弄不清供养军队和军工综合体的真正开支是多少。直到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不费吹灰之力地冲破军方人士的抵制（他们甚至不肯与党的最高领导人分享情报），戈尔巴乔夫这才开始意识到，国家为了关心“保卫祖国”，背上了多么沉重的包袱。“总之，我们摊上了这样的军事开支，”有一次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这样的慨叹。他呼吁自己的同僚，“不要在将军们面前退缩，他们生怕自己无事可干了。让他们放心，他们还有够四五代人做的工作好干呢。他们要不就是气呼呼地指责说我们把国家的防务搞垮了，却不顾2500万居民还生活在我们自己宣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

这时又故伎重演：他仿佛是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害怕，要么是想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实际力量对比——其中军方人士竟占到了四分之一，于是又表示和解地将自己对将军们的攻击搞得婉转一点，将拔出鞘的剑又放了回去：“我们如果削弱了国家的防务，那就是最大的错误。主要是别任意挥霍，要想到老百姓：让他们既享受到和平，又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下。”戈尔巴乔夫爱搞妥协的天性所特有的回避抉择或者延迟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既决定了改革第一阶段的内容，又决定了政策的面貌，人们说当时政策的特点是不够坚定和前后不一。

今天，人们很容易责怪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责怪他未能利用改革的“黄金时期”——全民热情高涨、社会几乎绝对支持的时期（像叶利钦那样）以坚定的步伐涉过险滩，尽快到达彼岸，与社会主义神话的时代彻底一刀两断。然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当时的追随者有的是

充足而有力的理由来进行自我辩护。首先，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在其70年成熟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之多即便仅仅有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则还有待弄清，还有待揭示：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发达的程度，而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至少是在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具体化的形态。还有待确信：让这个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最终就意味着将它灭掉。要是考虑到这些人是如何成长和在何处成长、他们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他人根本就进不去）时具有怎样的学识和视野的话，就不难明白，即便是那些能够做到洞察一切的人，这种洞察力也只有在积累了经验、碰得鼻青脸肿、往往还要经过严重的内心危机之后才能获得。

其次，套在一起的各种思想和各种人的无法协调起了作用：“马和战战兢兢的鹿”岂止是往不同的方向使劲儿，简直是往相反的方向使劲儿（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叶利钦与波洛兹科夫，其他的“刺猬与游蛇”）。这里不仅是戈尔巴乔夫迫使大家“和睦相处”的愿望：改革的内部矛盾起初尚未显示出来，个人的冲突尚未发展为利益的冲突。例如只需回忆一下，利加乔夫当初曾经对叶利钦“着迷”，博尔金曾经极力推荐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当谋士和讲话稿起草人，雅科夫列夫自己还力劝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去填补克格勃主任的空缺呢。

还不能忘记戈尔巴乔夫的特殊性格，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挑起的社会动荡尽管已经触及到社会上有权势的阶层和官僚在权力和财产方面的利益，却不会引起起劲的以至充满敌意的抵制。尽管如此，改革第一阶段政治上的模糊不清并非由于生性随和。请看号称“不讲情面的政治家”的利加乔夫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性意见，他说：“往往会听到所谓戈尔巴乔夫意志薄弱的说法。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似是而非的印象。”1986年秋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光凭政治宣言和电视说教无法使全国上下振作起来、经济生活中也毫无变化，便在政治局会议上“以利加乔夫的方式”向叶利钦提出坚决要求：“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把地下室的办公室统统关掉，把官员和懒蛋都搬出去，全部改成咖啡厅、青年俱乐部、大学生聚会的场所。”数月之后，戈尔巴乔

夫的经济改革计划在中央全会上获得通过，他又向雷日科夫发难，要求总理采取激进措施，“抛弃只治标的办法”。这些对于戈尔巴乔夫说来很不典型的焦急表现，回到传统的冲击式、州委式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的意愿，无不反映了改革首倡者日积月累的恼怒甚至绝望，他们遇到了顽强的反抗，而且发现：“他们原本相信党和人民不会不支持真正诚实而明智的政策，结果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雅科夫列夫语）

不过，尽管同幻想告别看起来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以至全国上下必须迈过去的无法回避的台阶，否则就寸步难行，尽管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并未白费，总书记却始终没有摆脱政治上时间日益紧迫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迫使他随机应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当发现自己是在绕圈子时又焦急不安。当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个圈子是他尚未下决心与之一刀两断的那个意识形态所划定的。也许，他是在回避将其公开，认为还不到时候。有一次他可是对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说过：“需要走多远我就走多远，谁也别想把我拦住。”

在这个决定改革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顶住了双重诱惑：他本可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向环境屈服，给体制换换门面，放弃实际推动体制改革这一极其沉重的庞然大物的尝试。这正是大权在握的官僚所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比形形色色的改革者都活得久长，曾经顺利地埋葬了一次又一次潜在的改革。戈尔巴乔夫还可以一心从事民粹主义的即兴表演，滑入官场的、貌似激进的行政改革的陷阱。这起码可以暂时提高他的声誉：我国人民可是习惯于把自己的领导人当成沙皇和领袖，期望又一位“克里姆林宫主人”撤掉、赶走、惩罚应予贬斥的人，也就是最终把国家“整顿”得井井有条。

这两种做法他都没有采取，于是在两边都落了个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政治家的名声。然而，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也为社会保住了继续前进的机会。雅科夫列夫认为：“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注定具有不一贯性。前后一贯的激进主义会在改革的最初数年断送掉一揽子改革的思想本身。”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他们所设想的革命，只有当社会本身成为其中主要的当事人时才有成功

的希望。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必须对俄国政治中一个永恒的问题重新做出表述：将“做什么？”换成“怎么做？”即把进行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改革的内容（这方面他还不是十分清楚）放在首位。

准备观看苏联高层生活中又一出政治剧的观众，起初对于叫他们来观剧持将信将疑的态度，有些人则干脆对导演发出嘘声。然而情节扣人心弦，大家便渐渐地入戏了。

……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掌声已经止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全体起立，以最后的欢呼声证明他们准备义无反顾地跟随总书记走“列宁主义道路”。再次向全国和世界展现了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戈尔巴乔夫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拥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也就落入了绝对权力的陷阱：不仅因为按照裁定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层中没有反对派（每个人的当选或者升迁都归功于总书记本人），而且也由于国内那种等待和善意的气氛，国家终于盼来了开明的“君主”（有些人这样认为），或者说盼来了精力充沛的“当家人”（有些人这样希望）。

然而，恰恰在获得正式的无上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无上权力之虚幻性：新领导的所有最坚决最激进的举措，所有拖延已久、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终于做出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的院墙外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本因为整整一代领导人退出舞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僚寒鸦”又感到放心了，舒舒服服地返回原来的枝头，耐心地等待“年轻气盛”的新书记明白过来，变得老成持重。许多人甚至对于没完没了的关于改革的谈话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真诚地以为任何此类谈话的要义，无非是将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排到关键岗位上。照他们看来，二十七大已经顺利地起到这个主要的“改革者作用”，到时候了，应当从政治——从这些定期的党的宗教节日必有的祷告，转到较为平常的人世间的事情上来。

与党务和经济干部的这种期望相反，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并未善罢甘休。代表大会后，他们加大了力度，试图挽救在发达社会主义泥潭中愈陷愈深的苏联经济。“我们仍然希望发掘体制的潜力，想以

此为基础去消除工业和技术方面的落后状况，苏联不仅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明显（在电子学方面，专家估计至80年代中期相差10—15年），甚至落后于东欧的'兄弟国家'，"戈尔巴乔夫解释说，"为此制定了几个追赶型发展计划。"

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做的，似乎全都做到了。向电子学投入了当时看来难以置信的高达110亿卢布的巨资。为了加快机械制造业基础的发展和现代化，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召开了全苏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借助"老同志的经验"，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口气严厉地向科学院副院长叶夫根尼·韦利霍夫宣布，他和他的同事们应当认为他们自己如今也已经动员起来加速研制新一代计算机，如同当年库尔恰托夫及其一班人研制苏联的原子弹一样（至于政治局下达的这项重要任务未能完成，毕竟不能说是因为韦利霍夫的班子在业务素质方面不如哈里顿或者萨哈罗夫的班子，倒不如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身后没有贝利亚那威严的身影）。

事隔多年之后，有人问戈尔巴乔夫，这个"我们"在那个阶段指的是谁，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是指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总之，就是安德罗波夫时期提拔上来的党的新领导成员。还有，梅德韦杰夫当时也已经是经济部部长了。"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宣布并向社会承诺的变革，却始终没有进行。新的"小范围"成员开始焦急不安了。"不管你抓什么问题，"雷日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抱怨道，"统统不起作用。我原以为代表大会会带来转折。路线很清楚，情况却总是毫无起色。要么我们得改变人，要么就得开始催赶。"戈尔巴乔夫赶快响应："要是不能保证带来转折，就会把事情搞砸了。"他在回忆录中摘录了一段大学同窗从高尔基城给他的信："米沙①，你知道吗，这里是一潭死水。"戈尔巴乔夫从陶里亚蒂市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州委和市领导给人的印象很沉重。嘴吃刁了。党的机关完全官僚主义化了。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

---

① 指戈尔巴乔夫。

从这些印象中得出一个不能令人宽慰的总结论，开完代表大会的两个月后，他在1986年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是这样表述的："又成了清谈馆。文牍主义泛滥，不干实事。目前情况下最危险的是惰性。"他当下作出第一个组织结论："要从首脑机关入手。精简机构，让他们自己淹没在文山会海里吧。否则就会出现赫鲁晓夫遇到的情况，机关要了他的命。"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受到主管党内人事的利加乔夫的有力支持。

于是，尽管未能找到可以拖动沉重的改革链条的"主要环节"，起码已经确定了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中间环节，这是呈褐色的官僚化的党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它阻碍着锐意改革的领导层同愿意热情支持他们的大多数居民的重新联合。政治局找准目标，校准标尺，决定转而采取果断措施。"我们是孬种呢，还是个统一的国家？"总书记不知是发感慨，还是在自问。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回顾过去的经验时这样说道："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改革会进行得如此艰难：无论经济改革、党的改革还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都一样。"接下来又说：尽管"人民发出毫无疑义的脉冲——别后退、往前走，党的机关却依然纹丝不动"。

大体说来，这方面的机会并不比那个抓住头发要把自己从沼泽里拖出来的著名文学人物多。因为党的机关要充当改革的主要工具和杠杆，而它又颇有切肤之痛地感觉到，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打破机关对管理国家生活的垄断，并从而剥夺它的权力。官僚本能地嗅到的东西，改革首倡者却只有在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之后才开始意识到。"代表大会后，我们试图从几个方面同时并进，"戈尔巴乔夫说道，"我们通过了企业法，意在促使经济完全实行经济核算。我们尝试开展'三自运动'，即自筹资金、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开始实行协议价格和削减'国家订货'。这一切都寸步难行。官僚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因为这意味着改变现存秩序。而且官僚也是各种各样：既有党内官僚，也有经济官僚和军界官僚——将军们以及所有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人。这可是经济中的精锐部门，他们有自己的特权，最现代化的设备，

最好的供应，享受着保密城市的优裕生活。这时改革突然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于是议论纷纷：什么领导不能胜任啦，必须甩开戈尔巴乔夫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政治局开始探索既能保证改革不可逆转、又标志着改革新阶段的方法。”

他以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改革初期的问题。在引退之后，他以冷静的头脑将理论基础归之于自己当初的情感，并在相当程度上归之于情绪冲动的举措。然而当初，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改革加速”的狂热中曾在全新问题的迷宫中实际是盲目地徘徊，误入死胡同，并时而碰壁。尽管那是体制的墙壁，一位经过典型的苏联式党内历练的领导人的反省，却迫使戈尔巴乔夫首先在他接受教育的地方寻找出路：更换干部。“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干部，”代表大会后，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解释说，“要想补救，就得更换干部。”

1986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干部决定一切！”这一斯大林不朽名言的旗帜下度过的。然而，就连并未受到停滞感染的年轻干部，一旦成为继续旋转的原有机制的“小齿轮”之后，也开始表现得与他们的前任毫无二致。原来，干部并不决定一切。更糟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干部中间，反对派已经开始成熟，船上暴乱的危险开始临近：就是那个曾经将赫鲁晓夫搞下台的官僚叛乱。

戈尔巴乔夫经常在脑子里反复想到“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①]及其受挫改革的可悲结局，经常思考他自己如何避免成为党的官僚的牺牲品的问题，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另外两位前任——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躲过此劫的经验，显然在这里用不上。他们一位是借助大清洗这部割草机经常修剪机关的草地，将稍微超过规定的中等水平的一切统统割掉。一位是亲自率领机关的队伍，赋予官僚几乎是无限的操纵国家的权力，为自己赚得了“国家终身教父”的地位。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戈尔巴乔夫明白，他是要带领人们走出党的围墙大门，前往那个期待他履行自己诺言的社会。“只有开放的观

---

① 指赫鲁晓夫。

点和政策才能摧毁机关的专政,"这位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承认自己蓄意反党。

于是,在胜利地执掌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很快即面临着尽管还显得遥远的保住权力的问题。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命运的问题,这个既决定着他所领导的国家的命运、也决定着他本人命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时时出现在每个政治家的面前,只是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个问题往往还同另外一个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那就是:权力用来做什么?换言之,同运用权力的计划交织在一起,而任何一个无愧于政治家称号的人都代表着这个计划(那些尽管占了大多数,却把权力本身、获得权力和保住权力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计划的人,这里姑且不论)。

具体到戈尔巴乔夫,尽管计划起初并不清晰,而且随着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其外貌、内容和倾向也在发生变化,计划无疑是存在的。因此对他说来权力本身首先是工具即手段,而不是目的。尽管如此,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并且终于有可能着手将意图付诸实施时,他必然实际上是每日每时地关心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这个工具。换言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失。

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在遇到这个问题时,处理的方式各有不同:实行妥协,或者与此相反,不肯妥协,有人牺牲原则,有人牺牲朋友,也有人牺牲家庭。看来,能否使权力以至整个政治同道德保持和谐一致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或者说始终无法解决。诚然,当政治家的良心开始感到不安时,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来,他们的职业仅仅是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绝不是独一无二的。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其仕途的不同阶段,处理保住自己权力的问题(自然是为了所开始的事业的成功)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我们还可以跟踪他直至 1991 年 12 月,其时他不得不作出也许是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在权力和他开始借助权力实施的计划之间作出选择)。无论如何,当暂时尚不甚清晰的官僚复辟危险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他迈出

了绝对是革命性的一步:赫鲁晓夫在1957年“反党集团”的微型政变期间,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因他的“背叛行为”而怒不可遏的斯大林继承者中间处于少数地位,他向中央全会求救,戈尔巴乔夫则与此不同,他在逃离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时,将自己的改革像婴儿一样紧紧抱在胸前,跑到了城市广场上。

早在1986年6月,他即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新政策的目标。“抓住头发拔出”党和国家这个怪物的阶段,实际上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官僚盘踞的机关拼命诋毁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咆哮道。当时,对于“开始改革”的党本身仍然是崇敬有加。然而“机关”,这在当时苏联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整个的管理机构,它已被归入政治怠工者的范畴。“官僚集团一无所能,”他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太习惯于来自上面的指示了,也许得强迫他们独立行动。”正是在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在来自各地的“炮打司令部”的不耐烦呼声的推动之下,总书记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对苏联官僚的堡垒进行围攻。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毅然决然地偏离了本可沿着中国“邓小平方式”的轨道将他所设想的改革推行下去的道路。

为了使抵制变革的机关陷入包围圈,必须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开展民主进程”。不知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否知道,政治中从来没有无私的服务,他打算撼动和“吸收入股”的社会,不久就会向他本人提出条件,必定要求获得党所空出的相当一部分权力,以作为对其参与改革的回报。即使他认为有此可能,也肯定未曾料到一切会来得如此之快,社会从他手中得到了自由这一意外礼物之后,回报他的是忘恩负义,更有甚者,是对自己解放者的遭遇无动于衷。

为了用改革的杠杆撬开党的官僚这块水泥板,就得有个支点,有几个支点更好。在一党独霸天下的情况下,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这些支点,谈何容易。如同招魂会中一样,又呼唤“列宁精神”前来帮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离开列宁我们就迷失方向,忘记了苏维埃。”在苏维埃政权成立70周年的时候想起苏维埃,想起革命领袖赋予苏

维埃的意义，大概只能是出于绝望。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需要利用手头的资源组建自己的军队。“我们将苏维埃排挤出实际权力机构，使之退居次要位置。我们担心会破坏党的作用，可是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党发生分歧了。有些人在干事，有些人在盼着他们出问题。”

例行的毫无结果的几个星期匆匆过去了，他指责党机关的腔调愈来愈带挑衅意味。如今在他看来，党本身已成了主要的障碍，同样也成了主要的改革对象：“如果不对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那它就只能变成一个聪明的不错的清谈馆。”他需要苏维埃和一切非党的机构来向党施加压力，消除党的垄断和由此引起的机关为所欲为。“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一党制的代价。如果无人监督，党的工作人员就会变成官僚。”于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虽然仍在拿列宁赌咒起誓，却发现了他的偶像所实行的一党制不可避免的后果，并就孟德斯鸠的话题即兴发挥，向政治局委员宣传起“分权”的美德来了。

然而，无论是苏维埃，工会，还是他在反复阅读列宁的政治遗嘱时也会想起的“文明的合作社”，他都未能依靠。所有这些“传动带”都是靠苏共中央这个惟一的飞轮来驱动的。在那个时期，公开性的号角所唤醒的知识界和媒体，向作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人质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为切实的支持。

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来，不堪回首、却又无法忘怀的令人惊慌不安的夜间电话铃声可谓多矣，其中1986年4月26日报告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的那次却与众不同。首先，由于所发生的事故不同寻常：直至数日之后，国家领导人方才获悉悲剧的真正规模。其次，这是第一次因而也是特别不吉利的信号，一次不祥之兆，给改革永远划上的苦难标志。体制像是缺乏经验的狙击手手中构造复杂的一颗地雷，轰然爆炸了。

切尔诺贝利成了终止和扭曲数十万人生命的悲剧的标志，它成了对于改革的承诺的严格检验，首当其冲的便是其中最具约束力的关于

公开性的承诺。试图自己弄清悲剧的真正规模的政治局那难堪的沉默，乌克兰地方当局按照习以为常的条件反射缩小悲剧规模、“以免莫斯科伤心”的做法，那些对于反应堆的设计和运行负有责任者的本位主义恐惧——惊慌失措、并未彻底弄清所发生事件的人们所有这些渺小的、见风使舵的忙碌和操心，打成了一个机关和本位主义的利益与阴谋的死结，除非表现出必不可少的政治意志，否则就无法将死结劈开。

戈尔巴乔夫整整沉默了14天。尽管在具体步骤的层面上领导人的反应就所发生的悲剧而言是恰如其分的，但全国上下以及外部世界都没有完全弄清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尽管由于灾祸具有全球的性质，打从第一天起就明白无法隐瞒，然而戈尔巴乔夫要承认这一点，看来就得克服纯心理方面的障碍。当初苏联防空部队击落南韩客机，安德罗波夫就是无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诚然，他当时已生命垂危，朝不保夕）。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终于坦率地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这时他自己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坦白承认”不仅减轻了改革在政治和道德威望方面所遭受打击的后果，而且也放开了手脚，可以在所出现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

在实际运用所宣布的公开性理论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发现开诚布公可以成为最宝贵的政治王牌。他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下来，热情地说服诸位政治局委员：“我们是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监督下行事。因此我们决不拐弯抹角。我们要开诚布公地讲出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他说来，用以对切尔诺贝利的征兆进行思考的间歇并未白白地过去。“在切尔诺贝利的层面上思考”，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就意味着并非仅仅从技术问题和行政失误中去找原因：“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许多‘保密’部和科学中心仍然不受监督。请看看垄断造成的后果：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科学方面，生产方面。封闭使整个体制滋生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做表面文章的习气，使人们依从于个人关系，依从于家族。”

在这些讲话中，可以觉出他内心里已对另一个、主要的体制作出

判决，同时也透露出他天真地相信开诚布公、公开性就是那把珍贵的钥匙，可以用来打开通往体制的城堡和装甲保险柜密码的路径："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就是社会主义。"

不仅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有一次切布里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反对发表瓦西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警惕地认为小说是在"挖集体化的墙角"，戈尔巴乔夫大声地抱怨说："不错，过激的东西是会有的。大浪一起，泥沙俱下。会有泡沫，会有垃圾，可这都是春天的标志，革新的标志，民主的伴生物。但民主的飞轮要转动起来……不要害怕。主要是人民做出了反应，昂起了头。打他们的头，再来发号施令，那就是对民主的背叛。"

改革？革命？"改革性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感到公开性得心应手，还因为他把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主要工具，他指望将自己所开始的改革从例行的改革尝试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当然，这二者之间的界限飘忽不定，是相对而言的。自然二者都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动，然而历史曾多次证实，其变动的深度并不取决于所选定的术语。有多少次革命或者宣布为革命的事件，较之某些改革来，更可归结为宣言（名号、街道名称、纪念碑、办公室内官员的肖像）的更换，目的是保全现存制度。索尔仁尼琴曾试图对改革和革命进行区分、分类，他首先依靠的是俄国的经验，他认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至于革命嘛（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不幸，这样的灾祸），它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应当也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是将改革当成体制内部的革新。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设想未能如愿，他并不甘心，继续前行：要对体制进行改革。这已经有点革命的味道了。远东之行期间在哈巴罗夫斯克，他首

次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说法，令许多人目瞪口呆。也许当时对他更具吸引力的，是革命这个术语的响亮动听，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体制可是喋喋不休地提醒人们它的世纪是从1917年开始计算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的革命就只能是暗指“反十月革命”。

无论戈尔巴乔夫所挑起的事件的客观含义如何，他不能、也不想大声承认这样的谋反。只是愈来愈多地先是谈起“革命性的改革”，后来则更加开诚布公地谈到改革这场“在人们头脑中、生产中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1986年6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他并不满足于将革命作为方式（对此，那些一切都已司空见惯的党的宣传工作者还可以容忍），而是一意孤行，不能让任何人心存疑虑：“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这是个深刻的过程，只是没有枪林弹雨罢了。今天我们所处的阶段，就相当于俄国从沙皇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个阶段。”然而，不知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因为当时自然还不清楚，他并未确切地说明过了这个阶段，当前的社会主义俄国会走向何方：是走向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超出它的范围呢，还是偏离它。

这种当时许多人觉得过分自信的、大胆的将改革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说法中，实际上只有本能地感觉到的这两个过程的内在基础。由于俄国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从沙皇制度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过渡，较之改革所开始的向着较为陌生、历史上与俄国格格不入的自由主义的进展，在许多方面都更简单，自由主义要求变更社会的承重支柱，而不是更换上层的结构……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试图安抚那些正统的理论家，他说：“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它是在党的倡议下进行的。这是个目标明确、而不是自发的过程。”这时他似乎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感觉到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之反常，便马上借助措词的随机应变摆脱圈套，他说：“改革的特殊性和力量就在于，它既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又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关于革命、革命性改革甚至自上而下的“改革性革命”，一切都很清楚。至于说到“自下而上”，那就大成问题了。雅科夫列夫在介入这次历史性争论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要清醒得多，他认为，“自上而

下的革命的戏剧，它将显而易见的优点（保持连续性、社会的协商一致，维持社会稳定，可以利用党和国家机关中具有民主倾向的部分等）与缺点（被过去捆住手脚、模棱两可、将无法联合起来的东西联合起来的打算）融为一体。”这些缺点戈尔巴乔夫也看到了，而且在自己日常杂务中肯定经常感觉得到，因此便（不知是出于理智还是出于本能）对于可以作为改革的实际基础的东西十分向往，因为他那“自上而下的革命”尚无像样的政治基础，更遑论社会基础了。社会基础有待建立和构建，其材料有赖于模糊不清的公众期待、“六十年代人”的浪漫主义理想、尚未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未来后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那刚刚破壳而出的带挑衅性的赤裸裸的自私利益。

将戈尔巴乔夫的革命称之为“预防性革命”倒更为确切，发动者意在将其当成一种防止的方式，防止不可避免的危机，防止作为危机后果可能发生的真正“自下而上”的革命及其俄国式的妙处——叛乱，暴力，国内战争等等。只有在其他社会成员之前掌握实际情报、看到日益临近的悬崖边缘的领导人，方可进行这样的尝试，他们可以下决心去踩刹车或者试着往旁边拐。此举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其他成员就其大多数而言，看不见、意识不到这一“即将发生的灾祸”，因为由于自己领导人的努力，他们被迫生活在虚幻的、宣传者的世界里，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不“自下而上”地去促进改革，却反而动摇犹豫，感到困惑，甚至与改革者作对。

戈尔巴乔夫正是想借助民主和公开性克服这一“材料的阻力”，发动“基层”，将社会从他的计划的客体变成积极的主体和参与者。他的短期政治利益一目了然：他需要社会作为反对官僚的同盟军，他的动机和政治意图（唤醒“群众的创造性”，催生“自由的俄罗斯人”，争取“出现社会主义民主”，抛弃“一切长上青苔的东西”）全都无懈可击，颇值得称赞。然而，他是否盘算过，这一实际上是革命的意图将把他和国家引向何方？

1985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叶利谢宫举行了首次单独会晤和长时间的谈话，事后密特朗对自己的幕僚说：“这个人

的计划很吸引人，可是不知他是否清楚，如果试图落实这些计划，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位新领导人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的决心，显然给密特朗留下了印象。法国总统未必知道列宁“不要怕乱”的呼吁，却肯定晓得勃勒东[①]关于“建设性破坏”的见解。不过那是个浪荡派作家和画家，“超现实主义之父”，而不是世界强国的领导人。

顺便说说，戈尔巴乔夫是否时刻牢记，他像一个传教士仅仅通过政治说教，究竟打算让一个怎样的国家倾向于民主的信仰？他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相信民主化进程必将唤醒人民。”屡屡半途而废的历次俄国改革的首倡者，他们有多少这样的希望都已葬身在改革的瓦砾堆中！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俄国改革的经验有两个经典的范例——彼得大帝“靠棍棒维持”的欧化以及“改革应当开导而不是灌输，应当暗示而不是命令”的叶卡捷琳娜模式，其实二者实际运用起来都不太顺利。

戈尔巴乔夫让大家相信，他这个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坚定的“叶卡捷琳娜主义者”，或者用20世纪的术语来说，更多地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改革就其内容而言是一场革命，”他坚持认为，“但就形式而言，这是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的进程。”全部问题就在于，将两个概念调和起来，让革命与改革杂交、“联姻”，较之将端庄文雅的欧洲改良主义与“骑兵集团军式”的革命决心融为一体要简单得多。要在具有在造反和专制之间左右摇摆的传统的俄国做到这一点，就倍加困难。对于俄国的国家政治传统曾有过多次的描述，看来应当警告、防止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在多石的俄国土壤中培植需要精心照料爱护的改良主义旋花。

1920年，著名的俄国作家康·列昂季耶夫写道：“社会机体大概无法承受那些长期的残酷行为，而离开它们就无法以人的材料建造任何东西。也许社会主义同俄国专制制度和强烈的神秘主义信仰的结

---

① 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奠基人之一。

盟还有可能，不过会使许多人感到可怕……否则一切不是萎靡不振意志薄弱者，就是无政府状态……①”

布尔什维克未必会充分利用列昂季耶夫的处方，他后来被当成极端的反动派和神秘主义者受到痛斥。布尔什维克起初唤起了俄国暴动的无政府主义能量，后来，为了避免“萎靡不振意志薄弱者”，又将可怕的专制制度赐给了我国。

还有一位政治上“萎靡不振意志薄弱者”的固有敌人叶利钦，他肯定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哲学家，他在《总统笔记》中再现的，依然是那个典型俄国式改革的临床公式。索尔仁尼琴曾经反对过叶利钦和盖达尔的“休克疗法”，他说没有哪个充满爱心的儿子会对自己母亲采取这样的疗法。对此，叶利钦斩钉截铁地说：“有时只有这样——通过打破、决裂，人们才能前进，才能生存下去。”

叶利钦当然不是同这位著名作家打笔墨官司，他的论敌是不共戴天的历史敌手戈尔巴乔夫。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反对以强制的办法来对付人，他曾尝试在俄国的现实中推行一种一旦成功就会成为医治社会疾病方面一场真正革命的办法：不是接骨正骨，而是政治上的顺势疗法。他是基于对我国政治家说来实属罕见的一种信念，那就是：传统的方式（强制的、行政的方式）在造成一种解决问题的假象的同时，实际上给未来留下成堆的后患。

在一个习惯于无政府主义造反者和暴君的国度，选择职业渐进论者的角色，要么意味着极其天真（俄国的批评者不断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这样的指责），要么意味着高度的政治智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崇拜者为此不断地抬举他）。以其“文明冲突论”享誉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大约在30年前，他当时尚不了解后来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无比痛苦，就曾经这样来界定革命家和改革家（准确点说是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革命者应当能够使社会力量相互对抗，改革

①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致瓦西里·罗赞诺夫的信》1983年莫斯科版第77页。——作者注

者则应当操纵它们。因此,改革者就需要具有比革命者胜过一筹的政治艺术。因为很少遇到能够将改革付诸实施的政治活动家,所以改革就十分罕见。走运的革命者不必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走运的改革者则不能不是个高明的政治家。”①

很难将戈尔巴乔夫列入走运的改革者(按照他的信念,就没有“幸运的改革者”),他行动起来完全违背了深知俄国特点的专家的警告。他在自己的改革(既“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革命)中,想将沙皇的(党的)改革那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专制同所唤起的永恒的人民追求自由的自发现象结合起来。这里的自由,在俄国的条件下实际上从来就只被理解为无拘无束,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况且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位来自普里沃利诺耶的哥萨克,尽管历经莫斯科大学智力琢磨以及党的机关磨盘的政治砥砺,却似乎感到自己充当自发政治过程的领路人和首领的角色,比充任枯燥而沉闷的社会秩序维护者职务要自然得多。他经常引用拿破仑的话,他并不效法拿破仑在混乱面前的“神圣的恐惧”,而是借用了此人的一句格言:“要参与其事,以后就清楚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初期也用上了这句名言。戈尔巴乔夫将其改动一番,为我所用,就成了:“要紧的是开始,进程自会展开。”

面向人民,而且是在俄国,指望将人民反官僚的热情既用于破坏目的、又用于建设目的,只能是这样的人:要么他希望民主本身早晚会将无政府主义的春汛引入政治与国家机构的河道,要么他十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不让事变失控的能力。姆雷纳尔日 1985 年春天在接受意大利《团结报》采访时回忆起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他说:“米沙这个人具有很多非凡人物的特点。不过他很自信,这可能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

① 《文明的冲突和国际秩序的重建。赞成与反对》1997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127 页。——作者注

“你在哪儿呆着，就在那儿改革吧”

至1986年秋天，戈尔巴乔夫最终阐明了改革新阶段的主题：党、国家、经济的全面改革。改革的杠杆是体制的民主化。他在其政治演说中将新方针又定义为“回到”列宁关于鼓励“群众创造”的思想。对于党机关中理解力最差的人，他则说得更加通俗易懂：“你在哪儿呆着，就在那儿改革吧。”他愈来愈热中于将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作为一场“正确的”十月革命的想法，加之令人难忘的日子——十月革命70周年正日益临近，应当以新的、“修正了的”、按照列宁遗训提高的社会主义来迎接这个纪念日。

改革的领头人给自己提出了宏伟的目标：最终将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现实的选择。“现在不要怕唱高调。要是仅仅停留在言词上就糟糕了，不管这样的言词有多正确有多美。”既然谈到了体制的民主化，那么必须消除在一条主要的战线上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现象，这就是在倒霉的人权方面。原来，在这个领域将言语变成行动比经济领域还要简单。仅仅需要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就足够了。当务之急就是取消苏联出国自由问题上的禁忌。关于这个问题，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判断，当初赫鲁晓夫在权衡利弊时，就曾表露出作为一个正统共产党人十分自然的困惑：“既然社会主义是劳动者的天堂，那又何必在边界上布满铁丝网，强行把人们留在这边呢？他们应当自己往这边奔嘛。”

戈尔巴乔夫的头脑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他也是一开始就将“简化苏联出入境办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就要求可以双向穿越苏联的边界，而且理论上愿意进入“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数大大超过出国者的人数。“谁要想出国呆上三个月，我们给他一个月就完了！反正谁要想叛逃，那就倒霉倒大了！这甚至不是损失，而是收获，让所

有的废物统统滚到那边去。凡是可以打发出国、无损于安全的人，统统用扫帚打发出去！这一切都是民主化的一部分，民主化应当遍及一切生活领域。”

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段雄赳赳气昂昂的讲话，其狡黠之处在于除了他所宣布的崇高目的——建立自己的符合新思维精神的“人权观”之外，所提出的遣送“废物”问题具有完全实用主义的目的：与里根的又一次会晤即将进行，因为美方通常都要事先准备一份苏联“不准出境者名单”，美国总统打算为这些人说情，戈尔巴乔夫是想“从他口中夺过”这个尖锐的话题。

在明显的人权卫士中，第一个获得自由并得以出国的，是尤里·奥尔洛夫。从内政的角度看来，最著名的苏联“政治信仰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了。

为了让政治局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戈尔巴乔夫相当装腔作势地将这段剧情处理成：似乎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城“苟且偷安”，而与此同时“全国都动起来了”。“别让他在那儿无所事事了！让马尔丘克（时任科学院院长——作者）去把他叫回来。什么住房，别墅，汽车，莫斯科这边全都保留着。让马尔丘克对他说：跟中央商量过了。”

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预示着安德罗波夫的遗产（已经不是斯大林的遗产）开始拆卸了，在政治局皱着眉头将这个苦果吞下去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往后的道路已经排掉地雷，他决定不再退居幕后，亲自作出这一耸人听闻的政治姿态。

1986 年 12 月 16 日，几个话语不多、身着便装、却显然具有军人仪表的人来到高尔基市一处受到精心保卫的住宅，他们未征得住户的同意，就在屋内装上电话机。戈尔巴乔夫通过这部电话机把电话打过来，建议“被流放的”院士返回莫斯科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为祖国服务”。为了遵守礼节，“发布”了并未欺骗任何人的一则塔斯社简短消息：“萨哈罗夫请求苏联领导人准许他从高尔基城返回莫斯科。经过包括苏联科学院和行政机关在内的权威部门的研究，决定满足这一

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时作出赦免女公民邦内尔的决定。这样一来,他们二人均可返回莫斯科,而安·德·萨哈罗夫则可积极参与科学院的生活,如今是在苏联科学院活动的莫斯科学派(?!——作者)。12 月 23 日上午,安·德·萨哈罗夫和叶·格·邦内尔乘火车抵达莫斯科。"

世界知名学者和人权卫士在 7 年流放之后重返莫斯科,这成了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发出的第一个政治信号,证明他在使体制民主化方面的意图是认真的。迄今为止,那边将他这方面的宣言当成又一次、只不过更加巧妙的宣传攻势。国内,当局在对待不久前还被视为危险的国家罪犯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方面轰动一时的变动,肯定证明在崇高讲坛上宣布的前进方向已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个正常的法治国家。为了通俗起见,戈尔巴乔夫以引人注目的、尽管是简单化的说法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全都准许。"鉴于过去时代的大部分法律均处在重新审定的过程中,而无论当局还是老百姓,遵守法律从来就不是俄国的民族传统,那就不难明白,新的法治国家散发着巴枯宁①无政府主义的气息。

改革所启用的其他政治概念也渐渐褪去了"社会主义"的包装,其中包括最具爆炸危险的概念:多元论。1987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宣布了即将进行的政治改革,并且使用了决定命运的字眼——"选举制度不能不受到改革的触动"。

足以证明集中精力进行政治改革、将改革其他方面置于次要地位的又一论据,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尽管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的报告中将经济的根本改革放在优先地位,这个领域却毫无进展。诚然,1987 年夏天起草了一份关于这一改革的方案,7 月份又专为批准方案召开过中央全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为社会民主化扫清道路

---

①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 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的“政治”一月全会之后，经济民主化就该进行了。这方面还要破除官僚的垄断，这次是经济官僚的垄断，并且从以行政方式管理经济过渡到以“商品货币方式”管理经济。

在沃伦斯科耶斯大林别墅同雷日科夫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艰难”辩论之后，雷日科夫终于让步了，全会为开始经济改革亮了绿灯。然而实际上经济改革并未启动，因为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①把一切都压下去了。”其实是全体政治领导人都惊慌失措了。政府刚刚提到面包和通心粉的价格要进行“调整”，尽管还要给居民发补贴，当时尚不知市场规则为何物的苏联公民的怨声载道就迫使最高领导层、首先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打了退堂鼓。

谁也怨不着。根据他的脚本唤醒的社会开始发出声音，表露出其他的生命征兆。原来，改革不仅使全国上下坐在电视机旁，它还让大家排成罢工纠察队，把人们带到铁轨上来，正好拦住刚刚开始烧足蒸汽的经济改革机车。被自己的论据逼得走投无路的戈尔巴乔夫在“群众的创造”面前退缩了，他当众保证今后“不经过与老百姓协商决不搞”任何提价。在作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走向市场的问题就可以暂时置诸脑后了。这样一来，靠城乡新的企业家和私有主阶级的形成来扩大戈尔巴乔夫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前景也变得很渺茫。后来在抱怨农村中“被推迟的”改造时，戈尔巴乔夫伤感地说：“应当从经济上炸掉集体农庄。应当更加积极地开始在农村铺设道路，更加大胆地把地块分给大家去耕种。我原想往里面投放像租赁制这样的病毒：投放到种植业和畜牧业。我们已经开始了呀，事情也有进展。本该一直走到底，鼓励中产阶级的。”既然没有“走到底”，就只有抛头露面的地下商人能够利用先前严厉法律中的姑息以及合作社开办人的适量优惠，他们成了“新俄国资产阶级”的萌芽。

由于管理者的消极怠工，由于拒绝“民主地”投票赞成提价的社会不够“觉悟”，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便只剩下惟一的推进改革的

① 指雷日科夫。

办法:加大政治攻势。雷日科夫自然对于事情另有解释,他认为,毫无疑问,当时正是"极不明智的政治加速"使得认真的分阶段经济改革的机会化为乌有……

1987 年年底之前,戈尔巴乔夫完全投入与十月革命 70 周年纪念日有关的活动以及纪念日报告的起草工作。在将改革宣布为"自己的"革命之后,如今他已经不得不权衡暂且还是设想中的改造的规模,也就是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向自己的偶像——列宁"挑战"。自然,纪念日报告中连这方面的暗示都不会有的。总书记只是在同斯大林彻底划清界限,仿佛是在答复自己那不相信斯大林与他们所受的苦难有关的祖父外祖父,他总结说:"斯大林是知道的。"报告中主要的新内容,是为布哈林正式恢复名誉,对于这一举措,党内教条主义者(当时属于这个范畴的除利加乔夫之外,还有叶利钦,他也认为类似的棘手问题不必"太着急")认为不到时候,激进的舆论界却认为还不够、显得羞羞答答。结果是,无论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对报告不满意,也许因为这个,至今"中派"戈尔巴乔夫仍为此感到自豪,他说:"主要的是,我并没有停止辩论,而是开始了辩论。"

此时他内心里已经为既摆脱斯大林,也摆脱自己其他前辈("布尔什维主义改进者")——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以及(暂时还较隐秘地)摆脱列宁本人做好了准备。他和其他"六十年代人"一起指望从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间隙"里找到理想的、始终未成现实的十月革命的提法,这个"间隙"经过详尽的研究,曾经多次在实践中试验过,均无果而终。如今戈尔巴乔夫已经搜遍他所继承下来的体制的粮囤,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抨击那些因他背离社会主义而牢骚满腹的人,将他们称之为气势汹汹的蛊惑家、教条主义者和"维护落后的理论家"。

"至 1988 年,"他在一篇对改革进行十年总结的杂志文章中写道,"我们意识到如不改革体制本身,就无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从此刻起就可以谈到改革的第二个内容丰富的阶段。它已经以另外的思想立场为依据,其基础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这时"我们"也成了别的

人。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愈来愈只是在名义上留在圈子里，而自 1987 年 10 月起，从戈尔巴乔夫的子弹盒内又放出一粒子弹，戈尔巴乔夫并未特别珍惜它，认为那是个空弹。这就是鲍里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漫不经心地对叶利钦在辞职报告中所述的委屈不以为然，从而唤醒了叶利钦身上未得到满足的虚荣心这一沉睡的核反应堆，在中央全会及后来的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受到有损尊严的讨伐后，这种虚荣心开始具有政治的形式。

后勃列日涅夫时代领导人欣快地团结在尚不清晰的改革计划和新总书记个人周围的时期即将结束。正在开始一个激烈冲突的时代，发生冲突的已不仅是各种性格和抱负，而且还有各种利益，其结局如同任何对抗性倾向之间的斗争一样无法预料。戈尔巴乔夫本人现在应当考虑如何独立地安排生活了。他依然自认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已仅仅局限于他曾详加研究的列宁为自己所划的范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到活生生的现实、准确的现实生活因素，而不应当仍然抓住昨天的理论不放。"[①]也许他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依然是他自己认为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然而，在决定超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新型"党以及一党制国家论的范围之后，他就开始褪去改革家的蚕壳，变成了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人——变成了戈尔巴乔夫。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9 卷第 134 页。

第五章 地球总书记

不打仗就好

如同任何自尊自爱的革命一样，改革不可能长时间地局限在一国的范围之内。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四月革命”并不像列宁的十月革命那样，有燃起世界大火、“让所有的资产者悲伤”的危险，克里姆林宫内很快就开始谈到改革的“全球意义”。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无得意地引用了雅鲁泽尔斯基的“二十七大的幽灵正在资本主义世界徘徊”的那番话。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个人政治抱负超过了“普通锡匠”的打算，他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在改革最初的“起跑”阶段，雅科夫列夫在这方面积极地与戈尔巴乔夫一唱一和，雅科夫列夫系二十七大报告国际部分主要提法的作者，在报告中，苏联共产党员的领导人自1917年以后第一次没有谈到“两个世界”不可调和的斗争，而是谈到一个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世界。

这样一来，世界历史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精细计算好的、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的社会形态转换进度表，变成了无法分开的共同进程。诚然，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受到那个时期礼仪的限制，也许还有自身"六十年代人"一族的限制，他们尚未完全转到新的信仰，依然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引出改革的人道主义方针和普遍通用的价值观念。例如，无论今天听起来有多么离奇，1986 年秋天，正值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工作紧张进行之际，雅科夫列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解释说："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制定出使人类免受生态灾祸的战略。"

在苏联"蒸馏甑"培养出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那种认为真正的、尚未被实用的政治行情搅浑的马克思主义素来具有人道主义的信念，有如密封小瓶中香水的香味存放了数十年。就连大卫·萨莫依洛夫这样决不受任何政治诱惑、内心里决不妥协的诗人，在回忆起 40 年代甚至 50 年代初表示不满和反抗的文史哲大学生所处的精神氛围时，也谈到那个将其中许多人团结到一起的对于"坦率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使命的信念。至于思想不那么浪漫、不那么理想化的人，苏联历史上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残酷经验使他们变得聪明了，他们对于改革的首倡者腾空而起、进入世界政治(和历史)空气稀薄的大气层的愿望，自有其较为讲求实际的解释。葛罗米柯曾对几代苏联领导人进行过近距离的观察，他在同儿子的谈话中，宽容大度、心存嫉妒地对戈尔巴乔夫渴望进入"政治太空"一事这样评论道："当领导人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国内问题开始愈积愈多时，他们通常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政策方面去。"

然而，总书记几乎马上转向对外政策，并非由于渴望"逃避"愈积愈多的国内问题(在他和他的同僚的心目中，未来还是一片光明)，甚至也不是出于昙花一现的、以新政治思维教理问答的方式出现的使命感，完全是由于非常实际的利益所致。早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和契尔年科时期，正处于自己为未来的总书记角色"进修"阶段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与他站在一起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就已经得出结论：苏联经

济简直是让军工综合体这个庞然大物给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于军工综合体的具体开支数字，他们当时作为政权的第二梯队，自然无从得知。据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甚至在身居高位之后，他们还惊诧莫名地发现，真正的开支数字连最高领导人也不清楚。首先，军工企业通过转移扩散，渗透到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根本无法“算清”，更不用说军队和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对于在预算条文中不见踪影的许多开支，就像防阶级敌人一样地极力掩盖，不让党的领导人知道。其次，勃列日涅夫在其垂暮之年，将管理国家的缰绳交给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这“三套马车”，其中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是当然的“辕马”，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早就不提多余的问题。

新的领导人只得依靠大概的数据，然而就连这个数据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70%以上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满足军队和军工综合体的需要，而且照马克思的说法，这部分国民产品等于“打了水漂”，这种情况必然会迫使改革者中止这一经济上的荒诞行径。“我们搞出的坦克比人还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抱怨道，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卖力地替他助阵。政治局里“硕果仅存”的前“三套马车”成员葛罗米柯试图又一次加入新领导雄壮的进行曲，他羞羞答答地表示悔过：“像运动员一样跟美国人比赛。以为导弹造得愈多，就愈有安全感。这是不明智的。”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悔过。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有一次给切尔尼亚耶夫看笔记本中的一页，在1985年春天外交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列在第一位便是“结束军备竞赛”，以下是“撤出阿富汗”，“同美国和中国搞好关系”。在新的克里姆林宫班子看来，遏制军工综合体不仅是紧迫的经济任务，而且是紧迫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以主人自居的乌斯季诺夫追随者（将军和军工综合体的院外活动分子）退出举足轻重的阵地。办法就是去掉证明他们的特权地位有理的主要原因——与西方对抗。

戈尔巴乔夫正确地估计到军备竞赛在使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最终实际上搞垮苏联经济当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自己的前任不同，他

作为另一代的人，要么是尚未意识到，要么是不肯相信这样一条：说来荒诞离奇，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倒需要有外来的威胁。所谓“苏维埃国家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论点，自国内战争时期以来一直是管理苏维埃国家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要么我们在最短期间实现工业化，要么我们被压垮，”斯大林警告说。于是千百万人为了拯救新制度牺牲了今天，正如列宾笔下的纤夫一样，先是套上了工业化的纤绳，然后又是“共产主义工程”的纤绳，并对“破坏分子”和“敌方间谍”受到死刑判决热烈鼓掌。“不打仗就好，”卫国战争的寡妇和一代又一代失去父亲的苏联人祈祷般地反复说道，却并未发现他们所拖动的已不是战后恢复的犁耙，而是超级大国十分沉重的满是导弹的装甲战车。

不过我们还是别太简单化了。战后时期，西方，尤其是美国和美国总统（从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来吓唬斯大林的杜鲁门到宣布对于苏联“邪恶帝国”的“十字军远征”并许诺［开开玩笑！］炸一炸苏联城市的里根）都在积极地为这一国家偏执狂推波助澜。美国人有其内政方面的动机。随着“俄国人来了！”的一声呐喊，不但发狂的詹姆斯·福里斯托尔从五角大楼的窗户里跳了出去，而且约翰·肯尼迪以这样的威胁为借口，让国会批准了消除“苏联导弹优势”所需的经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也获得批准。

在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都是从“射击孔”里看对方的气氛下，戈尔巴乔夫要提起新一轮缓和的话题，谈何容易。尽管如此，他在这个政治领域也要冒险遵循清醒的理智。“既然我们可以消灭对方一千次，那么为什么不能开头就把多余的部分统统裁掉呢？互相残杀反正到头来也会变成自杀，它只需一次就够了，”他对政治局委员这样说道，当机会出现时，他在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也提出这个想法。在“职业运动员”看来，这样的问题提法在政治上有失体统，因为那就违反了通行的国际游戏规则，况且“尚未经过改革”的竞争伙伴对此毫无准备。在一个习惯于按照荒唐核逻辑生活的世界里，遵循清醒理智就意味着让人觉得你是个天真的业余爱好者。

更加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蓄意破坏战略“威慑均势”时，就将他尚不知晓的又一个国内政治妖魔释放了出来。他在遵循最良好的意愿时，不知不觉地已从苏联体制的基础中、也就是从自己交椅下面打掉了一根最重要的支柱。只要苏联人“为了不打仗”乐于过自己的穷日子，自觉自愿地倾其所有献给国防，以抵御不为人知、却残酷无情的侵略者，当局就可以优哉游哉，心安理得。谁也不会向当局及其化身政治局提出不合时宜的问题，谁也不会要求讲清楚国家预算是如何花费的。社会一旦发现战争可以不必害怕，发现昨天的敌人今天成了伙伴、明天就是同盟者甚至朋友，它就可以向社会的管理者表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共产主义禁猎区的“野牛”——从顽固不化的“不先生”葛罗米柯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凭着理智或者政治敏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就连传统上忠于莫斯科的同盟者（只有雅鲁泽尔斯基之类极少的例外）不仅对于改革首倡者在其国内的民主化即兴发挥，而且对于戈尔巴乔夫诸如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和放弃大名鼎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类无疑是酝酿成熟的外交步骤，也都心存戒备。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所得到的情报进行了归纳，他这样评价对于苏联内政外交方面激进变革的反应：“卡达尔和昂纳克不相信我国的改革不可逆转，采取了观望态度。日夫科夫呢，是以元老的身份坦率地对来自莫斯科的交谈者说：‘你们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要紧，却在匈牙利引起了1956年[1]，如今戈尔巴乔夫又在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

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提及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那完全可以预见的敌对立场：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直至深夜的谈话，谈话实际上演变成了两对夫妇之间的激烈争吵（叶莲娜·齐奥塞斯库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丈夫在私人晚宴上的谈话），不过那都是后话了。其实，这也是为了弄清（就苏联在国

---

① 指1956年匈牙利事件。

际舞台上的战略地位而言)戈尔巴乔夫新外交政策所引起的的变化那可作不同诠释的性质。

而眼下,在“希望的革命”阶段,向苏联外交提出的是极其简单的实用性任务:尽快降低与西方对抗的水平,启动裁军谈判,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努力中将重点放在政治方式而不是军事方式上。根据改革的脚本,在数十年“冷战”期间以苏联死敌身份出现的西方,今后就得像女扮男装一样,完全去接替为它写好的角色。世界社会主义防御阶级敌人的外部边疆,应当变成戈尔巴乔夫革命可靠的政治后方,甚至是“供给基地”,因为如今主要战线不在苏联或者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上,而是在其内部。

“我同玛格丽特……”

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当时进入制定新外交政策的“决策圈”内的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他们无需借鉴葛罗米柯的经验即可明白:要根本改变东西方关系的气候,关键在华盛顿,在里根,也就是安德罗波夫曾经表示无法与之一起“做事”的“那伙人”的“首领”。尽管如此,为了不光是争吵谁更早将谁送进“*历史的垃圾堆*”(美国人也很喜欢马克思的这个提法),而是“解决问题”,反正也没有别的交谈者。

对戈尔巴乔夫说来,莫斯科通往华盛顿之路是绕道而行:途径巴黎、日内瓦、新德里、雷克雅未克。这段路程开始的时间还要早,那是上面已经顺带提到的1984年伦敦之行。正是在伦敦,确切地说是在切克斯英国首相郊外官邸的壁炉旁,戈尔巴乔夫将事先准备好的表示“多次相互残杀的核武器摧毁力”的图表和计算结果在壁炉前铺开,他所谓的“*我同玛格丽特*[①]*的史诗*”就此开始。“铁娘子”把鞋脱掉,埋进

---

① 指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沙发椅里，显然她与其说是全神贯注地观看图表上那一个个用小方块表示的核弹头，倒不如说是完全沉浸在与这位不同一般的“新俄罗斯人”的交往之中。尽管那位病入膏肓的总书记仍在莫斯科度着残年，戈尔巴乔夫未来的政治命运也是扑朔迷离，撒切尔夫人却当即前往大洋彼岸，她要立即向好友里根通报自己关于可能的未来苏联领导人的印象。

据里根班子中的舒尔茨国务卿后来证实，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的热情洋溢的评价（美国总统对她可说是无限信任）对里根影响甚大。尽管在政治观点和气质方面存在重要的、有时是尖锐的分歧，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两人执政期间以及双双下野后始终保持不变。撒切尔正式访问莫斯科并将“撒切尔主义”当作苏联经济改革良方积极加以宣传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生气地将她称之为“放肆的娘们儿”，同时却又无法掩饰地赞叹不已：他的这位“政治女战友”把三位上电视与她进行宣传战的苏联顶尖评论家弄得像小孩一样服服帖帖。1991 年，撒切尔比其他许多当时在任的政治家都更加坚决地力主派国际代表团前往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福罗斯。

戈尔巴乔夫还令另一位西方领导人着迷，那就是弗朗苏阿·密特朗。1985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以其法国之行，开始了向西方进攻的政治和宣传攻势，他力图让人相信，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不是一般的换换人或者换换代，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方针正在形成。也许使社会党人密特朗比超级保守的撒切尔倍感惊讶、倍受鼓舞的主要之点，是戈尔巴乔夫那从内部使苏联社会获得解放的宏大计划。这位法国总统通常相当矜持，政治领域的经历使他变得聪明，因其极其巧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①]还得了个“佛罗伦萨人”的诨号，早在戈尔巴乔夫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认为为了国家的巩固可以不择手段。所谓马基雅弗利主义，指无视道德原则的政策。

不再以共产党人自居之前许久，他即猜出这是个不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曾一改自己的习惯，突然充满感情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您能够实现您的意图，那将具有全世界的后果。"

对赖莎的发现，也在西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政治轰动效应。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在伦敦公众场合的首次亮相中她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首先是与其前任——尼娜·赫鲁晓娃和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娃的反差，如果说西方媒体也觉察到那两位的话，也只是将她们称作典型的官气十足的"老奶奶"。当记者们发现自己面前这位风度优雅、无所顾忌、根本不躲在丈夫阴影里的现代女性时，他们明白这是媒体不可多得的人物，于是将闪光灯、镜头全都对准了她。赖莎曾经引起真正的狂喜，那是她在出席一次招待会后，娇媚地向大家挥了挥手，并用英语演唱《再见，鳄鱼》，证明自己属于"摇滚一代"。她在"马克思与斯宾塞"商店用几分钟时间摆好姿势照相后，摄影师们献上一大束鲜花以示感谢。总之，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西方成了新的、摆脱自己过去国家的象征，而当时国家尚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不过，西方媒体（和公众）习以为常的低级趣味小报放在头条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也是免不了的。记者们"发现"赖莎在一家首饰店选购耳环，于是由一家伦敦小报打头，所谓戈尔巴乔夫夫人在购买珠宝首饰时用一张"金卡"结帐的消息不胫而走（事实是一位大使馆官员在陪同赖莎时曾用一张可以对外交人员打折的信用卡结帐）。"当时我和她连这种卡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短命的谣言本来很快就会忘掉的，谁知数月之后叶利钦在中央团校讲话时显然是故意来了个旧事重提。

赖莎对于法国之行——自己第一次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正式出国访问，准备得尽心尽力，大概丝毫不亚于丈夫。对于这位昔日的哲学系大学生和不久前的大学教师说来，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而她已经习惯于认真地准备考试。戈尔巴乔夫夫妇早在第一次访问法国时就认识了上面曾经提到的总书记顾问维塔利·古先科夫，按照古先科夫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曾让他帮助赖莎进行出访前的准备。在中央委员

会专为赖莎辟出一间办公室，她仔细研读资料和报告（也许还要写出要点），按照她的要求，这些东西分别来自外交部、文化部甚至时装馆，因为法方的日程安排中也包括观看时装表演以及同伊夫·圣·罗兰和皮尔·卡丹的会晤。从家庭档案资料中找出的，肯定不仅有照片，而且还有记事本，其中记有第一次法国之行中参观博物馆的印象。

然而，她希望自己看上去不仅像总书记夫人，而且像一个独立的公众人物，因此在她的坚持下，除了“夫人日程”外，还安排了政治活动：同法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家和法国妇女运动代表见面。她在会晤中完全无拘无束地就各种题目发表意见：从苏联的人权状况这个密特朗总统夫人达尼埃尔一直关心的问题，到毒品泛滥。

赖莎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起初对于她在伦敦引起的轰动持怀疑态度的巴黎，对她的外貌、风度和品位颇为赏识，始终无法相信她在置装时既不找任何一位巴黎时装设计师，也不找在西方已小有名气的斯拉瓦·扎伊采夫，却是自己多年的女裁缝塔玛拉·莫克耶娃的忠实主顾。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吸取了伦敦的教训，出国后再不去任何商店和小铺，此后媒体惟一一次能够窥视她试穿新衣，是在新德里，当时人们向她赠送印度纱丽。她后来与皮尔·卡丹在莫斯科见面，是以文化基金会副会长的身份。还曾帮助伊夫·圣·罗兰在特列嘉柯夫画廊举办展览会。然而赖莎在巴黎之行后主要感兴趣的，仍然是法国报刊上的政治反响，包括消极的反响。最感兴趣的部分她请人译成俄文，并小心地存入自己的专案文件卷宗。正是多亏她，目前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才收藏了最全的记录着改革年代重大政治事件的苏联和国外出版物（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录像资料）。

时隔不久，他俩访问的下一个欧洲国家首都是日内瓦，1985 年 11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罗纳德·里根在该市举行第一次会晤……日内瓦，这个和平与中立的象征、不同民族持不同观点者的栖身

之地，以及大概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①的隐居处，当时看上去倒像是个军事基地。铁丝网栅栏挡住通往苏联使团和美国总统官邸的道路，屋顶上布满狙击手，直升机在城市上空巡逻，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预示着瑞士首都即将成为导致冷战结束的世界历史转折点。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摄影师差点要亲身体验一下占据该市的特工机关那严肃的意图。他们乘坐直升机在美国总统官邸上空盘旋，进行实地转播，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明白无误的警告："不在一分钟之内离开这个区域，就把你们打下来！"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的会谈倒是在较为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里根同时听到撒切尔和密特朗这两位相去甚远的欧洲领导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高度评价，他急切地期待着这位头号共产党人的出现，显然兴趣甚浓。倒是他的助手感到紧张。此次他们的问题类似不久前勃列日涅夫助手所面临的麻烦，在勃列日涅夫参加重要的国际会晤时，那些助手将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直接交往中我国领导人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作掩护，也没有哪个代表团成员为他提供保险。如今扮演勃列日涅夫那个年老体衰的角色的人是里根，此人在年富力强时对于战略平衡和裁军谈判等复杂问题就不甚了了。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备有最必需的一些卡片，上面有简短的演说、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以及几段经过事先演练的插话、俄国谚语、"尼古拉·列宁"（不知国务院兢兢业业的苏联问题专家为何总是用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自古以来的笔名的全称）的语录，这些东西可以保证里根在会晤的头几分钟"独立航行"，此后谈判参加者的人数肯定大大增加，到这个阶段就不必担心总统会有什么即兴发挥了。

戈尔巴乔夫早在莫斯科即考虑到了出现这种场面的可能性，甚至到了日内瓦，也仍然在脑子里挑选进行这次谈话的方式，并在同自己的代表团成员最后会商时进行事先练习。成员中除美国学"巨擘"多

---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法国作家、哲学家，感伤主义的代表。

勃雷宁、科尔尼延科、阿尔巴托夫之外，还有苏联外交“新浪潮”的代表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以及初次正式参加国事访问的韦利霍夫院士和萨格杰耶夫院士。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高级会晤的“超级任务”十分清楚：突破渐入老境的美国总统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屏障以及幕僚用备忘录和材料为他构筑的“栅栏”，让里根相信，他面对的不是政治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代表着另一个世界，却愿意进行对话和合作。

戈尔巴乔夫知道，他没有权利错过日内瓦这个机会。押在这个赌注上的东西实在太多：谈话将如何进行，两位领导人之间是否能建立起私人关系而不仅是礼仪性的关系，美国总统是否会认为他是个潜在的伙伴，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得失啊。为了敲响对方的门，戈尔巴乔夫准备表现出对美国总统的年龄和经验的敬重，并同时提醒说，他自己肩负的责任丝毫不比美国同僚轻：“总统先生，我不是学生，您也不是老师，我们分别代表着两个巨大的世界。”

起初，他们之间的谈话像是用湿木柴燃起的篝火：火苗不肯着大，随时可能熄灭。第一次休息时，戈尔巴乔夫快要绝望了，他对随从说：“老头一个劲儿重复他背熟的那些东西，”并怒气冲冲地称里根为“恐龙”。不过气氛渐渐开始转暖。也许是同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的那些“恐龙”打交道的经验对我们的领导人有所帮助吧。关于人权、裁减50%核导弹和国家防御计划的争吵搞得戈尔巴乔夫疲惫不堪，他伤心地说：“看来，我们走进了死胡同。”这时里根提议出去走一走。两人在公园的小径上散步，浑身都冻透了，便走进一个不大的游泳馆，客厅里壁炉之火仿佛有预见地正熊熊燃烧。尽管在原则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并未靠近，恰恰是在壁炉旁，他们之间初次冒出了私人接触的火花。

万一这两位政治上的超级重量级运动员都是外交方面的大行家，那他们就更难找到共同语言，只得顺着此前别人蹚出的车辙往前走了。然而，两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并不崇敬自己的前任，都认为自由地即兴发挥比照着乐谱演奏强。正是因此，如一年后雷克雅未克所证实的，这两位杰出的业余爱好者居然能够在经过数学计算的均势和恐

吓平衡几乎快要成为公理的领域取得轰动一时的突破。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都出现了统一的上帝——清醒理智，就连他们的亲信当时都认为清醒理智是乌托邦。原来，两个理想主义者都有一个无核世界的幻想，都相信无核世界可能实现，而且特别具有挑战意味的是，他们并不羞于把幻想说出来。他们就是在这种幻想、也许还是历史性幻想的基础上，开始彼此接近的。

自然真正的职业高手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代表团的专家受命起草最后的公报，以便将刚刚出现的相互理解记录在案，专家们在认真地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走进了死胡同，将双方的立场又拉回到最初的起点。晚宴上，舒尔茨和科尔尼延科都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报告了这个“丰硕成果”，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看看对方的眼睛。这次是里根出面了，他也不愿意错过日内瓦这个机会（在这方面南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希望丈夫的总统任期以同莫斯科的某种“历史性协议”告终），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使了个眼色：“怎么样，总书记先生，咱们拿拳头敲敲桌子？”

这就意味着产生了戈尔巴乔夫力求达到的效果：美国总统准备抛开专家代笔的“发言稿”，将初露端倪的苏美两国接近的进程改为“手动操纵”。他们分别回到各自的角落，在自己的班子中对情况进行了分析。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原来争论多半不是“围绕事情的实质，而是围绕着措词”（后来，戈尔巴乔夫将科尔尼延科所体现的坚强不屈的葛罗米柯谈判风格称之为“洞穴风格”）。在两位领导人的压力下，直至深夜双方才找到共同语言，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便可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核战争不能容许”，因为“这样的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还说“双方均不谋求压倒对方的军事优势”。

与这两位都发现彼此的好感对自己起了作用的男人不同，两位第一夫人并未成为朋友。南希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刻薄地提到赖莎，认为她“一本正经，书呆子气”。她说自己在两人初次见面之前“张皇失措”，不知道同苏联头号共产党人的妻子、而且也是党员的赖莎讲些什么。不过据她说，赖莎将谈话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几

乎不让南希"插话"。南希认为此乃不久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所固有的好说教禀性的表现，她最想不到的是，在"克里姆林宫新主妇"这种表面上的自信背后，是这位来自韦谢洛亚尔斯克的阿尔泰少女那尚未褪尽的面对国际闪光灯时的内心羞怯，她的大半生都是在俄罗斯的外省度过的。

如果不算最后公报中的一般性词句和在国家宫舞台上的握手，日内瓦会晤与其说带来了实际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为戈尔巴乔夫关于可以朝哪个方向、在怎样的条件下推动苏美关系的思考提供了材料。在他首先感兴趣的削减核武库方面，他准备拿美国人提出的削减战略武器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导弹来"换取"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然而，美国总统却不肯这样做。至于在政治接触的领域，戈尔巴乔夫明白，除非他以苏联具体的变化作佐证，否则西方是不会相信关于苏联体制将要实现民主化的口头承诺的。

此次来日内瓦，里根带上了例行的苏联因掌握国家机密而不得出国者的名单，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并非因为他无法回答——总书记并不缺乏典型"反击"的论据和激情，而是因为美国总统提出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自己正在打算解决。既然他不想继续以谩骂来对付这种指责并从而回到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时代，那就得突破他原来的安排，尽快取消这些问题。

尽管两位领导人彼此表现出好感，苏美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却纹丝未动，止步不前。无论戈尔巴乔夫多么有魅力，也不足以让里根以及华盛顿上层领导相信他关于裁减军备的建议不是莫斯科的又一次宣传诡计。戈尔巴乔夫竭力扩大业已开始的和平攻势，1986 年 1 月即提出令他的西方伙伴目瞪口呆的又一倡议：建设无核世界的 15 年规划。这个分三个阶段的宏伟的"世纪工程"应于 2000 年结束，届时国际核俱乐部全体成员的核武库将全部销毁。及时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使戈尔巴乔夫可以为新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依据。

这里提醒一下，那几年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尚处于"列宁阶

段”，因而任何同过去政策的决裂或者对于过去政策的重新审视，都只能在引证列宁的著作或者他的某个主张的情况下进行。雅科夫列夫就曾十分幸运地“突然发现”这样的一条语录，列宁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狭隘阶级利益之上。从上下文中将这个主张取出来，并借用某种编辑修改对其进行校勘，就完全可以用作新政治思维的“科学依据”。当然，列宁本人肯定不会同意将他说成抽象人道主义者的做法，他曾无情地毫不妥协地反对过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此外，新政治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核时代为阶级对抗划出了“客观的界限”。认为列宁早在世纪之初就能够预见到核武器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无异于把他说成又一个诺斯特拉达穆斯①。

比较起来，一个对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毫无崇敬之情的人对于列宁遗产的态度，倒要比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精心得多，他就是乔治·坎南，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论”的创始人。他在解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时，特别强调该意识形态并未将资本主义当成伙伴，而是将其当成历史死敌，同资本主义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共处，甚至有时可以合作，它期待着资本主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共产党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促进这个过程。因此，在他们看来，同资本家合作是一种策略，而毫不留情的斗争（战争）才是战略。坎南将列宁及其追随者的思想阐述得相当准确，这点可由列宁 1920 年 11 月 26 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各支部大会上的讲话来证实，列宁说：“我们一旦强大到可以战胜整个资本主义，就会立即掐住它的脖子。”赫鲁晓夫在 60 年代曾当着资本家说“我们要埋葬你们”，因此他看起来像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正统得多的列宁主义者。

如此出人意料的“解读”列宁，究竟是巧妙的策略手段呢，还是新政治哲学创始人的真诚信念，只好去猜测了。今天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均亲自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戈

①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　法国医师，占星家。

尔巴乔夫是苏联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放弃在世界其他各国之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特殊文明中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并且重申他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统一的共同的世界的一部分。

为了证明新教义的普遍通用性，戈尔巴乔夫准备将如卡尔·马克思和罗纳德·里根这样彼此相去甚远的人物都算作新教义的先知："马克思可是早就讲过人类的统一，"他对自己的政治局委员说，"我们在一定的阶段似乎不大注意这一点。如今这一点就显露出来了。"至于里根，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那几乎与马克思是一唱一和，例如他曾说过："那些认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人，是大错特错了。"

无论戈尔巴乔夫采用怎样的辩证法平衡技巧来迷惑党内人士，他想千方百计让最高机关通过的那个主要的论题，实际上是具革命性的：他推翻不久前将和平共处当成"阶级斗争特殊形式"的解释，并且断言："如果更加深入地来审视和平共处的实质，那么这其实是对于统一的人类的另一种理解……"

当然，改革初期国内的昂扬气氛，再加上戈尔巴乔夫自然要把他打算进行的又一轮"俄国革命"在西方"卖"个高价的愿望，就使得他那关于世界发展的议论平添了救世主般的色彩。于是，因改革变得焕然一新的俄国又像1917年那样，准备向全人类提出（并铺设）通往未来之路（幸而这次不是通过将人类一分为二并使"劳动世界"与"资本世界"相互对立的途径，而是借助于使之和谐一致并且重新联合的办法）。"国际领域的新思维何时到来，"日内瓦会晤后戈尔巴乔夫在"小范围"内说道，"这很难说。不过它肯定会到来，生活本身是这样教导的，它可能出人意料地来得很快。"

按照他的逻辑，就连"选择自由"这样大逆不道的公理也已不再具有投降主义的意味，反倒是大有希望的了。因为假如可以借助改革"治愈"患病的社会主义，将其变成现代、人道、同时又繁荣的社会，那么，各个国家的人民利用"选择自由"，就会不受强迫地选择这样的社会，而屏弃反人道的资本主义。于是，经戈尔巴乔夫这么一解释，"选

择自由"就从苏维埃超级大国让附属国爱去哪儿去哪儿所开具的"自由证"的同义词,变成了还社会主义方案以历史前途的一种方式。

在上述的"直接面向人民"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相当自信地声称:"我有时甚至有一种印象,有些美国政治家尽管经常赞扬资本主义制度,标榜他们的民主,自己却对其缺乏信心,**他们害怕在和平的条件下与苏联展开竞赛**(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我感到,在读了这段文字后评论家会说,可惜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太不了解。唉,我还是了解一些的,至少足以让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吧。"

从这段火热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有时由于缺乏对自己关于新世界的构想进行"科学论证"的有力论据,他只得改用几近宗教式的语言。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宗教信仰行动很快就变成对于他的不折不扣的政治火刑,因为这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拥护者也许成了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头几年,在乐观主义的预测和良好意愿的阶段,对改革首倡者说来,既向本国、又向人类的其他部分许诺美好新世界,并不是什么难事。新政治思维的浪漫主义追随者不仅在苏联有,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便属于第一批相信全人类改革的人。戈尔巴乔夫夫妇交上了拉吉夫及其意大利妻子索尼娅这对充满热情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觉得比同里根夫妇在一起自在得多。1986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与甘地在新德里签署了以庄严文体写就的关于无核世界和非暴力世界的宣言,两人都真诚地相信已为这样的世界奠下第一块基石,当时还不知道,同他们的希望相反,核大国俱乐部将得到扩充,印度自己也将跻身其中,而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拉吉夫将会成为恐怖主义暴力的牺牲品。

欧洲社会党人也曾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为社会主义思想恢复名誉(看来是苏联自己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的机会,他们对于寻找国际政治中无人问津的"第三条道路"尚未失去希望。其中最

有影响的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西班牙总理冈萨雷斯。既然这些阅历丰富的国务活动家都对于改革的许诺并非无动于衷，那么西方世界中千百万左翼观点的追随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准备将戈尔巴乔夫上台看成盼望已久的基督再次降临。到了 1991 年之后，苏联解体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苏联政策破产之后，一位成为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的著名法国外交官在其致原苏联总统的充满痛苦的信中写道："您当时没有权利失败！"

自然，与改革初期随之而来的几乎是全世界欣喜的气氛，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地开始从苏联国内移至国外的对改革首倡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能不使戈尔巴乔夫多少有些"胜利冲昏头脑"。"西方之所以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的改革进程，"他在对 1986 年进行总结时说道，"是因为他们首先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而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让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我国国际威望的提高，我们在这方面超过美国……我们的实际政策胜过任何宣传。"他的这番话不仅是自我标榜。当时进行的种种民意调查无不证明：西方的舆论在对待改革中的苏联的态度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西欧的威望也大大超过美国总统。于是，他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的新外交政策可以得到回报，而且已经开始给国家带来可能比国内政策更多的红利，至少在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是如此。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就应该是"经济红利"了。诚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新的、改革的"春汛"）的救星应当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历史死敌和竞争对手，与希望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前任既未能"揪住"他们的"脖子"，又未能将其"埋葬"。

"改革之父"值得称道的一点是，甚至当情况已经完全清楚，他所赋予东欧各国人民、接着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人民的"选择自由"，根本不会用于维持强加给他们的体制、反倒是用于促使他们逃离的时候，他并没有后退，并没有改变他自己宣布的游戏规则。他没有步赫鲁晓夫的后尘。赫鲁晓夫在 1956 年批准了发扬苏共二十大精神的《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宣言》，不出数

日，就派坦克前往布达佩斯，以便对那些过分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人进行开导。

戈尔巴乔夫身边有不少顾问和谋士曾建议他对1989年的民主德国和1990—1991年的波罗的海三国也照此办理，事后又责怪他“软弱”、“背叛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大概肯定会考虑到一切风险，正视将他往这边推的压力。据说勃列日涅夫当初在决定派兵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时，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政治上的生存。戈尔巴乔夫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表明：1986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承认选择自由应当成为我们的实际政治方式，而不是宣传口号”这番话，成了他始终遵循的原则。这就是说，他起初打算用作拯救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新政治思维和民主，对他说来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目的。于是，在结束“以阶级观点”处理外交事务（为达到其最高目的——推行或者保住社会主义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的阶段时，他再次无可挽回地同名义上仍是他政治上领路者的那个人——列宁决裂。

清偿债务

要是期待世界其他各国、首先是美国人倾听呼吁并且相信他的承诺，充当新思维的追随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里根对于戈尔巴乔夫建设无核世界纲要的回答是军事计划升级，实际上退出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以及轰炸利比亚。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一个问题：以传统苏联式的“针锋相对”对此作出反应呢，还是尝试突破双方阵营中的“恐龙”均颇感兴趣的相互猜疑的怪圈。也是在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毫无顾忌地发泄了一通南方人的情绪（同时也打消本国“鹰派”的疑虑）：“同美国的关系应当进行修正……跟这帮人没法共事……”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例行的苏美

最高级会晤搁置起来时所说的话，“我决不到美国去，谢瓦尔德纳泽5月份也不必去华盛顿。”说到这里又猛然醒悟，遏制了一下自己：“不过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二十七大方针应当保持，”他提醒所有的领导成员（也提醒自己）说。“我们别无选择。”

既然如此，就别像普里沃利诺耶充满幻想的男孩那样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神游，也别去期待那个各国人民“忘掉纷争”团结成一个统一大家庭的必然未来了，还是回到旧思维产生的问题上来，清偿债务吧。其中至少有两个已经错过期限了：阿富汗战争，以及招致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式导弹的苏联“欧洲导弹”问题。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对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谈到这些问题，也谈到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的“轰动外交”遗留下来的其他问题。这次“具有方针性的讲话”的目的，是“使外交家们沉浸在改革的气氛中”。讲话中他特别抨击了“谈判使者”，说他们“睡大觉”，听任裁军谈判停滞不前，听任西方怀疑论者败坏苏联新倡议的名声、把倡议说成虚张声势。总书记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戈尔巴乔夫以前时代，对于苏联谈判使者的要求不是太多。据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送别1969年11月前往赫尔辛基与美方进行战略武器谈判的外交人员时，除正式的指示外，只加了一句话：“记住卢比扬卡[①]！”（意指必须守口如瓶，以免泄露国家机密）。至于戈尔巴乔夫，他在送别新的团队前往日内瓦和维也纳时，曾向专职使者格里涅夫斯基说道：“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肥皂泡。军费支出使得经济形势濒临崩溃。我们同美国人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要往回撤。花上几个星期，就为了讨价还价，把两万换成一万八，把一个月换成四十五天。日内瓦，维也纳，年复一年地原地踏步，纠缠细节，为小事争论不休。”

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显然已经感情激动地忍受了里根对“日内瓦精神”的背叛，正向大家解释调子的变换：“西方不会自己设法收场的。如果我们对西方立场的回应是强硬再强硬，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切

① 卢比扬卡系克格勃的所在地。

都会原封不动，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更糟糕……归根到底，我们同美方没有解决的问题难道还少吗……要看到主要的……”

从这个将“诗句”留给新政治思维宣传者的毫无诗意的确认中，戈尔巴乔夫萌生了雷克雅未克想法。这个使美方猝不及防的建议，其含义就是拯救“日内瓦精神”，推动原地踏步的谈判，从个别问题提升至观念性的问题。

为了引起里根的兴趣、“撼动”他、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必须向他提出某项建议。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准备接受美国关于削减50%的战略性导弹的建议、双方在“欧洲导弹”方面实行“双零”，以换取美国放弃纯属假定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为1986年10月举行的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晤准备的一揽子建议。莫斯科并不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际威胁。早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即已成立的叶夫盖尼·韦利霍夫院士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这样的系统不可能有效地工作（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军界和军工综合体则一下子提出了几个对美国人实行“不对称回击”的方案。“*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对我们说来，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说道，“*我们只需贵方战略防御倡议计划成本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使得它一钱不值。导弹防御条约方面的问题，也在它所保障的战略稳定性上。*”

当他在大西洋岸边霍夫第的府邸里勉强说服美国总统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正在欣赏冰岛的间歇喷泉，参观中学，这个荒无人烟的多石岛上再也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了，当初选定这个地方进行最高级会晤，是因为它与美国和苏联的距离相等。南希未到雷克雅未克来。一年后赖莎来到华盛顿，以上流社会的方式对她说道：“*我们在雷克雅未克就缺您一个人。*”南希冷冷地回答说：“*照我的理解，那儿是不要女人去的。*”最高级会晤一无所获，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未达成协议就分手了。两位领导人会谈破裂的原因，是他们未能消除“几句话”的最后差距，据舒尔茨事后说，这个差距使他们无法达成协议。问题当然并不在几句话上。本来就在大多数问题上迎合美国人的戈尔巴乔夫，如果

不带上美方哪怕象征性地重申礼尚往来的文字，他就无法打道回府。

在冰岛首都，实际上无暇顾及女人，也无暇顾及礼仪性的活动。当然，如果不把戈尔巴乔夫最后的记者招待会计算在内的话。记者招待会在当地的电影院里举行，这是市内惟一一处可以容纳云集该市并期待出现耸人听闻消息的记者们的地方。对他来说，赖莎正是必须出现在这个场合，而不是在未能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进入鸦雀无声的会场，在用目光找到自己的“扎哈尔卡”后，才恢复了往常的镇定，此时记者们依然沉浸在这样的印象之中：两位领导人在守候他们的汽车旁戏剧性地道别，机场上舒尔茨满脸忧伤。这时，只听得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看到了希望。”

……撤出阿富汗，是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又一个刻不容缓的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在二十七大的报告中将已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称之为“流血的伤口”。因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就连那些曾经直接参与政治局的不幸决定的人，上自安德罗波夫，都明白应当从阿富汗这个山峦起伏的圈套内脱身。早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81年，政治局在讨论了“国际主义行动”不能令人快慰的结果之后，作出了秘密的决定：“往撤出的方面准备。”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后，曾“在小范围内”几次重申这一意图，而且据外交部副部长A. 科瓦廖夫证实，安德罗波夫甚至还要求“向他提供”有关莫斯科知识界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臭名昭著的1979年决定“捆住手脚”（他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在秘密记录上签过字），对他说来并不存在“撤出不撤出”的问题。问题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如何撤出、何时撤出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撤出。立即撤出的障碍，是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经得过的“超级大国综合症”。如何在不受屈辱、不丢面子、不承认错误（子孙后代可能称之为罪行）、不使成千上万曾与占领军合作过的人成为牺牲品的情况下撤出，总之，是出于信念呢，还是出于私心？戈尔巴乔夫希望“体体面面”地撤出，不要跟美国人那样像是逃亡，希望

阿富汗不要开始屠杀，希望不要为过去领导人不负责任的决定受到申斥，那样一来当前领导人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我现在不去议论我们出兵一事做得对不对，”1987年1月，他在讨论谢瓦尔德纳泽对阿富汗考察结果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说道，“我们出兵了，却根本不了解人们的心理和国内的实际情况，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过去和现在在阿富汗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我国的道德面貌不相容的。我们每年在这上头要花掉10亿卢布。更不用说人的生命了。”

一个月后，讨论阿富汗问题的调子已经高了八度：“撤出，是要撤！可作出决定不容易。会打击到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在此期间有一百万士兵去了阿富汗。我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无法交代：干吗要投入这么多人？”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跟他一唱一和：

“应当采取坚决的方针，两年之内撤出，”雷日科夫说道。“最好是给钱，给石油，可不是给小伙子。”

利加乔夫表示赞成：“我们不能通过军事途径给他们带来自由。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我们指靠军事途径，却没有考虑后果。”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比其他许多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便附和说：“通过军事途径赢得战争是做不到的。撤军的决定应当贯彻执行，但是要防止撤走后留下一片敌对的地区。”

戈尔巴乔夫作了总结：“要撤出，就得加快国内稳定的进程，恢复一个友好中立的国家。我们又不想在那儿搞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美国别在那儿安营扎寨，建立基地。”

这个较低的目标——回到1979年，如今看来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也指望不上新的美国朋友的帮助。甚至在“苏美蜜月”的最高潮——198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胜利访问华盛顿期间，里根也没有给他送礼物。美国总统向戈尔巴乔夫暗示（这时两位领导人已经以‘你’相称），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只有由他单枪匹马地去收拾了：“既然你们没有准备确定最终撤出的日期，那我就无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停止对于自由战士的援助。”

他必须在华盛顿偿还的第二笔“债务”——中程导弹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个情况。戈尔巴乔夫将1987年12月在白宫林肯用过的桌子旁边签署的这个条约与自阿富汗撤军相提并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照他的说法，美国的潘兴式导弹“是顶在苏联太阳穴上的一支手枪”。与阿富汗的情况一样，为了恢复原状，也就是为了消除前苏联领导人冒失步骤的后果，必须按照最高的价码付出代价：销毁859枚潘兴式导弹和飞航式导弹的同时，必须销毁1752枚超现代化的苏联SS—20型导弹。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学校（和宣传）的熏陶下形成了所谓他的祖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的信念，对他说来，得知“国外害怕我们”可谓一大发现。人们害怕的与其说是炸弹或者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像香肠一样生产”的导弹，倒不如说是那些掌管这些炸弹和导弹的人，也就是苏联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能不害怕吗？他甚至在斯大林之后时期，在作出往古巴运送核导弹的决定时，竟然对于关于可能引起后果的警告不屑一顾：“没关系，我们可以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还有勃列日涅夫，他出兵布拉格和喀布尔，遵循的是“国际主义义务”；又如乌斯季诺夫，他建议安德罗波夫不要承认南朝鲜客机是苏联防空部队打下来的：“永远不会有人提供任何证据！”

因此，他所面临的真正的、尽管是背靠背的争论对象，与其说是西方的论敌，倒不如说是本国的政治前辈。他那看来像是单方面的让步、同意不均衡裁军，不过是为苏联领导人过去慷慨大方地喂肥军工综合体所付出的理所当然的代价，也是保证对于苏联新政策必要的信任度的惟一机会，如果缺乏信任，东西方之间的任何谈判都依然是宣传上的竞赛。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仍不得不驳斥对他的指责，有人指责他“卖身投靠西方”、指责他本人与谢瓦尔德纳泽都是“西方影响的代理人”，他坚持说：“这是一项负责的政策，对本国和本国人民负责的政策。其目的是冲破闭关自守，排除这个与世界其他各国合作的障碍。”

由于戈尔巴乔夫与过去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需要的是实际的结

果而不是宣传上的胜利，他就得既寻找具有说服力的措词，又向自己的伙伴提出“他们无法拒绝的建议”。只有采取至今不可思议的措施，牺牲某些军备领域积攒起来的苏联优势，才有希望冲破徒劳无益的谈判的怪圈，开始迈向拉吉夫·甘地去世后大概只有他一人依然相信的无核无暴力的世界。时至今日，尽管这样的世界比十年前更加显得虚无缥缈，戈尔巴乔夫却坚持己见，对诸如多勃雷宁之类批评者的论据进行驳斥，多勃雷宁认为苏联“本来是有可能在不丧失葛罗米柯时期苏联外交所积累的成果、也就是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情况下结束‘冷战’的”。

他俩谁对谁错：是在华盛顿当了25年苏联大使、对于美国高层领导比对苏联官僚还更加了解的资深外交家呢，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也大体当了这么多年党的干部、直至当上政治局委员之后才开始实实在在地发现外部世界的戈尔巴乔夫？是职业外交家，还是尽管已匆匆掌握外交要领的自学成才的世界级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天真的政治家、自称未来人和地球主席的政治上的赫列布尼科夫①呢，还是一个能够赋予事件、包括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事件以除了总统任期或者人的一生之外的量度标准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托马斯·莫尔②类型的空想主义者？始终未能生活在莫尔的乌托邦的人类，怎么也不肯忘记他，而且称他为“永恒的人”。如今所有这些问题都去问谁呢？“冷战”结束了，而且是在戈尔巴乔夫所提出（或者所接受）的条件下实现的。至于这本可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如今已不该由他而应由别人去证明。

---

① 维·赫列布尼科夫(1885—1922)　苏联俄罗斯诗人，尝试用未来主义手法写诗；在晚期作品中，诗人力图创造未来自由人类的“新童话”和寓言。

② 托马斯·莫尔(1478—1535)　英国人文主义者、国务活动家、作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俄国人来了！”

那个使詹姆斯·福里斯托尔不得安宁的噩梦，终于成了现实：1987 年 12 月，俄国人入侵华盛顿，他们从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的飞机上卸下了数十名外交官、专家、记者，卸下吉尔牌装甲汽车，而最主要的是卸下令西方防不胜防的、苏联进攻西方的新式武器——戈尔巴乔夫伉俪。美国首都不战而降。为了参加中程导弹条约的签字仪式和在苏联大使馆及白宫举行的招待会，美国的全部政治精英、实业界精英和文化精英纷纷乘车、乘飞机云集华盛顿（有些应邀者乘飞机从其他城市、包括从西海岸赶来）。那些未接到邀请的人，则匆匆离开首都，以免受到盘问：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缺席归之于紧急情况的出现。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文件上签字并相互交换钢笔时，全场起立，向他们鼓掌欢呼。南希也很动情，这次仪式的日期、时刻都是她同自己的星象学家商量之后亲自选定的，她转过身子向赖莎提议两位第一夫人紧随超级大国之后登上世界舞台：“我想我们也应当彼此握手。”是夜，在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上，王·克利本令在场的人再次起立，他演奏了为初次参加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而学会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喜欢唱歌的戈尔巴乔夫显然十分高兴地随着哼唱，而坐在海军上将威廉·克罗伊旁边的超级保守的华盛顿记者乔治·威尔，附在他耳边悄声说道：“上将，对您说来，这支歌值得上 200 艘军舰。”

三天的访问期间，整个城市沉浸在“戈尔巴乔夫热”之中。苏联代表团下榻的玛丽奥特饭店内的酒吧，已更名为“公开性咖啡馆”。陪同的乔治·布什抱怨说客人抽不出时间参观超市、与普通美国人打交道，戈尔巴乔夫听得此话，突然吩咐车队停下，他来到人们中间，大街上出现了戈尔巴乔夫热，令保安人员焦急万分。数百人站在栅栏旁

边，他们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走运，纷纷过来与苏联领导人握手。美国保安人员让这个意外情况弄得手足无措，他们冲着人群喊道："大家都把口袋里的手掏出来！"这个要求纯属多余，人们本已全都把手伸向戈尔巴乔夫。车队停在街角一家餐厅的旁边，餐厅老板俯身二楼的窗外，唤道："总统先生，快上来吧，我们这个星期的菜谱有俄国菜汤！"

然而并非全华盛顿的人都这样接待戈尔巴乔夫夫妇。他们抵达之前，宾夕法尼亚大街曾有2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苏联侵犯人权和依然禁止自由出国。习惯上用于政治示威的白宫前草坪被"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所占领：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还有克里沙纳人和阿富汗圣战者，他们都打出"绞死戈尔巴乔夫！"的标语牌。国会议员也不是一条心，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收到在国会山两院联席会议上讲演的邀请（这与五年后访问美国的叶利钦不同），而其中一位超级保守的国会议员还给里根邮寄了一把雨伞和一双套鞋，意在影射当年张伯伦及其为与希特勒会晤的慕尼黑之行。

戈尔巴乔夫也得克服自己通往华盛顿之路上的障碍。尽管他的班子的主要成员都明白为了"拔除"欧洲的潘兴式导弹，必须以牺牲苏联的SS－20型导弹作代价（军方人士，首先是总参谋长阿赫拉梅季耶夫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还是有人心存疑虑。曾亲自参与"补充军备"决定的葛罗米柯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说："无需向美国人作出新的让步。否则近25年建造起来的东西就会付诸东流。不能指靠美国人的正派。无论我们作出怎样的单方面让步，他们也决不会与我们'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

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断他说："那么您有何建议呢，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属于为数不多的他不仅称呼本名和父名[①]、而且称"您"的人）？使谈判破裂？"葛罗米柯的回答是："拖延。"

① 按俄国习俗，称呼对方的本名和父名系表示尊敬。例如这里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为本名和父名，葛罗米柯为姓。

然而，像从前那样拖延，利用谈判作挡箭牌，虚张声势，都不合戈尔巴乔夫的本意，他的目标是尽快取得成果："*我和葛罗米柯不一样，我不怕美国人超过我们，包括在航天方面。看看事实上是谁在虚张声势。他们进入太空还远着呢，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信任。时间对我们有利。*"在这种苏美两国谈判的策略问题上的互相挖苦的背后，是原则性的世界观方面的分歧，而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分歧：56 岁的戈尔巴乔夫较之年近八旬的外交机关首脑更容易相信时间对他有利。葛罗米柯不仅代表了"冷战"的政策和时代，而且代表了整个苏联思维的学派，这个学派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只有将从雅尔塔协定时代即保证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战后原状"冻结"起来，才能保证苏联在世界上的重要价值。由此便挑衅性地拒不接受可能动摇、撼动这个原状和使之模糊化的一切。由此也产生了策略："拖延"、模拟谈判，顶多同意停止军备竞赛，而不能同意裁减军备，更不用说不均衡裁军了。对苏联国内生活起了推动作用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对于"原状"构成威胁。显然，他最爱说的那句与加加林的"*走咧！*"相映成趣的"*要紧的是开始*"，也不能不影响到外交方面。

他与葛罗米柯（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之间在观点上的原则区别，毕竟不在于对美国人的评价——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用实力的语言还是用新思维的论据说话，而在于对苏联历史前景的估计。在现实主义者葛罗米柯看来，可以保住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国王的最后一个论据"、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一张王牌，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起威慑作用的潜力。

而按照遵循新政治思维的浪漫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信念（他自然自认为是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试图将处于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的国内局势和周边局势冻结起来，只会导致体制以至国家的历史性崩溃。他相信，只有经过改革之后的苏联，方可在植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平起平坐地"与西方世界一争高下，这样的价值观念使得苏联比她的历史性对手更加适应 21 世纪和未来世界。

西方不无兴趣地注视着苏联内部这场世界观与政治方针的冲突，尽管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诺言持善意的态度，在其实际政策中却更多地是遵循葛罗米柯的逻辑：他们鼓掌欢迎改革，却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防苏联领导人或是他的继任者像当初认可新政治思维那样突然对于新思维感到失望。（许多西方政治家在得知八月政变时，大概为当初没有让自己过分沉浸于美好新世界的幻想而感到高兴吧。按照戈尔巴乔夫助手[沙赫纳扎罗夫]的意见，西方、包括“七国”若是1991年向苏联提供他在伦敦所要求的援助，政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白宫前草坪上的告别仪式，尽管又像一年前在雷克雅未克那样，由于阿赫梅季耶夫和尼采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就未来谈判的指示进行协商而有所推迟，却与那次在霍夫季大厦前令人感到压抑的告别毫无共同之处。当时未能取得突破，原因是里根不肯牺牲战略防御倡议，戈尔巴乔夫也不愿摊开自己的“一揽子建议”。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欧洲导弹”的条约，并同意举行削减50%战略储备的谈判，这就使美国总统能够亲自确信对他（以及美国预算）说来代价如此高昂的“星球大战计划”，肯定会因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而受挫（时隔不久，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两位领导人都可以将最高级会晤的结果说成自己个人的成功：里根可以夸口说他迫使苏联同意了他关于削减苏联的“战略三元组合”的说法，戈尔巴乔夫则可以断言，他所提出的迈向无核世界的纲领实际上正在按他的进度表实施。然而主要的结果是根本改变了苏美关系的气氛。如果说美国在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是抱着将信将疑的好奇心，将他当成一种异国情调的政治现象的话，那么在送别时则是心存感激，把他当成一个使美国社会摆脱恐惧的人。曾使美国社会感到恐惧的，是苏联导弹、不可预测的共产党人、“邪恶帝国”的威胁，总之是随时可能不请自来的俄国人。访美期间他在美国人中间的威望如果说尚未超过美国总统的话，那也胜过列位准备接替里根入主白宫的主

要候选人，而里根的新闻秘书菲茨沃特则差点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希望人人都忘掉他在日内瓦最高级会晤后曾经温和地将戈尔巴乔夫称之为“来自药房的牛仔”。

与此同时，“俄国人”自己刚刚开始摆脱官方宣传拼命灌输的一种信念，即关于他们眼看就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或是又一轮“战争挑拨者”挑衅的牺牲品的信念。据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证实，戈尔巴乔夫本人直至雷克雅未克之后，才相信美国人并不打算跟苏联作战、并不准备对莫斯科实施使我国无法还手的核打击。他终于相信苏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仿佛内心里得到了解脱，对于军方人士的种种纠缠，他一概回答说：“*你们打算打仗吗？我可不打算，就是说，你们的要求无法接受。*”当时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对他表示一致支持。

这个始于雷克雅未克并在华盛顿得以继续的彼此消除恐惧的过程，成了结束冷战的开端，这种恐惧仿佛是独立存在，并采取了由不信任和彼此猜疑铸成的真正“铁幕”的形式。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各说不一。一说是1988年5月，当时里根走出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门，来到红场上，敢于在“邪恶帝国”的心脏以列宁墓作背景摄影留念。一说是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主张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不应成为外交的工具，并宣布单方面将苏联驻东欧部队裁减50万人。

对整个欧洲而言，“冷战”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而最终结束的。按照苏方（外交部新闻秘书根纳季·格拉西莫夫）的说法，“冷战”是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于马耳他会晤期间共同埋葬在地中海海底的。按照美方（国务卿贝克）的说法，当1991年1月苏联和美国一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赞成对于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萨达姆体制实行军事制裁时，“冷战”确确实实成了历史的陈迹。看来，大家都说得对，因为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许多尚未提到的事件，共同组成了那个关键性的变革量，它使得多年来分成不同潮流的世界历史汇聚到统一的河道。怀有此类梦想者不在少数，相信它可能成为现实者寥寥无几，而作为实际可以落实的任务提出此目标者，惟有戈尔巴乔夫

一人。

汉堡《时代》周刊外交评论员贝特拉姆写道："我曾坚信'冷战'和军备竞赛永无结束之日。因此我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促成'冷战'的结束，而是使之变得比较可以忍受、比较平静和稳定。然而戈尔巴乔夫先生使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1989 年美国《时代》杂志将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人物"，理查德·尼克松却不怕称他为"世纪人物"。

1990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未去领取授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于 1991 年春天抵达奥斯陆并发表了诺贝尔讲演)。由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代表他出席授奖仪式。为什么苏联总统当时回避了国际社会给予他的、他无疑当之无愧的荣誉头衔呢？主要原因自然是国内的局势。至 1990 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外交上的成功与他的政策在苏联内部所引起的日益具有悲剧性的后果之间的脱节，已是有目共睹。迟到的诺贝尔奖不过是更加突出了这个反差而已。此外，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这时也已开始失去国内的支持，外交政策本来是改革最有利的方面，比其他方面都更加持久地受到居民以及他周围大多数人几乎一致的赞同，如今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战场。

此外，戈尔巴乔夫在其联合国演说中作为未来世界公理提出的诸多新思维的原则，首先是其中的放弃使用武力原则，正在摇摇欲坠的苏联帝国的广阔疆土上受到极其艰难的考验。那些发生在第比利斯、卡拉巴赫、巴库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愈来愈难以说成是零零星星的事件，使戈尔巴乔夫面临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新政治思维是否适用于内政？如果不适用，那么运用其公理——从"选择自由"到"不使用武力"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原来，自己国家那纷乱如麻的现实，改革起来比周围世界要困难得多。国内的现实使戈尔巴乔夫与拘泥于旧思维的葛罗米柯重新展开辩论，如今已是背靠背的了，据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说，葛罗米柯在退休后曾一再地说："在危机形势下适量使用武力是可以的。"有一次他对自己的"教子"感到失望，怒不可遏地说："不配。"接着又归纳道："既然以自己的和平主义感到自豪，那就别坐上泱泱大国领导人

的交椅。”当然,“在危机形势下”说说容易,如何去对付通过改革走出体制的危机这个政治难题呢?如何走出这个挑起的、选定的、人工制造的危机——“建设性混乱”呢?

所有这些问题,他后来在改革的年代里还得碰到。在华盛顿与里根握手告别时,戈尔巴乔夫还有理由认为时间对他有利。因此,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一位好挑剔的记者打破昂扬的气氛,提出了一个关于苏联领导层内部分歧的令人尴尬的问题时,总书记突然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分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分裂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只见记者们一个个大惊失色,他们显然是对这番话的出乎意料的火气感到惊讶,于是他想缓和一下尴尬气氛,仿佛自我辩解似地加了一句:“也许我太激动了,不过我在大家面前是很真诚的。”当时没有理由怀疑他不真诚。不过同样的问题假如是在三个月以后向他提出,也许回答起来的口气就不那么坚定了。

第六章 “惟有党不会背叛我”

骆驼能否走进针孔[①]？

1988年春天，改革的反应堆——戈尔巴乔夫政治局那坚如磐石的正面出现了最初的裂痕。此前有关政治局内如何“熬制”和“翻滚”的详情，很少透露出来，尽管在胡桃木房间和政治局会议室里争论已是常事。然而戈尔巴乔夫依靠党的高层对他的个人忠诚，较为轻而易举地平息了纷争。曾几何时，他还在嘲笑西方记者“枉费心机”：“他们挑拨我们，想挑起我们不和，分裂改革。西方已经把我们分开了：说什么戈尔巴乔夫主张西化，利加乔夫主张俄化，雅科夫列夫是共济会成员和世界主义利益的代表，雷日科夫则是个专家治国论者，不介入意识形态。”而到了1988年冬天，在记者们“刮风”之后，开始“起浪”了。戈尔巴乔夫大体上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因为他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述

① 语出《圣经》，原文为：“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走进针孔还难。”

了阿尔巴托夫院士在与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谈话时对方提出的警告:“你们国家的戈尔巴乔夫,他的主要问题还在后头。当改革开始从言论转到行动、触及到人们的利益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在官方的改革编年史中,1988年是转折的一年。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此有多种说法。有时他将其说成是第二阶段的开始,“群众集会阶段”的结束,“其时人们都明白体制应予改革,而不是改善。”有时又说得更加坦率:“其实改革是从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始的。”第一阶段也好,第二阶段也好,毕竟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新的界限:与其说是在国内形势的发展方面,倒不如说是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内心演变上(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至少在初期“党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从地跟着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走的,有如线跟着针,他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按照他的表白,他与自己的追随者在对于“并不令人宽慰的1987年”进行总结时,他显然已经做好了扔掉列宁指示和语录这副“拐棍”的准备。然而他尚未下定决心彻底离开“马克思主义码头”,开始独立的航行,尽管无法纳入语录的生活愈来愈执着地促使他这样做。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有一天戈尔巴乔夫如释重负一般地对他说:“你知道吗,阿纳托利,我又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笔记》读了一遍。他在那篇文章里并没有拒绝私人所有制啊!”总书记还不敢把这个“发现”告诉政治局委员。

党的“非国家化”,使党的机关摆脱对于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这应当成为新阶段的格言。党在甩掉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之后,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主义机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它应当还自己以政治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位昔日的边疆区委书记、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不会不明白,将苏维埃政权期间像暹罗双生子一样长在一起的党和国家分开无异于冒险,无论其中的党还是国家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手术。因为除了党委而外,国内实际上再无其他的管理机构。

他应当清楚,试图将这个“党-国家”改头换面,使之像手套一样里子朝外,开始的时候将其变成“国家-党”(戈尔巴乔夫在那个阶段

明智地没有提起多党制），在不知为何称之为苏维埃政权长达数十年的一党专政之后，力求将实际权力交给虚无缥缈的苏维埃，这就无异于一头扎进问题的汪洋大海，那些问题当时尚无答案。此外，他有无现实的可能性，去"说服"党的官僚即便不是全部交出自己不受监督的权力、那也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分享权力，而且同意通过选举，哪怕事后使权力具有合法的基础呢？因为使机关离开发号施令的阵地、使凝固的官僚结构返回溶化开的状态，就无异于实际上既与斯大林的"圣剑骑士团"章程、也与列宁的"新型政党说"一刀两断，就无异于离开布尔什维克投奔孟什维克，几乎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自己与其欧洲兄弟有着亲缘关系的时代。

可见，利加乔夫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失去了国家权力标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图纸改造过的党，更像是陶里亚蒂和贝林格的党，而不大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或者安德罗波夫的党，区别仅仅在于：意大利领导人使本国共产党挣脱共产国际十诫的羁绊要比戈尔巴乔夫简单得多，戈尔巴乔夫与他们不同，他有个与国家死死长在一起的僵化的官僚机构。

谁可知道呢，也许他并未给自己提出这个明知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又是在"耍滑头"，打算利用党的机关——国内惟一有效的执行机构的组织资源和行政资源，假手党的机关来拆卸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党的国家，将其变成苏维埃的、也就是世俗的国家。他自己曾经断言，他想削弱机关，不让这个"怪物"将"职业革命家"的党变成反对改革的反革命势力的堡垒。

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又打算遵循列宁的遗训。列宁当初曾经认为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免发生内战。戈尔巴乔夫打算干列宁没有干成的事，他提出让党的书记兼任地方苏维埃主席的建议，以此来对党的官僚进行"赎买"。这个表面上看来无可非议的建议，其狡诈之处就在于，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只需党的书记干一件小事：通过选举这一关。于是 1988 年他便开始将国家党这头疑心很重的执拗的骆

驼塞进政治民主化的针孔。

他自己是否相信此役必胜呢，或者如他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批评家所断言的那样，他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些批评家未能进入市场经济的童话世界（与相当大一部分官僚不同，那些人对自己的总书记连骂带踹，却顺利地既利用了送来的时间差，又利用了“赎买”的建议，将新的权力连同大量原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即使去问戈尔巴乔夫本人，恐怕也无法得到。顶多能得到今天的答案，却得不到当时的答案。

雅科夫列夫回忆说，早在1985年年底，他就给戈尔巴乔夫写过一篇报告，建议将苏共分成两个党：一个自由派别，一个保守派别，均属同一个共产主义联盟。戈尔巴乔夫在看过报告之后，只说了四个字：“早了点儿。”雅科夫列夫在提到这个建议时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判断也有道理，戈尔巴乔夫当时认为：“在一定的阶段，只有极权主义的党能够对付极权主义的制度。不过，”他补充说道，“这只有在党的机关阶层仍然支持自己总书记的时候方可办到。”

尽管如此，却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当时就企图“利用”党的帮助来摆脱党，并且预先计划好了通过实行“总统制”完成从党的专政到他个人专政的过渡。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提出的责备也并不少，他们说戈尔巴乔夫的长期动摇不定简直无法饶恕，在下定一刀两断的决心之前磨磨蹭蹭，结果是必然又一次坐失良机。

然而，当时是1988年，距离同他所领导的党“离婚”还很遥远，也许总书记完全是真心地认为他有责任向党的大军解释，时代不同了，如今是另一个时代，如果党适应不了这个时代，它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灾祸。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意图，正是为了进行这次“重大”的党内对话。

作为经验丰富的调音师，戈尔巴乔夫试图做到未来音乐会上所有的乐器都发出和谐的声音。在同自己不久前的同僚——州委第一书记的多次会晤中，他一再地说：“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的基础上搞出新的法律体系。因为坦率地说，党就是通过非民主的途径将政

权据为己有的。后来又通过宪法宣布自己为执政党……我国最大的不守法纪就发生在党委，在州委，那里是第一批违反法律的人……我们党所拥有的这种权力，任何地方都没有，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没有。那里领导人受到私有制的限制。而我们这里限制器只有一个：我的良心和党性。”

州委书记们闷闷不乐地听着自己上司讲他们本来就知道的道理，在所讲的内容中，他们注意到两条主要的新闻：一是他们每个人都得通过竞选执行机构首脑的选举；再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官场生涯以两个五年的任期为限。“谁要是特别突出，如果票数够四分之三，可以连任第三个任期。主要是别考虑我如何保住位子。应当考虑国家。”

当然，如果希望那支开始变成既定改革的障碍（这点戈尔巴乔夫已经感觉到了）的党的队伍不再考虑自己、只关心国家的事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然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同实际上自己有理智的一生均属于其中一分子的党彻底分手之前，哪怕是为了摆脱负罪感，他也应该给党一个机会。他本人就与自己党内的同志属于同一血型、具有同样的生活经验，他应该想像得到他们将怎样利用这个机会。这里所说的肯定已经不是言论，而是利益了，应该想起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巴托夫的朋友的明智警告了。

“把他们全都团结起来”

在使党对于未来新生活以及可能实行的多党制做好准备时，戈尔巴乔夫首先应当自己有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党制最初会在自己的党内出现。改革尚未到开镰收割的时候，他却很早就得自食因背离其前任定出的规则而招致的果实。通过亲身体验，他将会明白：权力模式发挥职能的机制可说考虑得周详细致、面面俱到，只要你动其中的一个零件，整个体制就会运转不灵。

体制的每一个因素——从斯大林时代的、在赫鲁晓夫时代和后赫鲁晓夫时代受到减弱的清洗，到列宁早已宣布的同党内派别活动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都自有其“有益”的寓意。既然宣布“选择自由”为新政治思维在外交上的支点，颁布公开性，允许尽管是“社会主义的”、毕竟是意见的多元化，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会因为他的反对者（就是改革的逻辑开始对其利益构成实际威胁的那些人）赶在拥护者之前利用新的游戏规则而感到大惊小怪了。无怪乎古拉格[①]的词汇将一个说法明确化了，这个说法不仅对于被押送的囚犯是个警告，它对于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也是一个警告：“往左一步，往右一步，就等于逃跑。”新的总书记朝着偏离党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方向一下子迈出了好几步，他就进入了雷区，并且发现政治地雷今后会在他的背后或者就在脚下——在昨天还是铁板一块的“列宁式政治局”内爆炸。

转折性的这一年的头几个月，以他为首的政治局的内部情况，愈来愈令人联想到在已经跑调的钢琴上弹奏。政治局委员最后一次团结一致的时刻，就是将他们团结起来惩罚叶利钦的“仇恨两分钟”。雅科夫列夫在回忆起 1987 年的中央十月全会时，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闷闷不乐，神情专注，沉默寡言。他承受着坚定地要求将叶利钦开除出党的巨大压力。他也同样坚定地反对这个建议。”

然而，在除掉这个扰乱安宁的人之后，原先政治局内部那种平静的气氛也从此一去不复返。叶利钦以其多半是自发的越轨举动表明，党内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传统的意见一致和必须向领导人看齐均已成为过去。他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只需回忆一下他在中央全会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市委全会上所受到的鞭笞）才争取到的不一致的权利，在他之后，连那些故作激昂慷慨状谴责过他的人也可以享用了。“从前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必须友好相处，”雅科夫列夫说道，“却原来也可以意见不一致，即使还不是与总书记意见不一致，那至少也是

---

① “古拉格”系俄文 ГУЛА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音译。泛指苏联时期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

彼此意见不一致。”最先享用获准的党内持不同政见的权利的，居然是苏共党内最正统的势力，也就是特别强烈地感到显然已经失控的国内局势的威胁的那些人，这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实际上也是顺理成章。

戈尔巴乔夫的那些未来的激进民主派的批评者，当时大部分都还保持沉默。一是他们需要一段时间在雅科夫列夫提供的公开性的保护下成长壮大，增强信心。二是他们在这个阶段还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有多大的意见：他所倡导进行的国内民主变革，他们大多数人原来并未奢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得见。未来的民主派紧赶慢赶地跟在戈尔巴乔夫后面，如饥似渴地从他的讲话中读到或者从电视上听到他们昨天还认为“不可在电话里告人”的东西。

主动充当第一个反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喉舌角色的，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不久前还以戈尔巴乔夫最积极支持者之一著称的利加乔夫。例如，在1987年中央十月全会上抨击叶利钦政治上“不成熟”时他定调子，维护总书记，他说：“我们全都很尊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能同他一起共事，我感到高兴和幸福。”然而，到了1988年2月，好像是在讨论无害的学校改革问题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利加乔夫即开辟了自己的攻击战场。他反对给苏联历史抹黑（那是在政治局内围绕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稿进行了多日辩论的两个月之后），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必须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保证教育过程的“高度思想性”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敌人的警惕性”。

戈尔巴乔夫仿佛并未听清“警卫”的鸣枪示警，继续往思想上谋反的方向“逃跑”。他在此次全会的报告中坚持认为，既定的变革的中心应当是人、而不是“劳动群众”，党的领导作用并非一成不变，他再次以列宁为挡箭牌，去对付“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坚持“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再来一个根本的改变”。

戈尔巴乔夫让并未势头减弱的对改革的全民支持宠坏了，且尚未遇到他所纵容的“创造性混乱”带来的后果，过分相信自己平息周围汹涌澎湃的政治激情的能力（事隔十年之后，他说这是“过于自信”），以

致对于自己班子成员之间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并未特别在意。他觉得，改革的共同意图十分宏大，足以消除他认为是不同禀性和性格的冲突的东西。"我同意，"他对切尔尼亚耶夫说道，"利加乔夫这个人说话不大客气。可他是诚心诚意地操心事业，操心改革。至于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嘛，他是比较欠缺。"他也是这样来安慰《莫斯科新闻》主编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和苏联新闻社社长瓦·法林的，利加乔夫曾以意识形态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主编会议上对他们进行申斥。戈尔巴乔夫说："叶戈尔·库兹米奇①对我说过，《莫斯科新闻》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题目。所以他并不认为全都是一团漆黑。"

此外，不仅就政治观点、而且就天性而言，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改革者，一个善于搞妥协的人，他与其说是"讨伐者"，不如说是"劝说者"，他真诚相信可以使争论的双方言归于好，他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的争吵所反映的，并非简单的情感与自尊心之争，而是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利益之争。

早在1987年秋天，他就对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说过，他在南方休假期间，实际上同时收到"三个叶戈尔"（叶戈尔·利加乔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和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也是叶戈尔②]）的来信。"三个叶戈尔所忧虑的都是同一件事。他们担心的是改革可千万别受挫。然而他们的见解又反映出各种意见、争论、观点的范围有多么宽广，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多元化……这总的说来是好事，也是业已开始的这个转折中不可避免的。激动不安的状态总是伴随着革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从这个完全清醒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论："总之，让他们别惊慌失措。阿纳托利，把他们全都团结起来吧。"

"全都团结起来"没有做到。就连总书记的两位直接下属——他为了搞平衡让两人共同负责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也没

① 指利加乔夫。

② "格奥尔基"的昵称为"叶戈尔卡"。

有执行他的直接指示。他的指示是:把两个人单独关在一起几个小时,尝试“消除”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分歧。此次谈话之后,两人分手时已成完全势不两立的仇敌。自此宣布的政治局内部“红白玫瑰”之战,尚未演变成为针对总书记的战争,它依然是为他而进行的搏斗。每个阵营都指望将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以镇压对方的反抗。戈尔巴乔夫已经感到这种对抗中表现出社会上日益紧张的气氛,他竭力平息激情,不过这已经愈来愈难以做到了。

当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一个去南斯拉夫访问,一个去了蒙古,留下“看家”的是“主要的叶戈尔”——利加乔夫),右边船舷又一次响起了齐射声,此次已不是空弹射击。1988 年 3 月 13 日,也就是总书记启程出访之日,苏共中央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题为《不能牺牲原则》的来信。尽管这封占了一整版篇幅的来信刊登在《论战》版,中央委员会对于文章的重视程度(在次日举行的会议上,利加乔夫“建议”各报主编注意“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论战文章”,塔斯社奉命通过其渠道全文散发,在《苏维埃俄罗斯报》未大量发行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则建议共和国领导人购买一定数量的报纸或者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这篇文章)却毫无疑义地表明,这是党的领导层或者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派别的观点。

这封作为“具有方针性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的来信中,不时出现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已耳熟能详的术语,诸如:“世界主义者”,“托洛茨基派”,“反革命民族”。通过引用丘吉尔的话,为不公正地“受到诬蔑中伤”的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辩护。正统的反对派这篇胆大的抨击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大致介乎 1952 年挑起“医生案件”的反犹诉讼案的季玛舒克告密材料以及 1991 年 7 月也是刊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告人民书》之间。《告人民书》中提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纲领。戈尔巴乔夫不在的那些日子,国内的政治生活陷入停滞状态:党内官僚将文章当成行动指南,他们预感到即将冲出战壕,已在开始安排各地往中央寄“劳动者表示赞同的来信”,而垂头丧气的莫斯科知识

界则绝望地准备重返“厨房”。

自贝尔格莱德返国的总书记碰上“改革巡洋舰”危险地向右舷倾斜。被雅科夫列夫和民主拥护者惊慌失措的呼吁“上紧弦”的戈尔巴乔夫，采取断然措施镇压舰上暴乱。政治局为了弄清党的领导层内部关系而召开的两天会议，成了独特的“中国方式会议”。被迫在会上忏悔的利加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揭露了会上的“执行判决式作风”，它与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害异端”有异曲同工之妙，利加乔夫本人1949年就曾被指控同情托洛茨基主义。

每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必须表明自己对于“反改革势力宣言”（“隐名埋姓”的雅科夫列夫在《真理报》4月5日的编辑部文章中以此给文章正式定性）的态度。有些人，首先是利加乔夫，不得不进行自我辩解，证明自己与文章的发表“绝无牵连”，另一些人呢，像沃罗特尼科夫就不得不赶紧称文章为“标准”，多尔吉赫也不得不赶紧表示忏悔，并解释说自己看得不仔细，未发现其中的反改革情绪。

亚佐夫元帅不会长篇大论地来一通意识形态评价，这原是意料中事，他在会上代表军队指挥人员表示愤慨：完全被宠坏了的媒体不去提出爱国主义的话题，“却喋喋不休地大谈维索茨基，他都有些什么作为呢？”尽管令人不堪忍受的马拉松式会议的结果，是总书记求之不得的团结一致，团结一致为筹备党代表会议扫清了道路，却再没有人对这种勉强凑出的团结产生误解。“就得同这帮人一起将改革推向前进！”会后戈尔巴乔夫向自己的助手们抱怨说。然而他再无“其他的作家”。至少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

早在中学时代，演艺天地就吸引着戈尔巴乔夫，并且差点使他偏离真正的政治道路，后来他对此依然并非无动于衷。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在电视屏幕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舞台上充满激情、十分在行地当演员，他使任何一个伟大演员做梦也想不到的观众一连几个小时处于紧张状态，这让里根好不眼红。而且改革的整部“历史心理戏”都以政治叙事文学的舞台戏剧形象呈现在戈尔巴乔夫的面前。例如，他可以

把政治局委员搞得目瞪口呆，会议刚开始就讲他昨天晚上去看戏了，看的是莫里哀①的《厌恶人类者》："戏里讲的全是我们的改革。"你必须对于这个计划真正地十分执著，才能在法国18世纪经典作家那相当肤浅和刻薄的文字中看出某种政治上的相似之处。

到下一次，莫里哀就会被沙特罗夫成功地取代。戈尔巴乔夫在观看沙特罗夫的《布尔什维克》之后，兴奋地向同僚们讲述说："最后几句台词念完之后，剧场里鸦雀无声。然后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1988年7月28日向出席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作的报告，他觉得那"哈姆雷特式的"开篇像莎士比亚一样地有力，报告说："如何深化革命性的改革，使之变得不可逆转呢？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就群情激昂、违反礼仪以及打破禁忌而言，代表会议确实像一出情节充满尖锐冲突的戏。代表会议的开篇，是作家维塔利·科罗季奇对在场的"受贿者"的公开抨击，代表会议的脚本中，还包括有此前党的会议上闻所未闻的将领导人赶下台的呼吁，有叶利钦那半是忏悔、以要求"生前平反"作结的发言，有利加乔夫冲他说的"鲍里斯，你做得不对！"还有戈尔巴乔夫最终的胜利，他在代表会议闭幕时，平息了眼看要进入俯冲的辩论。

主要的是，代表会议永远结束了所谓苏共队伍铁板一块的神话，揭示了实际上的多元化以及苏联政治精英出人意料的多党制——此前政治精英均被送入一党体制的狭小的罐头式空间。"代表大会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动摇，"至今戈尔巴乔夫回忆起来还非常兴奋，"在这场整整十天的风暴期间我一直在掌舵，我以为我们会翻船的。而且许多代表比我激进得多。可现在人人都说戈尔巴乔夫是个破坏者。不过我当时知道，只有这样开放的立场才能削弱官僚的淫威。"

---

① 莫里哀(1622—1673)　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舞台艺术革新家。

他指望通过这样的休克疗法唤醒已进入政治休眠状态的"国有化的党",使之能够参与正在开放的市场上竞争,这是一场真正多元化的、而不仅是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竞争。

总书记要让党摆脱"并非它固有"的功能("现在它把什么都攥在自己手里:从迎接里根到马的套具和土豆"),要将党委会手中的执行权的杠杆交给苏维埃,一部分惊慌失措的官僚从他的意图中(完全正确地)看到了天崩地裂的危险。这时他们最感到恐惧的,不是可能校正甚至彻底修正意识形态:绝大部分党的官员早已不去考虑主席台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讲话的意义,他们也并不打算进行唇枪舌剑的意识形态辩论,何况尚未对此做好准备。

习以为常的话语的改变十分危险,仅仅因为它预示着昔日的舒适、稳定将一去不复返,预示着固定的常规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将受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的普通成员同那些领导他们以及他们已经不完全信任、却尚未下定决心与之顶嘴的人相比起来,更有洞察力。官僚们更多地是凭着皮肤、本能而不是理智感觉到:他们的权力,也就是安乐,如专门研究极权主义制度的德国哲学家阿伦特①所言,已经不是以思想的引力、即话语和口号为基础,而"仅仅是以组织的强大力量为基础"。

当然,对苏共代表会议的代表说来,这位公认的20世纪极权主义专家的著作并非案头必备的书籍。他们所竭力维护的体制千方百计地抵御意识形态方面的谋反,体制与其说是不让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早已学会绕开禁令)阅读此类书籍,倒不如说是不让其坚定的拥护者甚至领导人阅读,从而剥夺他们对现实进行清醒分析的必备工具。由此就出现了安德罗波夫"我们对于亲自建成的社会知之甚少"这一语惊四座的坦率说法,以及雅科夫列夫事后的表白,他说:"开始

---

① 汉纳·阿伦特(1906—1975)　法国和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声名远扬的《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作者。1933年起侨居巴黎,1941年起侨居纽约。

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时看不到后果的尾巴。我们怎么知道公开性会导致那个制度的毁灭呢？它将制度捣碎，从天上摔到罪恶的地面上——啪的一声！这叫什么制度？是一个砸碎了的骨架。”

具有洞察力的法林是戈尔巴乔夫身边为数不多的读过阿伦特著作的人之一，他看出了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不仅是党、也是整个苏联社会的“转折线”，是体制的更替。他在猜测中感到茫然：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政治权力中心从党转到苏维埃的建议，仅仅是回到早已有之的“十月革命模式”呢，还是为建立抄袭自法国或者美国的未来专制总统制扫清场地。不过他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要尽快地弄清楚，尽快地离开模棱两可的“全都团结起来”的阶段，承认有两个无法调和的思想纲领已在党内酝酿成熟。“无论承认与否，”他在代表会议期间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便笺中说道，“实质不会改变。至于两派都用表面上相似的语言讲话，这也改变不了什么。代表团乐于向左右两边鼓掌，这只会使情况复杂化，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刻跟着强者走……您为什么迟疑不决呢，有什么必要同您那些打算零售兼批发地将改革卖掉的反对派协商一致？只要再走错几步，革命更新的纲领就会类似于又一个美丽的梦想。”

所有认为“尼娜·安德烈耶娃宣言”就是对总书记的改革方案的公开宣战的人，无不愈来愈执着地促使他首先在党内划清界限，然后离开党，前往另外一个政治家庭。

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改革可以有完全另外一种开端和与之相应的另外一种继续，他暗示说，他和几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成员才是真正的“创造戈尔巴乔夫”并将其扶上台的人。这是当众向总书记发出挑战，许多人都在期待戈尔巴乔夫作出反应。他并没有公开应战，没有撤掉《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的职务，也没有当众批驳利加乔夫，当时更没有与保守派划清界限，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又一次表现出优柔寡断、意志薄弱以及不惜任何代价搞机关妥协的不良嗜好。

不仅是怀念果断的党的领袖的“铁腕”的那些经典的机关工作人

员，就连民主派雅科夫列夫也认为，领导人面对向他提出的政治挑战没有“拍案而起”，就削弱了自己在一个习惯于一长制的政党内部的地位，并且助长了反对派的威风，刺激了他们的贪欲。后来雅科夫列夫批评说，领导人“想扮演总书记的角色，却从来没有真正做过总书记。他当上总书记后，对自己的强大力量估计不足。他可是几乎无所不能。他可以在全会上依靠亲信，想用谁就用谁，想撤谁就撤谁。而且这些大家都会接受，也许还是欣然接受呢……”

戈尔巴乔夫没有“拍案而起”，这出乎人们的意料，就连他那些不顾一切的追随者也促使他“拍案而起”，有时对手明显地挑动他这样做，他不为所动，这当然是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据雅科夫列夫的观察，他“对于迫害政策持相当否定的态度，有时谈起这个话题甚至很激动”。然而，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戈尔巴乔夫的真正行为动机却有待更深入的挖掘。党的机关习以为常的生硬的、往往粗野的行为方式，旨在重申和确立领导人的统治地位，无论戈尔巴乔夫对此有多么反感，他也决非政治上的主张素食者，决非不以暴力抗恶论的追随者（尽管在个人交往中遇到没有礼貌和赤裸裸粗暴的表现时可能退缩不前甚至不知所措）。他对于妥协的追求，拒绝接受故意做出的“果断”姿态，则反映了有意识的选择。

较之有力的行动或者严厉的行政申斥来，“渐进论者”戈尔巴乔夫更崇拜的是过程，他相信只有具有深度的、平稳的变化才能使所发生的变革具有真正的根据。尽管党的代表会议上表现出两种倾向（激进民主倾向与保守倾向）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却没有急于根据表露出来的内部界线将党一分为二，这中间是有原因的。首先，他认为一分为二应当是内部自然演化的结果。其次，在他看来，当时的苏共并不是同样的黑压压一大片——笼罩在国家上空的一片乌云，而至少是由两个彼此并无多少关联的政党组成的：一个是官僚，他们已变成吮吸社会生命乳汁的地地道道的寄生阶级；另一个是党的“步兵”——千百万普通党员，他们依然相信官方宣传所宣布的崇高目标。为了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真正的、所期望的这第二个党，即使在政治上的合

理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仅是助手们的祈求和忠告都在促使他与第一个党彻底决裂的时候，他也情愿对第一个党采取容忍的态度。

“有一次我对他说，”雅科夫列夫回忆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同这个党长此下去会很糟糕的，一切都耗尽了。’可他说：‘你别着急，别着急。11 月份我们开个代表大会，把党分开。’离那个 1991 年的 11 月份，还差整整一年呢！”加之戈尔巴乔夫也并不准备党的代表会议刚刚闭幕就将党一分为二，当时，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夺得的政治胜利以及保守反对派表面上的投降，尤其是国内相对平稳的经济状况，都使人有理由希望取得成功：他只要将不可救药的顽固落后分子孤立起来，就可使党得救，就可像摩西①带领自己人民一样，将党从行政社会主义那寸草不生的沙漠，带领到他的改革的富饶乐土的谷地。

然而，相信“过程”的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使“第二个党”——改革党在组织上成形。其结果，一面是机关党在对其进行排挤的“改革工地主任”的进逼下被迫节节败退，他们不仅气恼地顶撞，而且在利加乔夫的掩护下团结起来（起初将自己的野战司令部设在利加乔夫的办公室，后来又迁至成立于 1990 年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一面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的党依然在等待他的号角声。在等不到号角声的情况下，便各自东西。其中的顺从主义者，如法林所预言的那样，跟着那些较为果断、因而在精神上与之较为接近的好斗的俄罗斯共产党领袖走了。其中的改良主义者本来尝试过利用手边的材料构建“民主站台”，而最性急的那部分人则认定“总书记已是江郎才尽”，在没有得到他任何“肥缺”的情况下，纷纷投奔新的叶利钦反对派阵营，为之效力。

总书记则认为阻止了顽固落后分子（“把狗拽住”），他就赢得时间，为党内民主派提供了适应新生活的机会，同时使两者都免于可能

① 源自《圣经》：神履行诺言，让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的“盲目革命”，结果却是两边都不需要他。他所唤醒的过程将自己的首倡者连头一起罩上，径直往前走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干部政策方面并没有仅仅指靠“过程”：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四年组织部长没有白当。一旦需要，“没有主心骨”的总书记便动用自己的“钢牙利齿”（葛罗米柯语），领教过他这一手的有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德国人鲁斯特降落红场的24小时之内被免职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夫，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后自愿退休的100多名中央委员，还有葛罗米柯本人。1988年9月，也轮到葛罗米柯离开政治局，并将其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让给戈尔巴乔夫。据改革统计学家的统计，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实际上总共换了四批政治局委员，不大重要的人物就不用说了。因此从形式上看，责备戈尔巴乔夫没有充分利用“想撤谁就撤谁，想用谁就用谁”的权力是不公正的。而且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样的责备倒不如归结为“换了不该换的人，没有合适的人接替”（自然，每个批评者都有自己的“理想人选”名单）。

问题是在另外的方面：他愈是频繁地更换中央委员、中央书记或者政治局委员，就愈加明白，问题不在人，而在他们的作用。让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家伙”退休，选拔年轻的新人接替他们，这就足以证实：人们在“老官僚”执政期间寄予太多希望的更新换代（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是塔斯社的一条消息：“选举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并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面。”），实际上几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当然，在他的人事决定上，也有某些性格特点和个人偏见留下的印记。他并未效仿勃列日涅夫，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黑手党”换成“斯塔夫罗波尔黑手党”（如果不算苏联农工综合体主席穆拉霍夫斯基的话），却长期依恋某些人物，例如早在担任边疆区书记时就相识的波洛兹科夫。由于与其说是政治上、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同样的原因，他仍然维持着同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的关系，他与这些人一起开始改革，似乎内心里认为自己欠人家的，甚至当这已直接危及事业时，也不愿彻底断绝关系。

也许，正是穆雷纳尔日所发现的戈尔巴乔夫的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在人事方面很拿手”，导致了致命的失误：要么表现在任命方面，要么表现为在与自己身边潜在的无益的或者危险的人分手时不够果断。其中最明显的，戈尔巴乔夫今天也愿意承认的，是1991年他“政治上的掘墓人”——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叶利钦。

起初，叶利钦博得戈尔巴乔夫的好感，那是改革的头几个月，他正在“物色积极肯干、坚决果断、对一切新事物很敏感的人”。此外，他需要一个不受任何莫斯科束缚的外来人，来清扫格里申去职后莫斯科市委这个“马厩”。尽管戈尔巴乔夫起初对于着手净化市委空气的新任莫斯科书记叶利钦的热心感到满意，却并未将叶利钦当成自己棋盘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按照戈尔巴乔夫女儿的说法，在家里每晚的“飞行分析”中，几乎从未提到新任莫斯科书记叶利钦的名字。因此，戈尔巴乔夫1987年夏天休假时接到叶利钦抱怨自己受到主持书记处的利加乔夫排挤的来信，当然就把那看成司空见惯的小争执，不必特别留意，况且正值对他说来政治上很微妙的重大事件——十月革命70周年的前夕。9月份他又给叶利钦去电话，劝他“忍耐忍耐”，便自以为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叶利钦在1987年中央十月全会的“反常行为”，令戈尔巴乔夫大为光火。叶利钦发言中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歌功颂德和可能出现新的“崇拜”的暗示，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与其说是认真的批评，倒不如说是这位自尊心过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对于未能当上政治局正式委员（以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照例都是政治局委员）大感不满的情绪爆发。

因为实际上所有的领导成员都替戈尔巴乔夫撑腰，他就有恃无恐地用了一种宽容大度、因而对叶利钦更具侮辱性的腔调：

“什么叫个人崇拜，这可是人人皆知。这是一种固定思想观点的体系，一种立论，说的是实现政治权力和民主的制度，法律的制定，对干部对人们的态度。

你总不至于政治上太无知，还用我们在这里给你扫扫盲吧？

…… 只有发展到如此极端的自高自大，才会把个人的自尊心置

于党的利益、我们的事业之上！况且正是我们处于改革如此重要阶段的时候。”

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对叶利钦的“个人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叶利钦在自己办公室试图拿办公用的剪刀自杀。后来，又“宽宏大量地”让他改任联盟部长（而不是让他退休），在此之后，叶利钦的问题一度显得不那么紧迫了。然而戈尔巴乔夫控制不住情绪，又两次对这位扰乱分子进行辱骂，一次是在他俩“男子汉的谈话”中保证“不再让他介入政治”，一次是在后来的公开讲话中，当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的面把他们的同乡叶利钦说成“毫无希望的政治活动家”（陪同总书记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沙赫纳扎罗夫，在试着把这句他认为“过分情绪化的插话”从塔斯社的稿子中删掉时，只得就自己这个“多余的倡议”向戈尔巴乔夫和赖莎进行解释）。

当脱离“昏迷状态”的叶利钦出现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讲台上，在发言中多少进行了一点忏悔，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又对利加乔夫进行批评时，总书记可以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策略没有错。在这两个假电极点的不同电位所产生的“电弧”的光线下，他本人的形象——一个使党和国家不致走向色彩各异的激进派的极端的人，便显得特别地具有优势。

这三位相去甚远、由于命运的怪癖而凑合到一起的政治家之间命中注定的历史联系，后来又得到了证实：他们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走到一起，然后彻底地分道扬镳。对叶利钦来说，代表大会的讲台成了他有效地演出退党一幕的舞台，也成了开始自己政治生涯中新的主要阶段的跳板。利加乔夫则在这个会场里遭到有损尊严的失败：他自我推举为副总书记的候选人（有违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愿），却居然没有得到具有反戈尔巴乔夫倾向的与会代表的支持。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电弧”熄灭了，从此刻起，曾经在他们拳斗中充当拳击台上体面裁判角色的中派分子戈尔巴乔夫，也像滑翔机一样失去了对他起支撑作用的两个机翼。

如果说在对待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承认至少犯了两个

"错误"(没有马上发表他在十月全会上的讲话,拒绝将其派到国外当大使)的话,那么在利加乔夫的问题上,错误就多得多了。他当然并未忘记1985年3月欠了这个人怎样的情(而且不希望别人对他提起此事)。然而在他对待利加乔夫的态度上,是尚未清除掉的个人好感("利加乔夫为人直率,为此我始终尊敬他,尽管他暗中给我使过几次'绊儿'")与他自己觉得巧妙的打算结合在一起。在总书记给自己提出的两位一体的任务(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样板来改变党的面貌以及遏制党内复仇主义派别)中,利加乔夫充当了"缰绳"的角色。就连他的直率,确切地说是缺乏灵活性,往往还有冒充"党的原则性"的粗暴,只要是冲着其他人,也对戈尔巴乔夫的心思,利加乔夫本人在主要问题上都保持着即便不是政治上的、那也是对他个人的耿耿忠心。

直到利加乔夫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发言,公开以曾经保证戈尔巴乔夫当选("代表们应该知道,当时也有其他的方案")为资本向总书记提出要求,这才意味着他们之间原来的公约已经废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留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实际上第一副总书记的地位,就显得不明智,甚至危险了。此外,在"尼娜·安德烈耶娃案"的丑闻之后(尽管戈尔巴乔夫表面上撤消了对于利加乔夫参与这一"反改革挑衅行为"的怀疑),已经不可能再坚持原先的将对意识形态的责任"一劈两半儿"的模式了。这个模式尽管具有伪善的性质,也许正是多亏这种伪善性质,它曾经一度既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满意,又让宣传部门"属下"的苏联媒体感到满意:每个主编根据"党的良知"的指引,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后台"。

然而,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如此胆大妄为之后,戈尔巴乔夫决定屏弃这种"改革时期的多元化"。"分成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苏斯洛夫"又合到一起了,并决定由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这位中央委员会中对戈尔巴乔夫最忠实的一个人充任这个角色。与此同时,出乎渴望复仇的"雅科夫列夫派"的意料,并未将利加乔夫的头颅送给他们。

“叶戈尔[1]应当调离意识形态岗位，但是仍然留在领导层内，”戈尔巴乔夫说道。看来他的出发点是，将具有潜在爆炸危险的人放在自己身边，比再给现已置身彼岸的反对派再送去一个领导人（在叶利钦之后）更为安全。

至于利加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总书记也以自己的方式作了处理：他没有用另一个“第二书记”去接替利加乔夫，干脆抽掉了利加乔夫所坐的交椅，实际上将书记处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庄严的坚不可摧的机关从此不再使国家机关战战兢兢。这样一来，也消除了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之间发生冲突的理由，因为雷日科夫一心要进行所宣布的经济改革，他对于利加乔夫实行党对经济的领导的要求，愈来愈作出过分的反应。

尽管借助这一举措，利加乔夫的自尊心表面上未受伤害，他却因在党代表会议上对总书记进行侮辱性攻击而受到残酷的惩罚：让利加乔夫主管苏联农业。只有亲自经过这个考验的戈尔巴乔夫，才会给自己这位不久前的亲密战友准备这样一份带毒的礼物。

此后几个月，两位原战友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见面机会愈来愈少，且已失去往日的信任气氛。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受到雅科夫列夫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有害影响。在一次这样的见面中，两人于苏联人民代表会议会间休息时漫步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小径上，利加乔夫提醒总书记说：“您身边有不正派的人。他们会把您毁掉的。”然而，利加乔夫在公开讲话中，包括在1988—1989年的选举运动中，愈来愈多地暗示他的真正批评对象，并不是习惯性的靶子——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而是不久前禁止触动的改革领头人。

20年前始于对“正常化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的、在同一个党的孵化器中培育出来的这两位地区书记之间的友谊，以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公开对抗作为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对利加

---

① 指利加乔夫。

乔夫说，不愿意看到他成为自己的副手。代表大会期间，二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休息室里不期而遇，戈尔巴乔夫说道："你知道吗，叶戈尔，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利加乔夫回敬道："1985年选总书记的时候，我可是投了您的赞成票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他们的下一次见面就晚得多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共产党的原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于1995年应邀到热那亚参加会议。戈尔巴乔夫看来是希望结束两位前领导人之间旷日持久、结果第三者从中渔利的的政治争论，在回应利加乔夫的挖苦话时，提了一个问题："叶戈尔·库兹米奇，您当初要俄罗斯共产党有什么用？是不是为了让这个党跟我作对？"利加乔夫真不愧为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直率的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那是为了抵制您和您身边的人所执行的政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逃往自由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甫告结束，党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对抗立即死灰复燃，这说明尽管表面上戈尔巴乔夫取得胜利，所谓党内团结统一的说法只得忘记了。取消了书记处这一真正的"苏联影子政府"，此举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将利加乔夫推向次要地位。这一看似纯机关的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寓意：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不再充当发号施令的机关，苏联共产党本身也不再充当苏维埃国家实际上的"最高强力机构"。总书记肯定也意识到一旦打掉党内官僚手中的这个工具，他也就砍断了自己所栖身的树枝。因此，1988年他休假归来立即召开的中央九月全会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葛罗米柯去职后空出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就未必可以看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尽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他在玩了几年"民主游戏"之后，又走上了同时兼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的习惯性老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

波夫和契尔年科莫不如此），这里情况却截然不同。获得新的职务之后，他就朝着挣脱亲爱的党和政治局的怀抱迈出了第一步。

这是不是说，法林关于戈尔巴乔夫意在“推翻制度而不是改革制度”的怀疑是正确的呢？是不是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雅科夫列夫的影响之下暗自作出了（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党的病痛已经发展成为不治之症*”这样的最终结论呢？是不是说挽救改革（以及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他自己）的惟一途径，就是为“逃往自由”——取得先是经议会选举、然后是全民投票选出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做好准备呢？换言之，就是逃离以赫鲁晓夫方式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上被“免职”这个挥之不去的幻觉。

要么，即使在力求摆脱一个党——官僚党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依然真心地试图给“第二个党”——普通党员的党提供政治机会？普通党员依然相信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词、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以及并未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也相信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党代表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内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内心里尚未与对党进行更新的想法告别。否则，在面对自己的谋士关于尽快告别他的党内职务的“祈求”时，他就不会依然固执己见，甚至违反逻辑、也不符合加紧了复仇主义劲头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要求，言简意赅地回答说：“*还早了点儿。*”他也不会为当选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党员比例达到85%而感到那么高兴了。这甚至超过了原先为“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联盟”所规定的限额。

1989年3月人民代表选举之后，戈尔巴乔夫当即以这个论据来抵挡政治局委员的攻击，他们感到怒不可遏的是，有30%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总的来说有20% 的党组织书记落选。“*许多人把这当成是世界末日，*”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列宁格勒选民胆敢把州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选下去一事，有些人将其称之为（1917年10革命之后）又一次彼得堡革命。当时戈尔巴乔夫以为，经他唤醒的第二个党通过民主选举，会像神话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显露出来：并未在改革沸腾的大锅里烫坏，却反而变得更加年轻貌

美了。

叶利钦借助 A. 卡赞尼克“馈赠”的名额勉强入选最高苏维埃，此事当时显得很“有利”，因为可以衬托出戈尔巴乔夫的胜利。他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从此即可摆脱那个让他的“律师良心”受到责备的、篡权的党的领导人的不合法身份。国家的政治日历不再以党的全会和代表大会召开日期来确定了，而是遵循他所复兴的议会的生活节奏……

然而，总书记以为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党都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土壤的希望，不久即化为泡影。残留的党的大树，如同加尔洵[①]小说中那棵不幸地冲破暖房的屋顶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完全暴露在严寒之中的棕榈树一样，无法适应开放政治，开始发黄枯萎。戈尔巴乔夫依然给树培土、浇水，只是后来他承认说：“人们一旦明白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不再通过暴力来加强，党立刻威信扫地。”

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撼动共产党党团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那些代表着他的希望的党的人民代表，意识到他们的当选应当归功于自己和自己的选民，而不应归功于批准未来人民代表名单的中央组织部，便开始分别走向两个完全对立的营垒：有些人听命于遗传密码，投奔传统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正统观念的维护者，另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总书记没有作出关于联姻的表示，加入了“怒气冲冲的”激进民主派的行列，戈尔巴乔夫本人将激进民主派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狂人”。

诚然，当时愿意相信苏共奇迹般再生的，不仅是戈尔巴乔夫，而且还有像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这样与党并无瓜葛的议会民主派代言人。“党的复兴已势在必行，”这位著名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当时在致总书记的信中说道，“时间将会表明，党是否具有内部的民主能量实现火山喷发，真正从党的最深处往上、直向戈尔巴乔夫的火山喷发。”

火山并未苏醒。选举应当起到注入病人停止跳动的心脏的肾上

---

①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加尔洵(1855—1888)　俄国作家。

腺素的作用，选举刚过去几个月，戈尔巴乔夫就得出结论说："任何主意和招法，包括允许派别活动都不可能成为抵御官僚主义化和僵化的可靠保障。"

在因雷雨而弥漫着臭氧的改革气氛下"仅仅"才过了五年的时间，从列宁时期就大权独揽地在苏维埃俄罗斯执政的政党的领导人，就得出将他的国家70多年遵循的历史发展模式一笔勾销的结论。假如他在大学学习期间没有研究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和美国宪法的条文，那就可以推论他是独立地、"自发地"发现了分权原则和权力制衡体系的价值和普遍通用性。

如今在总书记与自己的党的相互关系中，"遏制怪物"成了最主要的职能。不错，这方面他愈来愈感到难以如愿。他像一个因为子女和共同挣来的财产而不得不回到讨厌的妻子身边的丈夫，怀着忧伤和必遭灭亡的感觉出席中央全会。他最初身边的人愈来愈多地为他起到了独特的保护层的作用，保护层在密度很高的大气层中化为灰烬，其使命就是预防载有飞行员的飞机温度过高。

雅科夫列夫曾不止一次地成为这一策略的牺牲品，他承认戈尔巴乔夫和任何一位国务活动家一样，有权具有"双重性"，依他之见，否则的话，许多东西都不会有了：既没有1939年问题特别委员会，也不会有斯大林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他干得很认真，不过有的问题他想袖手旁观。如果情况不错，可以介入，如果不成功呢，可以找出罪魁祸首。作为一个政治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雅科夫列夫说，"我只是想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那些不断轮换的战友摊上了不是很值得干的角色：掩护改革领头人，有时要以自己的仕途或者声誉为代价。这当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情。他把他们推到前面当炮灰，自己却躲在"暗处"熬过最严重的时刻，并不急于公开袒护自己的战友，有时让他们充当自杀性杀手的角色，许多人因此感到寒心。那些不管有无充足理由都希望不仅在工作和政治上靠近戈尔巴乔夫、而且同他保持个人友好关系的人，尤其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相去甚远的人，如利加

乔夫和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和法林，卢基扬诺夫和克留奇科夫，就连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怪癖才上了编年史的亚纳耶夫，他们全都指责他“出卖”甚至“背叛”，理由是他在各种（有时为政治上的、有时为个人的）冲突中没有及时地支持他们，没有在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时保护他们，没有出面袒护他们，掩护他们。这里再强调一遍，他们每个人对于当年“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都有一大堆意见。

利加乔夫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的，除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外，还有他在受到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诬蔑、说他在调查“乌兹别克案件”中有贪污行为时，戈尔巴乔夫没有出面保护他。“列宁不在了，”利加乔夫大为感慨，“列宁在与他并肩工作的人受到攻击时，总是保护他们。”谢瓦尔德纳泽感到痛苦，因为苏联总统轻易地任由军界以及对于他们共同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其他人把他臭骂一顿，在讨论第比利斯危机的过程中没有公开对他表示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企图治一治那个毫无顾忌地公开指责他们是叛徒的利加乔夫，却未能如愿。法林则揭发戈尔巴乔夫患有政治上的“恋己癖”、“明星病”。

曾经断言“从个人的角度他不该埋怨戈尔巴乔夫”的雅科夫列夫，自有其特殊的抱怨：原来，在当上政治局委员之后，他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因为总书记没有委托他在例行的列宁纪念日作类似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作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有话可说”的他，认为这是正式的“改革之父”对他的嫉妒，“改革之父”担心这样一来，忠实的讲话稿撰写人会从他的阴影中走出来。

那些必须亲自出来驳倒对其背叛行为的指控的人，对于“主要变节者”又有另外的恩恩怨怨。在克留奇科夫看来，这种“背叛”已经得到证实：根据“及时有效的材料”（显然是指窃听），戈尔巴乔夫在与雅科夫列夫的谈话中承认说，“内心里感到自己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博尔金事先声明他不掌握具体的罪证，则认为这位“蜕化变质分子”在为自己的“西方主子”效力：“他两次在只有美方译员在场的情况下与布什单独交谈，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说法受到戈尔巴乔夫常任译员

帕维尔·帕拉先科的驳斥:情况恰恰相反,有一两次谈话系在美方译员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而当福罗斯的通讯联系恢复时,又“马上跑去给美国总统打电话”。最后,卢基扬诺夫坚信,“戈尔巴乔夫在背叛党的同时,也背叛了自己,也就是背叛了我们所了解的那个80年代的他”。

有些人的抱怨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或是在改革的动荡过程中,或是在事后发现自己曾是他的“手段”,是他用以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之一,需要时拿到手上,当工具坏了或是需要另外一件工具时,便毫不可惜地弃置一旁。回顾往事,很难相信:他的许多公开的敌人曾一度是他的战友,也许还是忠实的追随者呢。如果怀疑这些人个个都是出于官职低者对官职高者的尊敬,或者个个都抱有巴结新领导人以图飞黄腾达的自私希望,那就是把历史和这些人都简单化了。

那么,最初坚如磐石的集体因为什么发生爆炸,大家都各奔前程,甚至前往截然相反的方向,几乎把那个将大家聚到一起的人变成了孤家寡人呢?这应当归咎于历史条件、改革的负载过重、改革之船突然遇到未曾预料的暗滩、舵手“缺乏专业技能”呢,还是应当归咎于他的个人品质?

也许,原因仍然在于戈尔巴乔夫的那个“双重性”?在以诺言将同盟者聚集起来的阶段,“双重性”是个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它就起了致命的作用。也许,全部答案都在“选择”这个词上?看来雅科夫列夫说得对,他认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政治局1988年初实际上陷于分裂的基础:“也就是说,同30年代一样,是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

卢基扬诺夫的说法也自有其正确的成分,他断言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自己”,确切地说是改变了自己,与改革初期甚至当选总书记之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心理上依然停留在80年代初(更不用说他与卢基扬诺夫在莫斯科大学同一个系念书的50年代)的状态,那他作为90年代的国家领导人又有何价值呢?

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说来，原来战友的离去或者疏远，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接一个地失去许多原先的政治朋友和盟友（飞快转动的改革的离心机将他们一一甩开）之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保护层”，失去了左右两边的掩护，仿佛成了没有甲壳的乌龟，在任何猛兽的进攻面前无力自卫。

当然，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孤独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带领国家度过激进改革或者全民族危机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尤其孤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家是否可以享有诸如友谊这样自然的人的情感。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那么至少他的两个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有理由认为自己同他之间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一次脱口而出：“*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然而，就连这些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在面临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危机时也无力抵御。多年的交情并不妨碍谢瓦尔德纳泽于 1990 年 12 月甚至事先不打招呼就公开宣布自己辞职，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将不久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开除出党的决定，竟然毫无反应。

然而 1988 年秋天在更换当时领导成员的位置时，他还以为这是根据国内新的形势对最高权力机构进行改造呢。看来他并未意识到实际上这是在洗同一副牌。这样就使自己的选择受到局限，不仅是选择干部，而且是选择继续改革的政治方案，从而也缩小了纵横捭阖的余地。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囿于习惯的人的圈子和老办法的框框，在与党内保守派进行战斗的同时，并未马上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倡议下进行的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大大扩展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战场，而且从此他势必同新的伙伴、对手和反对者打交道。

随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反对派的出现，改革的后方也开辟了新的战场。从此不能再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了：“群众创造”的篝火熊熊燃烧，升腾的火焰大有将点燃篝火者燎伤之势。

鞭打“老虎”？

改革既然具有“期望的革命”（戈尔巴乔夫语）的面貌，它就在社会中唤起了形形色色的希望。如果说大部分居民是相当模糊地相信可以通过奇妙的跃进一举进入西方标准的繁荣世界的话，那么在社会中最具活力、并未进入党内官僚行列的那部分人看来，改革和任何革命一样，首先意味着“大量的空缺”。由于戈尔巴乔夫出于各种策略上的考虑，迟迟未公布初登政坛的“戈尔巴乔夫的应征者”，那些听够他的讲话、相信自己绝无仅有的机会已经出现的人，便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人人都各显其能，利用这个机会。

相当大一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意识到改革并未带来习惯性的干部更新，却对他们的平静生活构成威胁，便投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开始形成好斗的反改革势力。大多数普通党员则类似解除战时状态的军队，他们丢掉装具和军服，纷纷交出党证或者只是停止交纳党费，成批地离开党的多面堡。共和国的精英们失去了加入联盟官僚行列的前程，也摆脱了先前对发怒的莫斯科的恐惧感，掉头加入如今已是安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

戈尔巴乔夫助长了所有这些多元化自发势力，照著名美国记者斯密特的说法，他就处于“骑虎者”的境地，他的主要危险是从虎背上给甩下来。此外他又成了议会领导人，却并未得到所希望的更多一层保护，反而使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下。一方面，那个经受着政治上的舰船沉没的党愈来愈严厉地要他这个船长作出解释，另一方面，议会中的激进反对派又不耐烦地在旁边推推搡搡。“*民主派指望以其极端主义迫使戈尔巴乔夫保持中派立场*，”当时的一位民主派领袖 C. 斯坦凯维奇直言不讳，“*不许他屈服于党内保守派的压力。*”

他变成具有异国情调的、政治上的半人半马（半是总书记，半是议

长），同时充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领袖，既要吆喝和鞭打一些人，又要勒住和遏制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戈尔巴乔夫极为有趣的政治体验和个人体验，又是惟一有效的推进改革的策略，这种策略得到了补偿，至少他在同时进行的比赛场次中能够在所有的棋盘上获胜之前是如此。然而愈到后来，这样做的风险就愈来愈大，戈尔巴乔夫肯定意识到一旦处在取决于对手出牌的地位，那他自己就有失去主动权的危险。如今改革的节奏和进度表已愈来愈不是由他来决定（他是根据自己的分析、本能和对全国上下对于某种新事物的准备程度的估计来确定的），而是由唤醒的政治自发势力、介入政治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个人的自由游戏来决定，这样一来他与其说是起到主动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起到反动式的作用。

兴趣愈来愈浓的激进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筹码，不仅因为他们急于尽快地切断那仍将国家与不久前的极权主义过去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者是急于让戈尔巴乔夫本人与之一刀两断。他们那愈来愈高的声音和日益强烈的自尊心迫使他正视他们，主要是因为这种激进主义反映了全国上下的焦急情绪，全国上下开始公开地一再要求改革及其首倡者拿出具体的成果来。这时戈尔巴乔夫也亲身体验到实际上所有改革者都无法摆脱的那种厄运的作用：始于良好的愿望而且顺应公众期望的改革，因为仅仅预言奇迹的出现，却通常都不会带来奇迹，徒然增加了不满者的数量，而且往往使这些人调转头来反对改革者本人。

1988—1989 年，感恩知恩的全国上下与改革领头人之间热恋中显露出来的初次异常，并未导致公民经济状况的实际恶化，更未引起国家解体的悲剧性后果，那都是后来的事情。眼下人们开始表现出来的，仅仅限于因为生活迅速得到改善的希望迟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生活当然是“变得更快活了”，却显然并未变得更好，不过可以希望的东西同原来相比是多得多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到自己受骗了，感到自己很不幸。新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这种潜在的进展之所以会以愈来愈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因为由于改革者本身的努力，原来“哑然无声”的社会得到了自我表达的讲台——克里姆林

宫大会堂的舞台、电视屏幕和媒体。

一连几个预警信号，如同伯沙撒狂宴①中墙上出现的不祥文字一样，显露出戈尔巴乔夫同迄今为止准备义无反顾地跟随他的舆论界之间的裂痕。其中第一个、也许因此引起戈尔巴乔夫痛苦的感情反应的，是1988年10月颇受欢迎的《论据与事实》周报所发表的一篇关于民意调查结果的文章，公开性刚刚开始让读者习惯这种方式。其中，“改革之父”的支持率首次不仅低于祖国历史上道貌岸然的人物——彼得大帝和列宁(那还可以忍受)，而且低于他的同盟者兼反对派萨哈罗夫院士。

从第二年起，戈尔巴乔夫的“分数”就不是通过报纸调查的相对支持率、而是通过议会中的投票来展示了。从他1989年春天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仅仅一年的时间，投赞成票的代表的比例由96%下降到59%，而他的当选总统本身，最终是靠诸如雅科夫列夫、索布恰克、维·戈利丹斯基院士和德·利哈乔夫院士之类社会名流向代表大会发出激昂慷慨的呼吁来保障的。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难受的。倒不如说此前近乎宗教的狂热以及围绕着改革及其公认杰出领袖的社会激情的喷发才不正常，因而便昙花一现。然而，戈尔巴乔夫在确认自己与其他居民均出自同一社会土壤之后，对于开始冷却的征兆反应强烈，而且起初还感到委屈。由于《论据与事实》的这篇文章，他要求撤掉总编B.斯塔尔科夫的职务，不过时隔数日，待他冷静下来，也就不再坚持了。

无论如何，在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如今在相当大程度上已是迫于激进派的压力)的情况下，要做到在他所开始的过程中仍居领导地位，除了“鞭打老虎”、试图使改革具有不断革命的特征而外，没有其他出路。为此有一个办法：扩大改革的基础、基座。实际上，他以前所采取

---

① 《圣经》传说，波斯军进攻巴比伦，巴比伦王伯沙撒败退入城，以为可以无虑，正在狂宴时，敌军攻入，将他杀死。

的步骤都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从在最初包括赖莎和最亲密志同道合者在内的"小范围"内讨论改革的意图开始,戈尔巴乔夫便逐渐地将为数众多、就对改革的看法和由此产生的期望而言是五光十色的社会类别和阶层推到风口浪尖上。照他的意图,正是改革的民主化、将改革从办公室和别墅里的计划变成"全民的事业",可使国内的变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可保证变革不出现倒退,保证其不可逆转。

严格地说来,这个战略证明是正确的,它通过了1991年8月的考验,当时莫斯科在改革引航员被扣留在福罗斯的情况下,独立地挫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是带有轻歌剧味道的阴谋。俄罗斯议会、白宫保卫者以及在公开性哺育下成长壮大的媒体,向戈尔巴乔夫证明(对它们自己说来也是个发现),对他上的课领会得很好,从此再不依赖他每日每时的呵护了。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所认为的自己革命(革命开始时并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说的必要的"推动力量")的社会基础的加强,实际上不过是革命的不稳定的政治支柱的扩大,这种政治支柱就是成分驳杂的民兵,他们十分乐意地紧跟领袖去攻打令人厌烦的权力的稜堡。至于说到依靠实际上、或者说首先在经济上与改革的成功息息相关的整个阶层和类别的出现,去改变以至建立改革的新社会基础,那么眼下尚无这方面的迹象。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思考改革失败的原因时,认为首先是因为改革初期"*错过了开展经济改革的不少时间。后来,1987年通过了激进改革纲领,却又缺乏保证其具体落实的耐心、顽强精神、决心和意志*……"还有一次,他的话就不那么文绉绉了:"*经济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未能充分展开,我们在极权主义经济和平过渡到民主经济方面的探索又遭到挫折。*"换言之,又重复了一次布琼尼骑兵袭击华沙的可悲(就当时苏维埃政权的角度而言)经历:辎重队和军需部门拖了后腿,这次预示着欧洲"解放"和欧洲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进攻功亏一篑。然而,是否做过实现这种"经济改革"的尝试呢?

看来，主要的原因应当是所开始的改革的经济方面总是从属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且负有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使命。因此，只要出现使问题复杂化的政治事件，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经济上的决定都不止一次地被取消，或者推迟到美好的时期实施，而由于国内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消退，戈尔巴乔夫就腾不出手来认真地抓抓经济。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平民主义举动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上的后果就很少算计，尤其是当认为这些后果可以很快在政治领域得到补救的时候。

这类从经济的角度看来有害的举措中，无疑应当首推臭名昭著的反酗酒运动，它给改革的财政底部留下巨大的窟窿，后来始终未能补上。离奇古怪的是，在涉及政治改革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并无先例的勇气的戈尔巴乔夫，一遇到某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意识形态禁忌，却莫名其妙地畏缩不前。他的前助手尼·彼特拉科夫院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视野起初超不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自己某些思想激进的谋士提出的关于将集体农庄的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大家的建议，他的反应尤其激烈。这里思想上对于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尊崇是否对他起了遏制作用，他是否受到年复一年在“龙口夺食”中度过的边疆区党委工作时期无法忘怀的经历的影响，要么是顾虑重重的世袭农庄庄员的余音缭绕？惟恐侵入农村的市场自发现象会破坏他所熟悉的固定生活方式。也许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甚至在 1990 年秋天回击自己身边的批评者时，还一再地说：“我虽然赞成市场，可不管你把我怎么样，我还是反对搞土地私有制。我无法把我那搞集体化的外祖父一笔勾销。”在他对于中国的土地反改革成果的不信任评价中，也可以觉出在外孙身上扎根的集体化积极分子对恢复土地私有制的偏见。

然而，如果在现实面前不牺牲（也包括自己的）意识形态护身符，不为了他所获得的主要的上帝——清醒的理智而出卖（“叛徒”就应该如此）自己年轻时的小上帝，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成其为戈尔巴乔夫了。1988 年，在经过三年的试验之后，他放弃了借助“超级拖拉

机”——国家农工综合体振兴一蹶不振的苏联农业的做法，并将新的政治思维引入经济。正如承认东欧各国有“选择的自由”一样，他承认农民有“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不错，在背叛自己原有信念的道路上，他甚至走到了承认“终身租赁、有权作为遗产转让土地”的地步。

经济改革方面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完全沉迷于自己的“政治革命”，起初傲慢地拒绝了关于注意邓小平的经验的建议。他同样拒绝了贝克这个“外人的忠告”。贝克本人当过美国财政部长，他客客气气地开导戈尔巴乔夫说：“改革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快一点付出的好，不要一拖好多年，更不要往后推迟。”可是戈尔巴乔夫听不进去：“我们等了二十年，再多两三年的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谢瓦尔德纳泽向那个头脑迟钝的贝克详细说明了苏联改革家的逻辑：“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经济领域碰到什么问题。但是我国如不改革政治体制，或者说不解放人，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实际的经济改革。”

“两三年的时间”全都花在国家农工综合体、国家验收、企业自治上面，全都用来安慰人——时而安慰反对市场的正统派，时而安慰因面包和通心粉提价而惊慌失措的居民（总书记冒冒失失地许愿说：“不同人民商量，就不搞价格改革。”），直到这十分宝贵的“两三年时间”过去之后，戈尔巴乔夫才来借助为他这位政治家提供营养的农民的良知，他说：“应当让人干活挣钱。”“给老百姓自由，产品就出来了，”有一次他这样向雷日科夫解释说。如今该他心怀嫉妒地大发感慨了：“人家中国人，两年时间就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然而他的新经济说教并未具体化为实际的行动，依旧是空洞的愿望。不仅是1987年中央全会之后，就连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直至1990年年底之前还不想与之发生冲突的雷日科夫政府，也“浪费掉”了各种市场改革的方案，雷日科夫政府连同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五百天计划”一起葬送的，不仅是哪怕从心理上克服市场的障碍的机会，而且还有恢复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战略结盟的政治前景。还是这个彼特拉科夫回忆说，他1990年2月与同僚们共同起草了本应成为苏联首

任总统第一份正式文件的新经济纲要草案。戈尔巴乔夫喜欢这份文件,他"在文件上下了不少工夫",并将草案交给雷日科夫,结果是雷日科夫将其束之高阁。

"两三年的时间"决定了许多东西。自然界,尤其是经济关系的自然界,是空虚不得的。由于缺乏清楚的法律规范,国家对于私有主和私有财产的立场不明晰,以由新企业家、商人、农场主和知识界组成的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改革的社会基础并未形成,改革时期的"新经济"走入地下。与美国的禁酒时期相类似,当然是出于良好意图的改革者反酗酒即兴之作,尚在俄国的"芝加哥男孩"出现之前,就生出了苏联的"芝加哥黑手党"。往后除了酒类黑手党之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等"弟兄"。紧跟他们之后,政治黑手党也理所当然地出现。

他原以为可以借助改革实现列宁借助新经济政策未能如愿的目标——将战时共产主义的、行政命令的社会主义变成"文明合作社的制度",这个打算显然落空了。第一批问世的、根本算不上文明的合作社,在受到平均主义和对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赞扬的熏陶的舆论中引起了狂怒,人们对于"贪图私利者"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无法接受。在一次与居民的会见中电视直播时,戈尔巴乔夫冒失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啊,咱们把合作社关掉?"下面居然异口同声地答道:"对! 对!"

幸而合作社开办人没有受到"取缔",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也没有"没收"。而是羞羞答答地将他们藏到了国有企业的卵翼下面,照雅科夫列夫的看法,其结果是"他们并未养成独立、主动和负责的习惯,却变成了国有经济成分上面的一个吸盘,变成了一台泵,将非现金的预算资金抽取成为黑钱……"

结果是,戈尔巴乔夫曾尝试使之具有政治支柱和社会支柱的这场从上层开始的革命,原来根基很不稳固。精英的积极部分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兴趣,一心追求权力,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笔直的道路就是加入与戈尔巴乔夫分庭抗礼的激进反对派。颇具活力的新企业

家阶层坚信过渡时期经济的“灰色地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致富机会，纷纷投向半合法的和非法的商业活动，将许多党和国家官僚带了进去。不难理解，如此令人可疑的基础必然对于“上层建筑”产生瓦解腐蚀作用，并将其纳入犯罪分子的势力范围。其结果，一面是改革的顶部日益升入改变国家和世界的直上云霄的远景，改革的底部却愈来愈深地“埋入水中”。从某个时刻起，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必然不知不觉地既成为他所启动的进程的牺牲品，又成为某些势力手中的工具，他为这些势力打开了通往真正的权力即经济权力以及暗中的政治影响的大门。

1989—1990 年，除了社会基础之外，改革的政治支柱也开始受到锈蚀。先前的追随者和同路人，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有知识界和大众传媒的代表，他们保持对于戈尔巴乔夫知恩感恩的忠诚的时间最长，如今也开始分别投向完全对立的营垒。苏联共产党以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那底部锯断的树干发出的幼芽自不必说了，它们自然不打算成为总统党。戈尔巴乔夫试图注入活力的苏维埃，却对任何复苏尝试均毫无反应。至 1990 年，总书记兼总统已拥有无限权力，却除了电视屏幕之外，手边竟没有一个传动机构，借助这样的传动机构他可以即便不是大权独揽地管理国家，至少也是对已经展开的进程施加影响。

从党那里夺走的权力从理论上讲会流入的惟一机构，是暂时纯具象征意义的“总统制”。然而，就连这个未及适应新的环境、而且没有多少人明白的权力结构，也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从俄罗斯议会和苏联议会中的激进派，到与之沆瀣一气对总统“危险的独裁主义”进行抨击的“联盟议员团”中的人民代表。

这一切都以离奇古怪的方式发生，恰恰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所提出的目标。他所孜孜以求的事情已经发生：“进程启动了。”改革的反应堆已经开动，如今谁也无法将它关上。如今就连改革的首倡者本人在前进中（他的退路已经堵死）也不能明确地说，他是独立地选择今后的路线呢，还是听命于从背后推动着他的事件。

恰好在这个时期，戈尔巴乔夫在自己最信任的人中间首次提起可能辞职的话题，这也决非偶然。“任务已经完成，”他对切尔尼亚耶夫说道，“人民已经可以独立选择领导人、独立选择今后的道路了。”阻止戈尔巴乔夫离去的是这样一种希望：他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把业已开始的进程纳入理智的正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那些天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进行电话交谈中，也觉察到了这种情绪的余音。

尽管如此，苏共中央总书记依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应尽职责，那已不是对自己的党、而是对全国的职责。在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因而也是合法的新议会准备将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必须让迄今为止执政的政党完全自愿地、而且不作武装对抗地将最高权力让给人民的代表。除了准备了这次行动、依然是惨遭历史性失败的党的军队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而外，没有人可以向党发出撤退的正式信号。他同时签署和接受投降书这件事，使问题略微简单化了。然而，迟迟不进行当众“剖腹自杀”也不应该，与其让例行的人民代表大会逼着党的领导人走这一步，倒不如自己采取主动。

1990 年 2 月，苏共中央举起了白旗。“开始改革”的党，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自己提出关于修改大名鼎鼎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从法律上巩固了共产党作为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地位。一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就只需“满足”苏共关于“根据本人的愿望”免去其苏联社会“领导和指导力量”的“职务”的“请求”了。

早在 1989 年 5 月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在电视机前的全国上下就为前所未有的场面震惊不已：代表大会开幕前，党的“天人和诸神”，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很不习惯地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座位，他们的座位已在会场上其他代表中间，而不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舞台上的主席团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当初就是作为国家和党的隆重庆祝仪式恒久不变的布景而设计和兴建的。1990 年 3 月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新措词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将苏共与“其他政党”都安排

在同一排，如今全党都得被迫离开习惯于当成自己世袭王位的最高国家讲坛。

那么，将党带领到政治上的对马岛[①]的总书记，他是否出卖了自己的党呢？要么，他这是挽救了党，使之免受屈辱，也许甚至使之免受有人提出的纽伦堡审判？何况归根结底，是谁出卖了谁？在发生将总统囚禁起来的政变的一年之前，苏联共产党以至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部不是就已发生了反戈尔巴乔夫反改革的政变吗？

“惟有党不会背叛我，”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书记喜欢面带表情地朗诵中学时代背熟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句。1991 年 8 月 23 日，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辞去党领导人职务的声明，他的解释是：“党的领导人没有谴责政变，没有号召党员起来捍卫宪法。”党的高层在政变期间的表现大体上并不出乎意外：一部没有原先的第六条的宪法，对于党说来就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苏联总统同自己的总书记替身、同早已不再承认他是自己领导人的党最后的、尽管是迟到的分别，却不仅成为苏共多年历史的悲剧性结局，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完整性都具有致命的后果。立陶宛共产党的一位老党员讲道，他有一次同斯大林谈话时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宪法（正式的尊称是“斯大林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呢？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挑动分离主义情绪呢？这可是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啊。”领袖回答道：“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1991 年 8 月的苏联已经不是斯大林治理国家时的那个坚如磐石的大国了。毕竟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发生瓦解。从政变之后到苏联寿终正寝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总统比那个也叫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仅仅多存在了四个月。

---

① 指 1905 年日俄战争中在朝鲜海峡对马岛地区进行的海战。日本舰队打败了俄国太平洋舰队。此后俄国被迫开始和平谈判。

第七章 保住不能解散!

在老房子里

在对戈尔巴乔夫的许许多多指控中,他对其中一条指控作出了特别痛苦的反应,那就是: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这里他坚决地进行了自我辩护,每次都提醒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死守”,是由于绝对不能同意别洛韦日协议和“阿拉木图峰会”参加者解散苏联的决定,才辞去职务的。即使抛开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的问题不说,那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戈尔巴乔夫为联盟奋斗到了最后一刻,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消灭苏联的同时也要取消国家的总统,自然总统的职务也保不住。他曾表示只要能保住“革新的苏联”,他愿意不再谋求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他的这番表白是发自内心的。

不仅仅是主持“帝国瓦解”(当初丘吉尔就曾拒绝担任这样的角色)的可悲前景使他感到压抑:他致阿拉木图会晤与会者公开信中所预言的苏联解体将带来的内政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悲剧性后果,不但全

部言中，而且超出了他本人的担心。如今，一个主要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初这是否可以避免呢？

今天有人问戈尔巴乔夫苏联是否可以保住时，他的回答果断而坚定："可以！"并且进一步明确道：是以更新了的形式——"真正的联邦"或者"邦联"（附带说说，这可决不是一回事）。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就连"联盟"这个术语本身（它使人可以又一次离开在单一制的、尽管是现代的国家与灵活的、模糊的联邦—邦联之间的最终选择）他也很喜欢，他甚至更多地坚持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词的外形。反正这是他的语汇中的一个词，它使人可以不同过去决裂，不硬性割断在联盟中成长起来、曾在战争中保卫过联盟的几代人的记忆和爱国主义情感，同时又不会阻挡通往未来、通往理想的欧亚联盟——欧盟当之无愧的伙伴之路。他断言这样的联盟是可行的，并援引了无法反驳的、尽管并不恰当的理由：如同从未在"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过一样，我们也从未在真正的联盟里生活过。咱们就来试试吧！

那些不共戴天、并从此与他无法分离的、1991 年悲剧性事件中的对手兼伙伴，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捍卫的任务。在可以有各种方案的"保住联盟不能解散！"的提法中，正是这些人主动承担起对此作出总结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当然说得对：他使之受孕、可说是他在新奥加廖沃进程的试管里一手培育出来的新联盟胎儿，就在出生前夕被八月政变残酷地掐死了。他下面的说法也是对的：他那被政变分子击碎的水晶般的梦想——主权国家联盟（有人将这个词的俄文缩写 ССГ 破译为"拯救戈尔巴乔夫联盟"）无法破镜重圆，其责任完全在"别洛韦日三人帮"和顺从地与之随声附和的各共和国议员身上。

然而，他在承认下面这一点时也自相矛盾：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借助"当然是受到布琼尼骑兵和突厥斯坦军区部队的支持"的革命思想，延长了俄罗斯帝国的寿命。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在帝国纷纷崩溃的时代，而且是在他自己创造的新的条件下——列宁思想以及给系上宪法链子的"不可战胜和传奇式的"红军受到诋毁的条件下，保住这最后一个世界帝国呢？

对待联盟的态度问题，正好也是一条主要的界线，它不仅将20世纪最后10年的俄国历史一分为二，而且使得该世纪两个政治性格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泾渭分明。戈尔巴乔夫未能（在政治上）活得比原国家解体更加长久，尽管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解体的速度，他宁愿与权力告别——与联盟之船“同归于尽”；叶利钦为了重返政坛并且升至权力顶峰，则毫不犹豫地牺牲这个联盟。

保住联盟的问题以离奇的方式，也许正好也以合理的方式在改革首倡者以及这个进程本身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恰恰是因为最初的改革计划中没有预见到联盟国家的改革：以为“改革会把一切都安排好”。受到米哈尔科夫国歌歌词熏陶的改革者一代，真心诚意地相信“牢不可破的联盟”的确坚不可摧，相信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将会发现，在极权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冲到表面上来的，不仅有此前受到镇压机关抑制的主张自治和分离主义的思潮、“民族主义者”的反俄情绪以及民族之间的积怨，而且改革所唤醒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也都穿上了民族的外衣。在苏联制度的强力支柱倒塌后，出来取代装潢门面的行政的族际主义的，并不是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内著名喷泉所体现的各民族友谊的和谐统一，而是无法遏制的民族综合症和民族激情的狂潮。主要的“改革者”，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对此毫无准备。

他忽视日趋激烈的民族问题，时间过长地试图坚持“分阶段计划”，根据那个计划，要在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顺利结束之后才轮得上联盟的改革。当各共和国精英希望“一下子全都得到”时，他感到困惑不解，十分恼火，他依然相信俄苏帝国的整个多民族的五彩缤纷可以借助新联盟条约来个“一刀切”。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顺势疗法显然并不奏效，他却依然要自己和其他人相信：在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和中亚的整个辽阔大地上，“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不会支持“民族主义者”。

对于民族因素，对于与其说是作为居民情绪与愿望的自发流露、倒不如说是作为夺权斗争的政治杠杆的民族因素估计不足，这使他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方面，利加乔夫更具有洞察力。他在抵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营垒射向"保守派"的一支支利箭时，试图将其转送给"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他正是宣称这些人为"改革的"真正"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利加乔夫本人和哪方面都"不对的鲍里斯[①]"在其与戈尔巴乔夫对抗中，其实都从他们对于民族因素之政治潜力的发现中得出了实际上同样的结论。利加乔夫是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派别作为武器投向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则是跟苏联总统玩民族主权、首先是俄罗斯主权的游戏。

在思考对于他背后熊熊燃起的大火反应滞后的原因时，戈尔巴乔夫往往向自己和身边的人作出完全清醒的甚至严厉的评价："主要的敌人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在与当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帕吉阿什维利促膝谈心时说道，"就是在那些年过五十甚至年过六十的人身上。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我们身上编好的是当年工作方法的程序。"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我们在往前看时，仿佛是将头伸到了窗外，身子却依然留在'老房子'里。就是说，视野也受到了限制。"

为视野的局限，很快就会付出痛苦的发现和丧失宝贵时间的代价。如果说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卫国战争40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大概完全真心诚意地赞同他所继承的已成为"新的社会和族际同一性"的"苏联人民统一大家庭学说"，那么数月之后，在审定苏共新纲领时，他已经提醒谨防那种预言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融合"成为统一的"苏联民族"的提法，而到了1987年1月，他就对那些以"宴会上祝酒词"的方式来论述民族问题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然而，对他说来往往问题并不在于正确的评价，而在于及时的行动。至于说思想上依然居住在苏联这所"老房子里"的不止他一人，那只能是有限的安慰。就连长期处于民族问题最集中的区域的地方干部，如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当时的出发点也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彻

---

① 指叶利钦。

底解决”，对于民族问题可能以悲剧性的方式爆发毫无准备。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都时间过长地相信，屡屡使得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民族冲突只不过是令人遗憾的误会，可以通过回到“列宁的民族政策”来解决。关键时刻可以借助直接“面向人民”来解决。有几次形势复杂时，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和戈尔巴乔夫采取这个办法都获得成功。1988 年 11 月格鲁吉亚首都局势激化，戈尔巴乔夫向格鲁吉亚知识界发出口头呼吁，“此后人们在第比利斯大街上相拥而泣。”

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他依然相信民族问题可以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总背景下得到“一揽子解决”，并试图通过自己的电视讲话、告人民书或者致信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来扑灭卡拉巴赫、波罗的海甚至（在决定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前夕的）乌克兰已经熊熊燃烧的大火。

自然，没有哪个新领导成员去仔细听取“来自过去的人”——葛罗米柯的插话，葛罗米柯没有忘记过去是如何维护“统一大家庭”的和睦的，他时不时地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容反驳地说：“只要大街上一出现军队，就秩序井然了。”也许正是因此，未得到重视的民族问题才最终引爆了联盟，而世界如今已根据苏联的经验、而不仅是南斯拉夫的经验得到了对于一个出色表述的证明，那表述是波兰记者兼持不同政见者 A. 米赫尼克一字一顿地说出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与此同时，民族火焰熊熊燃烧的火舌肯定使戈尔巴乔夫感到警觉。它们表明：因莫斯科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惊慌失措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势家族，将要不惜一切手段进行自卫。反莫斯科情绪的“干柴”（这在加盟共和国总是很充裕的）甚至不必特意储备：只需将火柴往跟前一凑即可。

第一个将火柴凑近这个易燃物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1986 年 12 月，在欢送一位资格最老、最有权势的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金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光荣退休”（甚至没有邀请他参加讨论此事的政治局会议）时，戈尔巴乔夫任命接替该职

的是熟悉的乌里扬诺夫州州委书记根纳季·科尔宾，此人从未在哈萨克斯坦生活过。此前几年他曾在格鲁吉亚任谢瓦尔德纳泽的“第二把手”：根据组织部的标准，这个经历足以使他应付任何加盟共和国的特点。

按照苏联的标准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决定无可挑剔，表面上也顺理成章：他需要完成政治局最后几名干部的“清洗”工作，而谁都知道，“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多大的程度上依靠共和国的“大臣”与中央之间的“协议关系”体系。第一书记们保证自己的共和国效忠莫斯科，作为交换，莫斯科对于他们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实际建立的专制制度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其实，安德罗波夫即已开始摧毁勃列日涅夫体制的这些支柱，他曾经责成利加乔夫调查“乌兹别克案件”，当时认为这不仅是莫斯科对于塔吉克“巴依”[1]拉希多夫的严厉警告，也是对于其他共和国书记的严厉警告。戈尔巴乔夫着手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自己的”清洗时，至少有两点没有估计到：第一，试图同时挖掉建立在家族关系和贪赃枉法基础之上的体制并唤起社会和政治激情的狂潮，至少就意味着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第二，用从其他地区派来的“外人”取代已在民族土壤中留下培养蘑菇的巨型温室的加盟共和国“教父”，绝对不像在莫斯科、在老广场和卢比扬卡[2]的监视下进行此事那么简单。

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显然并未做好准备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松散流沙的第一次入侵，其结果是在驱散数以千计的哈萨克青年时二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青年人当时紧随“战争与劳动的老兵”之后走上阿拉木图街头，抗议任命非哈萨克人做共和国首脑。在这些并非自发的骚动背后可以感觉到一只坚强有力的手，操纵者即便不是下台的73岁哈萨克领导人，也是那些想向莫斯科表明共和国效

---

① 巴依系十月革命前中亚一带的大财主、大地主、大牧主。

② 老广场系苏共中央所在地。卢比扬卡系克格勃总部所在地。此处分别暗指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总部。

忠中央的合同可以废除的人。

继阿拉木图之后，不久前还不可思议的民族之间的悲剧性事件就在我国的各个地区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随着人们以及全新的、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问题纷纷“走上街头”，改革时期遇害者的名单也不断地扩大。地方精英挑起的、旨在“显出凶相”和表示中央的影响有限的族际冲突，仅仅是改革唤起的民族主义火山的第一次喷发。新政权的五花八门的反对派（从极端保守派到极端民主派）比新政权本身迅速得多地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人人都可利用的廉价燃料，可不难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以便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

在街头骚动和集市骚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示威，于是从此刻起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政治的形式，开始愈来愈露骨地向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挑战。闯入他所提供的舞台的，压根儿就不是他所邀请的演员。1987 年夏天，舞台就被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擅自霸占了，因为他们既没有公认的权利，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地域：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斯大林时期以与德军合作的罪名将他们驱逐出该地区。因为鞑靼人的示威是在莫斯科、当着全国和外部世界的面进行，而且是有组织的，就很难将其说成流氓或者极端分子的越轨举动。戈尔巴乔夫面临抉择：要么违背他在讲台和电视屏幕上亲自宣布的原则，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要么寻求政治解决。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

鞑靼人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牌走上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街心花园安营扎寨，当时派出“苏联总使者”葛罗米柯去与他们谈判。他在丰富的外交实践中尚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以他为首的委员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的指示颇具新时代的气息，却很难落实。戈尔巴乔夫说道：“我们应当承认人们上街提出自己要求和口号的权利，然而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极端主义的习气必须制

止，不可将公开性与放任自流混为一谈。不过也不要将讹诈者等同于鞑靼民族。"

当葛罗米柯要求更具体的指示以便用于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收场"时，政治局会议上的辩论兜了一大圈儿，涉及到所有的方案（允许迁回原居住地、为他们专门划出新的地域、实行安置配额等等），照例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就是说"暂时"一切维持现状。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戈尔巴乔夫在辩论的最后说："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一切都应当认真考虑。我们不能把克里米亚给鞑靼人：那个地方过去这些年变化太多了。应当呼吁人们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

主张维持现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继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之后，紧接着还得解决将梅斯赫季-土耳其人从乌兹别克斯坦迁至格鲁吉亚、被驱逐的印古什人以及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返回自己家园……的问题。尽管两星期之后，听了并不清晰的承诺便安静下来的鞑靼人没有过多地埋怨便被遣送回家，有一点很清楚：他们的行动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高加索怪圈

果然不出所料。早在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正忙于同保守派算帐，忙于勾划他的改革—革命随后几个阶段的进度表，刚刚打好基础的改革大厦就从位置相向的两头同时着火：一头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熊熊烈焰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一头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争取独立的运动渐成气候。再次发生流血事件，出现了成百上千的首批"改革难民"，开始了"民族清洗"（亚美尼亚人逃出阿塞拜疆以及亚美尼亚排挤阿塞拜疆人）。绘有"列宁的各民族友谊"图画的装饰镶板正面出现了大裂缝。然而，自幼在高加

索山麓长大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可怕的是他的航船刚刚驶离码头，就碰到了实际上无法解决的世世代代的偏见和激情的暗礁。

就在苏姆盖特大屠杀前夕的2月26日，他又进行了一次说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兼民主派的绝望尝试，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卡拉巴赫运动的鼓动者——女诗人席尔瓦·卡普季吉扬和记者佐利·巴拉扬。是雅科夫列夫带他们来见面的。戈尔巴乔夫申斥民族主义者，说他们“*从背后给改革捅了一刀*”。他劝说他们，恳求他们不要提出将卡拉巴赫合并到亚美尼亚的问题。他警告说：“*想一想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吧，那儿有50万亚美尼亚人哪！*”又威胁说：“*要是陷入纷争和不信任的漩涡，历史是不会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强调了作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牧师的知识分子特殊的道义责任。

当时戈尔巴乔夫本人，尤其是赖莎，几乎是虔诚地相信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那使人变得高尚的天职和政治潜力，把知识界代表看成自己民主改革的忠实盟友。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最尖锐的时刻，他提出吁请萨梅德·武尔贡、拉苏尔·加姆扎托夫、院士维克多·阿姆巴尔楚米扬以他们的威望来帮助政治家，这绝非偶然。正如苏联空间里许多其他族际冲突一样，这起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关于知识界精英行为的观念有多么浪漫甚至天真。一旦事情涉及到族际纠纷，“精选的”知识分子与坚定的民主派就会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戈尔巴乔夫的交谈者往往都是如此，在两个小时的促膝交谈后，卡普季吉扬和巴拉扬为他的魅力、坚决和论据所折服。告别时都保证说忠于改革，他们都相信改革领导者的话，并保证说决不使卡拉巴赫问题激化，以此换取对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权利的保障。“*只是别提出领土问题，*”在办公室门口分手时，戈尔巴乔夫又重复了一遍。和往常一样，顺利结束的谈话给他造成了问题已经解决的感觉。2月27日和28日，苏姆盖特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苏姆盖特的“血腥篇章”（两天之中市内有32人野蛮地惨遭杀害，其中亚美尼亚人26名）像一道深红色的痕迹将改革在道义上的声誉

一笔勾销：几家西方报纸都登载了一幅画，画中戈尔巴乔夫的前额上长着血红的胎记。戈尔巴乔夫仿佛是个已被击中却并未倒下的拳击手，他试图作出一副并未发生任何无法补救的事情的样子，呼吁保持冷静，警告不要采取镇压措施，建议向双方的人民发出公开信。“凶手必须追究，”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过要以正当和委婉的方式行事。我们不应当激动不安。”他认为苏姆盖特事件是反改革势力和地方黑势力针对他本人的阴谋，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考验”。

假设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他的民族安抚政策显然并未经受住这次考验。多年之后，两位性格不同且政治观点各异的人，两位前部长——一个是前国防部长亚佐夫，一个是前内务部长巴卡京，他们各自就此发表的看法竟完全相同，那就是：屠杀者逍遥法外，再加上极端主义者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和挑唆性的号召，后来便引起了暴力升级，新的为数更多的受害者也随之出现。

为了对敌对双方进行劝解，戈尔巴乔夫玩起了他所钟爱的两套人马游戏，他以自己的名义同时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分别派到巴库和埃里温去。因为两人都仍在与对方争斗，两人所阐明的莫斯科的观点就相互抵触，互相矛盾。结果，戈尔巴乔夫无论在哪个共和国都被当成说话不算数的人。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为武装对抗，国家元首决定自1988年8月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自己派驻斯捷帕纳科尔特的“全权代理人”。

他是否有一个解开卡拉巴赫死结的具体计划呢，要么也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只是希望激情平息、发热的头脑清醒过来、一切都“烟消云散”？再说，当时是否存在走出卡拉巴赫死胡同的合理的出路、“第三条道路”呢？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非回到传统的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苏联方式，亦非戈尔巴乔夫式的保证接受两个共和国领导人彼此谈妥的“任何提法”。沃尔斯基认为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戈尔巴乔夫丧失了这个机会，就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极端分子。沃尔斯基把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罗波夫作了个比较，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个极好的、正直的人，很强的政治家，却是个蹩脚的国

务活动家。他没有勇气拍桌子。我在斯捷帕纳科尔特的危机形势下向他求助时,他居然会说:‘紧急状态的事情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989 年 11 月,沃尔斯基结束了毫无成效的使命,返回莫斯科。对于中央说来,这个结果等于政治上的失败。

此时,民族的联盟地图上令人不安地闪烁着的,已不仅仅是卡拉巴赫,而是一长串红色的灯泡。1989 年 4 月 8 日夜间,第比利斯出现了爆炸性局势。外高加索军区部队和内务部队驱散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支持者的游行,这些人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并同时取消阿布哈兹自治,此次冲突造成多人伤亡(19 人死亡,其中以妇女为主,数百人受伤)。第比利斯悲剧演变成为尖锐的莫斯科政治危机。

关于格鲁吉亚首都局势白热化的消息,戈尔巴乔夫是晚上 10 点从伦敦返回莫斯科后得知的。在弗努科沃 2 号机场召开的礼仪性政治局"巡回会议"上,他听取了克格勃主任切布里科夫的汇报,切布里科夫以忧郁的色调描绘了形势,并通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部队发出的指示,那些措施系政治局委员下午在利加乔夫处开会时商定的。在听取了由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和切布里科夫组成的"三套马车"(戈尔巴乔夫在出访期间未留下任何人"看家")的意见后,他吩咐谢瓦尔德纳泽和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在征得朱·帕季阿什维利的同意后乘飞机前往第比利斯。作为原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继任者的帕季阿什维利,显然不希望莫斯科的空降兵前去"支援"他。谢瓦尔德纳泽在与他电话交谈之后,推迟了自己的行期,也劝拉祖莫夫斯基不要去。帕季阿什维利决定利用"赚来的"延期,以"自己的力量"调解冲突。当天夜里,在挤满集会者的政府大厦前广场上发生了流血事件。

这事儿谁也怪不着:刚刚回国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不在时作出的决定无关。次日前去休假的利加乔夫具有百分之百不在现场的证据。谢瓦尔德纳泽"没有赶上"倒霉的日子。只得追究使用工兵锹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员了。

然而所发生的事件给戈尔巴乔夫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首先是第比利斯事件给数周之后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投下了阴影，使其政治上的胜利黯然失色。在格鲁吉亚，四月悲剧将帕季阿什维利的政治生涯一笔勾销，再次衬托出他的前任谢瓦尔德纳泽的优点，却又为他的死敌、反对与莫斯科结盟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铺平了上台执政的道路（两年后，维尔纽斯事件也以大致同样的方式将兰德斯贝尔吉斯变成了英雄和立陶宛民族无可争议的领袖）。

在戈尔巴乔夫最贴身的几个人中间，严重的个人冲突使利加乔夫彻底地站到了对立面，谢瓦尔德纳泽的议会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利加乔夫为这一悲剧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从此，国家元首与军界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受到严重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把军队推出去当炮灰，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

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山区的崎岖道路经过了苏姆盖特、斯捷帕纳科尔特、埃里温和第比利斯还不算完，最后还有一个巴库。将莫斯科和巴库推向1990年1月悲剧的，有离开亚美尼亚、在巴库市郊的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安营扎寨的数千难民，有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冲突，自然还有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责备自己的同胞，说他们比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落后，甘当克里姆林宫温顺的仆从。大约在巴库事件一年之前的1989年5月，当时第比利斯悲剧还记忆犹新，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我们曾经承认即使在对外政策中武力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至于对内就更不应该、也不会诉诸武力了。*”这样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于是他自己就在无意中鼓励他们抓住他的话不放或者迫使他推翻自己的说法……

从1989年年底开始，巴库的空气中就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流血事件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的辅币。只要有需求，供应不成问题。当时阿塞拜疆（看来，莫斯科也一样）太多的人需要流血，需要出现人员伤亡。有些人是为了借此激发社会舆论，使之把矛头对准“搞镇压的中央”。

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的例子说明,同莫斯科的对抗愈激烈,愈带悲剧色彩,民族精英招募新追随者的可能性就愈大。有些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挑动联盟当局采取强力行动,以便洗去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身上苏姆盖特屠杀的污点。还有一些人则是想给戈尔巴乔夫上一堂"严肃"的国家政策课,向他暗示在治理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时,优柔寡断、威严不足(这是利加乔夫让大家普遍使用的术语)是不能容忍、无法饶恕的。当如此五花八门的势力都得出结论,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劈开纠缠不清的政治死结时,暴力事件的发生就为时不远了:为政治家、为极端主义分子效力的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基本教义者"和挑衅者总是富富有余。

从11月份开始,人民阵线组织的群众集会此起彼伏,几乎遍及全阿塞拜疆、尤其是它的首府。同联盟当局的对抗愈来愈具有挑衅的架势。曾有过几次摧毁苏伊边界边防建筑物的尝试,开始拦截定期行驶的长途汽车,拦截火车。地方当局和联盟当局目睹所发生的事件,却仿佛处于昏睡状态,按兵不动。会议、发往中央的密码电报和反馈的电话、关于举行谈判的呼吁、人民阵线领导人"预防性"的规劝不计其数,连人民阵线领导人自己也失去了对于事态的控制。为防万一调去增援当地民警的苏联内务部队(11000人)未对事件作出反应。不知是因为上面没有命令,还是因为阿塞拜疆领导人中间发生了分歧:有人同情民族主义者,有人则等着瞧,看这一切将如何结束。果然不难猜到,结局极其糟糕。

1月13—15日,一股反亚美尼亚和反俄罗斯的屠杀洪流席卷巴库。然而,甚至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然犹豫不决,迟迟不采取出兵这一他所预感到的非常不幸的决定。亚佐夫认为,总书记是想"躲避风头","保持一身清白"。更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强力部门的部长们愈是施加压力,派往巴库的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政治空降兵的汇报愈是显得绝望,他便愈加清楚地意识到使用暴力的决定性一步只要迈出去,那无论对他和对改革说来,都意味着不仅越过了政治界限,而且也越过了心理界限。

直至从巴库传来关于狂暴人群的兽行的消息(把人从高层楼房的顶层往下扔,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直至被围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楼前竖起了(象征性的?)绞刑架,戈尔巴乔夫才屈服于帝国执政者的传统命运:派亚佐夫和巴卡金前往巴库平息骚乱。临行前,克留奇科夫甚至雅科夫列夫都嘱咐他们要克服"第比利斯综合症",表现出"坚决果断"。两位部长不仅要国家元首口头上的委托,而且要法律委任状——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戈尔巴乔夫本来尝试像在卡拉巴赫那样拿"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行事"来搪塞,然而两位部长拒绝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出兵,从巴库那边、仿佛从沉船的甲板上传来普里马科夫又一次求救的信号,通报说人群准备猛攻,这时戈尔巴乔夫下了决心:"你们先去,命令随后就到。"又拿起电话,对卢基扬诺夫说:"阿纳托利,搞一个条文。"

在签署命令之前,戈尔巴乔夫又采取了一个看来是绝望的步骤:给一个人去电话,并非期望得到他的帮助,多半是有理由猜想此人正在幸灾乐祸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就是盖达尔·阿利耶夫[1]。阿利耶夫当时实际上在莫斯科处于被软禁状态和克格勃的监护之下,照阿利耶夫本人的说法,戈尔巴乔夫将巴库骚乱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并要求他对事件施加影响。这位前政治局委员自然回答说,他同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当初曾让他紧随库纳耶夫之后退休的总书记,未必会期待听到另外的回答。

1月19日晚上,巴库电视中心动力机组发生爆炸,就连人民阵线中打算呼吁居民、首先是妇女儿童离开街道和广场的温和派领导人,也失去了对于事态的控制。城市完全处在进攻的军队和——自发势力的控制之下。新的鲜血溅到改革及其领导人的旗帜上。流血事件

① 盖·阿·阿利耶夫(1923—2003)　1993年起任阿塞拜疆总统,两度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9,1983)。1967—1969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69年起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是各个政治营垒中最极端的的势力所希望和挑起的，阿利耶夫借此洗刷掉自己从前的过错，他可以将自己多年的过失归结为新执政者的“罪行”，从而为自己开辟重新掌权的前景。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整个这段悲剧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一个政府如果在极端情况下不使用武力，就无法维持……”这段话在书中是划了着重线的。他所得到的教训的代价是（根据官方报告）121 人死亡，700 人受伤，数十人“失踪”。

在“波罗的海人链”的束缚下

1990 年 1 月对戈尔巴乔夫说来十分难熬。就在巴库悲剧的前夕，他不得不既在思想上、也在肉体上赶到如同破烂不堪的旧被褥一般的帝国的另一端——波罗的海沿岸去。因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的非常中央全会，将总书记“派往”维尔纽斯，让他亲手对叛乱的党组织整顿秩序。

戈尔巴乔夫怀着战斗的甚至昂扬的情绪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前往立陶宛。克留奇科夫（也许当时已在着手为下一个“维尔纽斯一月”——1991 年作准备吧[①]）给他提供的情报令人感到宽慰地大讲特讲（站在苏共的立场上的）以布罗基亚维丘斯为首的临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影响日益扩大，而博尔金所挑选的来自各地的电报和“劳动集体”的呼吁书又证实：不仅占少数的操俄语居民，而且许多立陶宛人都“支持联盟”。

自然，此行不会轻松。然而这样的政治挑战倒是对他起了激励作用，而此行可与他直接面对最高苏维埃或者中央全会怀着敌对情绪的听众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他调动和展现了自己优秀的领袖品质。至

① 1991 年 8 月，克留奇科夫参与了八月政变。

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戈尔巴乔夫一心在解开"立陶宛死结"的过程中，既给以阿·布拉藻斯卡斯为首的当地党领导人，也给莫斯科那些咄咄逼人的批评者上一堂高级特技课，莫斯科批评者指责他纵容民族主义者和"威严不足"。

戈尔巴乔夫在临行前对自己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说："明白吗，我根本不能向他们让步。"这句话不仅反映出习惯于取胜的统帅一心为联盟而拼搏的决心或者逞强，也说明他深知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赋予他这个"无法完成的使命"就使他面临严峻的抉择。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 年 1 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

唉，这大概是凯歌行进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像冒冒失失地入侵俄国的拿破仑那样，铩羽而归。莫斯科既未盼到民族主义者的"带发头皮"[①]，也未见到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全会报告自己是如何说服和调解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和整个共和国、如何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轻率"的步骤。他只得向自己保守的后方和俄罗斯舆论表明，为了阻止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苏联分离出去，他已经认认真真地用尽了一切可以使用的论据和政治方式，下一步只能是使用武力了。

此行终了，难得心情抑郁的戈尔巴乔夫在机场与布拉藻斯卡斯告别时，只得请他们待"有关法律制定出来"再作出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心情抑郁有两个原因：他不但无法达到最初定下的目标，而且发现已经忘记如何创造政治奇迹了。就连他的对手也并未感到幸灾乐祸，他们从电视中看到戈尔巴乔夫如何忘我地为苏联而斗争，明白他们自己未必能做得更好。至于盟友，则对他进行安慰。在继续进行的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苏联人民演员乌里扬诺夫说道："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打算大动干戈，他没

---

① 旧时印第安各部落中的一种风俗，从杀死的敌人头上剥取带发头皮。

有违背自己的信念，他明白武力、暴力、镇压无法解决问题。可是他为坚持这个方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据布拉藻斯卡斯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在得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的决定后，晚上给他去电话，他当时与妻子正在看戏，戈尔巴乔夫一上来就是呵斥，口气强硬地说："阿尔吉尔达斯，你在那儿都干了些什么？"在访问（顺便说说，这是有史以来苏共中央总书记首次访问立陶宛）中，他的进攻性的战斗情绪起了变化。起初他还希望说服、压住以至吓唬自己的交谈者和听众："我希望你们考虑。立陶宛一旦退出苏联，就会置身于历史之外……"然而，他的论据和呼吁几乎四处碰壁。他高声说道："还不到砍掉缆绳的时候……你们批评的是昨天、昨天的政策、昨天的观点……"立陶宛人知道，他无法保证那不会是明天的东西。布拉藻斯卡斯认为，戈尔巴乔夫心理上的转折出现在离开立陶宛的前夕，当时他向知识界发表讲话，不知是第几次问道："难道大家都想退出吗？"这时听到的是全场异口同声、强有力的回答："是！"

戈尔巴乔夫、布拉藻斯卡斯和赖莎三个人同乘一辆车。一路无话。后来戈尔巴乔夫没有冲着任何人、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是怎么了？"又毫无停顿地接着说："应当喝两口酒。"在机场告别时，他眼睛看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是的，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的东西，还有待于莫斯科党的官员以及全国其他人去领悟，戈尔巴乔夫在他们面前负有保住统一的联盟的责任。不过看来戈尔巴乔夫本人直至来年一月的维尔纽斯事件之前，还不准备最终承认自己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失败。由此就出台了一整套对立陶宛（通过它也对其余波罗的海国家）施加压力的措施，那是 1990 年他自己或者是在他周围的保守派的逼迫下采取的。

重新审视多年形成的信念以至同幻想告别，总是一件难事。决非所有的政治家都能做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顽强地坚持自己关于国家的"苏联"观念，并准备借助他监督下的整个国家实力来捍卫。早在 1989 年 11 月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就提出用燃料价格来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强留在苏联的版图之内。布拉藻斯卡斯在立陶宛议会

宣布独立的一周之前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疲惫地挥手说道："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可是你们很穷，你们自己一无所有。离开其他共和国，你们可怎么过，你们会伸手要饭的！"

后来，又试着往联盟的经济桶箍钉上法律的桶箍：1990 年4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独立宣言的四周之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早已许诺的《关于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有关问题的解决程序》法令，所规定的"离婚"手续像名称一样地繁琐，使退出苏联实际上无法办到。对立陶宛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中规定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以及事实上的对某些极其重要的商品（直至药品）的禁运。若干联盟企业的劳动集体仿佛是自发地声明拒绝向该共和国提供自己的产品。

不久前还不无狡黠地颂扬戈尔巴乔夫的立陶宛议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本来已经说起"斯大林的幽灵在克里姆林宫游荡"之类的话，然而，他的美国后台以及科尔、密特朗相当严厉地制止了他，他便往后退了。"戈尔巴乔夫确实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过我们，"布拉藻斯卡斯更确切地解释说。他依然对于前苏联总统怀有明显的同情："他当然很难解决主要的矛盾：既保住统一的国家，又赋予共和国新的权利，因为他在这方面已经再无任何杠杆和工具。"

1990 年冬季的立陶宛战役失利，对于戈尔巴乔夫说来，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一大打击。这个教训值得深思，因为联盟的未来命运依然是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在立陶宛之行以前，对他这个典型的苏联人和千百万他的同胞说来，"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这句国歌歌词便是苏联的具体体现，俄罗斯自然是"平等共和国"中的第一个。当然，每个共和国都可能有自己的极端主义分子，有些地方还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不负责任的政治家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激情，但他们肯定只占少数，而"劳动者"并不认为联盟是个负担，肯定珍视联盟，并在必要时起来保卫，就像在卫国战争期间一样。

基于对联盟的这种认识，戈尔巴乔夫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所设想的民主化在为大多数人创造表现自我的条件的同时，可以使极端主义

分子陷于孤立,因而便"对联盟有利"。这个无可挑剔的公式,正如政治中的公式一样,实际上并未在哪个共和国中显示出来。它对波罗的海三国则根本不适用。原来,与布罗基亚维丘斯、克留奇科夫、博尔金等人的保证相反,不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而且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

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不同,波罗的海三国并无武装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并无屠杀,并未发生流血事件(后来是中央派来的部队血染街头),因此也找不到诉诸武力以便恢复"宪法秩序"的有力理由。这几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中央巧设陷阱:它并未逆改革的潮流而动,而是顺应改革的潮流,迫使戈尔巴乔夫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承诺,它比他的进度表和他所提出的运动速度仅仅快一步。但这一步就足以使改革在波罗的海三国"走错步子"。

立陶宛出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代表几乎与新出现的"萨尤季斯"一样地代表立陶宛共产党。"萨尤季斯"的领导人兰德斯贝尔吉斯1988年秋天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道:"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改革新时代,只有当原先成了谎言的话语具有另外的含义时才有意思。"

在这位职业音乐家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他们的混合乐队仿佛是照着戈尔巴乔夫的乐谱在演奏,速度上却稍稍快一点,这样就使总书记的整个联盟交响曲走调了。戈尔巴乔夫试图给他们的热情降降温,以不要超前的呼吁和创建一个新的真正的联盟——"我们尚未在其中生活过的"联邦的许诺来遏制最迫不及待的那些人,这时他至少有两个情况没有估计到。

第一,对于大多数政治家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说来,改革和这样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出现本身,仿佛是云层中突然出现的一线光亮,一扇"可能性之窗",它会随时砰然关上。根据痛苦的民族经

验，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更了解帝国官僚和联盟的镇压机器会有怎样的举动，因此对于“1991 年 8 月”随时可能来临，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更有心理准备。

第二，在立陶宛之行以前，戈尔巴乔夫看来简直无法想像在苏联的版图内还有这样一些共和国，确切地说是整个整个的民族，他们既不愿意同俄罗斯生活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旧联盟内，也不愿意同俄罗斯生活在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内，他们为自己的解放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他试图用所提供援助的数字、他们的经济“完全依附于”联盟其他共和国的资料以及关于经济崩溃的预言来影响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做法，便无法奏效。

至于这个对于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地区许多人说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一大发现，那是自有原因的。戈尔巴乔夫在多民族的俄罗斯南部边疆长大成人，并受到修辞上无懈可击的国际主义思想熏陶，他多年来都认为苏联是零星分布在其领土上的大小民族共同生活的自然形式，这些民族在漫长的俄国和苏联历史上相互通婚，血脉相连。

他还得意识到波罗的海人在历史、文化以至文明方面对于东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欧亚混合体的排斥。他也没有估计到他们的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与其他“苏联民族”的记忆不同，对他们说来，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现实经历以及由斯大林的“合并”引起的震撼依然记忆犹新，尽管俄罗斯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有阿尔奇·布朗注意到的相当重要的经济特点：当波罗的海三国居民将自己的生活水平与邻国作比较时，他们在苏联的板墙外所窥见的，并不是与其毗邻的高加索和中亚等“第三世界国家”，而是生活顺遂的芬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内心里设想自己处在人家的地位上。

在多年党内的生涯中，戈尔巴乔夫习惯于将整个苏联领土看成均匀地染成单一红色的六分之一陆地，他并未立即意识到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际法地位特点，它们是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基础上被苏联兼并的，对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很快向他提醒

这些历史教训的，不仅有一致声明废止其前任关于加入苏联的决定的维尔纽斯、里加和塔林的新议会，而且有他的外交伙伴，首先是美国人。

不仅自发的国际主义者戈尔巴乔夫，而且还有他那些就国际法角度而言更加受到职业束缚的谋士，都需要时间来证实：在各方面都平等的苏联各共和国中，有“欠平等”的、或者至少是对幸福的全苏联未来说来已无可挽回地失去的共和国。沙赫纳扎罗夫回忆道，新总书记起初在思考苏联的改革时，自然是指望将所有的共和国都保留在内：“后来，当我们明白，由于波罗的海人的执着和外来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这个想法在他们那里行不通时，便对自己说：‘咱们把其余的留住吧，何况似乎国内国外都没有人打他们的主意。’谈话是以这样的术语进行的。顺便说说，美国人清楚地暗示，除去波罗的海三国之外，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是我们的事情，他们对于破坏这些共和国的稳定并无兴趣……”

另一位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写道，他本人的大彻大悟是 1989 年夏天的事情，当时一条由 50 万人组成的“波罗的海人链”将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波罗的海三国五分之一的居民走上街头，在时隔 50 年之后对当时尚未找到的苏德条约秘密议定书附件投了事后的反对票。“我当时对自己说，要阻止他们退出苏联，只有动用坦克了。”

“波罗的海人链”紧紧地套在戈尔巴乔夫的脖子上。他在立陶宛所上的一课，其意义在于提醒他：当他凭着智慧、本能、直觉、天生的清醒理智猜到（和预先猜到）历史进程的方向，遵循这个方向并且为历史扫清道路时，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政治奇迹，而且是真正的、不带引号的奇迹。一旦他开始偏离历史的神秘航道，试着往后退时，他的手指便失去了魔力。戈尔巴乔夫面临对他说来是艰难的抉择——继续改革还是保住苏联，他当时选择了苏联，希望计谋能够成功，同时又不会牺牲改革。于是他走上了两者全都输掉的道路。向他预报这个前景的，又是维尔纽斯——对他说来在劫难逃的、1991 年的维尔纽斯。已经不只是红色灯泡、而是警笛通知他正在驶向礁石时，戈尔巴乔夫下

令“全速后退”。然而，为时已晚。

俄罗斯牌

禀性各不相同的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三国，在1989—1990年成了改革那广袤政治空间中第一批民族紧张局势最严重的地区。这是任何帝国（苏联这个从殖民主义俄国变化而来的意识形态帝国也不例外）所固有的特点：边疆地区比中心地区“醒悟”得早。当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以其改革的呼吁不断搅扰俄罗斯的外省和机关的深处时，共和国精英已经迅速地起跑了。

出现于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像“伟大的创举”一样开始在苏联全境四处开花，在高加索之后席卷摩尔达维亚、中亚，直至乌克兰，1989年12月乌克兰举行了乌克兰争取改革人民运动（鲁赫）的代表大会。因为起初人民阵线的领导人都自称是改革坚定的拥护者和“合法的儿子”，戈尔巴乔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自波罗的海三国归来并作出令人放心的诊断（“出现了积极的改革进程”）的雅科夫列夫的影响，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人民阵线并不是苏共的反对派，”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工作，以免将他们抛入与苏共对立的阵营。要信心十足地行事，要去掉极端主义分子，但是不要将他们与占90%的大多数人等同起来，他们还能去哪儿？他们会正经安分起来的！真理在我们这边！”

然而，随着人民阵线领导人不仅对于政治斗争入迷，而且从国家政权机关也就是莫斯科那里争取到了阵地，他们说话的腔调便起了变化。尤其是当他们在新的“戈尔巴乔夫选举”中夺得共和国议会中的主要阵地后，便开始向联盟中央公开叫板。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也走得最快的，依然是波罗的海人。不久，格鲁吉亚也同波罗的海人站到了一起，他们作出了自己有权否决联盟法律的决定。

至1989年，民族问题已进入主要政治优先地位的范畴。而戈尔巴乔夫则全神贯注地忙于应付新诞生的联盟议会中的暴风骤雨以及东欧的政治破冰船，对于联盟的外壳所发出的噼啪声的反应明显滞后。起初他决定提前召开讨论他始终无暇顾及的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全会于1989年9月举行，然而对于它所通过的决议已经很少有人感兴趣，主要是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尽管形式上全会也提出了新联盟条约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直至来年春天才谈到条约必须加快制订，以便“抑制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愿望”。他认为未来的联盟是不拘一格的，这样就可以“对有些人用颈圈，对有些人用短链子，对有些人则用长链子。”他本人是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其时联盟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所漏掉的，主要不是鬼迷心窍的各共和国分离主义分子，而是正在被唤醒的、当然也是受到他那不同倾向的政治对手鼓励的俄罗斯主权思想。原则上，民族分离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高涨，甚至某些“成活得不好”的“部分”的“脱落”，苏联都经受得住，却惟独经受不了俄罗斯对于联盟思想的背叛。

与此同时，正是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前景具有了实际的轮廓，先是从心理上、后来才从政治上反映了千百万俄罗斯人的委屈情绪，因为他们在自古以来认为是自己祖国的国家里被说成“占领者”，在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享有特权的民族的帝国里被说成“殖民主义者”。而且最先表达出这种因对俄罗斯人的不公正态度而引起的委屈情绪的，并不是政治家，却是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他在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突然冲着各共和国的代表们说：“既然你们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俄罗斯，既然它的欠发达和笨拙拖了你们的进步追求的后腿，也许俄罗斯应当退出联盟？”①当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远离政治的搞创作的人可以原谅

①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89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458—459页。——作者注

的感情流露。将传统的古老的俄国与苏联这个1917年后成了俄国的合法继承者、实际上就是她新的再生分开,似乎根本做不到。

然而不出一年,就发现在昔日多民族国家开始瓦解的情况下,它的"领头民族"——俄罗斯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都觉得自己世袭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开始从"帝国民族"变成一般的民族。在苏维埃大家庭里,俄罗斯人早已习惯于让苏联大家庭中"小兄弟"感到敬畏的无可争议的"老大哥"地位,对于真正平等的"代价"、对于许多人看来是侮辱性的不公正的民族共和国人同俄罗斯算历史旧帐的企图,他们不能不作出痛苦的反应。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日积月累的这种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具有挑衅意味的潜能,很快就被各种倾向的政治家、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竞争对手所"提取"。

在俄罗斯牌中,一下子就有两个对手实际上是同时、尽管是从不同的方面向他发难,这就是利加乔夫和叶利钦。利加乔夫指责他放纵民族主义者,搞垮苏联,从而毁掉俄罗斯人民的历史遗产,使数代苏维埃人以忘我劳动、苦难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成果付诸东流。叶利钦则恰恰相反,指责总书记兼总统与过去的决裂不够果断,仍然抓住中央集权的联盟国家过时的机构不放,惟一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

利加乔夫的"大军"由党的官僚组成,他们坚信如果沿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会使他们失去权力,失去国家强力盾牌的掩护,就会使他们与居民直接面对面,他们已经习惯于对居民指手画脚,却对同居民交谈感到生疏了。他们完全有理由对居民那复仇性的怒火感到惧怕。

叶利钦的"后备军"中,则是被改革的号角所唤醒、却未被戈尔巴乔夫吸收到重新瓜分国内权力过程里来的"苏联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记者,科研人员,后来在部长的职位上名噪一时的助理研究员、政治经济学教员、历史唯物主义教员以及社会学教员,还有创作知识界和半合法商业活动积极的有首创精神的代表,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无缘进入官场。与受到机关铠甲束缚的"党的战士"相比,这支"民主派轻骑

兵”的主要优势在于受过专业教育，可在任何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受过并不简单的苏联现实的熏陶，而且首先是年龄。此外，他们与党的工作人员不同，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却（他们也许自己还不知道）可以得到一切。

使人们聚集在高举俄罗斯民族利益捍卫者大旗的叶利钦周围的，除了民族怨恨和在自己家里受到屈辱的综合症而外，还有一种庸人之见，那就是：相信俄罗斯只要甩掉了不但靠她保卫而且靠她“养活”的寄食者——加盟共和国，自己就可在三四年之内跻身世界最发达、最繁荣的国家之列。向左右两边发出的这些承诺，再加上对于几乎是“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机关特权斗士的形象的巧妙利用，到1990年春天叶利钦就成了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戈尔巴乔夫终于发现了他的后方所出现的“俄罗斯问题”的政治潜能。他遵循自己“用两根滑雪板”往前滑行的方式，在召开关于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的同时，又作出了在中央委员会内增设俄国局的决定，俄国局由他亲自领导，他希望能够再次像雅努斯[1]一样一身二任，亲手来消除新的威胁。紧随叶利钦和利加乔夫之后，戈尔巴乔夫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俄罗斯牌”：将那个发出俄罗斯退出苏联的威胁的拉斯普京选入主席团委员会。然而，依然是联盟国家的总统的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是保住联盟，却不能像在政治改革领域那样顺利地同时扮演教皇和路德[2]的角色：一方面保卫和保护国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挑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以这样的官僚方式）以达到平民主义的、也就是对联盟说来具有毁灭性的目的，他的反对派就是这样做的。

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着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人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究竟由谁来占领“俄罗斯桥头堡”这个战略要地，这里既是对联盟中央展开扫射的最佳位置，又可

---

① 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一副向着未来。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

"鸟瞰克里姆林宫"。在两个宠臣(伊万·波洛兹科夫和鲍里斯·叶利钦)中间,戈尔巴乔夫公开把宝押在波洛兹科夫身上,并非因为那确系他安插的亲信:他正确地认为同那个人气正旺的"新入教的俄罗斯人"叶利钦比起来,这个正统的党机关工作者对他本人的潜在威胁要小。

然而,戈尔巴乔夫输掉了这场为了更使他满意的方案而战的战役(顺便说说,他不止一次地经不起自然而然的诱惑,选择了看似"容易"的道路,例如后来,他本人的当选总统并未经过全民投票,而是由他感到有把握的代表大会多数决定的)。他打破日程安排,非同寻常地亲临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以便给党内候选人的支持者打气,却无济于事。此后叶利钦的当选为叶利钦带来的是双重的胜利,因为他是在顶着苏联总统的公开压力的情况下当选的。

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一起,也输掉了让自己代理人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的选举。看来,因此在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前夕,由他非公开地领衔、实际上已是党内自治的部分在未能占领议会桥头堡的情况下,决定抛弃对自己总书记的虚礼客套。例如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主管"农业的利加乔夫公开将戈尔巴乔夫称之为搞垮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叛徒,并保证斗争到底。而在1990年6月,就其基本精神和思想纲领而言是反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波洛兹科夫当选为第一书记。参加会议的戈尔巴乔夫听到了粗鲁话,据切尔尼亚耶夫回忆道,他"*不仅忍受了粗鲁话,而且忍受了十足的粗野……回答了挑衅性的、愚蠢的、阴险的问题,回答得语无伦次,啰哩啰嗦,有时不善于表达想表达的意思,或者像往常一样,害怕明确,有意绕来绕去,就是要搞得不清楚*"。身兼过多职务的戈尔巴乔夫对于舍弃纯象征性的、鲜为人知的苏共中央俄国局主席一职,并不感到遗憾。然而万事开头难: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将舍弃其余的职务……

尽管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的关系中总是"冒火花",1990年夏天,他们两人却跨越了波洛兹科夫事件,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政治家,也就

是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人。恰在此时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夏日罗曼史”。起因为“500 天计划”。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以合作者的身份“介入”计划的修订工作并在上面签字,这当然不会使他们身边那部分想把每个领导人拉到自己那边去的人感到高兴。主动承担埋葬这一计划任务的,是雷日科夫政府:总理和他的副手列·阿巴尔金以如果计划通过就辞职相威胁。除他们之外,还有其预算将被大大削减的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如今由卢基扬诺夫领导的联盟议会。

按照苏联人民代表尤·雷若夫院士的看法,“*这时显然有人向戈尔巴乔夫狠狠地施压,也许甚至已经向他提出了最后通牒。*”雷若夫是跨地区议员团的五位副主席之一,他说,一位“来自机关”、早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他的人打电话来,提出在索科尔地铁站旁边秘密见面。在五分钟的见面时间里那人并未细说详情,却“力劝”他 9 月份离开莫斯科,反正是暂时“销声匿迹”。雷若夫说,当时他没把这个“同志式忠告”当回事,直到 9 月的一天早上,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装甲运输车正向莫斯科市中心进发,他才想起这个忠告来。后来解释出来了,说这是部队有计划的调动,是到首都来“收割马铃薯”。这是不是意味着八月政变有可能成为九月政变呢?

不管怎么说,当“500 天计划”以及他同俄罗斯领导人的“策略订婚”均遭到强烈反对时,戈尔巴乔夫后退了,他责成阿甘别吉扬院士在“总统计划”中对沙塔林—亚夫林斯基计划中的基本论点和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的看法进行驳斥。同以往一样,妥协并没有做到皆大欢喜,反而是谁都不满意,主要是给叶利钦提供了口实,叶利钦在 10 月就声称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原先的协议*”,声称“*将他的行为视作背叛*”,并说从此俄罗斯就不受承诺的约束,它将要制定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宣布,共和国要从以下三个方案中作出选择:脱离苏联,要求中央成立联合政府或是实行票证制度,因为戈尔巴乔夫向联盟议会提供的计划无法兑现。这是正式宣战。假想的婚事就此告吹,始终没有发展到举行结婚仪式的地

步，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参与下，或者至少在他不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对联盟进行“温和改革”的机会也随之消失。

在总统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控制不住情绪，他决定立即发表电视讲话：“不能放过这家伙。这个偏执狂患者急于当总统，身边的人在嗾使他。我要是保持沉默，人民会怎么说呢？”他自己身边的人则分成两个阵营。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和雷日科夫“嗾使”自己的总统别放过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B. 奥西皮扬则劝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失去自制力，后来助手们也站在他们一边。戈尔巴乔夫终于冷静下来，得出结论：“不要受这个挑拨。”并责成卢基扬诺夫去进行“电视抨击”。

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确信叶利钦是在虚张声势，确信叶利钦那伪装得不太好的发动人民举行罢工、游行反对联盟中央的威胁并未付诸实施，于是决定再次向他提出和解，责成博尔金安排两人的非正式会晤。据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尽管会晤进行得“并不简单”，毕竟有助于缓和紧张气氛。曾出席两位领导人会晤的博尔金则认为，会晤来得太迟，已无法对他们的关系做任何修补：“叶利钦颇多积怨，自尊心受到伤害，他迈不过这个坎儿。”

俄罗斯高举反联盟起义的大旗，走在“主权大检阅”的最前列，它的范例不仅吸引着其他的加盟共和国，而且吸引着它自己的某些自治共和国。盘算显而易见：“先来对付联盟政府，到时候就清楚了。”不时窥探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一班人，他们头脑中暗地里回响着戈尔巴乔夫不小心冒出的一句话：“他们还能去哪儿?!”

在尚未与俄罗斯领导人完全闹翻之前，戈尔巴乔夫对于主权宣言之风盛行，还能较为平静地看待，甚至持嘲讽的态度。1990 年 6 月紧随俄罗斯之后，发表主权宣言的有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米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加告兹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州、雅库特州、第聂伯河沿岸州、南奥塞梯州和伊尔库茨克州。

然而，除了宣言性的政治声明之外，到10月逐渐人迷的“君主们”即开始作出联盟中央不能坐视不理的决定。例如，如果说鞑靼宣布10月15日为抗击伊万雷帝军队的喀山保卫战中阵亡者的纪念日还可以宽容大度地不予理会的话，那么摩尔达维亚人民阵线关于该共和国必须并入罗马尼亚的声明，或者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关于不得在谢米帕拉京斯克试验场进行核爆炸试验的禁令，就是对于国家元首的权威和权力的公开挑战了。

其实，共和国的新当权者这样做，不过是在对俄罗斯新当权者亦步亦趋，他似乎是以自己的决定试图通过恣意夺取，强行从中央手中为自己“增划”政治领土。给人的印象是，叶利钦司令部内宣布展开一场竞赛，鼓励采取可以为戈尔巴乔夫制造政治问题、从“民主派”这个侧翼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包抄的平民主义步骤。关于在俄罗斯农村搞农场制的即兴讲话，宣布恢复圣诞节庆祝活动，承诺找到解决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旷日持久的争端的办法，都是这样出笼的。

10月24日，为了终结这场“主权化”的春汛，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规和地方法规。同日，不知是为了戏弄中央，还是为了向中央挑衅，俄罗斯联邦议会投票通过法律，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优先于联盟法律。

出现了棋局中无子可动的情况：戈尔巴乔夫要么容忍他所释放的共和国的放肆举动、举手投降，要么拍案而起、提醒自己的臣民“他还是沙皇”。为了做到这一点，要么如他身边某些党内保守派所极力主张的那样，试图回到不久前那个总书记的过去，要么通过强有力的向前突破来重新夺回政治主动权。这是两个彼此抵触的方案，戈尔巴乔夫居然全都选中了。然而因为二者很难同时兼顾，他就开始像驾驶在泥泞中打滑的汽车一样：往后倒车，以便过后借助冲劲克服障碍。

戈尔巴乔夫身处共和国骚乱策源地的包围圈中，受到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两面夹击—— 一方面是因他与叶利钦调情而怒气冲天，另一方面是激进民主派以“保守主义”为由开始对他公开发难，日益尖锐

的经济问题困扰着他，日益临近的寒冷的、大概也是饥饿的冬天的幽灵使他不得安宁，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强大国家的避弹所”里“过冬”。

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最后一次推动力，是11月份最高苏维埃代表示威性的妨碍议事。辩论成了“沿街叫卖”。在对总统“威严不足”的批评声和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中，截然相反的人——正统派和激进派开始站到了一起。上面已经提到，这种危险的感觉又对戈尔巴乔夫起了调动和激励的作用。次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以“强有力领导人”的富有战斗性的脸谱出现在议员们面前，这不知是回应断言已经有人向他提出最后通牒的政治局委员的慌乱反应、还是回应若干共和国领导人的“友好施压”，很可能是对最高苏维埃会场里近乎公开造反的气氛作出的反应。

在他那难得如此简短的20分钟讲话中，他分几点阐明了即将展开的、总题目为加强执行机构的“战役”的计划。政府变成了在苏联总统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内阁，将各共和国书记团结起来的联邦委员会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至于总统委员会，则因其中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自由派”人数使大多数议员感到恼火而宣布解散，让位于“威严的”安全委员会。昨天还在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的“联盟议员团”正是对于他的这个标志性步骤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它象征着戈尔巴乔夫决心与自己的民主派神甫一刀两断，投靠到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安全保卫者的卵翼之下。

“*我们不得不向右转*，”戈尔巴乔夫会后对自己的一班人说道。他首先对自己解释说，这次向保守派一边倾斜，是由于全国上下并未做好经受住变革的既有速度的准备，民主派原来是“不负责任的批评者”，因此社会情绪和期望的中心开始挪到右边，戈尔巴乔夫作为负责保持社会平衡的中派，也得随之移动。然而，无论他（同他的政治顾问沙赫纳扎罗夫一样）怎样力图给新路线加上新的中派主义哲学术语的包装，在字眼上将改革与稳定调和起来，“政治听众”对他的话待听不听。像往常一样，官僚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字眼，而是人事决定：谁上谁下。

“新路线”在人事上的第一个牺牲品，是内务部长瓦·巴卡京，保守反对派早就指责他优柔寡断，纵容“民族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在“推心置腹的谈话”中向他解释说，到该下去的时候了。第二位下去的是谢瓦尔德纳泽，他刻意造作地将门砰地一声关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联盟议员团”上校们的起哄戏弄下声称“专政即将到来”。末了，在新年前夕宪法中去掉了关于总统委员会的条文后，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沙塔林、梅德韦杰夫等人都失去了正式的职务和工作。彼得拉科夫所担任的经济问题助手一职宪法中没有提到，他决定不必等到“划黑叉”，便自动递交辞职报告。如今轮到了新的任命和新的姓名，这些姓名将在 1991 年 8 月成为不光彩的姓名。1991 年本身也日益临近，这是苏联历史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苏联首任总统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年。

逃离“克里姆林拉格”

除了从自己的前任那里继承的几个正式的头衔（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最高统帅等）而外，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非正式的、通常谁也无法辩驳的头衔，那就是：“皇帝”。并非美国总统讲演稿撰写者发明的神话般“邪恶帝国”、而是新的世界帝国——共产主义帝国的执政者。因为如果说关于苏联究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抑或一个帝国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的话，那么谁也无法辩驳一个事实，即莫斯科曾经借助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杠杆控制着世界的一大片地区。至于苏联“宗主国”居民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比附属国居民还要贫穷和艰难，那么这个事实如同这个帝国的完整性和内部秩序并不靠统治殖民地的行政当局、而是靠当地的“兄弟党”和国际主义思想来维持的事实一样，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尽管逃离社会主义集中营——“克里姆林拉格”的事情和逃离任何其他阵营一样时有发生，这

种逃离只有当实际上逃离者并不是奔向自由、而是奔向邻近的房间时才能成功，至于发生在“克里姆林拉格”内的叛乱，无论是发生在1953年的柏林、1956年的匈牙利还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每次都受到残酷而有效的镇压。

当然，苏联和它当时的执政者斯大林首先是作为战利品得到这个帝国的，那是以英雄主义以及为战胜纳粹德国、为对欧洲解放作出决定性贡献而捐躯的千百万苏联人的生命作代价。1945年2月在雅尔塔开会的“三巨头”中的伙伴——丘吉尔和罗斯福为斯大林戴上了该帝国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桂冠。同年7—8月在波茨坦，完成了这宗瓜分欧洲的交易的法律程序。

按照此后几乎立即开始的“冷战”的准则，拥有自己的帝国（在20世纪的词汇中这个术语换成了“势力范围”）如同核武器和其他一整套恫吓（遏制）敌方的手段一样，成了自尊自爱的超级大国必不可少的固有特性。正是因此，苏维埃强国割舍掉最后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花钱去供养日益扩大的“兄弟国家大家庭”，因为这笔开销如同军工综合体所需费用一样，实际上是作为预算的“公关条款”——“维持国际地位和形象”通过的。

当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权柄和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按钮时，苏联以其不堪重负的经济，已经既无法保持自己第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保持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头衔了。照彼得拉科夫院士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是因为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备战，将国民经济总值的75%—80%都用于军工企业和供养自己在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国外客户。*”正因如此，要求苏联摆脱军事竞赛的重负、要求摆脱与美国战略瓜分世界这一不可避免之事的新政治思维，决不是身居“苏联号”原子破冰船操纵台的那个天真外省人、业余政治家浪漫主义幻想的成果，而是完全清醒的、可惜并不令人宽慰的计算的结果（顺带说说，特别是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为什么政治局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原则性决定实际上是一致通过，其原因正在于此）。

早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即已清楚，苏联不仅无法更加扩展自己

的帝国(阿富汗就是明证),甚至无法保持其原来的影响力(对此波兰愈来愈雄辩地作了展示,该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受到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排挤)。苏联领导人保持自然是临时的帝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惟一办法,就是维持对于“外敌”的恫吓面目和对于“克里姆林拉格”居民的威严面目。两种面目也只是虚有其表,实际使用武力的能力和决心均已不复存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胡桃木房间的内部谈话中作出了完全明确的决定——即使在团结工会实际上夺得波兰政权的情况下,也根本谈不上重演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或者1979年的阿富汗,也就是根本谈不上搞武装入侵,勃列日涅夫为了不“给波兰人泼冷水”,神秘莫测地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卡恩说道:“你们应当自己去对付你们的反革命。我们不出兵。不过一旦需要,我们就出兵。”取代卡恩的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不愿意去猜这些字谜,不愿指望“老大哥”的理智,自己实行了紧急状态,以防苏联出兵波兰。

当然,“克里姆林拉格”的状况对戈尔巴乔夫说来,实际上成了与降低军工综合体开支一样的当务之急。改革的最初几月,他在政治局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简直筋疲力尽。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应当搞互利互惠了。此外,我们不应当对他们国内局势的今后发展承担责任。”他指的肯定不仅是波兰,还有在齐奥塞斯库体制和“安全队员”皮靴下奄奄一息的罗马尼亚,稍稍正常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相对说来一片繁荣的民主德国,该国仿佛一头可爱的小牛犊,正使劲儿吮吸着苏联和西德这两位妈妈的乳汁。

某些责怪戈尔巴乔夫“糟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的人认为,他如此“轻浮地”对待苏军撤出民主德国和东欧一事,其原因就在他属于未打过仗的一代。“对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他在战争中失去兄弟和其他许多白俄罗斯的亲戚)说来,波茨坦定下的战争结果是神圣的,”葛罗米柯之子在回忆与父亲的谈话时这样说道。曾任安德罗波夫助手、对其上司十分了解的阿·沃尔斯基认为:“尤里·弗

拉基米罗维奇[①]是不会放弃雅尔塔协定对欧洲的瓜分的，多半出于实用主义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虑。"按照这个逻辑，同其他那些前线战士出身的前任相比起来，戈尔巴乔夫以其照斯大林时代的标准看来堪称可疑的履历（他和他的亲人——爷爷、奶奶在德军占领的斯塔夫罗波尔度过了几个月），更容易同苏联士兵"走遍、爬遍"的那半个欧洲告别。

然而，他身边的前线战士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戈尔巴乔夫对于所爱戴的前线战士父亲的缅怀。访问波兰期间，他找到了父亲负伤后疗伤的那个军医院。此外，他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有自己的亡灵簿——普里沃利诺耶乡村纪念碑上刻着整整一行都姓戈尔巴乔夫的未能生还者，叫人不敢忘记战争的悲剧。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40 周年大会上作报告时曾一度眼里噙着泪水，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自然，这就是将他与党的前任领导人、与所有经历过战争并且永志不忘的同胞连在一起的东西。将他与这些人区别开来的，大概是这样一种认识：谁也不能永远沉湎于过去，更何况是政治家。战后在世界上、在欧洲和德国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于自己父辈、祖辈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苦难，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再说像我和切尔尼亚耶夫这样的前线战士都很清楚，"沙赫纳扎罗夫说道，"必须向前看，尽管亲自同德国人打过仗。因此我们都尽量支持戈尔巴乔夫摆脱'冷战'心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分界线不是按年龄而是按信念来划的。例如在德国问题上认为不能"放过"德国人的最热心的"基本教义派"，是来自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日耳曼学家。在他们看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也太开放了。戈尔巴乔夫则准备往前走，不揪住过去不放，并非因为他对于民族利益不够重视，他不过是能够明白新的情况。毕竟成为"德、法接近之父"的，恰恰是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

---

① 指安德罗波夫。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揪住过去不放,首先意味着改变与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国家领导人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不仅要放弃捆住苏联外交手脚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要放弃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在国内正在对该模式进行彻底审视的时候)。

在1985年11月同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谈话十分秘密,就连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也不得进入会场,他们在译员的小房间里偷听会谈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就宣布:从今以后,每个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本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负全责。这个信号的含义很清楚:"别指望我们的坦克去维护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体制。"会上商定莫斯科会谈的内容保密:要给各国领导人一段时间,以便根据苏联打算实施的事情来调整本国的改革日历。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认真地对待这个警告。有些人是因为把每个新领导人的手腕都研究透了,这些新领导人无非是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开始,以对"小兄弟"指手画脚、对桀骜不驯者严惩不贷、对忠心耿耿者奖以石油作结束。有些人则深谙苏联的一套,对于他能否真正兑现所有的承诺没有把握,即使他下了决心,身边的人也不容许他这样做。这些经验丰富、深谙克里姆林宫一套的人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宣言抱特别的幻想,他们"总是惦着"十分现实的前景:明天就得在某个别的人、例如利加乔夫面前点头称是,随声附和。

先后见识过许多苏联领导人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持特别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已经把他们都研究透了,而且通过诸如自己在保共中央全会的讲话稿均事先征得老广场的同意、或是定期提起将保加利亚作为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版图的建议等效忠莫斯科的表面文章,已经换来了他在本国国内的完全行动自由。他同苏联新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搞好,这不足为奇。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讨厌齐奥塞斯库。昂纳克也让他感到恼火,此人不仅不打算在本国搞改革,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已将苏联淹没、有可能溢出边界的这场危险的民主春汛的不满。睿智的卡达尔似乎本应感到高兴:终于有一位像他一样有意赋予社会主义以"人道主义

的和欧洲的面孔”的人入主克里姆林宫了。就连他都有点畏缩，他忧心忡忡地向1956年就认识的克留奇科夫打听，苏联总书记在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催促”改革，是不是在“逞能”。

对于这些民主实验，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的迅速接近，菲德尔·卡斯特罗抱着可以理解的戒备心理，他担心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人的闪电式比赛中沉迷于各吃掉一个大子，可别把古巴“让给”美国人。1989年亚美尼亚地震后，戈尔巴乔夫顺道去了古巴，尽量安慰卡斯特罗，向他解释说“选择自由”并不排除选择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并未患上东欧各国领导人的“综合症”，东欧的共产党人是靠红军上台的，他同意戈尔巴乔夫就新政治思维所作的诠释。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所有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只看中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两人不但彼此抱有好感，而且在自己的国内政策方面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将独掌大权的政党手中的国家政权交给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机构。

然而，尽管自己同“克里姆林拉格”各个“工棚”的关系各不相同，尽管有个人的好恶，当改革掀起的变革冲击波波及东欧时，在尽快地甩掉一些人、或者帮助包括他热情洋溢的改革同盟者在内的另一些人保全自己或者掌权方面，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无所作为。无论他做得对还是不对，反正他始终忠于一条原则，有一次不知是为了对于他那许多人不理解的无所作为作出解释还是进行辩解，他向改革同盟者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戈尔巴乔夫甚至让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自己去处理”他们那些和苏联有着最直接关系的问题和历史危机。例如1956年镇压布达佩斯的反共起义以及1968年扼杀“布拉格之春”。在这两种场合下，在回答为什么他迟迟不谴责苏联领导人在这两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这同他的所作所为反差特大）时，戈尔巴乔夫说道：“不必给现领导造成更多的困难。”在匈牙利，这就意味着“保护”卡达尔以及后来的接替者格罗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是“不让”古斯塔夫·胡萨克和亚克什·米罗什“受委屈”。

大多数东欧国家发生的“天鹅绒式革命”中，上台执政的不是温和的改革派，而是反共的反对派。当然，决定革命的这一结局的，不只是不肯承认自己对既成事实所负责任的苏联领导人那羞羞答答的立场，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姗姗来迟”。看来政治的摆锤在所有的情况下总是从一个端点摆向另一个端点。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固有的、并非总是能够得到补偿的方式在这些问题上表露无遗，那就是：往前走，仿佛比自己所策动的事件和过程慢半步，拿它们作掩护，就如同跟在坦克的装甲后面的步兵一样。

对此，他总是有现成的合理的政治解释：应当让社会成熟起来，感觉到提出的新事物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得自上面的指示。然而，这个处方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尤其在危急情况下，它会破坏这位“落在事态后面”的领导人的威信。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卡廷事件[①]和1939年的秘密议定书。至今戈尔巴乔夫还得进行自我表白以至几近自我辩解：应对与希特勒瓜分欧洲和处死波兰军官等负责的是斯大林而不是他。他知道这方面的文献证据确实存在，却为什么迟迟不予承认，迫使苏波研究“历史空白点”委员会的成员采取“守势”，也使得雅科夫列夫和法林在研究1939年苏德条约政治后果的委员会中面对波罗的海人和跨地区议员团的压力时，只有招架之功。

东欧那些“本地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又是派遣自己的信使去见他，又是亲自前来硬要他当面“相亲”，却统统无济于事。以代表团成员身份同日夫科夫一起前来的其未来继承人彼得·姆拉杰诺夫，为了事先向他通报保共政治局内“一批同志”已经做好解除日夫科夫职务的准备，借口忘记了戈尔巴乔夫题赠的一本书，“暂时”返回办公室。戈尔巴乔夫从姆拉杰诺夫口中得知这个未来的消息后，点了点头，却未置一词。

---

① 卡廷森林位于斯莫棱斯克市以西14公里处。1940年，苏联内务部机关在卡廷森林，将1939年在苏联境内扣押并从科泽利斯克劳改营押解至该地的4000余名波兰军官全部处死。

对于此类稍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都固执地不知是在躲避还是逃避。那些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行列并身居高位的克格勃间谍，以及跻身决策集团的苏联安全问题“政委”，纷纷暗示说他们正准备抓住正好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影响杠杆”，却无济于事。利加乔夫在访问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一次例行中央全会上就“交出”社会主义“阵地”和莫斯科出卖自己朋友敲起警钟，无济于事。法林领导的中央国际部向总书记汇报了自己关于如何帮助“朋友们”通过危险的湍流区的想法，“朋友们”是多亏决意改革不久前还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的关照才来到湍流区的，同样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依然沉着冷静，不动声色，既令人惊异，也无法解释。

当然，只要回忆一下 1989—1990 年“内部帝国”发生的事情，他的心情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无暇顾及。不过，他也为自己当时的无所作为找到了政治上的论据：“我绝对不想反过来贯彻‘勃列日涅夫主义’，把‘正确的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国内所做的事情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和变革方向施加主要的影响。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何况我并不想推荐新的‘代理人’充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是说，并不想又将全部责任推到莫斯科的身上。”听起来无懈可击。对于所谓“白白”将东欧、尤其是民主德国“交出去”的指责，他习惯性的回答也是这个调子：“交给谁了？交给了他们自己，他们的人民。再说我们当初有什么权利认为自己永远地‘得到了’它们呢？”

当然，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至今他的论敌还可以理由充分地反驳说：把东欧兄弟“交给”了西方，直接交给了北约，北约将他们吞了下去，眼也不眨一下，一点也不想作为礼尚往来，也来展示一下新的政治思维，或者哪怕表现出有礼貌的克制。戈尔巴乔夫在进行辩护时，引用了自己当时大多数西方伙伴的保证，贝克、梅杰、密特朗和科尔都曾公开表示，一旦德国在西方提出的条件下实现统一，“北约一步也不东扩。”他现在说，总之如果不把苏联搞垮，任何西方头脑里也决不会产生北约东扩的念头。可见，不满不是冲着他，而是冲着把苏联搞垮的

人。人人皆知,这就是八月政变分子和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者。至于为联盟战斗到底的总统嘛,与此无关。是这样吗?

"联盟游戏"

在苏联消失十年之后的今天,对于苏联当初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有些人会说,靠着涂上防腐涂料的意识形态和有效的极权主义体制,这个最后的帝国活得比自己的历史期限更久长,随着这两者的破产,帝国的死亡就是自然而然、合乎规律的了。有些人会说,这个陈旧过时的"牢笼",其中不仅关着不同的民族,而且关着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关着不同的历史时代,早该摧毁了。另有一些人也许数目最多,戈尔巴乔夫也在其中,他们会坚持认为:联盟需要保住,也能够保住。而且他们对自己正确性的坚定信念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尽管他们也颇感惋惜地承认,要恢复原先的联盟国家已经办不到了。说来难以置信,恰恰是八月政变和别洛韦日协定所葬送的苏联的凶死,为他们提供了捍卫自己观点的机会甚至补充论据。因为在提到苏联并非自然死亡时,他们就可以断言这一死亡并非不可避免。这个推论无法证明,不过现在也无法推翻了。

答案不同,不仅因为回答者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也因为他们对于 1991 年保住苏联的前景的态度各异:总统自然是竭力地、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保住苏联,从俄罗斯开始的各共和国精英的代表自然是希望把两者(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全都甩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说到"联盟"时赋予这个概念的内容各不相同,他们所说的是各不相同的"联盟"。有些人说的是现实的,已经存在了 70 年,俄国历史上那个漫长的富有戏剧性的阶段的、在许多人看来是自然而然且符合规律的、在有些人看来则是人为强加的形式。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应当承认,其人数愈来愈少)则指的是可能的、符合愿望的联盟,"我们尚未在

其中生活过的"联盟。他们谈起来是如此地坚定，正如谈到真正的、"地道的社会主义"，我们未及建成、却已经歪曲得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一样。

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已经无需将这位"改革之父"与托马斯·摩尔[①]相提并论。戈尔巴乔夫的乌托邦并非尚未找到的岛屿，而是具体的政治方案，它依靠的是完全确定的历史现实、绝对的经济利益以及合理的政治逻辑。可惜该方案终未付诸实施，也许这就是主要的、来自历史这个最高权威的关于其无法实现的证明（此外历史再无其他的论据）。

其实，还有完全另外一个、而在其多样性和相互矛盾方面并不比苏联逊色的现实，即美利坚合众国。有一次，美国驻法国大使罗哈京在谈到那些将美利坚合众国合并起来并且保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三，即：法律，美元，道路。显而易见，对于俄国说来，无论沙俄还是苏俄，国家建设的这三个因素都不存在：法律嘛甚至不值一提，道路呢进入了令人忧伤的有名警句，至于说到美元的等同物——不能自由兑换的卢布，它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向美元无条件投降的。不过自古以来，也有另外一些在过去时代同样有效地为俄罗斯国家服务的因素。我们也可以举出三个：官僚、军队和偶然的非内部因素——外来威胁。无论对于最大的世界强国说来有多么离奇，不正是外来威胁最初使俄国本身团结起来、后来又将一批文化上与俄国同源和并不接近的民族并入俄国的吗？外来威胁有时比叶尔马克、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侵略性远征还有效。至于最后一位"帝国增大者"斯大林，他充分利用纳粹侵略的致命威胁来团结苏维埃国家，战后则利用帝国主义包围的观点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改革，从苏维埃国家的骨架中取出了这三个主要的夹板。他这样做，不知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戈尔巴乔夫自己试图这

① 托马斯·摩尔（1478—1535） 英国人文主义者、国务活动家、作家、空想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

样来解释），由于政治上不懂行（葛罗米柯语）呢，还是"背信弃义地"听从来自国外的提示（八月政变发起者之一舍宁语）。他使取代沙皇官僚的党的机关失去了昔日的垄断权力。他通过削减军费削弱了军队，他允许把驻扎在国外甚至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苏军当成"占领军"对待，从而"贬低"了军队，为了解决第比利斯、费尔干纳和巴库的冲突，他利用军队去对付国内居民，又破坏了军队的声誉。与西方的关系中新的缓和使苏联失去"宿敌"，使全国人民忍受痛苦和牺牲作出的努力失去意义，这些努力本来是为了使自己免除几乎认为是必然发生的侵略的威胁，此外，缓和还一举摧毁了那个"被围困的堡垒"中几个设防棱堡，官方的反西方宣传曾将苏联社会关进那个堡垒。

戈尔巴乔夫不能不意识到柏林墙的倒塌势必带来克里姆林宫宫墙上的裂缝，至少有一次用第三人称（他往往这样来谈自己）说出的想法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放弃使用暴力作为贯彻国家政策的主要手段。这就足以使国家瓦解了。*"不过，既然他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放弃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说来是"致命"的意图呢？他在指望什么呢？

无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帮人怎样指责，也很难怀疑苏联总统蓄意搞垮他自己领导的国家。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公开声明。"*我不会参加联盟的葬礼的，*"在新奥加廖沃最后的晚餐[1]上他再次警告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为了用非暴力方式保住联盟，他几乎准备同逼近他的各共和国总统达成任何妥协：接受任何名号和法律地位——联邦不行，就来邦联，如同当初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谁同意，就同他签署联邦条约——即使不同 15 个或者 12 个共和国，哪怕同 8 个甚至 5 个共和国签署也行。这一切都是为了至少保住联盟国家的外壳，他打算过后再往里填上新的内容。

他在显然已经失控的解体过程的进逼下步步退却，相机行事，仍

---

① 据圣经故事，耶稣被害前与其门徒进最后的晚餐，耶稣说，他的一个门徒要出卖他。

然声称他认为出路并不在于恢复昔日硬性集权的机构，且不说那只有以大量流血为代价才能办到，出路在于联盟空间那类似欧盟的有弹性的“组织模式”：只有安全、外交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问题仍由中央统一处理。

当然，在这个以引证“共同历史”、抽象的统计数字、主要是良好愿望为基础的抽象模式中，一开始就有许多矛盾。模式的设计人以欧盟为榜样，却忽视了欧盟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这首先是完全主权国家经济上接近的过程。戈尔巴乔夫想以各共和国精英之间的君子协定为基础“自上而下地”建立自己的欧亚联盟，也就是指望从官僚警察的中央集权制过渡到文明的一体化，在可能耗费巨资的苏联星系“离散”阶段紧缩开支。

他甚至打算再次“超过”欧洲，建议新的联盟的联邦—邦联不仅要有共同的经济空间、不受边界限制的人员和货物流动，而且要有最高执行权——由居民而不是议会选举的联盟总统。他在为“温和的”新联盟做宣传时，依靠的是现有的“超过西欧”的一体化水平，他解释说，破坏业已形成的合作社经济联系是“不合理”的，“活生生地切断”人们的命运、破坏家庭关系是“不人道”的。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重新联合起来和世界全球化的情况下，将多年形成的、虽然是由整整一组民族组成的“苏维埃民族”拆开，是合乎情理的吗？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建筑图纸，是海市蜃楼，政治上的马尼洛夫习气[①]呢，还是独出心裁的、纯俄罗斯式的、相信又一个科学-历史教条的意愿与相信奇迹这二者的结合？这是1991年遗留下来、尚无答案的问题之一。只有一点清楚：现已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在做如此推断时，他是打算忽视政治中、尤其是俄罗斯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东西——共和国精英争权夺势以及俄罗斯纷争的无法无天的全部爆炸力。他

① 马尼洛夫习气源出果戈理《死魂灵》中人物马尼洛夫，意为无根据的幻想。

试图把欧洲哥特式大教堂的描图纸放到聒噪不休的街区、老爷式的土皇帝作风和大财主的民族主义上面。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他想同时解放和改革的那个国家，他实际上并不了解呢？他要强迫一些人脱去监督者的制服，强迫另一些人脱去囚服，让他们统统换上按最时髦式样裁剪的欧洲服装。很可能，他同当时身边的许多人一样，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他是由体制和具体现实熏陶出来的，他完全相信整个国家都住满了像他一样的人。再说，担当这一职务的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人呢？

尽管如此，如果轻视他的幻想，说他所设想的神奇的联盟改造无法办到，又毕竟太简单化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顾往事，说什么一切都已事先注定，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试图去要数量日益增多的燃烧的火棒，迟早会以火棒纷纷坠地收场，说什么不能无休止地既当纵火者又当消防员的角色，说什么用肉眼判断核物质临界质量的范围，以免发生无意中的连锁反应，到头来必将以爆炸告终，这么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毕竟，毕竟，毕竟……如果说奇迹会在什么地方出现，那只有在政坛，况且是在俄罗斯政坛。

假使不发生八月政变，谁也说不清事态将会如何往下发展，因为新的联盟条约已经过反复磋商，就只等签署了。就算是原来的恐惧心理都已烟消云散，包括最好闹事的叶利钦在内的各共和国领导人以及联盟最高苏维埃中气势汹汹的戈尔巴乔夫批评者，他们骨子里那种听从克里姆林宫及其主人的惯性当时尚未完全消失。无怪乎到政变前夕，戈尔巴乔夫已经将这两种人都搞得服服帖帖，有时他靠的是73%赞成保留苏联的全苏三月全民公决的威望，有时他则依靠关于大大扩展加盟共和国甚至自治共和国在新联盟框架内中自治权范围的承诺。

在极端的情况下，他曾以自己辞职相威胁，说来离奇，正是他的许多对手求之不得的这种前景把对手吓住了，迫使他们退却。这里起阻止作用的，对有些人来说，是在物色大家可以接受的继任者时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对于失去最高权威、失去“父亲”的恐惧。将戈尔巴乔夫恰恰推到这个角色位置的，既有“联盟议员团”

的成员，也有莫斯科知识界截然相反的两派——从怀念日丹诺夫式思想迫害的赤裸裸的斯大林主义者，到诸如И. 克利亚姆金和A. 米格拉尼扬之流的自由派，这绝非偶然。自由派声称，只有专权喜功的“铁腕领导人”才能带领国家从共产主义走向民主。

政变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向两派都展示了他并不准备扮演“主人”的角色，有些人怀念“主人”，另一些人渴望“主人”，他却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先前就以自己的行为促使了极权主义体制的崩溃，这也许比他的政治改革所起的作用还大。例如他可以不怕当着千百万电视观众的面在议会里受到公开的批评，又如他容忍了对他和赖莎进行侮辱的哈尔科夫出租车司机，容忍了Л. 苏霍夫代表的蛮横无理行为。而且他在搞掉帝国的皇帝的同时，也顺便动摇了帝国的基础。

1991 年八月政变之后，统一的联盟的命运就注定了，不仅因为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表独立宣言：有的是害怕突然出现的新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幽灵，有的则是害怕“善搞妥协”的联盟总统的地位将由严厉的、决不妥协的俄罗斯总统所取代。假如政变之后具有无上权威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号召大家起来捍卫和复兴苏联的话，国家本来还可以挽救的。尽管相当一部分苏联人依然相信戈尔巴乔夫，大部分人已经不相信他。新的政治星球——鲍里斯·叶利钦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许多俄罗斯居民认为自己受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骗，他们准备将对又一次奇迹的希望同叶利钦联系起来，而且打算向他的承诺投资，仿佛是向政治上的马夫罗季[1]的财政金字塔投资一样。西方准备将自己的股票投给政变中的胜利者，此时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问题：控制核按钮的是谁——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

11 月，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次小型峰会上，布什直截了当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首脑向他保证说，在福罗斯的数日囚禁之后，他依然控制着核按钮。这番话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

① 马夫罗季曾经通过股票投机诈骗了许多人的钱财。

力。在八月政变后那些日子里，甚至在接受中央竭尽全力试图强加给如今已不过是名义上享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游戏”的条件下，假如叶利钦决定在预计举行的选举中竞选苏联总统一职，那么他多半会胜出。

谁也不知道联盟以后会怎么样，不过那已经是联盟历史上不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另外一个篇章。叶利钦本人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他说来，这条路“已经堵死”。叶利钦十分厌恶地拒绝了手下人建议叶利钦迁入戈尔巴乔夫夫妇腾出的柯西金大街总统官邸，他十分厌恶地一口拒绝，而且无法强迫自己坐到戈尔巴乔夫的交椅上去。“我在心理上无法去坐戈尔巴乔夫的位子，”俄罗斯领导人这样写道。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过是在确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苏联首任和末任总统离职之后，在成立的国家业已结束的历史上，这个位子将永远不会空着。

第八章 “他是上帝，我是凡人……”

创世主的刨子

“人就是风格，”经典作家如是说。何况是公众人物，政治家。更不用说国家领导人了，而且是像俄罗斯这样将专制的沙皇传统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至上传统结合起来的国家。领导人的举止风格、性格特点、禀性、情结和随心所欲的要求，在这里都具有国家政策的面目，直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

如何定义戈尔巴乔夫的风格呢？除了已经多次描写过的、人人都可看见的以及至今尚未从记忆中消失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因为一个公众政治家，又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敞开心灵、宣布公开性、信奉开放、从讲台和电视屏幕上将自己强加给全国和世界的人，似乎已经彻底照透，经过讨论，被数落个够，拆卸成了一个又一个原子。他在千百面镜子里、千百万主观知觉中反映出来，他被传说

和议论败坏了名声，他像带有他的头像的套娃[1]被大量复制，于是他也和套娃一样变得面目全非。

这里说的是同一个人吗？大概就连那些责备、斥责戈尔巴乔夫，说他变幻莫测、反复无常、"无法预测"（像葛罗米柯和雅科夫列夫这样相去甚远的人，显然是不约而同地都为此感到难过）的人，也会同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会不起变化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怎能不随着他所领导的国家以及外部世界的戏剧性变化（其中也包括因为他的步骤和行为）而变化呢？倒是对他的另外一个指责要公道一些，那是说领导人变化得不够快，失去了反应，开始落后于他所策动的变革和进程。

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改革期间"*仿佛活了几世人*"，就是说，改革期间有几个戈尔巴乔夫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如同异父同母的兄弟一样彼此相像，却决不像是克隆的产物。他们尽管有区别，几乎像同一个画家在其不同"时期"一样，每一个都留下和保留了某种始终不变、使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东西：个人遗传密码，"道德的核心"。

真正的、地道的、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全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究竟什么样，大概只有他本人，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知道。"*我反正不会全部告诉你们的，*"有一次他这样警告身边的人，实际上不过是宣布一条不成文的、却是所有真正的政治家都遵循的必需的准则。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全部，因为判断政治家（和评定他们本人）不是根据隐秘的、内心的想法和意图，而是如《圣经》所吩咐的"根据他们的事情"，换言之，就是根据结果、痕迹，根据在历史的苍穹上一闪而过的又一颗尽管耀眼、毕竟早晚要坠落的星星所留下的痕迹。

核物理学家根据加速器里留下的这些痕迹描绘性状的特性和特点，勾划出肉眼看不见的、难以觉察的原子粒子的肖像。我们也像他们一样，从各种不同的证言和印象中收集戈尔巴乔夫总的"痕迹"，到那时，就像在自动组像机上一样将各种特征拼到一起，也许我们就很

---

① 套叠式圆脸村姑木偶，俗称套娃。

接近他的真正面目了。因为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看和评价“模特儿”的角度和观点，自己的水平，我们先来收集不谋而合的、亦即多半是客观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他具有几个无可争议的品质。其中之一就是惊人的工作能力。如今对他吹毛求疵的利加乔夫、博尔金和原贴身警卫弗·梅德韦杰夫，都异口同声地说：总统兼总书记的工作日从早上开始，持续到后半夜，到一点、一点半。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他的上司一分钟也不浪费：在去克里姆林宫的车上就在研究和浏览文件，开始给需要通话的人打电话。博尔金说，他每天平均上报100份文件，其中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晚上八九点钟下班时带上，次日早上送回来时，已经在上面作了记号和批示。看文件往往看到深夜，他可能在夜里11点和12点打电话过来，提出问题，或者布置任务。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坦言道，若不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醒说该休息了，就会一直呆到凌晨三点。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力不从心了，开始违反固定的规律。部分文件送回时没有看过：拿去存档。另有一些文件连看也不看一眼就送回，说是“这个我知道了”。除了博尔金的文件夹外，他在家里还看过什么，至今不得而知。例如，第二天早上他的一番话会搞得第一个来访者目瞪口呆：“知道吗，我昨天夜里研究了列宁是如何对待粮食税的。”

对于出国访问和接见来访者，尤其是初期，都是仔仔细细地进行准备，查阅许许多多文件，向助手和各级负责人反复询问、弄清他感兴趣的问题，在身边的人中间一连几个小时地“考问”进行谈判的思路和方案。不过，渐渐地他在外交方面对别人的意见也待听不听的了，对于原来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的细节和详情开始感到厌倦，原来是对战略问题的讨论，渐渐地成了短暂的走过场和分送“作为通报”的文件。对于次要的外国客人，已经不做专门的准备。并非每次来访者的姓名都记得清楚，在谈话中也往往即兴发挥，诚然，如切尔尼亚耶夫所说，总能切题，而且照例讲得“很精彩”。

回到家里后，雷打不动的同妻子一个半小时的散步已经成为白天工作的继续。“我们讨论一切问题，”戈尔巴乔夫勇敢地向美国电视评论员 T. 布罗考坦言道。对方不相信，又问了一遍，所听到的回答依然是：“一切问题！”

卢基扬诺夫讲述说：他在下班前向戈尔巴乔夫提醒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时，戈尔巴乔夫往往回答说：“我回头给你去电话。”卢基扬诺夫认为，这就是说问题将在“家庭政治局会议上同赖莎”讨论。然后夜里戈尔巴乔夫肯定如约打电话来，通报自己的决定。

梅德韦杰夫回忆说，甚至在南方休养时，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不把时间用于游泳，他们通常都在一起游泳，也不用于游山玩水，而是埋头工作和阅读，戈尔巴乔夫在海滩上晒太阳时，愈来愈多地宁可站着阅读：背部的神经根痛发作。贴身警卫对于原先的顶头上司勃列日涅夫经常打猎已经习以为常，真心诚意地为新总书记感到惋惜，说他这些年只脱身出来去打过一次猎，而且压根儿“没有嗜好”。

与此同时，恰恰工作才是工作狂戈尔巴乔夫的真正嗜好。天性的“过分”活跃与高度责任感和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贪图虚荣相结合，使他成为一个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雄心勃勃的改革意图的人。“您真是个天生的总书记，”有一次他的贴身警卫超越职务限制这样称赞戈尔巴乔夫。

那么起初使这个积极肯干、感情充沛的人如此全神贯注的，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呢？在对这个难解的问题作出的回答中，即便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实际上所有他原先的战友都是不谋而合：当时并没有一个计划。由“再不能这样过下去了”的认识便产生了改善一切、改正一切、“使一切都处于合适的状态”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任何全盘的具有神授超凡能力的想法，”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是想大刀阔斧地干点新的事情。”

自然，如果没有贪图虚荣，就既不会有干练的政治家，也不会有杰

出的改革家。我们来回忆一下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自白吧:“我从小就想让所有的人吃惊。”然而,让人吃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据1983年在加拿大与戈尔巴乔夫一拍即合的雅科夫列夫证明,他的最低纲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于斯大林习气、军国主义、官僚、国家腐败无法接受,对于法律制度的崇拜”。唉,为了在俄国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有不止一代的改革家。

自命不凡、事后聪明的批评家(现在!)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说,没有一个综合方案和总体计划就开始改革是不负责任的:不能不带地图和航路图志就出发远航,何况是承担了对于全国的责任。权威的反对派人士对我们的改革家进行诋毁:原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Г.科尔尼延科认为,他是个“不能进行概念性思维的人”,因此就落到了庸俗实用主义者的水平。与他分道扬镳的昔日战友追着痛骂他:原内务部部长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巴卡京断定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行动方案。随波逐流。他不是邓小平,是个同我们一样的人。”

卢基扬诺夫早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就担任过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干过,他不放过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的机会:“安德罗波夫在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之前,不仅要反复考虑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对各种方案进行‘斟酌’,试探各种人的反应,而且还在一张纸上画出整个一棵‘枞树’——设想的步骤可能引起的后果,有时要对未来15—20步进行计算。戈尔巴乔夫则情绪冲动之作太多。”

戈尔巴乔夫在面对下台后这些年来对他进行围攻的好说教的批评家时,甚至没有提醒说,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战略性决策,要么反映了领导人的一致意见,要么反映了经过长期努力达成的妥协。为了达成这样的一致,他不惜努力,不惜时间,照博尔金的说法,他可以在例行的艰苦的中央全会前夕,花上不止一个小时来同最“难弄”的州委书记见面,解释,劝告,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事先给可疑者和不满者“放放气”。

他另有一个辩解的总方针:“从1984年12月起,我的观点是:让

尽量多的人什么都知道并且参与作出与他们有关的决定。这就是我对列宁'群众的生动创造'表述的贡献。计划得面面俱到,安排得井井有条,全是瞎掰。照样一无所获。任务是由政治历史过程决定的。选好方向,目标,对。这是政治家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在这段话和另一句他所看中的老话"社会主义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新事物不断增加"当中都说漏了嘴。无论他怎样以列宁的名字发誓,实际上他的上帝不是列宁,而是过程。而过程另有一位预言家,不是列宁,而是伯恩施坦,在伯恩施坦看来,目的并不重要,但"运动就是一切"。不错,其实戈尔巴乔夫本人并未过分回避这个离经叛道的论断,而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甚至敢于夸奖其他的修正主义者、原则上的列宁的敌人——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1995年,他在思考改革和取代改革的激进改革的成果时写道:"前进中应当抓住历史进程本身酝酿成熟的健康倾向,试图掌握历史和加固历史,但不是强奸历史或者促进历史。"

戈尔巴乔夫为真正的改良主义改革者,因而也给自己规定了这样故意切合实际的角色,几乎是历史阐释者、解读历史文字的密码学家的服务性角色,他这样做决非过分谦虚。在充当创世主手中的刨子的平和的决心后面,令人感觉到一种自负甚至傲慢。即便这里说的是仆人的角色,但那是上帝的仆人啊。为了上帝,他情愿成为工具、全权代理人、预言家。许多西方传记作家根据对自己使命的坚信不疑这一点将戈尔巴乔夫与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①]相提并论,这绝非偶然。他自己坦言,他所获得的许多享有盛誉的奖金中,他最看重以另外一个马丁·路德——美国非暴力策略鼓吹者马丁·路德·金[②]命名的奖金,看来,这也绝非偶然。戈尔巴乔夫将过程、历史、历史的旨意,即使不是天意奉若神明,他决不是将其作为挡箭牌或者用以宽恕政治家过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路德宗的创始人。

② 马丁·路德·金(1929—1968)　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斗争的领导人之一,非暴力策略的倡导者。

失的赦罪符……“当然不可能把历史安排得头头是道，”他说道，“但历史不是命中注定的。它给突破、历史性首创精神留出了空间，也就是给个人留出了不小的活动空间。”

在评价政治家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戈尔巴乔夫怀着一种其历史上的地位得到保证的信心，并不害怕同自己的导师进行争论。“马克思主义要求不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现在是另外一种看法。历史是靠重大倡议推动的，也就是靠大人物推动的。就是那些好像是歌德所说的能够抓住历史衣襟、因此也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推动的。这里需要直觉，需要分析，总之，无法回避，需要非凡的个人品质，也就是那个个人。”他按照辩证法的教导，从总体转到局部，也就是转到自己身上：“比方有人说：‘你们的戈尔巴乔夫算个啥！什么都现现成成的，没有他照样进行。’可是得冒着风险下手跟这个庞然大物斗啊！”

这样他就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到一边，并且从经典作家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那里争得了自己贡献的空间，他也并未回避为自己进入历史的入场券付费：“不过，既然历史不是命中注定的，那就是说，它也并不免除你的责任。因此我承认，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过失误。”

至于他自己承认的这些失误是什么，今天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失误的清单（在市场改革和将党一分为二方面滞后，对于民族因素估计不足），已经成为改革的正式历史的一个部分，对这些毛病的承认同历史功绩的清单一起进入了历史，这里也有戈尔巴乔夫的部分功劳。近年来，前总统自然是在继续思考自己的产儿的不幸命运，思考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包括中国的）改革经验，他对这张失误清单作了几处重要的补充：“对于党的官员，当时应当找出其他最佳的处理办法。我们把他们全都当成保守的甚至反动的阶层来谴责。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精英啊。不应该完全疏远他们。这方面我们考虑不周。”

他本人似乎并未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所选择的变革速度算不算最佳速度？有时戈尔巴乔夫同意自己的激进批评者的看法，就是他几乎从改革之初就开始“落后”。甚至还人云亦云地说：“本来应当更快，更大胆，更坚决……”有时他又拿法国女政治学家 L. 玛尔

克为他洗刷的话替自己辩护："她说得对，我们选择的速度太快。社会还来不及消化它所遭遇的变化。"

有时站在完全相反立场上的人，为同样的过失对他进行批评。例如，为优柔寡断、动摇犹豫和长期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实际上用同样的话同时谴责他的，既有共产主义正统思想捍卫者利加乔夫，又有利氏的对立面雅科夫列夫，以及曾因异端邪说度过铁窗岁月的柳巴尔斯基。至于说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戈尔巴乔夫在执行完全相反的政策时态度坚决，那又另当别论。雅科夫列夫责备自己的上司，说他"大胆的意图远非任何时候都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在柳巴尔斯基看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对抗激进的变革——实行土地私有制和激进的经济改革，反对苏共放弃对政权的垄断"。根据利加乔夫的意见，对于历史形象的关心，"妨碍了戈尔巴乔夫采取坚决的、必要的、尽管是不受欢迎的措施。这就演变成了不幸和矛盾加剧，助长了局势激化"。离奇之处就在于，在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坚决的、"不受欢迎的措施"时，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激进的民主派要的是允许出售土地和放开价格，保守派要的是对于民族极端分子和"不负责任的"媒体中"恶意中伤者"毫不留情。

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不仅因为他有意回避在这两个相互抵触的方针中间作出选择，以便保证通过演化而不是强制、更不是冲突或者爆炸来改变国家，而且因为他认为每种观点都自有其哪怕是部分的真理。正如《新世界》主编A.蓬皮扬斯基在《优柔寡断的领袖颂歌》一文中所言："在他看来，这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在两种善之间作出选择。"

请看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如何看待政治中的坚决果断的："我认为自己并不是性格软弱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不但如此，按天性我属于激进分子（就为脾气大，赖莎往往把自己的米哈伊尔叫做"小刺猬"——作者）。如果说我久拖不决或者相机行事，那就是我认为不宜迅速采取行动。这并不等于说我每次都做得对。此外，我对于坚决果断和意志的评价，并不是根据人们的言词和故意作出的样子：政治家的果断

和意志在于始终忠于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任何复杂情况下始终遵循这个选择。”

如何为一个处于深度休眠状态、确切地说是执政者有意使之陷人他们觉得安全的休眠状态的社会选择最佳的前进速度，是又一个不简单的课题。需要选择好初级传动装置，以便可以较为平稳地、没有戏剧性的冲刺地使社会离开原地。当社会在高速行驶时，则要注意及时变换传动装置。情况变得复杂化，是因为同时有几只手几只脚伸向变速杆，伸向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

此外，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愿意让他希望投身于自己的计划的全国上下总是被改革首倡者们拖着走。因此就经常停下来，回头看看落伍者，就像陪伴羊群的牧羊犬一样，在围着羊群跑完之后又力求折回去，确实弄清没有一个掉队的。戈尔巴乔夫总是操心避免社会分成主导者和从属者、果断的先锋队及其带领的消极的群众两部分，惟恐在途中把谁丢掉，这就使得他试图求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公分母”（最后几年尤其如此），往往让自己确信他是面向大多数，是在使自己与扫尾的后卫部队保持步调一致。

借自《圣经》中雅各的“我会慢慢地，像牲口、像孩子一样地走”这句话，完全可以为他作辩护。然而显而易见，不仅是迫不及待的先锋队，而且还有被承诺的革命所唤醒的相当一部分居民，他们对于自己牧师的期望，多半是带领他们去再次“征服天堂”，如马克思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的那样，而不是建议他们去走令人沮丧的漫长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试图率领所有的人前往“富饶乐土”，准备为此阻拦迫不及待者、鞭策落伍者，最终是两边不讨好。

他那凭摸索来确定行进路线的做法，愈来愈多地被视为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妥协。“戈尔巴乔夫在保住中派上花的精力最多。每次他都不得不让步，却只有到为时已晚、让步已无任何意义的时候，”柳巴尔斯基如是说。

“他宣扬一条准则：在情况不是已经成熟、而是过分成熟的时候采

取措施。他要等到苹果掉到地上，才采取措施去消除后果，”同样苛求的利加乔夫也随声附和道，“每当国内发生激烈的事变时，他的反应都是慢半拍，因为他力图让全社会认清局势的尖锐性。”出自利加乔夫之口的这番听起来像是谴责的话，戈尔巴乔夫却准备当成恭维话来听。看来他是有意力图尽量避免社会组织的撕裂，并以此来为在急转弯处减缓速度进行辩解，至于其中还掺杂有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己稳坐司机交椅、保住改革领路人的角色的愿望，那又另当别论，改革已愈来愈公开地向执政党和舵手本人挑战。因为缺乏计量社会演化速度的精确工具，前进的速度只得靠以眼估量来确定，众所周知，这样就不仅为直觉、也为自我欺骗提供了空间。

因此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可以乐意将训练有素的党的机关的绝对忠诚和居民的坐享其成综合症，即苏联社会有机的无独立性，当成对他和他的计划一致支持的表示。而且，在那种条件下，他不得不利用这种落后状态，以便依靠有保障的惟命是从，在国家实际生活中施行最多的改革新政。可见，起初平民社会的不成熟是对他有利的。

然而，社会顺从的资源很快耗尽，由于所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社会所养成的坐享其成的习惯反过来气势汹汹地与改革首倡者作对。于是居民与改革之间的罗曼史开始演变成两者之间的冲突。戈尔巴乔夫承担起中介人的角色，尽管他并未这样对自己表述过，中介人从党那里夺过权力，以便交到日益觉醒的社会手中，他迟早会发现这个使命按理具有临时的性质。随着事情的顺利进展，改革首倡者与其应予解放和施恩的人们之间可能发生龃龉和冲突的天地也愈来愈大。领头人和被领者失去了起初的“父与子”的等级关系，他们在改革的华尔兹中旋转起舞，不仅互换着位置，而且可能踩到对方的脚。

这在80年代末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戈尔巴乔夫与此前支持他的公开性的媒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与“所谓的民主派”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他还热情地鼓吹：“我们需要公开性，不仅是为了谴责过去，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前进。人民需要全部真相……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多的光亮，以便让

党和人民了解一切,以便让仍会藏污纳垢的死角在我们这里彻底绝迹……”

然而到了次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的媒体和各创作协会负责人会议上,他就因为《论据与事实》发表了吹捧不够的民意调查结果而大动肝火,要求该周刊主编辞职,威胁说要对此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好不容易通过的很先进的《出版法》重新研究。又过了一年,在戈尔巴乔夫受到粗暴攻击的气氛中,最高苏维埃显然在他的首肯下,比中央全会上的当众斥责走得更远,批准了对于侮辱总统的尊严和人格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

当时与主编们打交道的调子明显起了变化。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头脑最迟钝者进行申斥:“汽油都没到我们的膝盖了,可你们还在扔火柴。公开性不应当变成为所欲为:它有责任对社会起加固作用……媒体应当对人们起团结和动员作用,而不是起涣散作用,也不是引发怨恨、不自信的情绪……”

幸而戈尔巴乔夫仅仅限于规劝和威胁,并没有修改出版法,并没有对侮辱总统者进行惩处,也并没有如威胁的那样撤掉《论据与事实》主编B.斯塔尔科夫的职务(不过当时主持愈来愈具挑衅意味的《真理报》的B.阿法纳西耶夫倒是丢掉了主编职务)。后来在回顾关于出版法的故事时,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当时“是太急躁了点儿”,还提到对于政治家说来,爱抱委屈是“不可原谅的奢侈”。

“您读的是什么,王子?话语,话语,话语……”

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终究为他无意识地、也许是自觉地孜孜以求的东西——苏联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自由比赛以及各自实际潜能的显露开辟了天地。戈尔巴乔夫禀性中的说教者和传教士特点在

这种局势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清楚地表现出改革的“言”与“行”之间的间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何况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性的“行”以及他执政期间苏联社会具体变化的规模，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此外，他自己说得对，言语，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往往就变成了具体的行动，当时同过去决裂的前提、因而也是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穿原有体制所赖以生存的谎言。无怪乎体制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诸如写出《不按照谎言生活》的索尔仁尼琴、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萨哈罗夫和兰德斯贝尔吉斯，无不呼吁还言语以本来意义。

不应忘记，苏维埃政权本身也深知未经批准的自由言论的破坏力（后来证明还具爆炸力）。赫鲁晓夫下台后官方宣布的“修正主义分子”之一、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列恩·卡尔平斯基被开除出党，就是因为他起草了一篇尽管并不打算发表的文章，题目叫《言也是行》，文中强调指出：“出现了可以用言语的振动来推动体制的现实前提条件。”

言语成了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必要工具，也是由于他的计划及其选定的实施方法的特殊性。他正是指望通过讲话、解释、对于改革的鼓吹，将社会舆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让怀疑者跟着他走，甚至使对手回心转意。德国作家斯特凡·赫姆在《李尔总统》一文中，对于八月政变、总书记兼总统在政变策划者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近视之原因进行了思考，他这样写道：“他本来希望只要他戈尔巴乔夫有足够的耐心向这些同事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并借助公开性向他们稍稍施加压力，他们就会在总的进程中自己发生改变。到那时他们就会发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他和他们的党的利益。”

然而，从他 1985 年 5 月在列宁格勒的第一次成功的公开讲话（他出于政治敏感性建议在电视上全文播发）开始，在他最初抑扬顿挫的讲话中，自然也表现出他的禀性的特点。如上所述，早在斯塔夫罗波尔从事共青团工作期间，他就可以不用讲稿发表连贯流畅的讲话，不管面对怎样的听众，几乎什么话题都能谈，这个本事引起了老同志的

注意。有目共睹的演说家天赋，讲话有声有色，他那体现着坚定信念的真诚坦率和感情充沛，使之在拙口笨舌的党的干部中脱颖而出。

他的南俄口音，有时重音不对头，生造词语，按照自己的方式将难念的姓名改头换面，这些都像作料一样使他的讲话更加明快生动，不过也往往为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侮辱性插话提供了口实。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这些言语上的毛病，有时候他的助手毫不客气地纠正他，大概赖莎也试图像留意丈夫的领带和西服一样地留意他的讲话。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因为自己的失言而产生缺陷情结，正如他不因为出身农民而产生缺陷情结一样："大家要我怎么样啊，同伴们，"他对自己那些两鬓斑白的助手说道，"我是那儿的人。我们那儿就是这么说的。"然而他暗地里得出了结论。

随着岁月的流逝，戈尔巴乔夫又增加了另外一个特点：喜欢将所思所想说出声来。正是在谈话、交谈、讲话中（甚至在为自己未来的讲话稿润色加工时，他也喜欢向助手们读出声来），仔细倾听词语的发声，确定提法的说服力，寻找新的意味和论据，突然发现意外的想法和构思。他自己经常回忆起一个著名的简明例子——雷克雅未克。他在闷闷不乐地同里根分手后，心情压抑地去同记者们见面，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给他们讲点什么？"然而戈尔巴乔夫一出现在怀着同情与希望注视着他的记者以及电视摄像机面前、也就是全世界的面前，一张口讲话，他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判若两人，他本人确信不疑、并且让自己的听众相信：已经输掉的战役可以成为在战争（这里是"冷战"）中获胜的前提。

在许多党内和议会的辩论中也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的口才解除了怀疑论者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武装，使他们纷纷着魔，何况他遵循自己全面和解的方针，可以在一次讲话中找到足以使最冷酷的对手感到满意的字眼。"关于党和媒体的情况，戈尔巴乔夫说得很对，"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从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说一套做一套。如今（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说的都对，没有设圈套，可是做得少……"

除了集会上即兴的口头讲话之外，总书记也喜欢和看重较为严谨的书面讲话。他认为书面的东西可以对思想进行“整理”，使之变得严谨，使之符合理智和政治的逻辑。雅科夫列夫提请人们注意，这是“斯大林之后”第一个“亲自动手写、善于口授和改稿的”苏联领导人。曾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几乎大部分讲话稿均出自雅科夫列夫之手，正是雅科夫列夫作证说：“全都讲的是别人的话。戈尔巴乔夫讲的才是自己的话。”

言语以及政治家兼演说家在历次革命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这种作用转瞬即逝。在演说家之后，照例就是独裁者或者“屠夫”的时代来到了，谁要是不能像列宁那样从一种角色转换到另一种角色，那他们自己就会变成他们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的牺牲品，如米拉波①或者托洛茨基就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所幻想的改革拉长成为一场革命，它又发生在20世纪之末，不是世纪之初，更不是18世纪末，没有出现经典的革命凶残行为的危险。然而，这场革命包含了从政治角度看来几乎是最大的危险，那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数不胜数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警告过的，革命的“颠簸”，亦即贬值，甚至贬低。“因为他同一个话题要讲许多遍，”卢基扬诺夫甚至带有几分同情地说道，“他不能不旧调重弹，何况基本上是在阐明同样的想法，这渐渐开始令人生厌，然后是令人恼火。”但问题甚至并不在于显然过分的自我复制，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助手尽管是相当胆怯地、毕竟已在开始对他说了，建议他讲话“简短一点，有力一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试图尽量在批评家面前为丈夫辩护，她在《我希望》一书中说道：“他的长篇大论是由于希望得到理解。”这里可以再补充一点：由于他相信这是可能的。

然而，即便是他直至改革终了面对听众还能找到的那些最具说服力的话语，由于情况并未好转，也会对讲话人起相反的作用。改革的革命充满了滔滔不绝的报告和发言，在电视辩论中喧嚷一时，让话语

---

① 加布里埃利·米拉波(1749—1791)　伯爵，法国大革命活动家。

的喷泉抛到表面上来，革命渐渐变成了电视系列片，变成了无数面镜子组成的长廊，其中每面镜子里都映照出喋喋不休的改革首倡者的面孔。这个镜子长廊使得他本人离又一次很不太平的国家的现实情况愈来愈远。

尽管如此，那么批评者关于戈尔巴乔夫只顾空谈不干实事的严厉指责有没有道理呢？即使在批评家们看来，他依然首先是一个肯定干出事业的人：有些人认为他“干了许多蠢事”、把一个“伟大国家”毁掉了，有些人则认为他进行了宏大的改革。“不干事就是犯罪。即使干的当中出错，人们毕竟是力求干出点什么事情！”如此果断的说法，难道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吗？他是拿破仑的“先参与打架，到时候就清楚了”的毫无保留的拥护者，同时又是已成为现代经济信徒座右铭的说法的自发的发明人，那说法是：“做事，思考，学习！”

每个这样的论断中都含有真理的成分。然而，应当将戈尔巴乔夫明显的禀性特点与时间的描图纸、他的计划的编年史叠加起来。同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改革照例也自有其集会的、演讲的阶段。很难给这个阶段找到比戈尔巴乔夫更好的领导人。然而，革命刚刚开始演变成为改革，就需要另外一些，顺便说一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所固有的品质：作为政治战略家和机关的策略家、通晓国家与党的机器的行家以及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可惜是苏联学派）的品质。

然而，较之改革领头人良好的或者不良的个人品质，新阶段改革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团结一致的班底，再是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关于班底，确切地说是相继更换的几拨人马的可悲命运，那都是后话了。至于说到对于国家和国内展开的进程进行管理的机制，那么不可忘记：在一定的意义上，结构本身就装有爆炸物，因为如果不拆除体制的主要支柱——大权在握的党的机关，所设想的改革就无法实行。因此，这个得心应手的机器的杠杆，戈尔巴乔夫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是当它还听使唤的时候加以利用。总书记兼总统大讲特讲让官员们放心的话，那是在设下圈套，指望社会中不断积聚起来的量变会不失时机地转化为质变。

当他逐渐成熟到提出真正改革者的意图、对于将这个庞然大物对准何方尚心中无数时,管理机制并未出现问题。当他自己已经明确改革的构想和战略目标、摧毁机关的无上权力成为首选任务之一时,原来可以充当实行改革的工具的东西,就变成了改革的绊脚石和主要的反抗力量。

许多起初曾经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意图的人,如今都在责怪戈尔巴乔夫,说他拆毁、烧掉好歹还能派上用场的旧房子,却没有盖起新房取而代之。然而,首先,除了原来房子所占的地方而外,他再无其他空地来盖新房,除了旧结构的构件、将其连接起来并勤勤恳恳地为原政权服务的“螺丝钉”而外,他再无其他的建筑材料。其次,当时最新出炉的政治精英和职业精英(未来的官员)并不打算放过业已出现的机会,而且如今再也不必为总书记当牛做马了,他们绝不会仅仅出于感激之情热望自愿地无偿地为总统服务的。

顺便说一句,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早在1990年春天即明确无误地向他暗示这个意思,当时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就设立苏联总统职位问题投票,戈尔巴乔夫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纳扎尔巴耶夫代表他们发言,要求在各共和国也实行总统制,“以便消除已经初露端倪的总统制思想同共和国扩大自己独立性的意愿之间的矛盾”。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当时强加给他的“交易”时,心情压抑地承认道:“不必隐瞒,我当然并未打算在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使得我们在提高中央政权权威方面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共和国在同意赋予莫斯科更多的特有权力时,当即要‘自己的那一份’。可是毫无办法……当时我真正(不知是第几次了!)确信了:政治就是‘可能的艺术’。”

结果,总统从将他往后拽的政治局的怀抱中刚刚挣脱出来,又遇到新的、他所建立的权力机构十分冷淡的接待,这些机构不再害怕老广场,认为没有理由继续受制于克里姆林宫。

在民主的基石上修建就其效率而言并不比原来的极权主义政权逊色的新政权大厦,却原来是(那个阶段)无法企及的任务。他夹在他

已经背叛的自己的过去与他所孕育的、已经傲慢地将他弃绝的未来之间日益狭小的空间里，在两者之间东奔西突，希望不仅与之周旋、应付裕如，而是完成不可能的事情：像神话中所说的那样，将迎头相撞的山岩分开，以自己的身躯填补缝隙，以便防止二者迎头相撞。而因为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依靠，避免灾祸的最后一线希望，就只有言语了。

我无法同他们一起生活的班底……

像基督一样，每个领导人和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使徒。拿破仑有他的元帅，戴高乐有他抵抗运动的战友，所谓“历史上的戴高乐主义者”，卡斯特罗有同他一起在古巴登陆并前往马埃斯特腊山的“格拉玛号”乘员。因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空降到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像卡斯特罗占领哈瓦那那样占领莫斯科，而是通过宪法的途径（按照苏联体制的标准）、按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愿上台执政的，他就没有忠实的乘员，并且还得在航行途中更换几拨班底。说来奇怪，他愈是多看看集体领导班底中同志们的脸色，尤其是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随机应变、被迫作出妥协的情况愈多，他作出的人事决定往往就愈成功，愈准确。反之，随着戈尔巴乔夫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并逐渐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完全靠他青云直上的人，他的工作班底反倒变得不那么可靠，他在新的任命中搞的“私人婚姻”也愈来愈多。早在多亏戈尔巴乔夫才当上“公爵”的那些人所策划的八月政变之前，他最亲密的战友就对于他在人事问题上临时现凑的做法往往感到困惑不解，并且预言会因此招致政治上的失败。至于说要想像到莫斯科会发生几近经典的拉丁美洲式政变，那么未必有谁能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让原先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参与讨论人事安排的情况愈来愈少了，顶多不过默默地听取他们的建议而已，具体的人选仍有待与博尔金（当然还有赖莎）最后商定。也许大学时

代好友姆雷纳尔日曾向他敲过警钟的、赫赫有名的自信，在这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他事后也因此感到后悔：他当初真心诚意地确信自己在人事问题上同在农业问题上一样地驾轻就熟，绝对内行。当特别固执的助手仍然决定就某项他们认为显然是考虑不周或者姗姗来迟的人事决定向他提出自己的怀疑甚至批评时，戈尔巴乔夫照例是摆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别太戏剧化了。晚一点儿倒对了。现在你看见了吧，什么都恰到好处。"

他还有一个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的行为特点，便是在同他毫不怀疑其忠心耿耿的人相处中的漫不经心，这曾经刺伤他的许多拥护者。他可以十分慷慨地花费时间、耐心以及自己魅力的大量资源，以便将动摇犹豫者和怀疑论者吸引、引诱到自己这边来，或者使对手保持中立。在这种场合，当交往和辩论是在公众场合进行时，他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字斟句酌，甚至面部表情都不敢马虎，而且不把谈话对方或者听众征服决不善罢甘休。

大多数人同他初次见面后，对他的印象都非常之好。"他看上去全神贯注，对论据反应迅速，好交往，喜欢开玩笑，"彼特拉科夫回忆道，"没有同普通工作人员见面时那种通常的'自下而上'的谈话。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见面有所准备，熟悉各种观点，他对问题大体上是明白的。几句开场白之后，马上就可转到现实的工作上来。"

"戈尔巴乔夫风格的实质很简单，"切尔尼亚耶夫证实道，"不做作，不傲慢，不摆架子，尊重人，强迫自己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做个民主派。"诚然，当事关"自己人"，事关那些无须说服、反正也"无处可去"的人时，他就完全放松了，这时他会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甚至就像是对于用惯的家用物品一样，暂时忘却其存在、不再理会，这对许多人说来大概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从边疆区委时期即已习染上、在他的情况下因友善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民主主义而大为缓和的这种当官做老爷的派头，使得许多对戈尔巴乔夫最具好感的人、特别是他的亲信身受其害，其中有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巴卡京、沙塔林、彼特拉科夫、法林。他们确实是无处可去。对于大多数人、特

别是上点岁数的人来说，他毕竟是命运的恩赐，是此生可以看到冷酷无情的高压体制多少变得有人情味的突然具体化了的希望，是对于原来在这个国家也可以实行某种合乎理智的制度的一种确认。

对于他们因此终生感激不尽的这个人的怨恨和不满，通常都是互相倾吐倾吐，大家都抱怨说，他心思不专，不能坚持到底，说话啰嗦，前后不一，变化多端，“坦率得恰如其分，阴险得恰如其分”（雅科夫列夫语）。总之是江郎才尽，然而，每当感到他和改革本身、也就是他们的理想遭遇危险，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去维护他。再说，由于他极其繁忙，不难找到纯人道主义的让人谅解的理由。万不得已时，当他们从人道的角度实在受不了、从职业的角度又看不到自己努力的回报，可能决意辞职，辞职也依然并不意味着决裂，即便像沙塔林那样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或者谢瓦尔德纳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激昂慷慨的讲话，也是如此。后来，当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的确身处逆境并向自己原来的战友求助、以此间接地承认自己当初做得不对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回到他的身边，有的是出于个人的依恋，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共同开创的事业的忠诚，希望哪怕推着他稍稍往前走走，甚至事先都明白那不可避免的、多半是可悲的结局已经为期不远。

要离开戈尔巴乔夫这个人颇非易事：按自己的性格、按天性，他是一个“人的收藏家”。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并在党内任职期间继续进行，他认为从每个人身上均可汲取到有趣或者有益的东西。他希望所有进入他的范围的、往往观点和禀性截然相反的人都能“和睦相处”。他真诚地相信，预示着我国引人入胜的未来的改革总计划，作为总计划体现的他本人，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因此，除了极少的例外，当变化的形势或者政治斗争的逻辑让他同某人告别时，戈尔巴乔夫从不主动提出“告别”，而多半是恰恰相反，他感到可能失去战友或者有益的盟友了，便开始再次表现出对于此人的关心。也许这里反映出继承下来的庄稼人的特点，他在贮藏室里贮藏了各种用具和工具，他知道在经营中无论哪个都早晚用得上。

因此他的班底成员在拿定主意真正离开的时候，像彼特拉科夫和

谢瓦尔德纳泽,事先都不让他知道,后来解释说,自己这样做是因为担心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劝阻他"。当谢瓦尔德纳泽因受到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向总书记提起辞职的话题时,就是这样的结局。切尔尼亚耶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之后未及凭最初的一时冲动一走了之(他写的辞职报告在保险柜里放了几天,"生病的"女秘书有预见地将保险柜钥匙带走了),他后来承认道,自己是"错过了机会",以至重新坠入戈尔巴乔夫及其意图的强大引力场。

这种"收藏家"和"调停人"的特点,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使他能够减轻并缓和在政治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冲突,也扩大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戈尔巴乔夫竭力避免或者哪怕拖延一下理所当然的划清界限,换言之,竭力回避与其说是在人们之间、倒不如说是在他们所体现的立场之间作出选择,从而浪费了时间;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

就连那些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他们在他身边的继续存在已开始给他造成直接的损失、甚至构成威胁的人,他也不愿意、不希望与之一刀两断。这里首先涉及到仍然置身于他的阴影里,充分利用形势的模棱两可、机关的服务和中央委员会电话的渐成气候的保守复仇派领导人利加乔夫、波洛兹科夫,以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久加诺夫。还有埋葬他那对体制进行"平稳改革"的计划以及联盟国家的人,这些人来自当时尚未形成的新生"民主派"的阵营。

叶利钦失宠的倒霉事件之后,助手们纷纷建议戈尔巴乔夫将这个危险而贪图虚荣的潜在对手打发到哪个国家去当大使,他漫不经心地却十分坚定地说:"伙计们,瞧你们说的这话,这可不行。他是个政治家啊。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把他抛出政坛。"不但如此,他明白在他俩之间关系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叶利钦无论出什么事,都会败坏他戈尔巴乔夫的名声,便嘱咐克格勃首脑:"你可得当心,他哪怕头上掉一根头发,我也要拿你是问。"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自己甚至对于公开的敌手采取宽宏大量、几乎宽恕一切的态度,与其说是经过理智斟酌的立场所致,倒不如说是性格使然:"我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我不能对人

搞报复。”

时至今日，尽管当初他收罗到一个班底里的人，诸如利加乔夫或者“出卖”他的卢基扬诺夫，在他的计划的历史性失败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他仍然尽量做到不抱成见。“我始终看重叶戈尔[①]的直率。我至今仍然对他抱有好感，尽管从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开始，他就在我的背后搞动作……至于卢基扬诺夫，他在改革的法学琢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说他如今竭力否认。在八月政变中，力求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想法使他走偏了方向。但是他并不适合这个角色。他多才多艺，可25年都是在最高苏维埃的走廊里度过的，没有从实际生活中汲取营养。结果就成了莫斯科的阴谋家和官僚，而不是政治家。”

宽容态度，有时近乎不严格要求，近乎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愿激化与人们的关系或者不愿与他们发生冲突（“我明白，有些人已是江郎才尽，可是不能对他们不尊重。我们又不是磨坊，把人磨碎了再抛出来。他们一般都苦干了三四十年啊。”），这当然主要是来自天性，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它已经削弱甚至破坏了俄国所习惯的民族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和威信。沙赫纳扎罗夫在重新提到叶利钦的事件时说道：“要是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暗示说：我一点不知情，要是他自己送了命，那这是他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连这样的议论都是不允许的。”

然而，这种迟迟不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班底告别的另一面，就是他不打算为新一代政治家清扫场地。这是不必搞斯大林式的清洗就完全可以做到的。还是那个沙赫纳扎罗夫讲道，1991年初，他在奥·博戈莫洛夫院士的帮助下，在自己的研究所里举行了一次与“新涌现的政治家”的会晤，其中有加·波波夫、帕·布尼奇、C. 斯坦凯维奇、A. 穆拉舍夫，这些人在萨哈罗夫去世后，觉得自己充当叶利钦的“政治步兵”角色不是太舒服。“他们说，愿意‘投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惟一条件是，他与自己的政治局一刀两断，并且向他们发出他把希

① 指利加乔夫。

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信号。我把这个试探对戈尔巴乔夫讲了，他未置可否，后来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伙伴们给我来电话，问他有何反应，可他当时未下决心。看来，他对这帮人不是特别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到 1991 年早春时节，叶利钦的完全另一批“副官”——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与沃夏诺夫在同亚纳耶夫和戈尔巴乔夫班底中某些未来的政变分子打交道时，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显然已是江郎才尽”，再也搞不下去，因此他身居总统职位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大负担。戈尔巴乔夫直至政变之后才得知他背后的这种活动，他说，“忠实的鲁斯兰”曾向叶利钦报告了亚纳耶夫的意向，叶利钦当时在他面前却只字未提。

随着改革的政治装药的逐渐耗尽以及改革内部矛盾的加剧，戈尔巴乔夫的班底开始受到侵蚀，而他本人，在工作日依然排满了会见、电话和接见来访者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从专门有趣的人的“收藏家”、“社会的灵魂”逐渐变成了孤家寡人。他最后一个真正的班底、他惟一可以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的班底成员，大概只剩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早熟的、与父亲分忧的女儿伊琳娜。

这种孤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甚至不可逆转的。这首先是职务和最高权力所决定的，尽管他真心力图改变千百年来的传统，按照俄国的通例，这种最高权力依然倾向于绝对化。这不能不影响到戈尔巴乔夫与身边的人、包括亲信之间的关系，由于国家权力机器的逻辑，他们都处于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臣民的地位。第二个客观上加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孤立和个人孤立状态的因素，是以独特的方式包含在他所选择的命运中的改革家的孤独，他故意不在彼此对立的两个阵营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寻求妥协的、横在反对者和死对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就往往两边不讨好。

“没有幸福的改革家，”他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所喜欢的说法，看来既从中找到安慰，又为他所不习惯的孤独找到辩护的理由。“政治家都是些不幸的人，”他在接受《新报》记者 Ю. 舍科齐欣采访时抱

怨道,“不是没赶上点儿,就是没有作出决定的时间,更不用说研究形势和周密思考所需的时间了。”几乎是所有最高执政者的地位的这些特点,尤其是在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它们加重了任何一顶俄国皇冠的分量,再加上他的天性的特点,从 1989 年年底开始,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在它们的重压下,本来即已超载的改革之船已沉到吃水线以下。

总书记喜欢高谈阔论,于是政治局会议往往变成他独自一人的长篇大论。当然,抱怨他怠慢、“无论谁的”(自然首先是他们的)忠告也不听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起初出于明显的政治考虑与之断绝联系的人,他们心怀嫉妒地注视着他周围形成了新的顾问和参谋班子。葛罗米柯已经习惯于那种批准事先商定的条文的简短仪式,加之开始有些体力不支,他往往在会上打开瞌睡,更何况实际上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回到家里对儿子抱怨说:“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情况愈来愈糟。戈尔巴乔夫好多事情都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干,向党内同志隐瞒他自以为很巧妙的举措。”说到这里,葛罗米柯一反往常的字斟句酌,对自己所推荐的人作出严厉的判决:“我是担心我们生活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的领袖至上主义的条件下。”我们记得,叶利钦早在 1987 年的十月中央全会上就曾不怕激起众怒,提到领袖至上主义,暗示新的个人崇拜露头的危险。

很快就被打发回家、曾多年担任总书记国际问题助手的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痛心地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认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忠告。”没有说什么恭维话就让退休的盖·阿利耶夫也对他心存怨恨,认为自己的退休是因为新领导人不愿意让“大人物”留在自己的身边。然而,从飞快旋转的改革离心机上逐渐开始掉落下来的,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的干部,也有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干部,他最初的队伍。

那些接替他们的人,同戈尔巴乔夫没有共同的过去,也不像“首批”改革者那样共同抱有最初的动机和希望。同这些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似乎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新人中没有人会(如葛罗米柯那样)仅

仅以自己的存在、或者（如利加乔夫那样）公开地提醒人们，戈尔巴乔夫之当选党的领导人是谁的功劳。当着这些人，他可以像在雅科夫列夫或者沙赫纳扎罗夫面前那样，不羞于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当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多亏他才有了今天的一切的人（彼特拉科夫毫不客气地称之为“马屁精”）时，戈尔巴乔夫就拥有了倾听他的讲话、同意他的意见、不争论的听众。仅仅凭这一点，就可以不必对这些人特别讲客气，不过他以为可以不怕他们，这就想错了。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使自己处于并非依靠某种观点和意见（他们没有观点和意见，要么是认为不说为佳）、而是依靠他们的个人忠诚（博尔金断言有一次在飞机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出让他宣誓效忠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就是说，依靠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而不是信念。

在对待这些愈来愈扮演服务人员角色的人们的态度上，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对其仆从负责的真正的“领主”，可以表现得甚至更加礼貌得体，在他们受到批评时为之辩护，例如对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他实际上对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或者利加乔夫都从来没有这样干过（在臭名昭著的T.格德良和H.伊万诺夫攻击他的时期）。“从上面”开始的换代也起了作用。在告别了“老人”并开始与同龄人分手之后，戈尔巴乔夫不知不觉地从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看自己）变成了长老，这也加速了他的秋天的到来。

任何时候都知道“应当报告什么”的克留奇科夫，用令人宽慰的、关于各地改革受到“全民支持”的战绩报告讨他的欢心，以此赢得信任，并以自己这一有针对性的情报和虚拟情报把戈尔巴乔夫朝自己所需要的方向推。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其正直一向受到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的切布里科夫也曾警告说，不可轻信克留奇科夫“塞”给他的一切。有一次戈尔巴乔夫曾将克留奇科夫的密报给雅科夫列夫看，雅科夫列夫证实说：“里面全是清一色的阿谀奉承。全是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对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赞扬。他那里国内情况一切正常。他像对吸毒者一样，使戈尔巴乔夫习惯于正面的东西，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因为赞扬而受到鼓舞，渐渐地变得离不开赞扬。同时也有关于自己

对手的情报。其中包括关于谢瓦尔德纳泽的。利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于谢瓦尔德纳泽威望、对于人们对谢氏的态度的嫉妒心。大概,也报告了关于我的情况,不过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我看。”

克格勃主任克留奇科夫和总统办公机构负责人博尔金借助每天放在克里姆林宫桌上的情报,拼命收拾自己的对手,引起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和嫉妒。雅各阴险的手法在身居高位的阴谋家的手段中得以复活。结果是,总统开始怀疑仆从所指的那些人“挖他的墙脚”,其实仆从才真正是在背着他编织阴谋的罗网。巴卡京讲道:“有一天戈尔巴乔夫突然开始急急忙忙地找我和雅科夫列夫,那是在博尔金向他报告我们同总参谋长莫伊赛耶夫一起去采蘑菇(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采过蘑菇)之后的事情……”而1991年夏初雅科夫列夫“觉出了他们在折腾什么事儿”,便试图让总统注意这些未来的阴谋家,戈尔巴乔夫却摆摆手说:“亚历山大,算了吧你。他们要干这种事儿,既缺少魄力,也缺点脑子。”最后,正如在古希腊、罗马或者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一样,上演了脍炙人口的场面调度:“沙皇”所关怀和提拔的人将他出卖了,而他漫不经心地、起码是不够精心地对待的人,却没有背叛他,并且在困难时刻捐弃前嫌,搭救了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一个从本能上与莫斯科官僚“沼泽”格格不入的人,不过才执政三四年时间,就连在最亲密的和毫不谄媚地忠于他的人心目中也起了这样的变化呢?是否他打算猛地举起的杠铃的重量(不仅是体制、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改革),即便对于他那农民的脊梁、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无法胜任的呢?要么是他那始终一贯的天性也经受不住绝对权力的腐蚀作用?绝对权力不仅以其重量把人压向地面,而且从内部腐蚀着他。也许诸如初战告捷和举世赞美之类的一般考验,比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还更难跨越?为什么就连忠心耿耿的切尔尼亚耶夫也会痛苦地说出“伟人未能保持住自己伟大性的水平”这样的话呢?要么不过是此前隐藏起来的、也许他本人原先并不了解的性格的弱点和毛病浮出水面,让大家都看见了?

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将法文的“一切都是女人从中作祟”改成俄国

版本,说道:“全都是赖莎的错。是她出于过分的自负,给自己提出了将平庸之辈捏制成伟人的目标,在自己丈夫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精神分析专家对戈尔巴乔夫独特的个性感到好奇,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别尔金教授于1991年秋天写道,戈尔巴乔夫行为中的许多东西,可以解释为许多杰出政治家所固有的“恋己癖”的表现,那不是一般的自我欣赏综合症,而是独特的“渴望承认”,它强化了所有的能力,“赋予个人非同寻常的光辉,使之可以大大超出普通人才能的范围”。然而同一个个人到了危急和挫折时期,便开始自卫,构筑“心理装置的棱堡”,这种心理装置可以从自己心灵中取出刺、对自己的不满、羞耻感、对自己的懊恼,再放到别人身上去。“我所设想的事情没有成功,结果与期望不符,这都怪他们,怪不称职的助手或者阴险的对手。”

一旦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才能出众的个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力图更换班底,降低其水平,以便保持自己无可争议的优势。“名人无需来自其他光源的任何补充照明,”别尔金教授这样写道,他把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当成医学现象来进行“解剖”。“他只要他自己就足够了。周围的人的使命,就是反射他那可穿透一切的光线。”法林在最后阶段坚决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他在自己的叙述中也谈到“恋己癖”:“戈尔巴乔夫的出类拔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可以发展成为杰出的人物,如果不是患上(对政治家说来十分有害的)自恋综合症的话。他是让权力彻底地毁掉了。”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甚至相互抵触的解释中,大概除了自然而然的偏见而外,有某种真理的成分。它们合起来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切都恰恰这样发生了,却无法回答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切不会有其他的结局吗?

我们逐一提到了朋友、敌人和精神分析专家的种种说法,这里再来回忆一下政治吧。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确实成了孤家寡人。他那在不同政治翼侧之间的东奔西突,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反映出“纵横捭阖天才”的巧妙策略了。这是一种反应性和冲动性尝试,他在摸索

从脚下滑走的中派阵地，摸索社会情绪的航道：它像水流湍急的河流的航道一样不断变化。结果是，他依次成为不同政治营垒的人质。他所自觉选择的、在彼此愈离愈远的社会两极中回避作出明确选择的立场，已经失去辩白的理由，主要是失去了效果，愈来愈被当成个人优柔寡断的表现。此外还应加上本能的无法做到孤注一掷，比方说他与叶利钦不同，不能把一切都赌上，不考虑后果地干。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在俄国的非理性情况下，往往正是这样不假思索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创造着新的现实，一旦成功即可以实现政治上新的质变。

无论戈尔巴乔夫受到怎样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往采取“果断行动”那边的推动（从激进民主派要求与“政治局同志们”决裂，到克留奇科夫坚持采取“非常措施”以挽救党和国家），他都固执地加以回避。甚至在得到额外的权力（据他自己坦言，在某个时刻只有上帝比他的权力大）时，他也实际上从来不用。“戈尔巴乔夫要这些新的权力干吗，”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苏维埃大发感慨，“他连现有的权力都不用的！”

有些政治家认为此乃一大幸事：掌舵的不是选择明确、坚决果断和毫不妥协、像列宁那样比其他人更了解“应当怎样”的人，而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灵活、随和、倾向于搞妥协的人，何况他还遵循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顺便说说，也符合马克思的忠告），对一切都加以怀疑。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总书记兴之所至，居然给与会者设下了心理圈套。“你们可能全都以为，”他突然对着全场说道，“不是该总书记最终拿出点儿毅力来了吗？”说着握紧拳头往桌上敲了一下。场内掌声四起。戈尔巴乔夫把拳头松开：“原来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你们只相信拳头。”中央委员们羞愧地默不作声了，却未必会原谅他的这次挑衅。这样一来，他所经历的孤独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正是他的计划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未来社会的轮廓已大致勾划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下一个阶段既无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又无合适的班底，干脆没有足够的精力。

戈尔巴乔夫凭着坚强意志和高度集中的精力，才将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变成自己又一次战术上的胜利，大会闭幕前夕，博尔金于晚间来到总书记的办公室，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孤零零地坐在桌旁：他一个人闭门造车，亲手拟定新一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仿佛是为了嘲弄，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亲手写上那些一年后组成他的行刑队的人的名字。因此，当他愤怒地冲着前往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表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代表谁？”时，他们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他：“代表您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戈尔巴乔夫在驳斥这些对于他的自尊心说来相当沉重的指控时，喜欢提醒说，就连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也出现了叛徒。“他可是上帝啊，我是个凡人……”他真诚地或者假装地妄自菲薄，这样说道。他的最后一拨使徒中，大部分人是叛徒。此外，耶稣当时既无自己的克格勃，又无设有分支的情报机构。尽管从另一方面说，正是这些机构将摆脱他们控制的总统“交了出去”。

克留奇科夫在一次关于改革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坦言：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1991 年 8 月，克格勃便试图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第九章　一九九一年：一号灾祸大事记

天上的刹车

1990年年底一片惨淡景象。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总统兼总书记依然使用着两边的办公室）的气氛愈来愈压抑。这更可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举止上看出来，因为迄今为止，他那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和令人惊叹的心理稳定性，使他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仅能自己保持镇静和冷静，而且能以自己的精力和信心去感染别人。当连他的助手或谋士都快要神经失常时，当看来改革者的方针已完全注定失败时，他的镇定自若和不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曾不止一次地令他们惊叹不已。"算了吧，格奥尔基，"他安慰感情激动的沙赫纳扎罗夫道，"别难过，你瞧着吧，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的。"

某些易动感情的人，如巴卡京，认为他那坚不可摧的神经铠甲不过是肤浅的证明。另一些人，如雅科夫列夫，赞叹不已的是：他怎么会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听取各种胡说八道"、忍受令人委屈甚至侮辱性

的对自己的攻击，仅仅是为了让大家都做到一吐为快，按照自己的条件将辩论进行到底。“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连跟他们打一刻钟的交道都受不了，”雅科夫列夫在州委书记和将军们特别猛烈的攻击后这样坦言道，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例行的中央全会上经受了这样的攻击。

有时，西方的来访者在对他的冷静和乐观主义感到惊讶之余，问戈尔巴乔夫他的坚毅精神是从何而来，他通常都提到三个“保卫系统”：“第一，大概毕竟是父母给了这个遗传素质。感谢他们。第二呢，是坚信我干的是需要的事情的信念帮助了我。至于第三嘛，是家庭，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这是我可靠的后方。”他那遵守传统同时又是历史性的乐观主义，也确实是坚定不移的对自己正确性的“路德式信念”（“我坚持那种观点并无法改变”）以及与生俱来的农民的信念这二者奇怪的混合物：农民坚信倾盆大雨或者久旱无雨迟早都会转为好天气、投入土地的劳动必将结出自己的果实。

然而，到 1990 年与 1991 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就连戈尔巴乔夫乐观主义的“战略储备”也似乎即将告罄。从前可以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做到的事情，现在不行了。一切都不顺手。他继续取得的例行的战术胜利，无论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总统还是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制服保守反对派，都是以让步、牺牲和使胜利失去一半意义的妥协等愈来愈大的血的代价换来的。愈来愈难以确定如何定义这些半拉子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胜利呢，还是好不容易得以避免的失败。更何况愈来愈多地需要以新的祭品作为成功的代价。

在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度过改革头几年的许多人纷纷离开他的班底、各奔前程之后，他的棋盘上大子儿（尽管任性）没有了，剩下的多为小卒子。他只好开始将他们往王后那边推。于是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卢基扬诺夫、普戈甚至博尔金都跻身于高级别政治活动家之列，戈尔巴乔夫还曾试图让博尔金进入自己的“新政治局”——安全委员会呢，看来他是忘记了另外一个“提公文包的人”——契尔年科可悲的政治轨迹。

至1990年年底，他身边新的随从实际上已经主要由不大熟悉的人组成，让他们担任关键职位，一般都是根据别人的忠告和暗示，而不是源于自身的经验和在一起长期相处的经历。戈尔巴乔夫的两名政治上的“家庭教师”——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依然对自己的学生无限忠诚，他们在此期间不安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政治品质的“丧失”，发现他明显降低了对于身边的人要求的水平。“他不再感觉到为他准备的材料多么地单调乏味，”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仿佛是治疗医生在病人的病历中这样写道。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变得“孤僻”，是受迫害综合症的结果，是由于他成了各方攻击的对象，攻击愈来愈猖狂，正是由于不受制裁。

“今天的《真理报》选登了一组来信，全都是唾沫四溅地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助手在日记中记录了9月份的政治温度。11月：“右派因他被授予诺贝尔奖金而怒不可遏。”马上又是来自另一条战线的攻击：“《莫斯科新闻》上，‘改革的工地主任’——叶·安姆巴尔楚莫夫、亚·阿达莫维奇、尤·卡里亚金、尤·阿法纳西耶夫、亚·格尔曼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在卢基扬诺夫控制的最高苏维埃，亲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以及与其针锋相对的联盟议员团轮番发言，要戈尔巴乔夫辞职。他对他们的攻击处之泰然，把那当成理所当然、实质上也是理应受到的攻击。至于‘民主派’的攻击(10月‘民主俄罗斯’代表大会在决议中要求让总统、政府和最高苏维埃辞职)，他则感到难受，认为是背叛行为。”

事实上，又一代民主“平民知识分子”并未对俄国历史融会贯通，看来是显示出先天的不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显示出似乎无法治愈的俄国知识界的通病——焦急的症状。该病世纪初由“路标派”①诊断出来。尤里·特里丰诺夫将“路标”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篇名，小说讲的是刺杀改革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是的，开始

① 路标派　因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而得名的一批由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的撰稿人组成的集团。

了通往各各他[①]之路，"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个可悲的结论很快就得到了证实。除了取代石头的报刊上的"唾沫星子"和最高苏维埃的攻击而外，又加上了开枪射击。在庆祝十月革命73周年的节日游行队伍通过红场时，来自伊热夫斯克的钳工A.施莫诺夫从斗篷中掏出双筒猎枪，试图朝站在陵墓主席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开枪射击。经法庭审判和身体检查，断定他患有疾病，便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新班底中的主要权威、两位"灰色主教"分别为克留奇科夫和卢基扬诺夫。大部分情报正是他们（往往通过博尔金）向戈尔巴乔夫提供的。这两个人生活经历和仕途都相去甚远，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除了两人目前职务上处于受戈尔巴乔夫支配的地位而外，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关系：对于曾经一度是、也许始终是他们真正"顶头上司"的安德罗波夫的忠诚和怀旧的眷恋之情，其中，克留奇科夫自从1956年悲剧性的匈牙利事件起就如影随形地跟随安德罗波夫，卢基扬诺夫则曾在安德罗波夫任内当过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左派"抛弃"他（民主派自己则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之后，有这两位安德罗波夫前"副官"作掩护，他可以感到自己较为安全。然而，既然"亲信"监督着送给他的情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监督着他的一举一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也就处于他们的监视、甚至是看押之下。

就精神和"血统"而言，民主派当然与他更为接近，与民主派的"离异"毕竟使他感到难过，他安慰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冷淡，因为它与政治逻辑相悖，只要假以时日，那些缺乏耐心的激进的战友就可意识到他是对的。民主派中有些人确实也有恍然大悟的时候，可惜戈尔巴乔夫已经引退，而且他之所以引退，其中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尽管如此，1991年新年前夕更让他感到苦恼的，并不是由情势和最高苏维埃强加给他的格格不入、像硬皮鞋一样夹脚的班底，而是改

---

① 各各他　耶路撒冷近郊的一座小山，据基督教传说，耶稣钉死于该地。

革今后的命运尚不明朗。他把改革的刹车当成被迫的战术间歇，以为保守派会让他能够在他们的阵营里暖暖身子，喘喘气儿，为新的改革攻势养精蓄锐，且不会为此提任何要求。他认为，整个国家和他本人都理应得到这样的喘息：五年半的时间干了不少事情，按照经典改革的规则，对于突然降临到人们头上的“决定命运的变革”，理应好好消化。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后不过两年的时间，国家经历了事实上的政治体制更迭：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举行了三代苏联人生活中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国际舞台上的变化更不消说：自阿富汗撤军，签订关于销毁“欧洲导弹”和拆毁柏林墙的协定，此举不仅为德国统一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回归现代世界和共同的历史开辟了道路。问题是出在另外的方面：如果说“宏观政治”中有益的变化无可争议的话，那么在“微观水平”上——苏联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

戈尔巴乔夫看来是忘记了，他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奔波于斯塔夫罗波尔各个区中心、解释揭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时，即已发现政治家不可忘记的一个规律：“*人们衡量自己的领导人，不是凭意识形态的公式，而是凭他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1990 年与 1991 之交的那个冬天，全国显然是快到了向他提醒这个政治公理的时候。

当然，这种局势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早在仿佛无法阻挡地胜利行进的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例如原蒙特－爱迪生公司总裁、意大利人斯基姆贝尔尼这样的怀疑论者，就曾经警告说：“*戈尔巴乔夫的惟一危险是空荡荡的商店和消费者的不满，这种不满必将引起普遍的动荡。*”总书记本人几乎每到新年前夕都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警告：“*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如果供应状况得不到改变，我们就得下台。*”

又一个“关键性的一年”结束了，供应状况只是更加恶化。戈尔巴乔夫大概是意识到，用一年或者 500 天的时间奇迹般地扭转经济形势并不现实。然而，他担心从政治上损害改革的形象，尤其在开出空头支票之后，他下不了决心公开说出人们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

甚至害怕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准备依靠政治的而不是市场的自发势力,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它自己最终会在国内实现协调一致并整顿秩序。然而,因为所期待的奇迹(水变成酒,关于繁荣的话语变成经济高度发展)迟迟不见出现,商店的货架却空得令人可怕,只得放下架子,去讨好西方,讨好那些不久前曾对其推销自己宏伟的新世界设想、对其鼓吹新政治思维的金科玉律的同僚。

至1991年春天,去何处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几乎已成为他的第一要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定他的会见甚至出国访问的日程表时,愈来愈考虑到获得贷款的机会。例如,对于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访美后顺道访问韩国的提议,是在韩国方面确认准备为改革捐助20亿美元之后才表示同意的。在同国务卿贝克的例行会谈中,谈判的政治部分结束后,戈尔巴乔夫"顺便"提出,当此"苏联经济困难时期"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如同雪中送炭。贝克答应考虑考虑,数日之后,让大使通知他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愿意"设身处地",拨出援助款项。科威特的埃米尔也有同样的表现,以感谢苏联在抗击伊拉克中的外交支持。不过这些"施舍"不能根本解决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的问题。3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不得不说:"再过两三个月,全国就要断粮。"

切尔尼亚耶夫描绘了当时的超现实主义图景:身为苏联总统助手的他,开着带有信号闪光灯和同克里姆林宫进行密码交谈的设备的私人汽车,跑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的面包店,结果是空手而归。首都的情况尚且如此,外省的状况如何就可想而知,而且也不难理解:罢工矿工威胁要开始总罢工,这并非如戈尔巴乔夫所解释的那样,是改革敌人的"挑衅行为",而是改革本来要为之谋福利的那些人准备给改革作出的判决。

总统心情压抑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联盟的状况岌岌可危。在卡拉巴赫事件、第比利斯事件和巴库事件以及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拉脱维亚之行以后,已经十分清楚:原来的联盟濒于崩溃,新的联盟遥遥无

期，而且相信的人不多。在不回到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前提下保住联盟国家，只有在至少预先得到形式上的合法支持——大多数居民的委任状的情况下方可做到。全联盟的全民公决即可将委任状送给他。关于举行全民公决的原则性决定已经作出，剩下的问题是拟定提交全民表决的问题，以便借助肯定的答案（这点不必怀疑）以最合法的形式杀杀那些愈来愈入迷的"主张自治者和分离主义者"的威风。然而，全民公决在春天之前无法安排，只有等到春天再说了。

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形势。在经受住中央的政治压力、总书记的"骑兵奔袭"和事实上的经济封锁之后，三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而且相信他们离梦寐以求和饱经苦难得来的独立只有几个月、而不是几年的时间。他们"不顾莫斯科紧皱的眉头"，于1990年11月来到巴黎签订新欧洲宪章，指望在克莱贝尔大街的会场里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其他成员平起平坐。只是由于苏联总统向密特朗提出若不将波罗的海三国代表逐出场外就决不签署任何文件的最后通牒式抗议，会议组织者这才将急躁的来宾请到观察员和记者所在的顶层楼座。

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便精神倍增地开导他说，在波罗的海三国也并不是大势已去，只要中央给"健康力量"提供最起码的支持，他们就会使胆大妄为的民族主义者"清醒过来"。根据克留奇科夫掌握的材料，"劳动人民"会热情地支持他们（"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这位当年的克格勃首脑回忆说，"70%—75%的人赞成保住联盟国家。"）当然，给局势"正常化"行动增加麻烦的只能是国际的抗议。戈尔巴乔夫不能对西方同僚、尤其是美国同僚的意见坐视不理，苏联经济的存活愈来愈取决于他们。不过在一月之前，国际政治的形势似乎还不错。美国正忙于惩罚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的准备工作：联合国安理会最后通牒的期限已到，布什最关切的是苏联不要改弦更张。为此他愿意暂且对于莫斯科在波罗的海三国恢复"宪法秩序"的行动视而不见，条件是当地局势不得发展到动用武力的地步。

况且戈尔巴乔夫早在10月份即通过梅特洛克向布什保证说："尽管我们处于国内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我并未改变前进的方向。"马耳他会晤后，布什曾对身边的人说，他相信自己的苏联同僚。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全国上下期待他实行"铁腕政策"的戈尔巴乔夫，在克留奇科夫、普戈（本人是波罗的海人，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提的是什么建议）和亚佐夫（对部署在该地的卫戍部队事实上被围困感到忧心忡忡）的压力下，终于投降了。他大体和一年前对布拉藻斯卡斯说"你们愿去哪儿去哪儿"一样地摆了摆手：试试吧，看看你们的"健康力量"都能干些什么。此外也对他没有更多的要求。且不说计划在维尔纽斯采取的行动结果如何，可以认为俘获戈尔巴乔夫的战役开局是顺利的。

一月。维尔纽斯："知道，不知道？"

1991年1月13日（"13"这个数字名声不好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晚上，时任立陶宛内务部长的米休科尼斯打电话到自己原先的同僚巴卡京的家中。他通报说，有人在维尔纽斯策划了一场有部队和从莫斯科去的阿尔法分队参加的真正的激战。特种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攻打了由手无寸铁的人群守卫的维尔纽斯电视中心。据部长掌握的材料，死亡人数已超过10人。与普戈、亚佐夫或者克留奇科夫联系不上，他们的电话无任何应答。

激动不安的巴卡京赶紧往别墅给戈尔巴乔夫去电话。他感到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听了悲剧性的消息，竟处之泰然："别着急，瓦季姆。我已经得到报告。你的那些立陶宛人太夸大其词了。市内的局势激化，是由工人纠察队与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有人伤亡，不过不会让部队擅自行事的。我已经下令把情况搞清楚。"巴卡京明白，总统是在向他转述克格勃对于事件的解释。

次日早晨即已查明，实际上情况比这位无所不知的机关的领导人所描述的要严重得多，而且看来已经超出他本人的预料。攻打电视中心造成13名和平居民身亡。立陶宛议会周围出现了街垒。至今无人知晓的、以拥护苏共纲领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位书记为首的民族拯救委员会，要求推翻兰茨贝尔吉斯政府并在共和国内实行总统直接治理。看来，这就是整个草草拟就的脚本的最初目的，按照这个脚本，起来反对分离主义分子的工人纠察队的"自发行动"必将导致与忠于当局的警察的冲突，从而为联盟军队和特种警察部队的介入提供了口实。

不过，由早在1月10日就从莫斯科秘密前往该地的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和弗拉季斯拉夫·阿恰罗夫两位将军挂帅的这一专项战役的过程证明，1991年型的苏联克格勃就其职业素养而言，比1961年策划反卡斯特罗的"健康力量"科奇诺斯湾登陆的中央情报局高明不了多少。第一，反分离主义者要少得多：只有数百人，而不是所预期的数千人。第二，仿佛是力求决不落后于屡屡受挫的美国同行，莫斯科的战略家们同美国同行一样，未考虑到时差，因而其使命为镇压"街头动乱"的坦克和阿尔法分队，在动乱开始的一小时之前即已抵达出事现场。

这次夜间冲突使戈尔巴乔夫次日清晨一下子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问题：联盟中央与实际上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间的尖锐冲突，与美国关系的大大复杂化，自然还有莫斯科政治形势的激化——不仅是本来就对他持批评态度的民主派义愤填膺，而且他那至今忠心耿耿的支持者营垒里也明显地出现分歧。他与当年猪湾失败之后肯尼迪处境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如他对大家担保的那样，他并未参与策划这次笨拙的行动，也并未表示认可。"1991年1月，"他讲述道，"*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他没有说明是谁对他"施加了压力。一切都相当清楚：当时他自己援引了来自"劳动集体和部队"的数十封电报，那是克留奇科夫和卢基扬诺夫通过博尔金向他提供的。）*他们知道戈尔巴乔夫不会同意，因此就背着我开始攻打*

电视中心。指望用流血事件来把我套进去。”不过这样的解释不仅不能在舆论面前消除对他的怀疑，反倒会加重个人的责任。既然强力部门可以“背着他”策划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那就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谁在领导国家？

次日上午，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就聚集在总统的克里姆林宫接待室，其中有巴卡京、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和E.伊格纳坚科，他们既为立陶宛的悲剧事件、也为总统的立场暧昧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在坐等一个小时之后受到接见，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戈尔巴乔夫说明如今他本来已十分明白的道理。这次旨在“吓唬吓唬波罗的海三国国民”、抑制他们的分离主义情绪并从而至少在预计3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之前将其留在联盟国家范围之内的行动，岂止是遭到失败，它已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央的“耳目”以及中央为此次行动之不得要领所应负的责任，已经昭然若揭。更糟的是，意在向全国展示“强大政权”肌肉发达的新面目的整个行动有必将破坏总统威信的危险。戈尔巴乔夫不但必须应付此举在波罗的海三国引起的后果，而且要寻找摆脱突然袭来的危机的政治出路。

聚集在他的办公室的好心人，争先恐后地建议采取可以将维尔纽斯悲剧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有目共睹、当然也是理智的步骤：既同摆脱总统控制的“强力部门”、也同自封为拉脱维亚人民意志体现者的民族拯救委员会划清界限，甚至立即飞往维尔纽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换言之，要按不落俗套的方式行事，例如威利·勃朗特就曾出乎千百万德国人的意料，在华沙犹太人区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就为德国人向被害者赎罪而言，仅此一举，他比任何讲话和签署的外交文件都做得多。

戈尔巴乔夫听着他们的讲话，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给人的印象是，他自己也萌生了前往维尔纽斯的想法，他吩咐准备讲话稿、预先通知兰德斯贝尔吉斯。尽管如此，据巴卡京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中“他不像他自己”。是否因为他对于此次策划的行动所了解的情况，比他准备承认的要多呢？要么是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政治陷阱？当有人问

到1月13日之前戈尔巴乔夫对于克格勃和军队在维尔纽斯的计划是否知情时，克留奇科夫反问道："难道您以为我们可以撇开他进行军事干预吗？无论他是怎样的总统，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巴卡京曾作为内务部长与戈尔巴乔夫共事了几年，他坚信强力部门的部长们是不会将自己的真正打算告诉戈尔巴乔夫的。"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应当结束这种不成体统的情况，那边有我们的人，他们会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当然啦，至于可能造成的伤亡谁也不提，都知道凡是同暴力有关的一切，戈尔巴乔夫都特别小心谨慎，已到了病态的地步。"巴卡京曾经参与处理卡拉巴赫、第比利斯和巴库等悲剧的善后工作，他口气坚决地说："责怪戈尔巴乔夫几乎参与了策划，纯属无稽之谈。在使用武力方面，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截然相反。叶利钦是先打了再考虑。"

雅科夫列夫证实说："他的确对于镇压政策持十分否定的态度。甚至因此很是激动。"在其他代表离开后，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多呆了一会儿，他可以证明戈尔巴乔夫"简直是在电话上跟亚佐夫大声嚷嚷：'瞧我们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的坦克在国内可以不经国防部长批准就开来开去?!'可以听见元帅在电话的另一端(当时克留奇科夫同他在一起)辩解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是我们的坦克。我们马上弄清楚。"

据戈尔巴乔夫的说法，维尔纽斯行动的脚本是由安全机关首脑亲自拟定的："数年之后，那些当初被派到那里去执行任务的阿尔法分队战士四处找我，据他们讲，在攻打电视中心之前，给他们看了以我的名义用铅笔写的手令，这个手令后来撕掉了。其中有人想到将碎纸片收集到一起并保存下来。有人就是想这样把我拖进冒险行动。"说到这里，怎能不想起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感人肺腑的发言，此人是忘我的戈尔巴乔夫拥护者之一，同时也是他的决不妥协的批评者。1990年12月，他在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辞呈之后立即在发言中警告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周围都是一帮佩戴带穗肩章的人。他们会挑起大屠杀，再到您的身上把沾满鲜血的双手擦干。"

尽管如此，在维尔纽斯悲剧之后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并不使用"冒险行动"的字眼。原定的拉脱维亚之行告吹。后来他解释说，还是那个克留奇科夫劝阻了他："他说安全无法保证。"至于克格勃首脑是以什么方式表示警告的，是作为对于国家元首的关心呢，还是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总统肯定不仅考虑到在波罗的海地区人民面前挽回自己的声誉，而且考虑到自己莫斯科班底中复杂而脆弱的力量平衡。前往立陶宛悔罪，就意味着不仅与强力部门领导人、而且与那些自认为在执行总统命令的军方人士划清界限。最高统帅不能这样去做。"你明白吗，阿纳托利，"他在与切尔尼亚耶夫的一次谈心中这样说道，"我不能这么随便地划清界限和加以谴责。这可是军队啊。"切尔尼亚耶夫本人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戈尔巴乔夫知道还是不知道？"他认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发生类似的事情"，自然指望的是另外的结局，看来当时没有想到执行起来这么蹩脚。

有人正确地认为，正是在戈尔巴乔夫1990年11月之后，也就是决心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强硬领导人"装束之后，他内心的矛盾中包含着比"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更加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这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在讲出自己对事件的评价之前，久久地观望等待？

答案之一："无法最终相信'维尔纽斯冒险行动'的真正发起人向他建议（强加给他）的自成逻辑的模式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失败"，这模式就是：挤压分离主义分子，通过"适量地"使用武力，最好是仅仅通过武力威胁限制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难怪在维尔纽斯悲剧开始的几天之前，他仿佛勃列日涅夫当初对待斯坦尼斯拉夫·卡恩那样威严地对立陶宛总理卡兹梅拉·普伦斯科涅说："你们自己整顿秩序吧，省得由我们来干！"

正式承认这一策略的失败，就意味着刚刚选定的"铁腕方针"未及着手实施，就承认自己的失败，意味着确认他当时的死敌——联盟破坏者、民族主义者的胜利，这些人不仅通过手无寸铁的人群（有人断言其中仍然有暗藏的狙击手）击败了装备精良的军队以及经过特殊行动

的训练的职业军人，而且就在他的战场上、借用他的政治方式胜过了他。

另外一种答案："惊慌失措"了，心情沮丧，让可能出现的军界的不满把自己吓倒；又一次在必须作出明确选择时优柔寡断，是他的决策（或者回避这些决策）所造成的后果使他面临抉择。更何况在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 1 月份作出选择，比此前要困难得多：要在作为分崩离析的国家的实力支柱的军队（和克格勃）与政治大军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政治大军已从成分复杂、原本顺从地跟着他走的部队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零散的小分队，他们经常相互攻击，也对他本人进行攻击。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就连他的"私人近卫军"中也开始人心浮动。那些像拿破仑的老兵一样对他忠心耿耿的助手无法理解他了，更糟的是，已经不再相信他。原则上戈尔巴乔夫不可能期望得到他们的完全理解：彼此相去甚远的职能以及所负的责任的大小将他们隔离开来。顾问只需出出主意，总统则要作出决定。助手们深知他的治国职能的特殊性，迄今为止照例是无怨无悔地"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而且不仅因为是部下。倒不如说恰恰相反，他们替他干，是因为认同他的计划的主要目标，并且相信没有看错人。维尔纽斯的事件，确切地说是总统对于事件的表达含混和令人费解的反应，动摇了这种信心。"*您使自己注定要执行其目的只能通过武力达到的政策。从而就陷入了与您所宣布的哲学的矛盾之中。您已判若两人，我也对您无法理解，*"那些日子里切尔尼亚耶夫在未及交给总统的辞职报告中这样写道。

在拉长成为政治上无限期的一周间歇之后，戈尔巴乔夫甩掉附体的魔力，战胜"断然措施政策"的诱惑，谴责 M. 布罗基亚维丘斯共产党中挑衅者反宪法的越轨举动，谴责军队对公民动用武力（诚然，他在武力脚本明显失败后的所作所为使这一选择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大打折扣）。切尔尼亚耶夫可以如释重负地写道，戈尔巴乔夫"*没有背叛原则性的方针，只是机动转移不大成功*"。这位毫不妥协的顾问用语太温和了。

就其对于总统声誉和威信所具有的破坏性后果而言，这一周的等

待观望同他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的十天沉默可说不相上下。惟一不同的是，发生于独立政治航行之初的“切尔诺贝利停摆”可以诿过于自然力之无情和船长之缺乏经验，而此次驶往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暗礁（在攻打立陶宛电视中心的一周之后，普戈手下的特种警察部队又攻击了里加的内务部大楼），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掌的舵。尽管波罗的海暗礁终于成为往事，两侧船舷上的窟窿却未能堵好。

莫斯科的民主派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尤为强烈。有些人，如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惊慌地宣布克里姆林宫当局在布尔什维克经验的鼓舞下，正在准备用以驱逐民主派主要“男高音”（索布恰克、波波夫和他本人）的若不是“哲学轮船”，那肯定是什么驳船。另一些不久前鼎鼎大名的“改革工地主任”则在广播和电视上揭露戈尔巴乔夫的“团伙”，《莫斯科新闻》在第一版登载了30位该报筹委会委员的声明，声明呼吁将“血腥的体制赶下台”。

如果说昔日的志同道合者奖给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性绰号不能不破坏他的情绪的话，那么不放过自己机会的叶利钦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就肯定迫使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此次受挫的对维尔纽斯的征讨在政治上给他造成多大的损失。毫无疑问，落入立陶宛分离主义者（这些人后来承认自己是指望挑动莫斯科[按照第比利斯的脚本]动用武力对付国内居民，以便影响国际舆论）为他们设下的套索的莫斯科特工机关所采取的笨拙行动，显然成了送给议会主席兰德斯贝尔吉斯的一份礼物。兰德斯贝尔吉斯马上就将维尔纽斯的武力行动与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相提并论。不过叶利钦所获得的政治胜利也毫不逊色，他代表俄罗斯前往维尔纽斯和塔林执行“团结使命”。联盟总统的政治“失误”使自己的对手不仅提高了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声望，而且也在莫斯科获得十分必需的分数。此后，叶利钦感到非常自信，以至2月份就在新的“维尔纽斯桥头堡”声称国家处于“戈尔巴乔夫体制垂死”的时期，并要求他辞职。

戈尔巴乔夫使自己与左翼“持怀疑态度的同盟者”（萨哈罗夫语）的关系极大地、甚至是无可挽回地复杂化了，他察觉到从右翼去发现

支柱的尝试也并不成功。强力部门领导人为自己的失利而大发雷霆，失利说明他们“职业上毫不中用”，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他们确信总统不仅是个软弱的人（“苏维埃政权深灰色大衣披在共青团领导人软弱的肩膀上”，如爱好诗歌的卢基扬诺夫所言），不准备走到底，换言之就是不准备通过流血使那些共和国领袖清醒过来，而且还是个不可靠的总司令，他会在失利的情况下“交出”自己的军队，他们在维尔纽斯预演之后肯定暗中得出了结论。在他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通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路考”，因此准备和实施拯救联盟国家的主要战役时就得撇开总统，把他孤立起来，免得他碍事，如果反抗，就连他也一起反。“我们当中有个人要下台。”1991 年春天克留奇科夫对自己身边的人这样说道。

“铁腕体制”的幽灵实际上没有吓倒任何人，他并没有带来所寻求的稳定，却几乎在从政治到社会的所有战线上都引发了不稳定：议会中紧张局势加剧，首都 30 万人抗议游行，新一波矿工罢工。这个方针并未如所期待的那样加强联盟，却加速了波罗的海三国“退出”联盟，并恶化了中央与共和国精英之间的关系，从俄罗斯开始（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77% 的选民在关于联盟命运的全民公决中支持戈尔巴乔夫，他们也支持叶利钦，投票赞成在该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就连借助总理帕夫洛夫发动的针对隐形经济生意人和企业家的攻势以讨好居民的平民主义做法也惨遭失败：荒唐且未做好准备的更换（没收）大面值钞票的行动引起居民的恼怒和怨恨，如同 1985 年的反酗酒荒诞剧一样。

在维尔纽斯事件、尤其是莫斯科差点爆发的流血事件（3 月莫斯科曾集结了将近 5 万军队以对付意料之中的“社会动乱”）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暗自全盘否定了通往“铁腕体制”之路，是“新尉官”们将他往这条路上推。然而，恪守自己战略（和天性）的他，在新的桥头堡尚未准备好之前，不愿示威性地同身边对他进行严密监护的强力部门领导人一刀两断。

他未去维尔纽斯，是对克留奇科夫作了让步，当然不是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而是因为不愿同那些他不久前还准备依靠的人公开脱离关系。尽管他们不仅让他上当，而且还表明正在将他领进政治的死胡同，他却并不急于或者说未下决心让他们清醒。有人认为，如将应对维尔纽斯冒险行动负责的部长们撤职，八月政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对此的回答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如不加快新奥加廖沃进程，只会促使政变提前到来。

即使在自卫方面，国家元首也宁可依靠政治进程，而不是依靠他暂时还拥有的政权强力部门。“他想在新联盟条约的基础上把他们统统换掉，”沙赫纳扎罗夫断言。“不过他对这些政治家的评价不高，他低估了他们的自卫反应。”

“我是不是惧怕过克格勃呢？”1991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文学报》的问题时说道。“没有。当时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我知道他们的力量，我肯定可以胜过他们。”距离彻底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回答谁胜过谁的问题，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戈尔巴乔夫与孤寂

1991年4月，根据与乔治·布什的商定，理查德·尼克松来到莫斯科。这位既经历了两届总统竞选的胜利、又经历了被迫下台的屈辱的美国政坛老将，大概比其他人更能测量出激情澎湃的莫斯科的温度以及戈尔巴乔夫保住手中操纵国家的舵轮的机会。尼克松参观了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总统，他确信自己所面对的依然是“原来的戈尔巴乔夫”，又同他身边的关键人物一一见面，与叶利钦也有接触。他向白宫传达的此次“考察”的结论无法令人宽慰：“苏联因戈尔巴乔夫而疲惫不堪。”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以来的六年，既使国家大为改观，又使国

家疲惫不堪。所期待的繁荣和稳定奇迹一再推迟出现，商店里空空如也，而联盟的骨架令人恐惧地濒于瓦解。3 月 17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尽管取得了所设定的成功，却不大能使戈尔巴乔夫感到宽慰，而且已无法阻止业已开始的苏联帝国瓦解过程。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有 6 个拒绝参加全民公决，而在一月事件记忆犹新的波罗的海三国进行的、中央不予承认的“民意测验”中，赞成独立者超过 90%。主要是全民公决并未使政治风暴平息下去，风暴掀起的浪头从四面八方击打着国家的船长桥楼，桥楼上矗立着表面上不动声色的船长那孤寂的身影。

尼克松看到了一幅非常错综复杂的图画：左派和右派、激进民主派和保守派，他们全都要总统兼总书记的“脑袋”。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的下台不仅可以解决国内的基本问题，而且可以让势不两立的政治阵营言归于好。在就近的仔细观察中才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其中每一方都将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同以除掉对手为前提的事态发展联系起来。

叶利钦揭发苏联总统具有“独裁者倾向”，他坚持要求将最高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换言之就是交给各共和国总统组成的大臣会议，为首的自然是俄罗斯（当时还是苏维埃俄罗斯）那未来的总统了。蛮横的联盟议员团头头 B. 阿尔克斯尼斯上校趾高气扬地以“鹰派”自居，他受到“健康力量”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行动的鼓舞，要求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并将权力交给民族拯救委员会，“委员会中不应有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的位置”。

克留奇科夫在会见尼克松时，向美国客人暗示说，已对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争论“感到厌倦”的最高苏维埃可以将权力掌握到自己手中，作为克格勃首脑，他还不同寻常地向美国人提出了“注意”卢基扬诺夫的建议。联盟议员团仿佛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不久也提到要“江郎才尽”的总统将权柄要么交给卢基扬诺夫，要么交给亚纳耶夫。

各个阵营之间的政治“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宣传的石子儿仿佛相向而行地在戈尔巴乔夫的头上飞过，却主要打在他的身上。奇金的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揭发叶利钦与"车臣黑帮"有染的文章,波尔托拉宁的媒体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指望借助反动的联盟议会和将军们"扼杀"民主和从肉体上消灭叶利钦。此次访问莫斯科之前,尼克松读了不少俄国哲学家的著作和关于俄国的材料,他在谈自己的感想时想起了别尔嘉耶夫,认为他所目睹的情况,均源自于莫斯科政治上层那无法遏制的对"自我消灭"的渴望。

然而,原因当然不在俄罗斯性格的神秘莫测,也不在冲突双方初看起来非理智的行为。对于联盟总统的围攻是基于完全确定的政治逻辑。戈尔巴乔夫所唤起的改革进程在改造国家的同时,不仅导致彼此对立的"鹰派"的出现,也使维护完全不同利益的强大"政治家族"粉墨登场。一方面是传统的党内官僚、经济官僚和军事官僚的家族,他们为中央集权的帝国服务并且靠帝国过活,另一方面是改革的号角唤醒的新的经济能手与政治能手以及共和国精英。在改革口号的掩护下,在改革的经济和法律"阴影"里,形成了新的后苏联社会的社会基础和财政基础。影子市场和影子政治的自发势力冒出水面,冲入政权。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不可避免,各种势力无不希望单独控制这个泱泱大国,由于它们并不理解的原因,莫斯科"沙皇"正在出人意料和自觉自愿地放弃治理这个国家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对双方都起了妨碍作用:因为他尽量延迟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防止最终的火并,避免俄国司空见惯的对立面之间的冲突和打耳光。作为拳击台上的裁判,他强迫双方遵守文明的游戏规则,希望教会他们顾及法律和舆论。最后,还因为他那人性化的"人道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方案,该方案与军营式体制和市场无政府状态一样地格格不入,因此对这个理想化的"中间方案"双方均不满意:每一方都指望把被子往自己那边拉,准备把它撕掉。为了得到清算(也许还是达成协议)的机会,他们需要甩掉戈尔巴乔夫,为此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向他进攻。

紧跟在激进民主派和最高苏维埃之后向自己的总书记开战的,是他所领导的党。不能说此前他不曾听到自己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那令人难堪的尖刻话语甚至恶言恶语。据戈尔巴乔夫回忆道，第一次造反发生在 1989 年春天的政治局会议上，那是在有 35 名中央委员落选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之后。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全会上，辩论常常升温，直至白热化的地步。不过总书记遵循所选定的驯服机关"怪物"的策略，忍受着攻击，每次都能找到"使辩论善始善终"的办法，于是列宁临终前嘱咐要像维护眼珠一样加以维护的党的团结，至少表面上仍是坚不可摧。

然而，在 1991 年 4 月 24 日的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当几乎大部分州委书记都参与对他公开的和显然是有预谋的攻击时，他一反自己平素的方针，甚至未向会议主持人提出发言的要求，突然离开主席团的座位走到讲台前，喃喃说道："好吧，够了，现在我来回答大家！"在很少见到总书记怒不可遏的会场里，响起了喊声："休会！休会！"戈尔巴乔夫说道："我简单说两句，误不了大家吃饭。"他一字一板地说："我应当指出，将近 70% 在全会上发言的人声称，总书记的声望和威信均已接近于零。我认为，在这种状况下把他留在党内是不行的。那简直是犯罪。我建议停止讨论，对于撤换总书记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谁来接替他的问题作出决定。此外，谁要是能够使在场的那两三个或者四个派别满意……我就辞职！"

全会与会者中间一阵慌乱。会议宣布休会，休会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伊瓦什科向全会通报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从国家、人民和党的最高利益出发，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关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建议不予审议。"全会在 13 票反对、14 票弃权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政治局的说法。于是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要求未获通过，他自己也不坚持，他指望在 11 月的非常代表大会上苏共分裂时，可将大部分顽固分子驱逐出去。尽管如此，他当时确实已经做好了愤然离去的准备，还因为他已经有地方可去了。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他终于在全会召开前夕的 4 月 23 日，启动了制定新的联盟条约的机制，他的周围聚集了九个共和国领导人（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均未参加关于联盟命运的全

民公决，他们也未出席新奥加廖沃的会议）。

他提出的9+1模式成了他拯救联盟的最后一次机会。总统兼总书记还有最后一宗政治资本尚未花掉：联盟国家独裁者的权限。共和国领袖们尚未下决心向莫斯科提出像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三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国所提出的公开挑战，他们准备就在“温和”的联邦机构范围内重新瓜分权力和财产一事讨价还价。作为对于赋予他们大部分权力的交换，他们同意保留中央对于外交和国防的控制，同意全联盟的两院制和总统职位。主要是他们保证不得侵害联盟法律高于共和国法律的原则，不得侵害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神圣的字眼——“联盟”。

在同西方同僚的交易中，他的王牌已所剩无几。在签署关于核裁军的协定、苏军撤出阿富汗、拆除柏林墙和德国统一之后，西方对苏联总统较为重要的要求，以至同他讨价还价和“体谅他的困难处境”的原因，均已不复存在。1991年3月突然瓦解的华沙条约（他派副总统亚纳耶夫前往布达佩斯参加该条约那并不光彩的葬礼），几乎使他失去了可以借以坚持与西方平起平坐地降低军事对抗水平、坚持阻止北约东扩的最后一个论据。

在新的情况下，已不再是西方朋友更加需要戈尔巴乔夫，而是戈尔巴乔夫更加需要他们：为了从改革日益遭到明显失败的主战场即经济方面挽救改革。在六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未能以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或者所提供的榜样来使西方政治家成为新政治思维的信徒。当苏联领导人1991年5月前往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时，因为扮演的是经济援助申请者的角色，大家也就把他当申请者对待：彬彬有礼，却无动于衷。

他实际上是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的。他曾断言他所开始的改革如果得到西方的经济援助，像美国对战后的欧洲提出的“马歇尔计划”那样，只会使整个世界受益，此说并未使得讲究实用主义的包括布什在内的七国首脑动心，看来，布什更加相信尼克松的印象，而不是“朋

友米哈伊尔"的诺言。在戈尔巴乔夫的背后,新的"俄国威胁"的幽灵已经出现,这次不是核威胁,而是俄国混乱的威胁,西方根本不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混乱的挑起者的戈尔巴乔夫可以从容应付,即使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也不行。

波罗的海事件之后,美国人仿佛为了表示对他产生的怀疑,推迟了苏美最高级会晤。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第一次,当初,计划中的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因在苏联上空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而告吹。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称,"将来苏联对于邻国的主要威胁,可能更多地来自苏联领导人控制国内事变方面的无能,而不是来自他们借助武力扩大其在国外影响的企图。"他并未发现一个多大的秘密。且不说苏联总统自然并无将"戈尔巴乔夫主义"像"勃列日涅夫主义"一样向国外推广的打算:当时他尚无可能(维尔纽斯和莫斯科的事件都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依靠武力哪怕在本国、而不是在他所发明的"全欧大厦"确立最起码的秩序。

总统不再诉诸群众的创造性首创精神,也不再跟在列宁之后呼吁"不要怕乱"。这二者都太多了。他只得转向完全另外一本不习惯的、他讲起来不具说服力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词典"。他于"火热"的1991年1月在莫斯科的讲话中解释说:"改革只有在秩序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2月,他在明斯克警告说:"分裂、关系破裂、生产停顿将会导致的结果是,需要采取断然措施。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由于混乱就会出现专制的方式和治理形式。"他在哈巴罗夫斯克高声说道:"应当阻止集会和罢工的进程。时间已经是以天计算、以周计算了。"

戈尔巴乔夫(在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提醒全国预防"专政的危险",至少在维尔纽斯的可悲经历之后,这个危险已经对任何人都起不了恫吓作用,他只不过是在发出警告,并且试图找到摆脱日益加剧的对抗的出路。在明斯克,他建议成立"中派力量联盟"。在哈巴罗夫斯克,他评价了当时政治上迅速得分(又是不无他的帮助)的叶利钦的潜

力，谈到了“苏联－俄罗斯联盟”：“如果与俄罗斯领导人建立起正常的相互关系，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不然的话，后果很危险。”

他在新奥加廖沃召开的、叶利钦同意参加的“九巨头会议”，提供了试图使苏联这架飞机刚刚离开地面就退出俯冲的机会。戈尔巴乔夫的盘算似乎并未落空。九位共和国领导人加上苏联总统，大家一起呼吁矿工停止罢工。曾几何时号召进行罢工的俄罗斯领导人，亲自前往库兹巴斯，以扑灭此前他还在往上浇油的大火。新联盟条约草案在经过新奥加廖沃官邸内无休无止的争吵之后，总算最后敲定。这是戈尔巴乔夫高超的策略技巧的又一证明：他能够说服所有的人都同意条约草案。看来加盟共和国也同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达成了难以想像的妥协。苏联最高苏维埃（卢基扬诺夫也参加了“新奥加廖沃的不眠之夜”）投票对他表示支持，并责成自己的主席参加签字仪式。就连原本对总书记气势汹汹的中央全会，仿佛也默认了这无法避免的事情，它按照训练者的指挥棒，乖乖地坐到所指定的墩子上。似乎8月20日联盟条约签署的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可以问心无愧地向公众表示忠诚了。看来，眼前这一仿佛伸手可及的胜利使他有一种终于获得安全的感觉，并使他不可饶恕地丧失警惕。因为对自己的“掠取者”他应时刻留神，不可须臾背过身去……

戈尔巴乔夫完全正当地向全国（也向世界，因为他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发言中也这样做了）发出关于可能出现灾祸和可能实行（并非他的）独裁的警告，实际上他自己却表现得惊人地无忧无虑，丝毫没有采取使自己免遭意外危险的措施。他再一次觉得，以奇妙的方式找到的政治解决办法仅凭其合理性即可驱散乌云，缓和局势。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没有遵循自己分析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对于所接收到的警告、信号和征兆统统不予重视。

早在4月份访问日本期间，雅科夫列夫即向他递交了一封私人便笺，其中说道：“据我所知，而且分析也提出这样的预见，一场国家政变正在策划之中。类似新法西斯主义体制的东西即将来临。1985年的

主张将受到践踏，您和您的战友将受到诅咒。悲剧的后果甚至都无法想像。”戈尔巴乔夫不知是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警告没有重视，还是以为只要他回国后与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袖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就可使自己免受任何威胁。

然而初夏时节，他收到布什通过梅特洛克交来的关于右派在他背后搞阴谋的警告。梅特洛克大使本人说，当他从波波夫那里得到这个情报时，即按照守纪律的外交官的惯例附上自己的评论“上交”，评论中说，对于政变的威胁他不能当真：想法本身很荒唐，在他看来，此类行动必败无疑，这点有目共睹。

看来，戈尔巴乔夫遵循的也是这一合理的逻辑，他认为自己助手对于普戈、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在最高苏维埃搞的挑衅性示威作出的反应是“张皇失措”，那些人要求赋予政府特殊的（实际上是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并未接受公开制止反对派、最好将他们撤职的忠告，在最高苏维埃发表了安抚性的讲话。总理帕夫洛夫匆匆出来悔罪，说什么大家“没有正确理解”总统的意思，戈尔巴乔夫就感到满足了。

戈尔巴乔夫内心里已经同这个让他感到懊恼的整个班底告别：根据更新的联盟的模式，在条约签署后，居然想跟他顶嘴的总理及其部长们所担任的职位本身均会裁掉。从利加乔夫的例子中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宁可以“温和”的方式甩掉妨碍他的人：不是撤职，而是抽掉他们的板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于右翼反对派最近向他发出的政治“警告”也无动于衷，右翼反对派又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久加诺夫执笔的集体《告人民书》，号召爱国者起来夺取“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议员手中的权力。

在最近举行的中央七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自己未来的、已显然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党的纲领，并宣布了即将举行非常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应当完成他那个党与布尔什维克派“离婚”的手续，此时州委书记们已经不再同他争论，也不试图推翻他。他们内心里也已经与他告别，因此他们就以挑衅性的鼓掌欢呼，对于他们心目中理应担

任党内最高职务的卢基扬诺夫那几近国王演辞的讲话表示欢迎。卢基扬诺夫本人后来证实，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本不打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日历乖乖地在11月充当牺牲品，而是打算“在9月举行的非常中央全会上提出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看来知道此事”。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不得而知，反正他到福罗斯后，又在电话上同这位卢基扬诺夫就即将进行的联盟条约签署的程序进行讨论，出发点是卢氏肯定出席签字仪式……

1991年的7月，便是在各个“政治家族”的此类阵地对抗演习中结束的。未来条约的文本已送到装订车间。定于8月20日举行的隆重仪式的礼仪已经周密地拟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的、最艰难的山口已经征服，接下来将是通往峡谷的斜坡，他认定他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得到哪怕两个星期的休息。临行前，他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到新奥加廖沃共进晚餐，讨论未来的共同生活问题，他们谈到议会和总统的改选、新的任免事项。新的“三巨头”处于欣喜的状态。三位领导人的赞叹、简短答话以及他们奖给自己那仿佛已经打败的对手的绰号，从敞开的窗户一直传到别墅内很远的地方。不过，大概即便关上窗户，即便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普列汉诺夫[1]没有按照规定呆在隔壁的房间里，克留奇科夫和博尔金也依然可以得到有关三人心情的极为详尽的情报。后来查明，在苏联总统机关负责人博尔金的保险柜里保存着窃听谈话的磁带。

实际上谁也不打算在全会上与戈尔巴乔夫开战，因为他的对手再无勇气同他进行公开的政治格斗。“他们全都在相互竞赛，”戈尔巴乔夫几乎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忆起政变前几周的情况，“因为不能在合法的范围内、在社会和世界的面前公开甩掉戈尔巴乔夫。他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因此他们只能搞阴谋家的那一套。”

首先正是因为这个，而不仅仅是因为总统的温顺厚道和漫不经心，整个国家才注定要经历政变。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八月灾难中有

---

① 此处可能有误。普列汉诺夫时任克格勃第九局局长。

许多偶然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要是不去休假，就不会发生任何政变了。"也许会出现结果相似的另一种情况。正是政变再加上12月份的"别洛韦日阴谋"，以离奇的方式使得戈尔巴乔夫成为人的背叛和政治不公正的牺牲品，从而将他作为真正的历史人物挽救了下来……

不过，当然不能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助手的意见：无论有多么劳累，他也不应该在8月份去休假。"把一切都抛开，"他对切尔尼亚耶夫说道。"可是得抛给他们。这帮浅薄、庸俗的外省人。"最后一个修饰语出自他这个斯塔夫罗波尔人之口，显得尤其尖刻。他躲开"这帮人"整整休息了两个星期。

八月。"福罗斯笼子"

8月3日那天，戈尔巴乔夫回家的时间早得出奇：晚上7点。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道："明天飞克里米亚。能呆多久就呆多久。要是现在不休息休息，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在福罗斯别墅（"金笼子"，理想的软禁场所——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弗·梅德韦杰夫后来对别墅作出了专业的评价）安顿下来之后，按照赖莎立的规矩，确定了作息时间表，进行了监督性估量。一昼夜分成三个单元：休息——游泳，登山，阅读；工作——打电话，起草联盟条约签字仪式的讲话稿和早已构思好的关于改革转折阶段的文章（小册子）（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就在旁边：都在离得不远的疗养院里休养）；睡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忆道："睡觉是第一位的。"

戈尔巴乔夫临行前，留下两个人替他"看家"：一个是按照宪法排在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还有党务副手奥列格·舍宁，这位不久前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显然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亲切对待（正式的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准备入院手术）。舍宁是他不久前西伯利亚之行中"发现"的：此人坚

决果断的气派颇有点像利加乔夫，利加乔夫已经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有人来接替他。

登机前，戈尔巴乔夫向舍宁暗示，是把他当成班长留下来的，还对他说了一番动员的话："别松劲。要跟踪形势。如果出什么问题，根据情况行事。"对亚纳耶夫也讲了类似的话，同卢基扬诺夫讲好19日前从瓦尔代赶回参加条约签字仪式。对其他送行者则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他没有料到这些人会有什么意外的惊人之举，因此也就对他们不感兴趣。联盟条约签署后，反正他们大部分人都要成为牺牲品。

此时此刻，让戈尔巴乔夫放心不下的不是机场上送行的人，而是新的政治盟友：各共和国的总统，首先是叶利钦。他了解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多变性格，哪怕是经过新奥加廖沃宴会巩固下来的关于联盟的约定是否能维持到8月20日，还不能说完全有把握。他这样担心是有理由的：叶利钦的谋士，有的隐蔽如布尔布利斯，有的公开如尤·阿法纳西耶夫和斯塔罗沃伊托娃，都劝叶利钦不要签订联盟条约，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帝国中央"会再次耍弄民主派。何况叶利钦本人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向身边的人表明，他并不打算长期充当联盟总统手下的"次要角色"。最近的一次展示，是他利用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示威性地推迟抵达克里姆林宫的时间，甚至与夫人奈娜分开前往（责成加夫里拉·波波夫去陪她），然后又搞得两个超级大国的礼宾司工作人员精神恍惚：他抢在东道主戈尔巴乔夫的前面，向目瞪口呆的芭芭拉·布什提议将她领到胡桃木大厅的宴会桌旁。叶利钦意犹未尽，在正式宴会中宾主交谈甚欢时，他又挽着纳扎尔巴耶夫的胳膊，在全场众目睽睽之下来到主宾席前，向美国总统通报说，新苏联未来民主的真正大师将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

他感觉到叶利钦在签订联盟条约问题上依然犹豫甚至更加犹豫，便从福罗斯最后一次给叶利钦打电话，那是8月14日，两人就此话题讨论了40分钟，力图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叶利钦再次重申自己同意参加仪式，那是在戈尔巴乔夫动用一切政治论据向他作了暗示之后，戈尔巴乔夫暗示说：尽管俄罗斯总统将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一样按照

字母表顺序入席，然而在拍照和电视转播时，叶利钦将会出现在居中的位置……

也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一切与所达成协议的脆弱性有关的操心事吧，8月18日下午5时许，由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将他拒之门外）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福罗斯时，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他的卫队长向他报告有客人从莫斯科来拜访他，到那些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40分钟之内，他已经搞清：包括最高统帅战略通讯在内的所有电话，均悉数关掉。他把家人集合起来，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准备应付事态的任何发展——从"赫鲁晓夫模式"到更加悲剧性的结局。

谁希望在福罗斯把他"干掉"呢？当然，按照逻辑他最先会怀疑到的人，是不久前还起劲地要求他下台的叶利钦。至于说向他下手的是断了线的傀儡——那些不仅职务、而且名气、甚至在政坛的存在本身全都多亏了他的人，如亚纳耶夫、舍宁之流，那么他即使在噩梦之中也想像不到。同样无法马上就相信的，是他多年来习惯于当成最亲近者看待的那些人的背叛。这里有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私人卫队长梅德韦杰夫（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受到伤害最深的是，这个和他们家简直密不可分的，总是很有礼貌、沉着镇静的军官不仅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抛下自己所保护的领导人，甚至在临行前都没有过来说两句道别的话）。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背叛。"戈尔巴乔夫后来说道。他在巴克拉诺夫的口授下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名单写在一张纸上时，无法马上相信卢基扬诺夫的背叛，并在此人和亚佐夫的姓名旁边打了个问号。"也许他们没有征求意见就把他的名字写上了，"他向切尔尼亚耶夫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切尔尼亚耶夫当时同戈尔巴乔夫全家一起拘留起来。

表面上，国家政变是星期日下午四时许开始的，当时经克留奇科

夫批准，普列汉诺夫从飞近别利别克机场的飞机上向为总统服务的专用电话总机发出指示：关闭别墅内的一切通讯设备，包括通往“核按钮”的线路。即使撇开政变的政治方面不谈，苏联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核潜力曾失去控制达73小时之久，这毕竟是事实。至于根据宪法和经卢基扬诺夫审定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在此期间接管了总统权力的副总统亚纳耶夫，还是不把“核按钮”交给他为好。正当普列汉诺夫撤走负责“核按钮”的军官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齐集在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的办公室，大家纷纷给亚纳耶夫斟酒，使之达到“应有水平”，劝他担负起国家元首的职责。从保证祖国安全的角度来说，总理帕夫洛夫大部分时间也并未处于最佳状态。他一口气喝了不少，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的，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想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口实，他以兴奋的话语开始了内阁8月19日的第一次会议：“*怎么样啊，男子汉们，咱们是把他们关押起来呢，还是枪毙？*”

事实上，政变是两周之前，即戈尔巴乔夫飞往福罗斯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五人行动小组”当天在克格勃的市内“别墅”（ABC目标）开会，成员有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博尔金、戈尔巴乔夫临行前吩咐他“*要跟踪形势*”的那个舍宁。阴谋分子们心急如焚。他们手里的时间并不太多：到8月19日之前，也就是总统预定返回莫斯科的日子之前。预谋的这次行动，目的言简意赅：阻止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

头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还要把哪些人拉进来？克留奇科夫在过去的几周里进行了主要的准备工作：同潜在的共同参与者见面或者给他们打电话（只有他一人可以这样做，而不必担心窃听），点到了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吸收普戈、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参加一事，是17日同样在ABC目标举行的下一次会见中决定的，当时已有帕夫洛夫参加。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相信他们都会同意并决心“采取非常措施”。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政变显得“业余”和不认真（尽管其政治后果

是悲剧性的），其原因在于那是一帮因即将被裁掉而吓破了胆的人三四天之内的即兴之作。事实并非如此。克格勃的“分析家们”事先就奉命开始拟定未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构想和主要文件。克留奇科夫本人早在春天就对于要“招募”的人小心地进行了摸底。法林讲道，自己曾经同他有过一次“奇怪”的电话交谈：克留奇科夫要弄清他对于“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的”戈尔巴乔夫的“不当行为”持何种态度。当法林讲出自己对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某些国际问题的忧虑、提出要同他本人讨论攒起来的意见时，克留奇科夫就此打住，此后再未来过电话。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亚纳耶夫也开始讲戈尔巴乔夫的坏话，说什么总统“劳累过度”，“头脑在作弄他”。甚至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外国人交往中也谈及此事。至于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还同谁讲过自己的“忧虑”，就很难确定了。例如，雅科夫列夫就对于政变前克留奇科夫与叶利钦之间可能有过接触的问题感到“好奇”。众所周知，克格勃制定的脚本至少在俄罗斯总统问题上预想过两个行动方案：一个是“软方案”，即预见到可以同叶利钦就保持中立或者联手对付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一个是“硬方案”，即在叶利钦固执起来的情况下，将他送到军事目标“熊湖”或者扎韦多沃狩猎场隔离起来。

应当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男子汉的谈话”中建议叶利钦在好坏之间作出选择，谈话也定在 8 月 18 日的那个星期天，待他从阿拉木图返回后在机场进行。为了使他变得更好说话（和有机会马上施加强大压力），预定俄罗斯总统的座机在契卡洛夫斯克军用机场降落，而不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然而，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调度员并未接到这方面的命令，那个毫无任何觉察、因哈萨克领导人的盛情告别而感到兴奋不已的叶利钦，在紧盯着他并且做好一切准备的阿尔法小分队的严密监视下，从伏努科沃驱车前往自己的别墅……

戈尔巴乔夫自然对此一无所知。在谈话中，巴克拉诺夫有些含糊不清地对他说，叶利钦不知是已经被捕，还是马上就要逮捕。戈尔巴

乔夫不知道，那边热心过度地派了三架直升机去瓦尔代接卢基扬诺夫，卢基扬诺夫马上就要抵达克里姆林宫，那边破例派了两辆迄今为止只有总统抵达时才出动的吉尔－115轿车去迎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弄不清楚：莫斯科的整个行动事实上是谁在领导，策划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在实施自己的“冒险主义企图”中究竟打算走多远。

起初是巴克拉诺夫，后来又是打断他话头的瓦连尼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最后通牒：要么他自己签署关于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个别州”实行“总统治理”、换言之就是紧急状态的文件，要么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且靠边站，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替他把必要的“脏活儿”干完再说。瓦连尼科夫以军人的直率确切地说明：“不是必须靠边站，而是下台。”戈尔巴乔夫听了火冒三丈：“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话给派你们来的委员会捎去吧。”

针对这个冒牌委员会和紧急状态的主张，戈尔巴乔夫又讲了几句难听话，他明白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莫斯科那些派“议员”来找他的人手里，看来他并未失去希望，以为只要把他们镇住、讲清他们的企图不会有好结果，还可以在事件尚未发生不幸转折时力挽狂澜。“你们哪怕作出一天、头四步的预见也好，往后会怎么样啊？全国人民肯定会否决，决不会支持你们的做法，”戈尔巴乔夫通过派来的这五位，向那些等待着对于最后通牒的答复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高声喊话，希望让他们回心转意。他还不知道莫斯科那边的反应，理智地摆脱这一荒唐处境的机会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这时他决不想使自己过早地成为牺牲品、不想扮演阿连德①的角色。此外，他对于身边的人负有责任。尽管家人——赖莎、伊琳娜和女婿阿纳托利都支持他在任何

① 阿连德·戈森斯（1908—1973）　1970—1973年任智利总统。在军人法西斯政变中被杀害。

情况下都不怕讹诈，他却不应忘记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妻子、女儿、外孙女负责。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在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告别时，戈尔巴乔夫表面上沉着冷静，向他们伸出手去（后来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几乎把它当成揭发他参与政变的惟一细节）。

代表团成员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一个个垂头丧气：经过反复讨论的脚本碰到戈尔巴乔夫的严厉反击，暴露出他们毫不中用。原以为向他施加压力就可使维尔纽斯事件如今在莫斯科重演，如意算盘却落空了。尽管政变策划者理论上也曾预见到事情会出现如此转折，然而，就势必要采取的包括对“暴跳如雷的总统”在内的“果断措施”进行议论是一回事，开始将其付诸实施又是另一回事。政变尚未开始，它在戈尔巴乔夫这里碰壁之后，便脱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战略家所铺设的轨道，开始朝斜坡滑去。

他们决定按照预先准备好的“硬性方案”行事。普列汉诺夫将总统的贴身警卫梅德韦杰夫带回莫斯科，冻结了“核按钮”，让自己的副手格涅拉罗夫留下，并下令将总统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存放汽车和通讯装置的车库一律查封，并派自动枪手把守，别墅禁止出入，四周部署了新的卫队，担任警戒任务的舰艇从海上对“目标”进行保护，直升机和总统的备用座机从别利别克机场撤走。给“金笼子”挂上了沉甸甸的粮仓锁。

此后不久，还是那个普列汉诺夫在对核准的脚本进行加工时，要求第四总局局长Д.谢尔巴特金提供关于总统脑部血液循环障碍、必须卧床的诊断结论。这些材料必须由医生在19日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之前送到。然而，未等到结论出来，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和帕夫洛夫就当着惊惶不安的议员、代表和被惊动的部长们，语无伦次地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他们脸上露出悲痛的表情，讲述着总统的“悲惨状况”。他们一门心思地瞎编乱造，添油加醋地说什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寸步不离他的床边”，还杜撰了发生如此突

然不幸的原因。克留奇科夫在同吉尔吉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阿卡耶夫、杰缅季耶夫、克拉夫丘克)电话交谈中,都说总统病重,似乎已有医生结论。卢基扬诺夫在向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解释时,为了避免过细的追问,便主动向民主派发起了进攻:“这都是你们那个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搞成神经性休克的。”他对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手头有戈尔巴乔夫病情的诊断结论,其中的内容“不能公布”。

政变分子只是在自己那个圈子里才直言不讳。8月18日,克留奇科夫将亚纳耶夫叫到克里姆林宫来,亚纳耶夫得知因“戈尔巴乔夫身患疾病”自己要承担起总统职务,他问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听到的回答是:“你要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医生。不是说了有病吗!反正现在不是弄清问题的时候。挽救国家要紧!”比他晚到一步的卢基扬诺夫不知为什么没有问过总统的病情。

与此同时,“患病”的戈尔巴乔夫以其过分充沛的精力、例行的设想好的计划,怀着业已出现的对于摆脱他认为最严重的改革危机的出路的希望,陷于在纵横驰骋中被抛出马鞍的骑士的处境,他已被判处就他那积极肯干的天性而言也许是最重的刑罚:经受等待的折磨。莫斯科来人离去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伊琳娜跑进他的办公室,母女俩心都碎了:室内竟空无一人。她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冲向阳台:戈尔巴乔夫站在那里,甚至显得心平气和。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已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至于对事态的下一步发展施加影响,那已不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失去了习以为常的信息来源,只能满足于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幸而还可收到受干扰的自由电台的俄语广播(电视是被监禁的第二天才能看到),戈尔巴乔夫不仅可以了解莫斯科发生的事情,还可以从像苏联情报局通报一样沉闷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战绩报告中了解关于——自己的消息。置身于三重包围之中的他,与当年困在易比河孤岛上的拿破仑处境相似,诚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与法兰西帝王不同,为了“登上大陆”和返回首都,他指靠的是政治对手,而不是自己的“近卫军”。

他能否如后来责备他“消极无为”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尝试“突

围出去"呢？"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同父亲一起经历了这些可怕日子的伊琳娜问道。"带着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外孙女翻山越岭？或者把我们和妈妈留下做人质，自投罗网（几乎肯定已为此布下罗网）？让自己吃'冷弹'，以便减轻政变分子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做到了一个被关押在四面高墙之内（就算只有三面高墙吧，第四面是大海）的囚徒所能做的不多的几件事：向普列汉诺夫的副手格涅拉罗夫提出抗议，让此人向莫斯科转达自己关于恢复通讯联系和派飞机来的要求，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甚至背着依然忠于他的卫队，将他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散布的关于事件的解释进行驳斥的话录到录像带上。还有，尽量在别墅阳台和海滩上多露面，哪怕让从海上对福罗斯进行监视的海员看到：同官方的报道相反，他平安无恙。顺便说说，就连如此无力的展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根据侦查确定，一批海军军官认真地讨论了登陆解救关押中的总统的可能性。

为了对自己的叛国指控进行辩护，政变策划者在侦查期间、法庭上、尤其是赦免后，都在自己那细节丰富的答记者问中谈及戈尔巴乔夫的"自我拘禁"，谈及他似乎还拥有通讯手段，他可以使用几部没有掐断的电话。有些人断言他可以"到车库去，在汽车上打电话"，有些人不相信总统居然没有当今十分普及的移动电话。这些论断的意思很明白：假如他同政变有染，假如他哪怕以间接参与者或者合伙策划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那么该有多少政敌（他们不仅是来自政变分子阵营）会为此感到开心啊。

当然，政变分子与其对于"企图夺取政权"负责（侦查员起诉书的说法），倒不如将自己打扮成"理想主义者"，"采取了针对苏联总统的行动，但仅仅是为了祖国的利益"（克留奇科夫语）的苏维埃国家的捍卫者，或者打扮成自认为在履行支持苏联的全民公决的委托的人（卢基扬诺夫语）。不过，如果最终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多多少少算个政变分子"的话，岂不更好，不是说他故意躲到福罗斯去，以便借联盟拥护者之手惩治自己的对手——民主派，从自己的主要政敌叶利钦开

刀吗。

几种说法相互抵触，然而这远非八月事件经过中的惟一矛盾。“政变中缺乏逻辑，”巴卡京认为，“无论哪一方的行动都是如此。”看来，只得接受他这个最接近真理的论断并且承认，正如俄国式暴动一样，“苏联式政变”如此地不理智，它还可能完全……徒劳无益，确切地说，对它的策划者说来政变是致命的。

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他对于八月事件所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本来就已经相当大了，完全不必仅仅为了在庸人心目中进一步玷污他，便试图给他硬栽上参与刑事犯罪的罪名。详细的侦查弄清了福罗斯事件的所有细微末节并且断言：自普列汉诺夫于 8 月 18 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关闭通讯装置至飞赴克里米亚的克留奇科夫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恢复通讯联系为止，苏联总统没有包括战略通讯手段在内的任何通讯手段。凡对此缺乏信心者，不妨读读一封信的片段，该信是原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于 8 月 25 日从卢比扬卡监狱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我当时想，在您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时候，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家人该有多么难受，我自己也因此而感到恐惧和绝望……”

被拘留的总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改变他的处境中最主要之点：自从他亲自选择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并从而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以来，这是一生中命运头一次不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任凭别人摆布。首先是任凭政变分子摆布，这些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却原来他们的正派甚至清醒理智都指靠不上。不但如此，他的政治前途、也许还有生命，如今都取决于那些近来变成他的最积极批评者和政治对手的人，取决于他们的行为和对他的态度。眼下只得把最后的希望同他们、同他们抵制政变的决心联系到一起。俄罗斯总统能否在政变分子的许诺和威胁面前挺住，他是否会像一月份那样号召军队不要听从“罪恶的命令”、不要向和平居民动武呢？（当初听说叶利钦这样对军队讲话时，戈尔巴乔夫可是气愤地说：“他简直是发疯了。”）如今总统只能指靠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这些人昨天还在要求他下台，眼下却在白宫前

面筑起了人墙，他们成了迫使亚佐夫元帅于8月20日夜间下令军队“停下！”的手无寸铁的主要力量。他寄希望于民主派新闻界，这些人冬天还在对他进行无情的攻击，而在8月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维护他，并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实行的对于报刊出版和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发出挑战。是他们以其协同一致的努力制止政变，解救了自己的总统。不过他本人也属于粉碎政变者之列，因为他在对自己未来命运自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率先毫无保留地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讹诈说“不”。

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隐居生活中当然不知道，他拒绝充当“冒险主义分子”的帮凶，这是否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他不知道，当从福罗斯返回的议员们讲到戈尔巴乔夫“*怒不可遏*”和“*感到受辱*”（亚佐夫语）时，原本虚张声势的阴谋分子便因此心慌意乱起来。何况上天也有“不祥之兆”：真想不到，巴克拉诺夫从机场沿着夜间的莫斯科街道驱车回家时，汽车轮胎正好在他数日后服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对面突然爆裂。

卢基扬诺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克留奇科夫赶快给他让出主席的位子，卢基扬诺夫劈头就问：“*戈尔巴乔夫那边怎么样？*”帕夫洛夫和亚纳耶夫争先恐后，连说带骂地讲起福罗斯的情况。“*那你们有个计划吗？*”这位最高苏维埃主席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没有，*”亚佐夫承认道。“*有啊，*”克留奇科夫说道。从这一刻开始，尽管后来证明为时已晚，卢基扬诺夫开始暗自勾画各种可能版本的“安德罗波夫枞树”。他拒绝了出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任的建议：立法机关首脑应当置身于该委员会之外，因为根据宪法（他有预见地把宪法文本带在身边），无行为能力总统的职务应由副总统代理。“*如果希望我来帮助你们，那么我可以起草一份关于拟议中的新联盟条约不符合宪法的声明。*”他当天夜间果然说到做到，于是次日早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发布时，配发了他那篇作为法律依据的声明（后来卢基扬诺夫改动了自己声明中的日期，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声明撰写于政变之前几

天且与政变无关)。诚然,他当时也向政变分子说明他们的行动依然是违反宪法的事情,至少在他计划于 8 月 26 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之前是如此。当然,到那天代表和主席都已经很清楚是应当在事后为政变辩护呢,还是与此相反,应当加以谴责,正式将政变策划者变成罪犯。

在得知戈尔巴乔夫拒绝批准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表现各不相同。博尔金反复地说,戈尔巴乔夫反正“不会放过这件事的”,他对仍在犹豫的亚纳耶夫继续施加压力,而且用了一个对他自己来说最可怕的论据:“现在咱们大家都没有退路了。”后来几天,他认为最好是住进医院,躲过向政变分子袭来的、由他们自己挑起的事件的巨浪。帕夫洛夫也是故意来了个引起高血压危象的豪饮,使自己无法工作。

克留奇科夫也玩起了自己的游戏。他放弃了在他的机关内部制定的“极端脚本”。他未下决心让叶利钦的专机“拐向”契卡洛夫斯科耶机场,也未下令将其在别墅扣留,尽管阿尔法分队战士已经派往该处。此外,在某个时刻他甚至与叶利钦在电话上讨论了自己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面前发表“政治讲话”的可能性,后来正是与叶利钦商定派飞机送鲁茨科伊和西拉耶夫去福罗斯。(尽管克留奇科夫曾经保证,直到这架飞机在别利别克机场降落之前,防空部队的炮口始终瞄准着它,准备将其击落,只等无线电通信发出约定的口令:“鲨鱼。”)

……直至 8 月 20 日深夜,强力部门部长的下属都在为“霹雳行动”、即以“效力射炮击”攻打白宫[①]作准备。根据拟定的脚本,其任务是“为阿尔法分队开道”,分队战士应当登上五楼,控制住叶利钦,将其转送至扎韦多沃狩猎场。打算将可能出现的伤亡的罪责推到“俄罗斯领导人不负责任和极端主义的行为”身上(后来在 1993 年 10 月攻打白宫时所付诸实施的大体就是这个脚本,而实施者已是叶利钦本人)。

---

① 指俄议会大厦。系一白色建筑物。

当时,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以及8月19日之后飞抵莫斯科、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阿赫罗梅季耶夫态度最为坚决("走到底",哪怕可能出现流血也不管不顾)。直到第一批示威者偶然地在装甲车履带下毙命之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等人的副手在夜间巡视拟议中的"战场"时,才发现白宫周围聚集了大约五六万人,一旦攻打就会"血流成河"(列别德语)。前线战士出身的元帅、国防部长亚佐夫听到汇报后说:"不得开枪!"他未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商量,就下令部队撤出莫斯科。次日早晨,当着前来劝他收回成命的舍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后来又加上卢基扬诺夫),他说:"我们输掉了。既然会闯祸,就得会负责。我要坐飞机去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认罪。"

政变至此收场。委员会成员们争辩了一个半小时,都责备对方优柔寡断,"像罐头盒里的蜘蛛一样对咬"(亚佐夫语),最后决定乘飞机前往戈尔巴乔夫的拘禁地。这次出面解释的不是"随员",而是主要发起人: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卢基扬诺夫与伊瓦什科同机前往,但是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分开"乘坐,因为他们"无须悔罪"。事后卢基扬诺夫会在一些人面前说,正是他坚持将军队撤出莫斯科,当时他感觉到立法机关"该是将控制事态发展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时候了"。他在同另一些人谈话时,又会鄙视地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说成"冒险分子",将政变称之为"必死者的阴谋",因为它是由"助手们"策划的。显然,他指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克留奇科夫及其一班人,这些人习惯于执行别人的指示,却不能像他们的上司一样,沿着选定的道路走到底。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纳扎罗夫实际上也发表了这样的观点,自然,他并未因一切都以放空炮结束而觉得惋惜:"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戈尔巴乔夫被禁锢在福罗斯,自然不了解政变幕后发生的事情。伊琳娜回忆说:"我们仿佛是呆在一个大坑里。"因此,当广播里说曾向

记者们许诺提供苏联总统无行为能力证据的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将前往克里米亚时,他们都不知道该做何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先想到的是:几个小时之内,那帮人将会设法使戈尔巴乔夫处于第四局根据克格勃授意所作诊断报告指出的那种状态。恰在此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发生了严重的高血压危象,一开始,就连身为医生的伊琳娜和她的丈夫阿纳托利都以为她是轻度中风。失语,半个身子几乎瘫痪……

同三天前一样,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巴克拉诺夫都是由普列汉诺夫领进别墅的地界的。然而到了楼房前面,荷枪实弹的卫队挡住他们,并发出开枪的警告。第九局副局长格涅拉罗夫不久前还以齐奥塞斯库卫队的命运威胁过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这时只见他骂骂咧咧地冲他们叫嚷:“放下武器,这帮兔崽子!别给我丢人现眼!”却是无济于事。贴身警卫们曾答应戈尔巴乔夫要跟他跟到底,他们意志坚决。当贴身警卫同样不让“分开”乘机前来的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进去时,普列汉诺夫阴沉着脸证实说:“这些家伙会开枪的。”

克留奇科夫请求戈尔巴乔夫接见他,戈尔巴乔夫则提出了恢复通讯联系的要求。经过一阵犹豫并附带说明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之后,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被拘留的戈尔巴乔夫又成了总统。他首先与叶利钦通了电话,然后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备长以及几个共和国领导人。他感到权力的舵把又到了自己手中,于是给布什去电话,以便证实:第二号核超级大国又成了可控制的了(差点成为戈尔巴乔夫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博尔金后来认为,戈尔巴乔夫打这个电话是希望尽快与自己的“西方大老板”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俄罗斯代表团——鲁茨科伊和西拉耶夫也抵达别墅,还有从莫斯科同机飞来的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在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同意听取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的报告。他们解释说自己“与此事无关”,并对议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无所作为进行了辩解。戈尔巴乔夫拒绝接见的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巴克拉诺夫,由警卫护送着去了机场。普列汉诺夫在车上与格涅拉罗夫并排坐着,恼怒地对副手嘟哝着说:“都是一帮胆小如鼠的老头,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我这下倒霉了。”在法庭调查中，格涅拉罗夫回忆道，他原先的那些上司一个个“都像闯了祸的顽童”。亚佐夫元帅尤其显得可怜，看上去“像个身穿松垮制服上衣的准尉”。

戈尔巴乔夫全家乘坐俄罗斯代表团的飞机，离开幸而没有成为又一个“伊帕季耶夫之家①”的福罗斯别墅返回莫斯科。两个外孙女睡在飞机的地板上。“助手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克留奇科夫坐在相邻的机舱，他实际是作为人质由警卫看守着。让他坐到这架飞机上，是为了以防万一，这样他的所有部下就不致一时心血来潮，在无线电太空中说出“鲨鱼”这个不祥的字眼了。

政变的阴霾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逃过了这些年一直担心的“赫鲁晓夫式下场”。然而为了这一无可争议的胜利，他除了遭受无可挽回的政治损失而外，还付出了另一个对他说来异常高昂的代价：赖莎的健康。当她紧紧抱着外孙女，从将他们从福罗斯囚禁中解救出来的飞机舷梯上下来的时候，应当看看她的眼睛：那是受到致命伤害者的眼睛。

“谁要是想明白政变对于戈尔巴乔夫不仅是政治上、而且是心理上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月后记录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证词的总检察院侦查员Л.普罗什金讲道，“只需在九月份看看她就行了。为了开始回忆那三天的事情，我同她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作准备，事后，等她全部讲完了，我又用了同样多的时间去安慰她……”

刚刚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后，有一天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泪痕满面：她将两人的全部来往书信付之一炬。她容不得旁人的手和眼睛去仔细搜寻他俩共同的、只属于他俩的往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仿佛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家里，”伊琳娜回忆说，“一切都岌岌可危。我们不知道哪个权力机关会破门而入：不知是克格勃呢，还是民主派。”她自己继母亲之后，也将记了几年的日记付之一炬。如果

---

① 指被推翻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琳娜堡的住处。1918年7月18日夜间，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亲信在此被处决。

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在共产党人政变之后烧掉了同丈夫的来往书信，那么她的女儿则是预感到了父亲必然下台、叶利钦一班人将会上台执政。“我尽量把某些特别痛苦的回忆从脑子里抹掉，”她说道。“我能做到。我实际上不去想福罗斯。这样生活起来平静一些。大概这是对付所经历的压力的一种防护手段。是我的生存方式。我认为妈妈当初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第十章　一九九一年:二号灾祸大事记

“另一个戈尔巴乔夫”

总统自福罗斯囚禁地归来后,如他自己所说,已是判若两人。问题不仅在他本人,不仅在于他在克里米亚隐居生活中所经历和思考的事情。他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戈尔巴乔夫相似的人”——对自己的国家而言。首先是因为这些日子里整个国家曾一度濒临内战的边缘,在先后经历了因莫斯科出现坦克而引起的恐惧、政变失败所带来的欣喜之后,国家本身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其次,戈尔巴乔夫这位政变前无可争议的“一家之主”与如今已是名义上由他来领导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在许多人眼中,正是他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他将未来的政变分子弄到自己身边,早在这些人将他拘禁在福罗斯别墅之前,他就成了他们的人质。况且,他的获释首先不能归功于自己的行为(他断然拒绝阴谋分子的最后通牒自然打乱了他们的一切计划),而应归功于

出乎政变分子意料的、民主力量和居民对于政变分子的抵制，这一抵制表明，新版本的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秘密全会[①]或者不流血的国家政变，政变分子已经搞不起来。

福罗斯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自己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总统的所有这些致命的失误、新的有缺损的地位都对他的执政者威信打击甚大。因为在俄国（以及苏联）公民心目中，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民族领导人就是上帝赐恩的君主、天赐的"生父"的观念，无论他身着沙皇的紫袍还是顶着总书记的称号，都是如此。

主要的是，在八月动荡之后他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千百万人将他们的生活迅速而奇妙地得以改观的希望同他所开始的改革、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思想上的解放、令人陶醉的变革空气，以及上边赐给的政治自由，不能永久充当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补偿。八月还表明，改革已经"误入歧途"，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并不预示着美好前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自己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称之为"美好的时期"），而是预示着阴霾的日子和悲剧性的问题。曾几何时，改革的首倡者和鼓动家还几乎被当成救世主，如今则已失去昔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

就连在自己心爱的政治天地里，他看上去也并非不可替代了。政变发生前，作为中派的戈尔巴乔夫尽管也受到来自两翼——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尖锐批评，不过如上所述，他对两派发生直接冲突起了阻碍作用，对立的双方都把他当成一个关键性人物，需要把他往自己这边拉，而不是将他除掉。当时一家颇受欢迎的报纸，曾将戈尔巴乔夫描绘成被蒙住眼睛的走钢丝演员，下面的观众一个劲儿地冲着他喊："稍稍往左一点儿！""稍稍往右一点儿！"

---

① 指1964年10月14日召开的让赫鲁晓夫下台的苏共中央全会。

每当他以自己的辞职相威胁时，党的官员就向他低头，往后撤退，这不仅是出于深深印入机关工作人员脑海的尊敬身居高位者综合症，而且是出于一种担心：怕的是一旦他下台，就得直接面对被改革搅乱、失去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尊重的社会。

莫斯科和各民族共和国的激进派，至少在维尔纽斯事件之前，也同样公开将赌注放在戈尔巴乔夫拉紧控制党和国家镇压机关险恶的混成队伍的缰绳上：若是没有他的禁令，这支队伍早已将最不怕事者关进监狱和疯人院，早已将较为谨慎者打发回厨房了。激进民主派正是打算以戈尔巴乔夫为掩护，加强自己对于已溃不成军、不过并不服气的右派的阵地的进攻，将右派连同总书记兼总统一并挤走。

戈尔巴乔夫约束着党，操纵着舆论，驾驭着像一辆由狮子拉套的马车的国家，竟然能设法"拖着国家"经历不可逆转的变革，这些变革最终使得国家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粉碎了政变。于是，经过必要嫁接后的机体战胜了危险的感染。

然而，政变切开了已经开始发炎的体内脓肿，使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直接面对面，从而打破了理论上无懈可击的戈尔巴乔夫公式。政变在以其失败证实国家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已脱离原体制的引力场的同时，使戈尔巴乔夫计划中更加自负的第二部分——他那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却无须为此诉诸暴力和革命的理想化为泡影。尽管八月阴谋同一举将其粉碎的莫斯科革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戏剧性和象征性（难道历史教科书事后不是将封号赐予在生活中可能具有狂欢节或者轻歌剧面目的伟大事件吗），它既表明新生的俄国民主大获全胜，又表明戈尔巴乔夫输掉了最重要的赌注——逐步的、渐进的变化。而且，曾经像赌咒发誓一样反复说过不要对人们采取强制手段的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以下事情负责：他曾许诺将要过上平安体面生活的国家，起初是让八月的政变分子、后来又让别洛韦日的"野牛"打断了脊梁骨。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事态能否按照最好的或者也许是最坏的版本发展，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谁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这是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题目。

而他自己，则从一个大胆挑战历史传统的人立即变成自己意图的牺牲品。因“无法预见的情况”而失去王位或者不过是因为失足丢掉自己王冠的君主，即便臣民关切地将王冠拾起、帮助戴回原处，他在自己臣民的心目中也已不再是一国之君。重新加冕同二度婚姻一样：按规定新娘是不穿白色婚纱的。

尽管白宫保卫者在得知他返回莫斯科时，曾有节奏地高呼：“总一统！”“总一统！”实际上原先的那个戈尔巴乔夫他们已经不需要了。原来卓有成效地扮演石墨棒（放置在他亲自挑起的新的俄国动乱这一核反应堆中的石墨棒）角色的他，再也起不到这个作用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使命的一大部分。如今不是退出政治舞台，就是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

甚至最杰出的政治演员在退出舞台时，也并无任何非同寻常之处。人人都难免一死，政治上的死亡也一样。有的政治家是在最不合适的时刻遭遇死亡的，当时他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认为这一行动是没有道理和不公正的。不必指望人民对自己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充满感激之情。当社会觉得自己昨日的领袖或者偶像已经不再需要时，就会冷漠地不同他来往。至于纪念碑和热情洋溢的回忆录，那都是后来的事情，须等到当事人过世之后。

在我们的记忆中，诸如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的20世纪政治巨人，他们曾在关键时期领导过的国家一旦意识到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时，当即毫不留情地让他们退休。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的处境也与此相似。如果说他不准备屈服于下台的前景，那么决不是因为他尚未充分感觉到八月这些日子里发生在莫斯科、并在各加盟共和国引起反响的变化的规模；自然也不是出于一个职业政治家自然而然的对权力的依恋，而首先是出于因八月灾祸而变得更加强烈的意愿：继续与历史进行辩论，使自己的意图有个顺利的结局，向自己的国家和世界证明“一切都还是可能的”，并从而为已发生的事情进行自我辩护。

而且他明白，在新的异常条件下，为了使失事的改革之船摆脱困

境，需要“另一个戈尔巴乔夫”，他打算证明可以成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然而为了以新总统的面貌呈现在国家面前，先要与旧总书记彻底告别……

我们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步行来到克里姆林宫。市中心禁止通行，红场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清扫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字路口身着莫名其妙的制服的卫兵，才令人想起不久前的政变。我们在诺布内桥会合，这里三天前空降兵坦克的炮口还朝向斯帕斯基塔楼，一行人经过斯帕斯基门进入克里姆林宫。我们人数不多：一批于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我们起草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呼吁党的领导人承认自己对八月悲剧所负的政治责任并宣布中央委员会自动解散。在公布之前，我们决定将声明交给总书记。

我们穿过空无一人、回声很大的原人民委员会走廊，被领进戈尔巴乔夫的接待室。按照警卫人员在“无线电低语声”中所用的行话，这个克里姆林宫印刷厂战略要地叫做“高地”。我们在与总统接待室毗邻的胡桃木客厅的圆桌前落座。这个不大的房间曾是“小范围”政治局委员传统的会场，它是“谈论”、也就是决定最重要最微妙的问题的地方。1979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在这里作出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决定。1991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也将在这里举行长达 10 个小时的会晤，讨论自己辞职的条件，以和平的假象结束两人之间的个人决斗，决斗的牺牲品是像胡桃一样陷于四分五裂的国家。

总统如此迅速的辞职在 8 月份还是不可思议的：无论重新占领“高地”的戈尔巴乔夫，数次声称愿与“新的戈尔巴乔夫”密切合作的叶利钦，还是自告奋勇在胡桃木房间那早已瓦解的政治局“小范围”成员的座位上就座的我们，全都感到不可思议。

他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步入客厅。戈尔巴乔夫自克里米亚返回后，我们这是首次见面，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那极好的南方的黝黑肤色、健康的容光焕发的外貌与不常见的面

部表情之间的反差。那双往往在初次见面时引人注意的"南方人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变得暗淡无光，透露出不过一周工夫内心里发生的重要变化：他失去了往日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使他的拥护者深受感染，并起了镇住对手的作用。

他看了声明，点头表示同意，并把两张纸递给我们。"这是我卸去总书记权力的声明以及关于将各级党委的房屋和其他财产——印刷厂、党校、休养所置于国家保护之下的命令。在目前的紧张忙碌中，可不能因为领导人犯错误而让清白无辜的人受到连累。我们可千万不要重蹈56年匈牙利事件的覆辙。况且在没有任何政策、无人管理的情况下，我们这里有人会悄悄地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毁掉，全部偷光的，"戈尔巴乔夫说明了命令的意义所在。

自然谈起了党的命运。"他们自己勾销了对党进行改革的机会，我直到最后一天还给他们留着这个机会。我问心无愧，"他仿佛是事先为所谓身为领导人却对党放任不管的指责进行辩护。"是他们出卖了自己的总书记嘛，既不要求同我见面，也不召开中央全会。"他讲话中的"他们"究何所指，令人费解，因为政治局委员舍宁和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曾前往福罗斯给总书记带去"黑色标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认为当政变这辆车往下滑的时候，谁能阻止它？"我问戈尔巴乔夫。"两个人，"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卢基扬诺夫，他是议会主席，还有伊瓦什科，他是党内二号人物，我不在的时候代行我的职务。"我想起了不久前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战役，当时他在争取到设立副总书记一职后，不得不一反常态，在两个候选人之间当众作出选择：一个是毛遂自荐的叶戈尔·利加乔夫，一个是伊瓦什科。"耐人寻味的是，"我想道，"如果换成利加乔夫，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那是个八月的夜晚，被反共人士从福罗斯囚禁中解救出来的总书记，正在胡桃木房间对与他断绝往来的党进行政治清算，当然，如果那时再向他提出下面这个不愉快的问题，就有失分寸了："与戈尔巴乔夫

失去联系的苏共中央领导人所采取的观望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重复了他本人在今年一月份维尔纽斯事件高潮中的立场呢?”由于命运的作弄，时隔七个月之后，他本人置身于当初立陶宛那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将自己的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波长上，以便了解老广场[1]和最高苏维埃那“羔羊的沉默”将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收场。于是，维尔纽斯的回声以提醒道德上的绝对命令的方式在福罗斯回荡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又有哪一位政治家在什么时候遵循过这个绝对命令呢?

不过，如果说在胡桃木房间提维尔纽斯不合适的话，那么我们讨论了另外一件同他打算签署的声明有直接关系的话题:辞去总书记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最高职务的想法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战友们曾经建议他利用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这样完全可以不必再看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脸色行事。戈尔巴乔夫当时相信到年底前还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却没有估计到他的对手也挺会算计。

许多人以为他在四月全会上同意留任总书记是个错误，也许从此失去了在党内同志打断他的脊梁骨之前挣脱他们紧紧怀抱的最后机会。顺便说说，如果他当时辞职，就可以在威望方面赶上自己的主要对手叶利钦。

党的火车开足马力，向死岔线驶去，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地从机车驾驶室跳下来，仍在绝望地试图刹车或者让火车转到安全的路段，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和政治主动性，最终埋在脱轨列车的残骸之中。关于他卸去总书记职务的声明可以帮助他从残骸里爬出来……

……随着讨论的进行，戈尔巴乔夫对拟好的文稿做了几处改动，将最终的定稿又给我们读了一遍。结果，正是在苏联党内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多年来举行秘密会议的胡桃木房间里，人们首次听到最后一任党的总书记正式的退位诏。

当天出席这一简单仪式的人，谁也不曾想到将我们眼前克里姆林

---

① 老广场系苏共中央所在地。

宫发生的事情和末代俄国皇帝在普斯科夫会让站沙皇专车车厢上的退位相比拟。精力旺盛的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像精神堕落的尼古拉，况且我们这个代表团尽管由独特的失望"君主主义者"组成，却显然并不拥有舒利金[1]和古奇科夫[2]那样的权力。如果说我们与他们有何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天真地相信还可以通过此类象征性的举动确立对于自发的政治事态的控制。

……一个月之后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恰逢满脸通红的西班牙外交部长退出。他显然是心情激动，不知是由于刚刚结束的同苏联总统的会晤，还是由于他得到消息说返回马德里的行程推迟，原因是他的专机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跑道上与荷兰同僚的专机相撞受了轻伤。在 1991 年 9 月的这些日子里，首都飘起了"各国国旗"：这里正在举行政变之前很久即已定好的国际人权会议，西方的大政治家都抓紧这个机会，要亲眼看看经历八月梗塞之后苏醒过来的莫斯科。

除了这个顺理成章的动机而外，也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向重新履行总统职务的苏联总统表示西方各国首都的支持和声援。尤其热心的是那些政变期间曾经惊慌失措的领导人派出的使者，这些领导人当初要么采取观望态度，要么像密特朗那样表示愿意同"新的苏联当局"打交道。

而像布什这样没有对患难中的"亲爱的米哈伊尔"弃之不顾的人，则有理由认为对于俄罗斯民主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前来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贝克，从华盛顿带来了赠给戈尔巴乔夫的礼物：几乎相当于战争纪念物的美国国旗，据他说，这面国旗在"我们全都为您祈祷"那天飘扬在国会大厦上空（后来得知，美国人几乎在同一天还将一面几乎具有同样"英勇出身"的国旗赠给了叶利钦）。

---

① 瓦·维·舒利金（1894—1976）　俄国君主主义者，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右翼领袖之一。

② 亚·伊·古奇科夫（1862—1936）　俄国资本家。十月党领袖，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0 年起）。1917 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部长。

“你可知道，”我们寒暄之后戈尔巴乔夫说道，仿佛是在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贝克几乎要为当初不相信我的话道歉了，我曾经预先对他们讲了我国保守派进行反击的危险。”戈尔巴乔夫显然指的是当年五月他在伦敦所受到的冷遇。当时他为了论证自己关于支持改革的热烈呼吁，曾提到如果没有西方的财政保险，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会打击千百万人的福利并使他的对手活跃起来。然而，七国领导人已经越过戈尔巴乔夫看到叶利钦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家英国报纸称戈尔巴乔夫在七国峰会上的讲话是以共产主义的复辟来对西方搞讹诈。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以习惯的得克萨斯方式对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这个小伙子卖自己的商品一直卖得不错，可是我觉得这次他情绪不高。”

如今，在经历了几乎断送了民主改革的八月政变之后，贝克事后承认戈尔巴乔夫说得对，对他的政治战略给予应有的评价：“时至今日，我们才充分意识到您当初每天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有多大。您为了削弱国内保守力量所选定的策略也不难理解了，这种策略曾使西方感到担心，不过我们都看到它不无道理。”如今戈尔巴乔夫在转述起自己同美国国务卿的谈话来，已经仿佛是在重复一些论据，这些论据可以对自己在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进行解释以至开脱，从而可以哪怕稍微减轻对于未能防止政变的个人责任。

八月政变以其共同威胁的现实性和幸运的结局，为他与近几个月成了对手的昔日民主派同盟者讲和创造了条件。这样做的基础是两位总统——苏联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展示性的称兄道弟，他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停地向世界、全国和对方保证：准备从此携手并肩，为加强经历艰苦考验的民主而劳作不息。叶利钦看来尚未充分意识到展现在他面前的崭新前景，他公开重申愿意恢复制定新联盟条约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然而叶利钦却在俄罗斯议会当众羞辱了戈尔巴乔夫，许多人认为，这是苏联总统为重返克里姆林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为无能的政变分子在其两天冒险行为中给全国带来的恐惧付出的代价。

两位总统一度十分频繁地一起露面，甚至用两种声音一起接受了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采访，这开始有点类似罗曼诺夫家族的伊凡和彼得[①]，众所周知，尽管为期不长，伊凡和彼得却曾经共称沙皇。西方分析家对这种非同寻常的政治景观十分入迷，甚至预测到两位领导人访问纽约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共同(!)发表讲话的完全超现实主义的情景。然而莫斯科的看客却很清楚，又一次克里姆林宫联合组阁的结局不可能与300年前不同。余下的问题是弄清两人当中谁将成为新的彼得。

说来奇怪，在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内，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尽管大概是预先定好的。问题在于经历八月地震之后国家的政治景色是一片废墟。旧的苏联体制赖以支撑的台柱——党、克格勃和军队被政变搞得威信扫地，而且实际上已经毁于一旦。戈尔巴乔夫曾经为其设计和基础苦心经营几年的新议会制共和国大厦轰然坍塌，将多层的苏联议会埋在瓦砾堆中，因为议会主席和大部分议员均站到了政变分子一边。不久前在新奥加廖沃受孕的联盟国家组建以"流产"告终。政变引发了"早产"，大部分民族共和国匆匆通过独立宣言的结果，是一下子出现了几个主权国家，如今就连将其联合成为经过更新的联邦制结构，也更加困难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了考验之后刚刚喘过气来，就像西叙福斯[②]那样，双手抱住向山下滑去的联盟条约这块巨石，开始重新将巨石往山上推。滚滚而下的八月雪崩所到之处，留下宽阔的通道，他的道路上一度似乎障碍甚至比原来少了。曾经在中央全会上对他大张挞伐的党内官僚也好，气势汹汹、不再顺从的人民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也好，都不会再同他公开作对了。在对面的翼侧，激进民主派意

---

① 伊凡五世(1666—1696)　　俄国沙皇(1682年起)，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子。因疾病缠身，无法管理国事，遂与其弟彼得一世共称沙皇。1689年以前，由姐姐索菲娅代其执政，索菲娅被推翻后，由彼得一世执政。

② 据希腊神话，西叙福斯因侮辱诸神受到惩罚：神罚他永不停息地往山上推石头，刚刚推到山顶，石头又往下滚落，他再重新开始。

识到政变分子的主要靶子毕竟是戈尔巴乔夫，而非叶利钦，看来，激进民主派对于他勇敢地拒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最后通牒的行动准备给以应有的评价。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戈尔巴乔夫再无重大的政治对手，他再无斗争的对象，除了……他自己。

在新的环境使他失去原有的表白理由和保留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向全国展示真正的戈尔巴乔夫是个怎样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终于无需见风使舵、订立反常的战术联盟，无需看"右派"的脸色行事、以免他们折磨"左派"，无需稍稍减缓改造的速度以便等待跟不上他的国人。对他来说，这个新的考验几乎比福罗斯悲剧更难通过。

一个致力于渐进的改革的人，一个拒绝职业革命家的勇猛和轻率的坚定的"渐进论者"，如今却不得不在激进行为方面与昨天他还称之为极端主义分子的人一争高下。他是个中派政治家，搞妥协的大师，无与伦比的极端观点的调和者，他竟然能设法让观点截然相反的人相信他可以比他们自己更好地捍卫他们的观点，如今却面临无需找中间人的情况。

尽管激进行为和迅速变革的平民主义承诺不仅与他不久前的立场相抵触，而且不合天性，他却只得卷人新的环境所强加的陌生的游戏。全国上下都心情焦躁，很不耐烦，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地位，他必须去充任领导。此外，还得赶快：他的对手发动政变后的混乱状态留给他的时限眼看就要过完。前往南方并再次陷人消沉状态的叶利钦，日内即将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明白，他应该以理所当然地重新掌舵的人的身份，而不是叶利钦一班人选中的失事舰船船长的身份，去迎接叶利钦。

他那些不久前的西方挚友抱着无法掩饰的怀疑态度注视着苏联总统的这些努力。贝克回忆道，他在政变后不久即对自己的总统说："戈尔巴乔夫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除非他成为比叶利钦还大的民主派，这不大可能。"对此，审慎的布什说道：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家，完全一笔勾销尚为时过早。

他仿佛窃听到了大洋彼岸的这场争论，便试图在几周的时间内补

上自从倒霉的1990年秋天以来落后于叶利钦的距离，当初在两人签署《500天经济改革方案》基础上出现的短暂的政治联盟，实际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拆散的。看来，他准备在这几周内，将保存至今的所有大胆的想法、所有革命的创举和显得激进的术语从“暗兜”中一一掏出。

在克里姆林宫与银行家和企业家会晤时，戈尔巴乔夫保证说他准备千方百计支持私人的主动性并捍卫俄罗斯商业活动和生意人的利益，条件是他们“遵守刑法”。为了使人相信这不仅是说说而已，便宣布成立苏联总统属下的支持企业家活动委员会。还向农业企业家保证成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在同他们会晤时，对于将土地转为私人所有曾经持十分怀疑态度的戈尔巴乔夫，表明自己支持农村中包括私人农场在内的“一切有效经营形式”。他喜欢的说法是：“*别再犹豫不决了。应当积极地往前走。*”那些天他把这当成咒语一样一再地重复，似乎首先是冲着自己。

助手们之间暗中展开了一场竞赛：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举行最不同寻常的会晤，在他的帮助下，给曾经被否决或者被推迟到美好时期的独特想法“配上音”。“社会的要求”显而易见：总统应当自己去填满政治空间，尽管愈来愈多地是在虚拟的、想像的空间中行动，因为控制具体事变的杠杆愈来愈不受他的控制了。

恢复他的联盟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办法之一，是同国外伙伴打交道。他十分乐意地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外国来宾，经常与科尔、梅杰、冈萨雷斯进行电话交谈，这不仅使他可以占据报纸头版和电视屏幕，而且帮助他自己保持精神舒适和心理平衡：戈尔巴乔夫感到自己有事可做，因为随着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叶利钦的手中，就连工作日也愈来愈难以填满了。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些交谈过程中，他在试图即便不是解决迅速陷入危机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那也是使之得到缓解。

布什赶来救援，就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着世界气候的早年间那样，他给戈尔巴乔夫送来了美国关于核裁军的新建议，以便“征得同意”。这些建议也由美方同时送达叶利钦，不过“核按钮”暂时掌握在苏联总统手里，当然要等他回话。戈尔巴乔夫在回信中进一步发挥了

布什的主张，并当即建议在某个中立国举行又一次苏美峰会（有位助手倒是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亚速尔群岛，但具体会晤地址由美方考虑）。当然，这样的新"雷克雅未克会晤"或者"马耳他会晤"不仅可恢复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声望，而且有助于将叶利钦（即使在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单独通话时，叶利钦也若隐若现地在场）排挤到原来的共和国档次上。从全部情况来看，美国不愿被卷入八月后所确定的克里姆林宫力量平衡的"重新整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戈氏的建议不予理会。

戈尔巴乔夫大概自己也很清楚他与俄罗斯总统之间关系的彻底明朗化，只有在国内、在个人政治决斗中才能见分晓，无论布什、梅杰和密特朗怎样对他抱有好感、往往显然认为他比叶利钦强，都无法替他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爱莫能助。在同叶利钦的背靠背的争论中，他的主要弱点甚至并不在于一个成了八月政变的牺牲品、一个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在于合法性水平的不同。他的对手是令人信服地当选为实际存在的、尽管尚未彻底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呢，是他使那次选举成为可能，自己却始终下不了决心面对选民，他所领导的是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的联盟机构，那些沉迷于独立运动的共和国领导人公开使联盟机构的威信受到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重新搞出一个自己的国家并在其中赢得选举，才能"赶上"叶利钦。正是因此，在八月之后最初举行的一次与助手的商谈中，他谈到了必须加快举行总统选举。在不仅联盟条约条文、而且新国家的构想在共和国领袖之间都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这个想法显得不现实。此外，甚至遭到失败的政变给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带来的损失也十分严重，人们对于改革及其首倡者的厌倦情绪极其明显，他实际上绝无赢得选举的可能。几乎所有的助手都如是说，自然他们都尽量挑选最得体的说法，建议先借助国家之间的经济协定加强联盟的经济基础，然后再将政治上的联盟套到这个结构上。

助手们的推断颇具说服力，且符合逻辑：在欧洲，就是这样先成立共同市场，再成立欧洲联盟的。然而他们却没有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当

时所处的时间异常紧迫的窘境，戈尔巴乔夫感到脚下不是泥土，而是正在融化的大冰块。他甚至多半不是凭理智、而是凭本能感觉到，随着每个星期的逝去，共和国精英对于权力的胃口在增大，而生活在统一的联盟国家内的习惯以及对保存联盟的希望却在减弱。

新奥加廖沃进程恰似一辆发动机熄火的汽车，由于惯性仍在往前滑动，而且就那也仅仅因为道路是通往山下的。可以靠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政治脉冲来开动发动机，为此至少需要他的国务委员会同僚的同意。多半正是因此，戈尔巴乔夫才出乎许多人意料地突然改变了先后顺序，尽管经济协定已经可以签署，他却宣布说："我们要加快政治上的联盟。"

我不准备说当时是什么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影响：是纳扎尔巴耶夫关于在阿拉木图由总理一级（撇开联盟总统）签署经济合作条约的建议呢，还是希望抓住突然支持尽快建立政治上的联盟的叶利钦的话把儿要求兑现。无论如何，选择已经作出，指针已经拨好，克里姆林宫的列车正开足马力，沿着新奥加廖沃路线向前疾驰，这条路线曾一度将国家引向政变，如今则直奔别洛韦日密林。

戈尔巴乔夫决意加快联盟条约的签订，也就是统一国家的正式重建，其动机与导致不幸八月的原因截然相反，实质上却引出了同样的结果：自己的对手旨在推翻他的阴谋。如果说八月份反对他的，是因中央被毁掉的前景而勃然大怒的党内官僚、联盟国家的强力部门，那么十二月份正是重建中央机构的尝试引起了此次已是共和国官僚发动的叛乱……

被选定作为彻底摧毁联盟国家的城堡墙壁的工具的，是"俄罗斯攻城槌"（意大利历史学家乔治·博法语）。博法所谓的"攻城槌"，指的是完全具体的人物：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冲突，由个人的对立发展为不妥协的政治战争，最终对于昔日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对于被称之为"改革"的独一无二的历史试验的结局，都起了命中注定的作用。

1991年秋天，苏联及其千百万公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人的个人关系，两人同年出生，具有并行发展的党内仕途，一先一后、尽管是殊途同归地登上国家权力的巅峰，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和改革方案。

这是两个死对头，两个明显相反的禀性，俄罗斯民族性格两个各不相同、尽管是无法分开的实体，在二者之间不幸的会见、冲突和使全国精疲力竭的对抗中，有着许多历史上无法避免、不可思议地预先确定的东西。从在叶利钦未来的死敌——叶戈尔·利加乔夫的坚持下，将这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调到莫斯科开始（利加乔夫当时曾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两人在位于第一任苏联总统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列宁故居博物馆之间的胡桃木客厅里告别结束。

"九一年政变"使得差点成为政变牺牲品的他俩在一度日益疏远之后走到了一起。然而政治利益的矛盾，再加上性格不合以及个人的恶感，又使得二人在短暂的战术休战之后，马上开始分道扬镳。尽管看来由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逻辑本身，两位领导人的立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当时俄罗斯总统身边的人（布尔布利斯、波尔托拉宁、沙赫赖、科济列夫）在这几个月里，为使这场冲突具有尖锐和对抗的形式可说是竭尽了全力。"当你和鲍里斯[①]单独谈话时，他好像是个正常人，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跟他还谈得拢。可只要他走出房门，置身于自己的班底的影响之下，就完全判若两人了，"戈尔巴乔夫抱怨说。

叶利钦的班底正确地发现加快签署联盟条约方针包含这样的危险：苏联总统可以借助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这方面戈尔巴乔夫依然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将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安营扎寨的机会连同粉碎政变的胜利者桂冠一起剥夺掉。因此，注视着戈尔巴乔夫政治复苏过程的叶利钦班底，就自然要迫不及待地期盼着自己的领导人自南方归来（有人甚至试图带着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设法前往他在八月风暴之后"放松放松"的地方，诚然，结果是无功而返）。

---

① 指叶利钦。

在叶利钦身上唤起昔日的猜疑和不信任综合症，重新挑起政变之后同在克里姆林宫一个“洞穴”中的“两只熊”之间的冲突，可说是易如反掌：近年来他们的关系中积攒的可燃物实在太多了。

然而，尽管这两个历史人物行为所遵循的逻辑在今天看来是怎样地不可改变，人们却很难摆脱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关系所特有的非理性。自然，这个说法更适用于戈尔巴乔夫，他以追求逻辑和对于事件的系统分析的笛卡尔主义者而感到自豪，而不大适用于容易冲动、早就摆出一副不可预测的样子的叶利钦。每当提到这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提到必须对他的行为作出反应时，戈尔巴乔夫这台电脑就仿佛“意外停机”，或者闹毛病。

尽管如此，八月那次联盟国家舰船沉没之后到了一条舢板上的两位总统，曾一度朝着同一个方向划桨。然而，在刚刚粉刷过的苏联—俄罗斯统一体的正面，九月份就出现了旧日角逐的裂缝。起初表现为俄罗斯总统示威性举动（此乃亲信出的主意），看上去是故作姿态，公然寻衅。例如，政变后叶利钦只有一次曾突然中断拖长的“休假”，那是为了与纳扎尔巴耶夫一起对卡拉巴赫实行“点奇袭”，“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问题。与他在“市委书记时期”对莫斯科商店的突然“奔袭”一脉相承的这次示威性行动，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使俄罗斯当局的坚决果断与联盟中央的无能为力形成对照。叶利钦在电视摄像机前摆好姿势，一字一顿，就差用拉丁文了，讲了一句完全适用于罗马皇帝的话：“*只有伟大的活动家才能作出伟大的决定。*”讲完就回到索契，继续休假，卡拉巴赫问题的车子自然被抛在原地，一动不动。

此后不久，俄罗斯总统看来是希望在世界地图上标明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的出现，他宣布在俄罗斯领土上暂停核试验。这次谋士们显然是使他陷入困境：他们忽略了这次暂停戈尔巴乔夫 10 月 5 日即已宣布，而且事先征得了叶利钦的同意，已经在整个苏联境内生效了几个星期，自然俄罗斯也包括在内。

另外一件使俄罗斯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形成对照的事情，其潜在的爆炸危险要大得多。这里说的是刚刚显露出来的车臣问题。1991

年11月,焦哈尔·杜达耶夫宣布独立(在一年前俄罗斯领导人自己挑起的“主权大检阅”之后,这个宣言性的举动并无任何异常之处),叶利钦对此的回答是在车臣境内实行紧急状态,副总统鲁茨科伊将军则派出俄罗斯内务部队前去平定该共和国。军事冲突一触即发。

戈尔巴乔夫得知这些决定后,试图与叶利钦联系。一切都发生在当时还算节日的11月那几天,俄罗斯总统处于“超脱”状态,无法联系上。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只得紧急通过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哈斯布拉托夫采取行动,这又引起了叶利钦的过激反应,他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事务。“既然您批评了俄罗斯,那我们就得应战,”他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说道。事情已经闹到必须处理俄罗斯与苏联的冲突、而不是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的地步。需要苏联总统施展其全部外交艺术来安抚叶利钦。“一切都取决于身边的人给他塞的是哪盒磁带,”在这次几乎开不下去的会议后,戈尔巴乔夫伤心地说。

来自俄罗斯领导人的信号,无论有多么不妥当甚至可笑,本应使戈尔巴乔夫警觉起来,他本应意识到这是俄罗斯领导人内部和叶利钦脑子里逐渐成熟的总的战略意图——与中央分道扬镳、即瓦解联盟国家的方针的征兆。而戈尔巴乔夫在秋天的这些日子里,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策略技巧都用于将如今已是正式独立的各个共和国的总统召集到一起,试着通过理智的论据、经济合理性的逻辑、感情充沛的呼吁,甚至援引西方政治权威的意见,去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应当保持、或者说应当复苏受到致命伤害的苏联——尽管换了个名称,叫做主权国家联盟。

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说不可饶恕的、不如说是不肯相信悲惨结局已无法逆转的病人膏肓者所特有的轻信,他把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所取得的无足轻重的战术上的胜利当成了夺得决定性战略要地方面的进展,却并未意识到或者害怕承认他依然停留在地平线上。也许,正是因此他才如饥似渴地抓住叶利钦那些令人放心的话:直到11月之前,叶利钦始终积极参与关于未来联盟结构的讨论,每次会上均对条约文本提出修正意见,甚至还去制止那些

对于主权国家联盟这个佶屈聱牙的名称嗤之以鼻的怀疑论者，他说道："没关系，会习惯的。"

正因如此，11 月 14 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例会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如此轻松地看待终于达成的关于成立统一的"邦联制民主国家"的协议，他相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家瓦解的可怕前景也不存在了。他尽量不暴露出内心的狂喜之情，谦虚地退到一旁，让叶利钦有机会高声向记者们宣布："达成协议了，联盟还在！"不久即可弄清，俄罗斯皇帝的这句格言，其价值并不比他当初关于卡拉巴赫的名言高。

十二月。莫斯科。引退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有可能借助以国务委员会会议形式出现的人工呼吸，使八月政变中受挫的更新联盟的计划起死回生呢？他一口咬定说有这个可能，谁也不能禁止他相信这个。然而，为了做到起死回生（理论上，这样复活的奇迹还是可能的），不仅需要"另一个戈尔巴乔夫"，而且需要这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的许多其他成分：需要另外的共和国领袖，另一个叶利钦及其另外的班底，当然已对改革大感失望的居民的另一种意向，换言之，需要的是另一个国家。不过这样的国家也许就无需改革了。

主要的是，作为形式上仍然存在的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手中已不掌握任何管理国家的杠杆。"8 月以后，"戈尔巴乔夫说道，"我的阵地实际上极其薄弱。我的处境十分艰难。""滑稽可笑的政变"及其实际的牺牲者使党、克格勃和军队威信扫地，剥夺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所拥有的传统的权力手段。正是苏联大国赖以支撑的这三条"巨鲸"的正式领导人舍宁、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领导了政变，导致三条"巨鲸"政治上的死亡，将其变成阴谋的工具。卢基扬

诺夫束缚住了最高苏维埃的手脚,不让刚刚破壳而出的议会起到挽救国家(以及议会本身)的宪法捍卫者作用。为人绝对正派、却显然惊慌失措的C.阿列克谢耶夫所领导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其表现也好不了多少。

政变带来的这些毁灭性后果应由联盟国家支柱机构领导人负责,除此而外,各共和国又对他施展了诡计。在1991年6月当选总统之后,叶利钦声称俄罗斯停止把所收税款划拨作全联盟的预算收入,这显然是为其他地方领导人作出榜样。在制定新联邦条约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才恢复了条文中为保障联盟机关运作所必需的联邦税的概念。政变摧垮了这一本来就脆弱的结构,打掉了戈尔巴乔夫手中仅存的用以维护统一的联邦国家思想本身的最后一个工具——三月全民公决的结果。"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七月会议上的著名发言中悲观地预言,"我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由于他和他的同谋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国家真的瓦解了。

尽管如此,至11月,永不气馁的"不倒翁"戈尔巴乔夫几乎已使"死人"起死回生。同意签署经过修订的条约文本的共和国有九个,比政变前多,该文本顾及到了所有已获批准的庄严的独立宣言。"改革的美好时期"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又重返斯摩棱斯基广场,着手对于苏联外交政策严重受损的门面进行修理。就像第一次新奥加廖沃进程的乐观时期一样,可能签署条约的庄严仪式的日期又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又一次反戈尔巴乔夫阴谋的幽灵也如影随形,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因为八月之后共和国精英尝到了不受中央约束的自由的甜头,对他们说来,让联盟活着就等于自愿地给自己套上枷锁,把政变赐予的缰绳交还莫斯科。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愿意甚至关注保留联盟的联系、保留作为联盟联系象征的戈尔巴乔夫。惟独叶利钦及其班底另有自己的先后顺序。与其他共和国领袖不同,他主要不是同中央本身、而是同戈尔巴乔夫有着恩恩怨怨,且首先是个人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此外,只有他可以实际地觊觎联盟总统的职位,客观

上这就将两人之间的对抗变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总的说来，“平等者中之第一”的俄罗斯的精英与其他共和国截然不同，他们对“帝国中央”并无政治上的要求，还因为至少在那个阶段他们指望只要拿下克里姆林宫，即可亲自占据“帝国中央”的职位。1991年秋天，布尔布利斯在为叶利钦起草的“关于俄罗斯战略”报告中，警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唆使各共和国反对俄罗斯，他同时又安慰说：俄罗斯即使将联盟甩掉，也不会失去自己控制各共和国的机会，各共和国“无处可去”（实际上他是借用了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反正会来找我们，请求加入。

至11月，极为奇怪的情况（一个国家两个首脑）走到了岔路口。被政变推到前台的叶利钦如果不回到其他共和国首脑的队列、承认戈尔巴乔夫的领袖地位，那就得向他发出挑战。而时间十分紧迫。不仅是制定联盟条约的硬性日程表催促着叶利钦，随着八月凯旋的远去，叶利钦的英雄形象也日渐苍白，而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要同戈尔巴乔夫的治国才干和策略艺术一争高下，他感到吃力得多。敏感的外国人觉察到了在政治和个人的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而且从布什开始，根据自己的偏爱，纷纷同他们感到习惯的戈尔巴乔夫打开了交道，愈来愈明显地不把古里古怪而且经常从视野里消失、“不与人来往”的俄罗斯总统放在眼里。在叶利钦的班底看来，再拖延下去很危险：戈尔巴乔夫拥有赢得这一局的现实可能性。当叶利钦终于明白过来同联盟总统一刀两断在所难免、迫在眉睫时，关于推翻联盟总统以及解散联盟的问题就变成了实际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课题，就得选择只赢不输的策略。

叶利钦一上来，就拽下了本已在向前疾驰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紧急制动阀”，他未作过多解释，一口拒绝签署已经商定并准备分送各共和国的联盟条约草案。在11月25日的总统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对因这样的背信弃义受到伤害的戈尔巴乔夫和感到困惑不解、本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其他共和国首脑说，条约文本需要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各委员会“讨论讨论”。尽管如此，俄罗斯一班人尚未下决

心公开宣布自己新的战略目标。俄罗斯领导人觉得,充当瓦解统一国家的公开首倡者,而且是在大多数共和国根本没有渴望“自由”的情况下,似乎不大妥当。为了让排球运动员叶利钦能够彻底“扣死”没完没了地打来打去的球,突破所有的拦网,他需要有人在球网上方给他来上一个巧妙的传球。

这个角色由他的乌克兰同僚——未来的总统克拉夫丘克主动承担下来:好在 12 月 1 日乌克兰要举行总统选举和关于独立问题的全民公决。因此,按照叶利钦的班底的意见,国务委员会就未来联盟作出的任何原则性决定在此日期之前均须“挂起来”。仿佛是在一场已被收买的比赛中,“斯拉夫三国”[①]领导人事先就说好了结果,开始公开地拖延时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安慰大发雷霆的戈尔巴乔夫说,“*您干吗这么难受?再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星期之后,您瞧着吧,我们全都签字。*”国务委员会上开始的又一轮无止无休的争论,愈来愈像不久前的中央全会会议。

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冷静地将对联盟国家提供财政保障的龙头一一关掉,几乎每天都要宣布将又一批经济部门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俄罗斯上缴联盟预算的款项彻底终止了,此举不仅立即使得莫斯科官员陷入分文不名的境地,而且其他公职人员,从教师到军事将领,也未能幸免。原来,夺取银行不一定非得通过攻打冬宫(或者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只需发布命令就行:根据 11 月 28 日的一纸命令,70 多个部、国库,甚至国家银行都改归俄罗斯管辖。因为此举引起各共和国领导人群情激愤,叶利钦“暂时”将银行交了回去。

戈尔巴乔夫仿佛对此并无觉察,仍然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坚持不懈地将从四面八方把他遮盖起来的松软的政治“酸奶皮”搅起泡沫,希望早晚脚底下会出现坚实的根基。实际上他已经是臼里捣水,白费力气。总统频频接见外交家、银行家和记者,设法从西方“七国”那里搞

---

① 指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

到迟到的贷款,并怀着嫉意注视着电视和报刊对他的工作的报道,尽管实际上联盟国家的领土像搓纹革一样急剧收缩,已经只相当于他的办公室、接待室和与之相邻的胡桃木客厅加在一起的空间。曾在 1990 年宣布戈尔巴乔夫为“十年人物”的《时代》杂志,在发表戈尔巴乔夫答该刊记者问时,用《*没有国家的总统*》作为标题。日益孤立的、“俄罗斯攻城槌”准备攻破其大门的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日子里酷似福罗斯的别墅:如果说通往“高地”(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要冲是由他私人的、联盟的卫队把守的话,那么进出克里姆林宫均由俄罗斯的保安人员来监视了。

11 月的一个夜晚,戈尔巴乔夫夫妇决定纪念结婚 38 周年,也顺便丢开新奥加廖沃的“无聊乏味工作”,他们前往剧院观看《三月望日》[①]。丢开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次日,戈尔巴乔夫针对恺撒的阴谋、朋友的出卖以及战友的背叛谈及自己的感想时说,该剧“*简直就是取材于我们的生活*”。只是他和赖莎都以为剧中讲的是八月的经历,实际上却讲的是他们即将面临的十二月。

在自然是赞同独立的乌克兰全民公决之后,苏联悲剧急转直下,接近尾声。在投票的前夕甚至当天,戈尔巴乔夫希望对其结果施加影响,向乌克兰记者发表了长篇电视谈话,就中回忆了自己的俄罗斯-乌克兰祖先,劝说人们保住联盟。谈话在联盟电视上播出。可惜其效果并不比他当初夜间在福罗斯录制的告苏联公民书强。

在克拉夫丘克宣布乌克兰拒绝签署联盟条约之后,舒什克维奇加入到游戏中来。他的作用就是在一周之内赶紧为叶利钦铺上红地毯和……在别洛韦日密林中摆好宴席。至于其他的事情(关于解散苏联的文件草稿)则由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组成的“先遣小组”来操心。在动身前往明斯克参加“早已计划好”的俄白会晤之前,叶利钦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商量如何说服乌克兰加入联盟*”,因为克拉夫丘克答应要到明斯克来“*讲全民公决的情况*”。两位总统很快谈妥了如

---

① 古罗马历三月望日系恺撒被刺之日,今喻命中注定之日。

何“向乌克兰人施加压力”。两人都表示没有乌克兰的联盟是无法想像的。直到事过之后才弄明白，每个人给这个说法加进了自己的内容。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叶利钦顺便对记者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要是不成功，就只有考虑其他的方案了。”后来叶利钦在小范围内谈到这次会见时，还夸耀自己多么巧妙地麻痹了苏联总统的警惕性。

尽管戈尔巴乔夫写道，当他得知是谁在明斯克筹备会晤（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时，就“什么全明白了”，看来，正如在八月一样，他又一次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以为“三巨头”前往密林，不过是为了“放松放松”。至于密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12月8日晚上从舒什克维奇口中得知的，伙伴们让舒什克维奇以三个人的名义给戈尔巴乔夫去电话，通报说他和他的客人们在白俄罗斯确实是“什么都签署了”，不错，决不是预定要签署的东西。为了不让戈尔巴乔夫白白地拿着电话听筒，还告诉他说，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知道所作出的决定”，“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①]通知了布什总统”。叶利钦认为最好是给美国总统而不是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不仅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解释，还因为他觉得在“兴奋状态下”通过翻译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更顺手一些。后来，布尔布利斯在回答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瓦解苏联？”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如今我们的上面再没有任何人了。”

对于“别洛韦日三巨头”说来，真正狂喜的时刻来临了，不过那是在几天之后，当他们已经确信戈尔巴乔夫不想或者是无法对挑战作出适当的回应的时候。而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密林好汉们”确确实实地紧张了一通：选择会晤的地点时考虑到了波兰的边界近在咫尺，万一出现无法预见的麻烦，一架直升机就停在附近。后来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可以证明他们当时的神经有多么紧张。极度紧张的舒什克维奇12月9日早上给总统办公厅负责人Г.列文科打电话时，“几乎是在抽泣，”他开始解释说，他得好好睡上一觉，一切都得好好想想，因为一

① 指叶利钦。

切都来得太突然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不过要是他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认为有必要，我准备立即赶到莫斯科去。”次日上午的另外一次电话谈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我在场。叶利钦在回答他何时抵达克里姆林宫的问题时，反问道：“到那儿该不会把我抓起来吧？”戈尔巴乔夫甚至发蒙了：“你怎么，是发疯了？！”

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别洛韦日密林中那几位同桌用餐者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纯属多余。即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没有背叛自己的总统、没有背叛宪法，戈尔巴乔夫也依然不会动用军队和特种部队去逮捕阴谋分子。尽管正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从而没有履行捍卫联盟国家的宪法职责”，他后来受到许多人的猛烈批判，其中包括其他一些八月的政变分子——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他们自己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未下决心逮捕叶利钦，当时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戈尔巴乔夫是不可能出来阻止的。

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决不是因为他不掌握情报或者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手段：无需太多的兵力和手段。卢基扬诺夫断言（诚然当时他自己正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白俄罗斯肃反工作者”及时通报了苏联总统，而且准备“将这伙人当场抓住”。沙赫纳扎罗夫坚信：戈尔巴乔夫即使不是在当天夜间，那么随后几天还可以在军队中恢复一长制的，尽管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跑到阴谋分子那边去了。女儿伊琳娜也认为：“只要父亲愿意，他可以闹出很大的乱子来的。”然而，他在开始自己的改革时，最害怕的、希望避免的就是“流血的乱子”、激烈的政治冲突或者（千万别来）内战。至少，他不会为了保住权力冒这么大的风险。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尚未充分表现出来的好弄权势的本能，是他作为政治家或者起码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弱点，是在俄国的情况下特别不可饶恕的弱点。他大概会准备接受这个指控，难怪他不仅一再地说

① 指戈尔巴乔夫。

他认为权力不过是具体政治方案的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而且还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显然，对权力的如此“实用”的态度，就使得他在同诸如叶利钦之流把权力当成主要目的的人相比当中明显处于下风。看来，由于这个原因，结果他成了更适合改变和改造俄国、而不是治理俄国的人。在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学多年之后，俄国政治方面的伙伴让戈尔巴乔夫想起了小时候便领教过的无情的一课：在选举米沙[1]为共青团书记的会上，他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时有人在背后抽掉了米沙的椅子，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下…… 8 月份戈尔巴乔夫幸运地躲过了“赫鲁晓夫式的下场”，12 月份却碰个正着。

尽管有这一切沉痛的生活教训，他却没有自救，没有借助军队挽救国家，而是在 1991 年 12 月试图向他所造就的社会力量和宪法机构求助，希望他们像在八月那样支持他，搭救他。然而，在别洛韦日政变之后的日子里发现，抛弃他的不仅是国防部长，而且还有政治大军。近年来已“对戈尔巴乔夫感到厌倦”和对改革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确信在我国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幸福，甚至可能成为灾难。他们利用赐予的“选择自由”，准备将控制自己的权力交给向他们许的愿更多、可以更大声地发号施令的人。

戈尔巴乔夫谁也怨不着，只有怨自己和——俄国。最终，他自己也在 12 月 25 日的告别讲话中说道：“*我明白，开始一场如此规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冒着风险的事情。*”一位对于外国人不可知的“俄罗斯灵魂”进行研究的伟大研究家曾经说过，俄国人即使有了选择的机会，也决非总是选择自由，这是否预告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有风险、甚至注定要失败呢？“*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大宗教裁判官仿佛是在警告未来的俄罗斯改革家。“*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找到可以将这个不幸活物与*

---

① 指戈尔巴乔夫。

生俱来的自由天赋交给他的人……先让他们吃饱，再来要求他们品德高尚……”

可惜改革并没有让人们吃饱，尽管并未对此作出过正式的许诺，他们都认为自己受骗了，况且人人均被赐予的自由，仅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利用和支配。“我们改正了你的功绩并将其建立在奇迹、秘密和威信的基础之上。人们为他们重新被当作羊群一样领着而感到高兴，”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会跟着宗教裁判官重复道。然而即使当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无论听从其领袖的各共和国议会、感觉受到他欺负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失败政治家毫不留情的舆论、摆脱恐怖心理的好嘲弄的报刊，全都不准备支持他，他也没有缴械投降。他还得进行自己最后一次战斗，以便让他那如今已在所难免的引退像他在位时所做的一切一样，成为俄国政坛的新现象，并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

在这些日子里，许多人，甚至包括身边工作人员在内，都将他那尽管是事后的、使“三巨头”的别洛韦日交易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懈努力，当成了绝望的、尽管明明注定失败的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走的企图。“米·谢·①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中读到，“他的事情已经完成，早就应当引退，应当爱惜人格尊严，爱惜对于他在历史上的作为的尊重态度……每‘抓住’克里姆林宫一天，都会推迟历史将戈尔巴乔夫放在他那20世纪伟大人物位置上的时刻。”

是啊，有时就连亲近的人也无法做到彻底地相互理解。伊琳娜·戈尔巴乔娃毫无遗憾地指出：“我们这个家庭并未习惯于权力。”不是克里姆林宫拴住了戈尔巴乔夫，阻止他一走了之的也不是他手中正在被剥夺掉的权力，而是在不文明的国家中“一切都文明地进行”的愿望。“你们又不是江洋大盗，”戈尔巴乔夫试着向叶利钦解释，劝他让联盟议会可以作出关于自动解散的正式决定。

别洛韦日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他12月10日的声明中写道：“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这个

---

① 指戈尔巴乔夫。

问题只能在所有主权国家参与并顾及到各国人民的意愿的情况下，通过宪法的途径来解决。”

他建议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便使取消联盟条约和实际上修改三月全民公决结果具有合法的形式，并提出就联盟命运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主张。他的呼吁无人响应。曾受过中央组织部人员熏陶的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民选总统叶利钦坚定不移：“谁知道他们会怎样投票呢……”

戈尔巴乔夫致阿拉木图会晤参加者的信也未得到答复，阿拉木图会晤讨论了成立主权国家联合体的问题，据宣言记述，这个主权国家联合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之上的构成体”。这个状似带洞面包圈的联合体取代了中央，它那神秘莫测的表述的主要意义，就是不在克里姆林宫内保留任何哪怕象征性的协调机构。

整个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正是竭力甩掉联盟，而不是叶利钦用来为自己的别洛韦日即兴之作进行辩护的什么“千方百计使乌克兰留在联盟内”的愿望。在这点上谁也不会弄错。俄罗斯领导人刚到阿拉木图就表示：“我们希望他按部就班地下台。应当让国家的总统体面地退休。”各独立国家的元首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因为他作出了积极的巨大贡献”，起初他们打算集体确定这次退休的条件，不过后来又决定将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作为主要的猎获物，交给那个终归把联盟“搞垮”的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试图完全依法办事，也许还希望出现奇迹（因为穆斯林共和国“阿什哈巴德反峰会”建议召开由他主持的国务委员会，以刁难“斯拉夫野牛”①），他等待着来自阿拉木图的正式消息。至于辞职，他在别洛韦日密林会晤之前即已开始准备，辞职是 11 月 25 日国务委员会例行会议同样无果而终之后的事情。当时他曾经让切尔尼亚耶

① 指分别代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夫和雅科夫列夫分别独立起草他的辞职声明稿。“不过此事应守口如瓶”，因为他打算为联盟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阿拉木图会晤之后，他一粒子弹也不剩了。

关于自己准备辞职一事，他“预先”通报的第一个外国人是科尔，12 月 20 日，他对科尔说：“如果阿拉木图的与会者批准以目前提出的关于联合体的协定的文本，我就辞职，而且此事不会拖得太久。我已经说过，我不会继续参加国家解体的过程。这可是我开始的事情啊，因此我不想让过程脱离宪法的范围，不想让联合体成为骗人的东西。”

国际文传电讯刚刚从阿拉木图发布了“关于终止苏联存在”的快讯，密特朗就率先给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也许是希望纠正自己在八月的“失误”吧，当初他曾匆匆忙忙地与戈尔巴乔夫告别，政变的次日即谈到“新的苏联领导人”。他表现得特别殷勤，顺便说说，这表现出他对于苏联总统政治艺术的由衷赞叹。密特朗那通常是庄严沉着的嗓音这时显得激动。看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屈服于自己已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现实，他在尽量安慰密特朗：“我很平静，我正在设法让所发生的事情尽量少一点痛苦。”当法国总统问道：“既然有关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在先，怎么还会出这种事呢？”戈尔巴乔夫听到译员译出的这个问题，只是淡淡一笑：“您有权问我这都是些什么伙伴，他们居然抛掉商定的观点，简直像是拦路抢劫的大盗！”

这大概就是他惟一的一次让自己的感情得以宣泄的时刻，尽管只是在答话里。西方国家首脑经常给他打电话，以便弄清情况或者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在这些电话交谈中都不敢放松，而且不忘请求“帮助俄罗斯：如今改革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她和她的居民身上”。他并不抱怨，也不寻求同情。谈到自己的未来，他尽量打起精神：“我不会离开政坛。不会藏到密林里去。”他向布什保证说。“我不想告别，因为历史转折，甚至最急剧的历史转折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他让梅杰放心。他向所有人保证，他今后将“以任何身份”为那个“我们一起开始的宏大的、高尚的事业”尽心尽力。

即使在包围着他的新闻界人士面前，他也并未流露过多的情感。

在克里姆林宫与一大批编辑和电视记者会见时，他面对劈头盖脸的问题，只是耸耸肩膀："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我应当承认这个现实。我将尊重代表机构的选择，我只能这样。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评价、自己的观点。我已经向社会提出了各种方案，让人们去思考吧。你们都知道，戈尔巴乔夫能够作出妥协，但是有的东西是无法跨越的。"

对于是否会动用军队的问题，他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我认为利用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不仅不该受到支持，而且应当受到诅咒。军队应当用于它的直接使命。指望动用坦克的政治是达不到目的的。此路不通……"

谈到辞职，他把那当成已经解决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我已经竭尽所能。别人会上来，也许干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改变吓不着我。我们这个家并不是娇生惯养的。也许生活中的这个转折对我来说甚至很有必要。"末了，他突然来了一番豪言壮语，以免记者再提一些表示同情的问题。

顽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不吃这一套，他们单刀直入地问道："您不觉得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在贬低您吗?"他的回答是示威性的冷漠，显然是用来保护受到伤害的自尊心："这就只有凭他们的良心了。我必须超越情感!"

戈尔巴乔夫仿佛预感到了，在他辞职后的生活中还将不止一次地"超越情感"。诚然，他没有预料到那种必要性会说来就来……

在阿拉木图闪电式峰会之后，再将不可避免的事情拖延下去已无任何意义。叶利钦回来后，他们立即商定举行会谈，以便讨论"交出"克里姆林宫的条件。会谈于12月23日在胡桃木客厅举行，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和列位总统(雅科夫列夫也以独特的证人身份参与其中)在不慌不忙的男子汉谈话中，似乎不仅有可能讨论国家政权从苏联转到俄罗斯的技术程序——移交政治局档案、总统个人的所谓斯大林档案以及核密码，而且有可能将关系彻

底理清。商定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条件：总统退休金，别墅，汽车，卫队，拨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坐落在原先为各兄弟党积极分子开办的"列宁学校"内的房屋。（叶利钦对于这个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机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可能成为"反对派的巢穴"，戈尔巴乔夫向他保证说，自己并无这样的打算。）

讨论了俄罗斯总统的经济改革计划：1992 年头几个星期，布尔布利斯拼凑起来的盖达尔一班人打算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几乎全部放开价格。根据他们的保证，叶利钦指望经济在经历"市场疗法"的首次休克之后，到秋天就恢复元气，他要求"哪怕前半年别批评他"。戈尔巴乔夫保证说，"只要他将民主改革推向前进"，就予以支持。还商定 25 日在关于辞职的电视讲话之后，叶利钦立即到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交接核密码。次日，戈尔巴乔夫打通了布什的电话，在同他告别之后说道："您可以安安心心地和芭芭拉一起过圣诞节了。明天我就辞职。'核按钮'不会出任何问题。"他保证在新年之前把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给新主人腾出来。叶利钦并未提出异议，况且已是指日可待。

所有问题都已谈到，似乎除了历史上的未来地位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瓜分的了，两位总统在晚上 10 时许相互分手。据雅科夫列夫回忆说，喝得酩酊大醉的叶利钦过分坚强地、沿着空旷的克里姆林宫走廊仿佛是在操场上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打道回府。雅科夫列夫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平静地不失尊严地"经历了整个痛苦的移交钥匙过程之后，已经躺在办公室后面休息室的沙发上，两眼通红。"瞧见了吧，萨沙，这算什么，"戈尔巴乔夫说道。

次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将自己的工作班子召集起来，尽量安慰大家："谈话谈得不错"，新政权答应考虑大家的工作安置问题。"也就是安置我和你们，"总统不高兴地说了句玩笑话。"他削减了我的退休金和卫队，不过这毕竟无关紧要。"

两天之后，叶利钦在会见记者时介绍了自己对此次谈话的说法。他一口咬定说原苏联总统曾索要"数量荒唐的卫队、服务人员和几辆公务用车"，但是他"没有同意"并且建议对方"对所犯的过失及时忏

悔”，因为“他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至于自己退休的条件，叶利钦当时自然还不会考虑到）。俄罗斯总统当即要求没收并封存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档案。似乎他对这部分档案比对“斯大林档案”更感兴趣。

…… 12 月 25 日来临了。起初戈尔巴乔夫打算于 24 日发表辞职声明，“以免拖延”，不过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将这个悲剧性新闻推迟一日，“以免破坏”他在西方的千百万崇拜者的“圣诞之夜的节日气氛”。当离讲话还有两个钟头、他不知已是第几次重读自己的讲稿、进行一些修改时，情绪激动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家里打来电话说：原来，俄罗斯总统的总务部门人员已经跑来找她，催她“腾出公家的房屋”。尚未免职的总统将讲稿放到一边，骂了一句粗话，给暂时还属于自己卫队、力求在新上司面前得到赏识的卫队长去电话：“你真是胆大包天！”他咆哮道，“这房子还住着人呢。”听完了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他生气地把听筒一摔。然后，他怒气未消，转身对我说：“你知道吗，他们的这番表现，更使我坚信自己做得对。”这个让他本人也感到意外的念头，帮助他获得了当晚对他说来十分必要的内心平静……

下午七时整，他开始面对电视摄像机和全世界的电视屏幕发表演说，显然有些激动。不过刚刚讲完颇具说服力和意味深长的头几句话，他就平静下来了。讲话中既有痛苦，也有一个预言家的自豪，这位预言家尽管未能将自己的人民带往富饶乐土，却无疑是使他们摆脱了羁绊。如今，当新的领导人和领袖超越他并疏远他，带领着人群一往直前时，他突然成了不需要的人，他提到“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他人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上面。

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特德·科波尔牺牲了圣诞节假期，获准拍摄苏维埃政权的最后日子，当初苏维埃政权震撼世界的最初十天曾经受到约翰·里德的热情歌颂。科波尔在离开莫斯科时说道，在他看来，苏联总统的辞职堪称政治尊严和个人尊严的榜样。看来，正是一个人（他甚至在给别人让位时也迫使他们赶上自己）的这种尊严，使叶利钦

失去了理智。叶利钦自食其言,不肯去向下台总统要"核按钮",却建议对方将核密码给他送到中立地带来。

戈尔巴乔夫当天本来压力就够大的了,我觉得他甚至如释重负般地回避了同俄罗斯胜利者的再次见面,派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将'核按钮'送至叶利钦的办公室。他还听说,已经下令务必在他的讲话结束之前将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圆屋顶上降下来。最后的告别晚宴,他是在胡桃木客厅里举行的,入席者只有他那"小圈子"的五名成员,那些一切都多亏了他的新俄罗斯或者如今已是独立的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来电话表示感谢,或是哪怕表示支持或者同情。

第二天就不得不"超越情感"了。新克里姆林宫行政当局的总务管理人员限他三日之内搬出政府别墅。尽管光家里的书就得装几卡车,却对他说别指望公家派车。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以便好好地整理整理文件,并按照事先的承诺接受几个记者的访谈,他显得闷闷不乐:"别墅那边往外赶,还不给汽车。"当我问他自我感觉如何时,他这样答道。伊琳娜讲述说:别墅管理员通知父亲限多长时间迁出时,父亲大发雷霆,开始大声抱怨:"这太丢人了。"还威胁要给叶利钦去电话:"同他可是什么都谈得好好的啊!"妈妈则说:"跟谁也别打电话,什么也不用去求他们。我和伊琳娜就是累死,也要把东西捆好搬走。有人会帮我们的。"帮助他们搬到分给下台总统的旧别墅的,是卫队的小伙子,也就是在福罗斯留下来同他们坚持到底的那些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办公厅主任开着自己的汽车,跑遍空荡荡的国家别墅,东一张床、西一张桌子或者橱柜地搜罗,以便为戈尔巴乔夫一家的"旧"新居多少搞点家具。

12 月 26 日,戈尔巴乔夫的新闻处在总统官邸为记者们安排的告别宴会,已是由基金会出资了。戈尔巴乔夫打算次日上午去自己的办公室完成文件整理工作,并同日本电视记者举行事先定好的会见。清

晨，他的助手接到叶利钦接待室打来的电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已经占用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

"占用"办公室自然不是为了工作（办公室还得进行长时间的修理和重新设计），它具有纯象征的性质，看上去倒像是一场登陆战役。12 月 27 日清晨，以总统本人为首，由西拉耶夫、布尔布利斯和哈斯布拉托夫陪同的先遣队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接待室门口。将他们领进办公室的，是一位值班秘书，他在自己党的机关生活中可谓见多识广。也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曾经提到过的那一位："他可是至今有时候还习惯性地管我叫列昂尼德·伊里奇[2]呢。"

在办公室里，叶利钦以胜利者的姿态环顾四周，要求将上锁的抽屉全都打开，神色忧郁地等待着值班秘书同房管员联系、派人去取钥匙。抽屉里空空如也。桌上也是一无所有。新主人突然问秘书道："文具上哪儿去了？"值班秘书没有听懂。"我说的是大理石墨水缸。"为什么他提起了文具呢？要么是认为总统的桌上应当放有某种威严的东西，要么是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公家的财产往家拿了。秘书解释说，前任是不用墨水的：每天值班秘书给他桌上放几支不同颜色的钢笔。看来叶利钦对于详细的解释感到厌倦了，便用手势将秘书轰了出去。

对这个梦寐以求的"高地"的占领，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庆祝一番。他们并未在原先矗立着苏联国旗的角落里竖起俄罗斯国旗，况且谁也没有想到将国旗随手带上。拿来了另外的东西——一瓶威士忌。四个男人黎明时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就像在门洞里一样，打开威士忌酒，以自己的方式为从今完全成为他们领地的地方"作上记号"。写有"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铜牌早在他们到达之前就有人殷勤地从墙上取掉了。上面镌刻的字样已经属于过去，因而铜牌本身从 12 月 25 日晚上起仅仅具有历史的、

① 指叶利钦。

② 指勃列日涅夫。

大概也具有博物馆的价值。是谁想到了将其“私有化”的，至今不得而知。那个未及改变名称和自己本质的国家，在只差 5 天就满 69 周岁的时候土崩瓦解了。而那个曾经许诺和希望借助他所开始的改革延长国家寿命的人，在其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总统的职位上呆了一年半多一点。

…… 1991 年，这个共产主义体制和苏维埃国家生死攸关的年份，即将成为过去。戈尔巴乔夫履行其历史使命的期限也即将结束。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按高标准要求，尽管经历了政治震动和个人的震动，他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当然，在 12 月的那些日子里，他并不这么认为。两次政变——八月政变和十二月政变，恰似接踵而至的两次地震或者心脏病发作，看来是无情地毁掉了顽强地复兴中的、正在改革的人道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构。实际上两次政变另有其历史的功绩：它们击碎了戈尔巴乔夫打算在其中继续培育新的俄国社会的胚胎的试管管壁。这些完全损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双重管壁，已经无法顶住戈尔巴乔夫决定释放的内部力量往外冲的压力。然而这些管壁又是戈尔巴乔夫计划中他无法突破或者不愿突破的框框。

戈尔巴乔夫早在改革初期就曾经说过苏联社会孕育着深刻的变化，此话不假。他承担起了历史助产士的角色（只有伟大的政治家方可担此重任），并且批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按照他们的教导，只有暴力方可成为历史的接生婆。

第十一章　在自己雕像的阴影里

冷却下来的反应堆

在当代，政治家们感到幸运的是，他们的生命甚至不会因他们当政的国家的完结而中断。“不，整个的我不会死！”——1991年1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告别戈尔巴乔夫时，仿佛以他的名义在第一版写下了这样的话。同他告别得早了点儿。无论是那些不知是幡然悔悟还是恍然大悟，纷纷跑过来向他大表同情、为他叹息不已的人，还是那些在艰难的日子里不敢给他去电话的人，都告别得早了点儿。他挺了下来，并且经历了比逐出克里姆林宫、剥夺权力更难以忍受的事情：原先战友的背叛，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如今掌握在别人手中）陷于衰败甚至（更糟的是）受到诋毁。

尽管新的当权者对他的态度特别不友好，尽管电话突然全都不响了，尽管按照苏联官僚的传统下台总统处于“不可接触者”的地位，他却并未出国（科尔和布什力邀他去“休息”，密特朗则向他提供法兰西

学院教授的荣誉职位），并未退出政坛。他曾一度闭口不言。并非因为他曾经答应一段时间内不批评叶利钦。在精疲力竭的六年半之后他不仅需要歇一口气，而且需要搞清改革究竟怎么了，他的国家究竟怎么了，需要弄清为什么虽然他的希望是有所好转，结果却适的其反。他伤心地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

此外，还应当确定什么是后改革时期，作为改革进程的首倡者，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对后改革时期负有责任。"要是父亲说：行了，我金盆洗手了，只要我安全，哪怕洪水滔天，随你们怎么干都可以，"伊琳娜说，"那么我们只要靠他出书和演讲的报酬，就可以到塞舌尔的什么地方，安安稳稳地过上很不错的日子。可对他来说这根本不可能。"

戈尔巴乔夫证实说："我并不因为欺骗了什么人而有负罪感。凡是我想的，我总是公开讲出来，我不断向人们呼吁，即使冲我吹口哨喝倒彩，公开责骂我，也是如此。有些人甚至说，他们对说教者戈尔巴乔夫感到厌烦了。不过，至于说到我对于计划的夭折，对于它今天的后果负有责任，至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

至于他对俄罗斯历史上叶利钦阶段的态度，这里人之常情当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委屈情绪，感觉到对他的不公正。然而作为这个档次的政治家，不可仅仅在带感情色彩的评价上如此"奢侈"。倒是与此相反：对他说来，最简单的办法是对于同"鲍里斯[①]及其一班人"的关系不屑一顾：只需"超越情感"，向自己暗示："既然他们有如此的表现，那就说明我做得对。"

至于对新政治方针的总评价，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尽管八月政变和十二月政变两者都具有反宪法的性质，戈尔巴乔夫毕竟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尽管"别洛韦日阴谋"毁掉了对他说来如此宝贵的联盟，却不能将叶利钦所宣布和执行的政策说成对改革的否定，说成复辟，至少在刚开始时不能这么说。而且，那样一来，就无异于他亲手抹杀几乎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主要成果，即：他的改革在苏联（俄罗斯）社会中

---

① 指叶利钦。

引起的变革不可逆转。因为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并未将自己的命运同职务联系起来,而是将其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因而"戈尔巴乔夫时代"不会随着他的引退而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既然如此,那么在他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改革命运的继续。

最初,戈尔巴乔夫对于经济改革所抱的并不简单明确的态度,也可这样来解释:俄罗斯领导人决意采取的步骤,即一举跨越深渊进入市场,是他自己当初没有勇气去做的。尽管戈尔巴乔夫不能支持盖达尔"休克疗法"的激进主义,他同激进改革派的分歧却主要在策略方面,而不是在所采取措施的方向上面。因此,他几乎同1991年8月一样,又一度成了俄罗斯总统立场和行为的人质,客观上对他更有利的是叶利钦政策的成功,而不是失败。

然而,至1992年5月,戈尔巴乔夫即已对于所选择的改革模式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作出评价,确信他因苏联解体而感到的担心均不幸而言中,于是他打破沉默,咄咄逼人地宣称新的俄罗斯一班人"走错方向"。"沙皇鲍里斯"[①]的迅速滑向独裁、刚愎自用和包括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礼,使得戈尔巴乔夫愈来愈容易摆脱同"民主派阵营"(与其说是政治的、倒不如说是怀旧的)联系,摆脱"欠俄罗斯总统情"的感觉,俄罗斯总统1991年8月曾经从政治上、也许还从肉体上解救了他。

叶利钦对于这位"开口讲话"的反对者的第一反应,是经典的州委式的:不顾已载入文件的对下台总统物质生活保障的条件,按照"上面的"命令收回供戈尔巴乔夫使用的吉尔牌汽车,裁减卫队,解雇了别墅的园丁。1993年,叶利钦对于另一位下台总统几乎也来了个如法炮制,这次是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令他大发雷霆的是尼克松像在1991年春天一样,到莫斯科后不仅同在位的总统见面,而且同反对派代表鲁茨科伊见了面,一气之下,便取消了给美国客人提供的专车。尼克松显然是忘记了,当年充当鲁茨科伊这个角色的是他叶利钦

① 指叶利钦。

自己。

秋天，针对不肯闭上嘴巴的戈尔巴乔夫的惩罚措施进一步升级：征收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地铁机场站的大楼。协助这一行动的，是在10月13日拂晓时分封锁了大楼中央入口的一大批武装警察和特种警察部队，还有与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的安皮洛夫“劳动俄罗斯”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纠察队员。纠察队员冲着前来上班的戈尔巴乔夫高喊：“叛徒！”警察不让他进入已经“征收”的大楼，聚集在大门口的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则十分开心地对下台总统进行采访，戈尔巴乔夫站在台阶上回答记者提问，完全自然地进入了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卫士的角色。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对他的态度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回答起来毫无通常的外交辞令，他的用词是：“糟糕透顶。”最终冲突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得到解决：基金会在被没收的大楼里可以租上几间房，供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同事以及存放他（最宝贵的）档案之用。

尽管戈尔巴乔夫可以毫无顾忌地评价叶利钦的政治方针了，该方针愈来愈明显地意味着“迅速离开民主成果、离开改革，缩小民主，逐渐滑向专制和独裁”，政治却并非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正如他向叶利钦所承诺的，他并不打算将基金会变成“反对派的巢穴”。他对国内事件进行评论，要么是当他接受记者采访，要么是当他认为不能保持沉默：实际上他是民主派政治家阵营中惟一谴责1993年武装攻打俄罗斯议会的人……退休后的头几年，他把时间大多都用于回忆录写作和早就一再往后推迟的阅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段时间他自己“感觉到变得聪明了”。

同家庭谈话一样，思考基本上依然是围绕着那些让人感到心情压抑的改革问题：是否应当开始改革，如果应当，那么是否应当这样来进行。过去，在政治战役和辩论的激烈时刻，在环境和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对所出现的问题立刻作出即兴的回答，根据直觉，考虑到听众的性质，等等。如今他回顾往事时，即使做不到不带成见、那至少也可以保持头脑冷静，既思考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他的

某些决定和行为究竟有多少道理。

多数人都是如此，身为政治家更不用说：第一个自然而然的欲望，就是为过去的生活和所做出的事情找到辩解的理由。不过，假如一切都归结为下台政治家的这个可以解释的弱点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成其为“十年人物”甚至世纪人物了。戈尔巴乔夫并不羞于承认已经犯下的严重的甚至致命的错误，而且不怕冒被人看成顽固落后分子的风险，重申他忠于自己最初的意图和信念，他的对手以及政治上的看风使舵者早已将这些意图和信念宣布为谬误。

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选择”就是如此，很可能是不合时宜，他自福罗斯归来后马上就提到了它。当时就连他的许多真诚崇拜者都认为这是失言，是此人政治上的疏忽，他尽管说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实际上却并未充分地感觉到这些变化。只有洞察力强的反共分子K. 柳巴尔斯基以几近赞叹的口吻（出自习惯于尊重非正统意见者之口的这种赞叹是有道理的）在《新时代》杂志的文章中说道：“在八月革命之后马上重复关于忠于社会主义选择和必须继续改革苏共的话语，在帝国实际上已经崩溃之后仍然呼吁保住联盟的，只能是信念十分坚定的人。”

在关于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和内容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准备大大地突破传统的共产主义诠释及其俄国体现的框框，至于说到联盟，他不愧为这个被遗忘的国家的总统兼船长，即使在崩溃之后，也依然站在他的船长桥楼上。中断了的平稳改革进程和解散联盟，这就是他对于克里姆林宫新“住户”的主要意见，他不肯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继承人。“目前的政策使国家脱离了渐进式变革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就是将联盟国家当成给国家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主要原因加以摧毁，”戈尔巴乔夫在1995年4月“自由言论俱乐部”纪念改革开始十周年座谈会上说道。看来，他至今还会这么说。

正如坚信联盟的神圣性一样，他对于改革之预先注定、不可逆转同样坚信不疑，他坚信假如不是他，那么另外一个担任他的职务的人也不得不开始改革。“改革并不是1985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

血来潮的发明,"他至今还坚持认为,"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什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他超脱地谈到自己,不知是把自己当成历史人物、还是当成广场上的雕像,又加了一句:"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

他认为已经令人信服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开始这一切?"接着又谈到普通人向他提出的、对自己说来较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原来是相信您的。可我们的生活还不如当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除了"他们不让把事情进行到底"和"他们把联盟瓦解了"这两个显而易见的说法之外,戈尔巴乔夫再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况且,那些起初让一个政权、后来又让另一个政权害得再也不相信政治家的人,那些最终毕竟不是凭言词、而是凭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来衡量一切的人,难道用言词就可以说服他们吗?

实际上,答案是有的。尽管对于这个答案,有些人不理解,有些人感到不愉快,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想听,戈尔巴乔夫却不必因为这个答案而感到难为情,因为答案中包含了他历史的辩白,他在历史法庭上的辩护词,他在作出判决前的最后陈述。承担他的辩护人角色的,是赖莎之后他最亲近的人——女儿伊琳娜,伊琳娜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说这事儿没成,那事儿没成。全都成了。主要是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了。他们获得了选择的权利。至于他们如何运用这个选择的自由,他们应当怎么办和谁应当控制他们,如今已经是他们的事情,而不是他的事情了。总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后持续了六年。我们大家却在另一个政权下生活了十来年,这个政权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可依然是什么事儿都怪罪戈尔巴乔夫!"

当然,一切都没有这么简单。这点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感觉到了,否则他就不会说对于改革的后果、为"重新来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负

有“道义上的责任”，也不会在1996年参加总统竞选了。因为一个感到自己对国内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的政治家，除了给人们提供自己的服务，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总书记和“总囚犯”

戈尔巴乔夫在决定参加竞选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他同基金会的助手们商量，又对首都的代表、更多是对边远地区代表的意见进行了试探，这些人都建议他开始“游说”。实际上，看来他自己已经作出了决定，因为莫斯科所有出谋划策的人都劝他放弃，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而就一个已经属于历史的人的政治声誉而言，不好的结果是最糟糕不过的。”就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不赞成他参加竞选，她很清楚结果十分可疑的竞选会带来怎样新的过度负担，而且很替丈夫担心。此外，她在1991年8月之后，不仅身体上没有从所经历的震撼中平静下来，而且也没有从背叛这一更加严重的心理震撼中恢复过来。“福罗斯之后甚至在我们家中，”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一切都仿佛变得灰暗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让步了，她明白，对于一个自认为“负有政治使命”的人来说，回避竞选就无异于牺牲某种重要的东西。

的确，对戈尔巴乔夫说来，参加竞选的心理原因也许比他所援引的政治理由更重要，这些理由是：不让取消选举，阻止叶利钦宣布首轮获胜，促使创建有影响的“第三势力”，它可避免许多选民被迫在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作出选择。为了形成这样一个有费多罗夫、亚夫林斯基、列别德参加的选举联盟，戈尔巴乔夫准备表示无意在联盟中谋求领导地位。“第三势力”一事并未成功。“有的人让叶利钦收买了，有的人是无法克制个人的野心，”他归纳说。

促使他本人参加这次竞选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种陈述已见、一吐

为快、向曾经相信他的人解释清楚的愿望。在竞选的几个月内他跑遍了二十多个俄罗斯地区，先后到过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西伯利亚。向人们解释清楚往往是艰难的。当然，也曾有过政治对手——共产党人的挑衅行为，他们试图打断他的演讲，一字一句地高呼口号和咒语来阻止他讲话，伏尔加格勒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克里姆林宫皱起了眉头，暗示地方当局不得帮助前总统竞选。结果，不仅受到州委传统熏陶的省长们，还有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才开始闻名全国的真正的民主派，如“因为太忙”不敢同他见面的、素有北方首都之称的圣彼得堡的市长索布恰克，他们表面上毕恭毕敬，却在最后一刻禁止使用已经安排用于戈尔巴乔夫与选民见面的会场，并下令当地媒体对他的演说不予报道。

在西伯利亚，事情发展到了危险的边缘：戈尔巴乔夫通过人声嘈杂、情绪敌对的会场走向讲台，有个家伙假装伸手去与他握手，突然抢在贴身警卫的前面，猛地以职业的动作用手掌侧面使劲儿砸戈尔巴乔夫的后脑勺和颅骨底部。袭击者被抓起来并迅速带出场外，戈尔巴乔夫则忍住头晕和疼痛，仍然坚持登上讲台，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说。然而，对他说来最艰苦的考验，并不是公开的对手或者暗地派来的挑衅者的敌对情绪，而是与普通人的交流，他为普通人开始了一切，但他们已对他感到失望。

戈尔巴乔夫在开始这次足迹遍及俄罗斯城乡各地的堂吉诃德之旅时，他还想像不到呈现在他面前的已是另外一个国家：工厂停工，田园荒芜，无业居民失去了工作和希望。国家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了在难忘的那个战后年头从斯塔夫罗波尔到莫斯科沿途所见到的情景，区别在于此次崩溃并不是极其残酷的战争的结果，而是改革带来的后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因此同他会见时，就不是把他作为只需在人们面前打开例行许诺的扇子的又一个问鼎克宫的候选人，而是把他当成应对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往往开始得十分艰难的会见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因为会见往往是以掌声和对成功的祝愿而告终。“当我们在竞选中抵达阿尔泰时，”戈尔巴乔夫回忆道，

“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到集市。那里的女人都把她围起来，高声喊道：‘你们倒好啊，你们都出国了，我们还在这儿。’赖莎对她们说：‘瞧你们说的，我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都没有走，我们的孩子孙女也没有走。’”到伊万哥罗德就该他倒霉了：“我穿过人群，就像是穿过夹道鞭笞的兵阵一样。整整20分钟都在叫嚷，侮辱，高喊‘犹大’、‘叛徒’，不让我开口。我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嘛。你们要干什么？把我钉十字架？钉吧！我这不自己送上门来了。’会场安静下来。然后讲了三个小时。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要让叶利钦上台执政？这点他们无法饶恕。最后是以鼓掌欢呼结束。当然，这次活动和我的其他活动一样，报纸一字不提。”

“李尔总统”①在其破败王国内的政治漂泊中，一度曾由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及其形影不离的伴侣、妻子玛丽亚·罗赞诺娃陪同。后斯大林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首席囚犯”西尼亚夫斯基不顾伏尔加格勒的酷热，执拗地跟着原总书记登上马拉霍夫小丘，仿佛登上耶稣蒙难处各各他，这时传来反戈尔巴乔夫游行参加者怀有敌意的喊叫声，那些人在附近打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标语牌。西尼亚夫斯基夫妇回到巴黎（西尼亚夫斯基从勃列日涅夫劳改营出来后定居于此）后，双双来到俄罗斯大使馆，投戈尔巴乔夫的票。“他没有机会，这并不重要，”后来西尼亚夫斯基来到我们所在的尼科洛大街庆祝选举日时说道，“我投他的票是为了自己，因为戈尔巴乔夫是惟一为国家做了点事情的人。”

根据官方的数字，西尼亚夫斯基和罗赞洛娃以及其他与他们想法

---

① 指下台的戈尔巴乔夫。典出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年事已高的李尔王欲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口蜜腹剑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赢其宠信而瓜分国土，小女儿考狄利娅却因不愿阿谀奉承而一无所得。前来求婚的法兰西国王慧眼识人，娶考狄利娅为皇后。李尔王离位，大女儿和二女儿居然不给父亲栖身之地，当年的国王只好流落到荒郊野外……考狄利娅率队攻入，父女团圆。但战事不利，考狄利娅战死，李尔王守着心爱的小女儿的尸体悲痛地死去。

大体相同的人，在 1996 年总统选举中所投的票占总票数的 0.51%。即便如戈尔巴乔夫所认为的那样实际票数至少是这个数字的十倍，总数依然无法令他感到快慰。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指望按照他自己规定的游戏规则回到积极的政治中来。如果说 1991 年为了摆脱他，起初是联盟的官僚、后来是共和国的官僚不得不抛掉政治，违犯法律的话，那么时隔五年之后，已经是被新的当权者的改革搞得精疲力竭的居民，以民主表达意见的方式弃绝前总统了，他们认为他的改革正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当然，俄罗斯社会之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执政者，正是归功于他，在这点上他可以找到安慰，因此，正如在刻骨铭心的八月的日子里一样，当俄罗斯社会表明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抵御政变时，它就有权表明不再需要他。相当残酷的是(历史上往往就有这样的情况)，因他而摆脱了原体制的看管(尽管也许如今又置身于另一个体制的看管之下)的国家，十分肯定地表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公布选举结果之后的第二天，曾陪同他前往全国各地的顾问B.库瓦尔金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向他表示祝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个自由人了。您能为国家做的事情已经做到。您已还清所有的债务，如今除了对自己的家庭而外，对谁也不欠什么了。"当然，这一令人振作、尽管是完全诚挚的祝贺也是一个安慰：戈尔巴乔夫尽管并未希望在选举中胜出，毕竟指望得到另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使他和他的拥护者无需再去看不可靠的、变化无常的盟友的眼色，回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派别甚至政党的想法上来。竞选表明，先前那个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多半是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因笨拙改革的后果分成几个不均匀的部分、受到总的无信心危机袭击的社会来说，"新的"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尚未到来。他在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等到重新听到他的话的那一天呢？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在戈尔巴乔夫 70 岁生日那天为他举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庆祝会，对许多人说来不仅是向他表示祝贺，而且也是表示迟到的忏悔的由头，这使得他对此抱有希望。

“他身上可以看到她的自大狂”

凡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人，甚至很难设想他在对于“不知恩图报”的国家和不跟他走的选民有怨气的情况下会同政治告别，“遁入家庭”。库瓦尔金本人则正确地将他描绘为“使命的人”，对他说来主要的是完成自己的事业，尽量去做“作为戈尔巴乔夫”可以为俄国和世界做的事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认为自己负有政治使命。这是他的十字架，他在走自己的路。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未必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毕竟要指出，他的劳动的某些而且十分重要的结果是完全可以辨认出来的。）

“回到家庭”的说法对他说来已失去意义，因为自从大学期间结婚之后，他就从未离开过家庭。他同“扎哈尔卡”（他发现赖莎与魏涅济安诺夫一幅画中名为扎哈尔卡的姑娘很相像，就这么叫她）的联盟对于两人来说就成为一种核心，所有其他构成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质子都在不同的轨道上围绕着这个核心旋转。这个联盟不仅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而且又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联盟。难怪戈尔巴乔夫将妻子戏称为“家庭党支部书记”。虽说她像对自己其他许多职责一样负责地对待党员资格（直至 1991 年 8 月之前，她每月亲自前往区委交纳党费），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个戏言却大可不必太当真。“她决不会通过党委把丈夫拽住的，”他说道。当着大家，“扎哈尔卡”总是特别正式地以本名和父名称呼丈夫，家里他有两个绰号：“米”和“小刺猬”。青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还给赖莎封了个“外交部长”的头衔，那是他在出差中定期给她写信时的事情，他委托她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外交关系。赖莎对于自己的这个职责也极其认真，她满腔热忱地守卫着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边界，防止任何来自外部的入侵。如果考虑到丈夫的公众角色和飞黄腾达，这也并非易事，因为戈尔巴乔夫的

大部分时间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自己为数甚多的职务：属于他所领导的党，同事、外国来宾、首先是属于自己的意图，他像个蓄电池，在家中，从赖莎那里充电。他身边有些人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夫妇几乎从来不邀请人到自己家做客（每年元月 2 日例行的政治局委员偕夫人在总书记别墅聚会算是例外）。大部分人以为这是赖莎的影响，是她使朋友们不再与他往来。实际上呢，尤其是在斯塔夫罗波尔时期，夫妇二人所过的决非离群索居的生活，在莫斯科也依然同某些人全家聚会。他们在首都的熟人圈子，很大程度上是由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强加的，仅仅因为这个，同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工作的继续。当戈尔巴乔夫想暂时丢开工作或者是“电池失效”时，他便给赖莎去个电话——这样的电话每天有五六个。不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斯塔夫罗波尔刚到莫斯科时，也曾试图与“克宫夫人们”搞好关系，然而在一天晚上同夫人们玩了几个小时的朴烈费兰斯[①]之后，很快便对党内的上流生活失去热情。

无须将戈尔巴乔夫夫妇之间的关系描绘为田园牧歌式的图画，他们那和谐得令人惊异的联盟不需要这个。他们也有发生口角的时候，据女儿讲，有时在雷打不动的晚间散步之后两人没有一起回来，分别从两道门回到家中。“不过他们不可能长期不和”：就一切问题进行交流的需要已深深植入两人的禀性。赖莎对于那项已经成为丈夫和她的毕生事业的计划的参与性（这让官僚们觉得很不习惯）也好，戈尔巴乔夫对她的尊重态度也好，在许多人看来都是违反了当局不成文的规定，都是某种弱点。总统卫队长梅德韦杰夫以偶然的、却是正确的说法表达了克里姆林宫侍者对于国家元首行为的看法，他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上可以看到她的自大狂。”

赖莎本人感觉到了自己周围的应力场，却无法理解此类挑衅性的举动（“我对他们做了什么，干吗要折磨我？”），对于必须改变他们家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以迎合庸人的反应和官僚的礼节这点也觉得无法

① 朴烈费兰斯系一种三人玩的纸牌游戏。

容忍。在她看来，视察受到地震严重毁坏的斯皮塔克、视察切尔诺贝利地区或者前往摩尔曼斯克看望北海舰队官兵，这决不是想在电视上再次炫耀自己，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的渴望：渴望不仅在礼仪活动中、而且在可能惟独需要她那无可替代的支持的一切场合出现在丈夫的身边。正是在去了受到辐射污染的白俄罗斯各地区之后，她带头发起捐款活动（夫妇二人以他们的稿费所得和诺贝尔奖金向基金会捐助了10万美元），帮助国际援助儿童白血病患者基金会重整旗鼓。

戈尔巴乔夫尽其所能地保护赖莎，不让她受到因其所扮演的许多人感到不习惯的角色而引起的成见和敌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常任译员帕维尔·帕拉先科回忆道："听到嚼舌根的人老提她的名字，他就很难受。"但只要他"正在履行"自己的正式职责，他为妻子辩护的可能性就极其有限。只有在退休之后，已经不受礼仪的束缚，他俩这才不把摄影记者当回事儿，手挽着手，爱去哪儿去哪儿。直到决定命运的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才得以正告欺负赖莎的人和叶利钦，这些人抓住所谓她使用了"金信用卡"的流言不放，正告所有怀疑她拿国家的钱请巴黎时装设计师为自己缝制衣服或是在文化基金会领工资的人。整个执政期间，他始终未能满足他的"扎哈尔卡"梦寐以求的"多会儿在海边置上一处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小屋"的愿望。他们那紧张的、许多人看来值得羡慕的全部生活，不仅是被迫地可以公开的，而且还是公家的、在卫队的隔绝（甚至是看管）下和在不属于他们的地界上的生活。在戈尔巴乔夫夫妇最后一次顺访法国期间，密特朗总统的夫人达尼埃尔发现赖莎喜欢他们家庭养蜂园的蜂蜜，想送给她一个蜂箱，赖莎只是苦笑地拍着手说："可我们没处搁它。我不知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讲过多少次了：'咱们不要国家别墅，自己搞一片地吧！'"

说来离奇，正是使戈尔巴乔夫卸去国务重担的退休，才让赖莎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突如其来的命中注定的疾病，就是她曾力求不让切尔诺贝利的儿童罹患的那种疾病，"像八月雪一样"（戈尔巴乔夫语）从天而降。急性白血病的确是在短短

几天之内就将一个显得年轻、妩媚动人、精力旺盛的女人变成了卧床不起的重症病人。她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开始以天计算了。多亏外国朋友的帮助（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不肯向他提供帮助），他们派来了供紧急运送用的具有专门设备的飞机，戈尔巴乔夫将妻子送往联邦德国明斯特市专门从事白血病治疗和骨髓移植的科研实习医院。他和伊琳娜几乎两个月寸步不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该病急性期赖莎受到剧烈疼痛的折磨，需每隔 10—15 分钟给她翻身一次）。在病房里，戈尔巴乔夫一直同她讲话，甚至在她陷入昏迷和失去知觉时也不停止：医生保证说她能听见戈尔巴乔夫说话。他说，她“奉命活下去”，他给“扎哈尔卡”唱她喜欢的抒情歌曲，回忆起上大学时她因患咽峡炎住院时，他在宿舍里给她烧土豆并送到病房去的情景。当然还保证说，他们肯定会有一处“海边上的小屋”。她假装相信他和医生所说的话，每次都不忘详细地问他，当天白外套里面罩的是什么衣服。

戈尔巴乔夫夫妇意外遭到的不幸，在全世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同情浪潮。明斯特的医院，戈尔巴乔夫下榻的宾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房间，全都堆满了鲜花，堆满了表示支持和希望康复的电报、信件：它们分别来自各国国家元首，来自俄国各个角落和世界各国成千上万个普通公民。

那些天几个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生的女孩全都起名叫“赖莎”。有人寄来“经过检验的”具有神奇作用的草药，有人介绍了自己幸福的或者痛苦的经历。数十万俄国人，其中肯定许多人不久前还并不掩饰对于苏联“第一夫人”的恶感，他们全都把戈尔巴乔夫一家的不幸当做自己的不幸。正如《共同报》以辛酸的嘲讽笔调所写的那样：“原来我们当初都是爱她的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难得有缓解的时候，当给她念来信时，她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应当死去，才对得起他们的爱吗?!”

戈尔巴乔夫，伊琳娜，还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直至最后一分钟都始终相信的奇迹，并未出现。9 月 20 日，她去世了。俄国版的《爱情故事》同美国的电影音乐剧不同，成了现实的人间悲剧。“小刺猬米”失

去了自己的“扎哈尔卡”……政治的辐射像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堆一样，使来自阿尔泰韦谢洛戈尔斯克的乐观愉快的女孩深受其害。伊琳娜认为：“就为了公开地与自己丈夫站到一起，妈妈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米哈伊尔和赖莎的大学时代朋友鲁道夫·科尔恰诺夫说得更明确：“赖莎是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害死的。”

在1999年“黑色九月”的几个星期之后，我来到戈尔巴乔夫家中，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了我认为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根本不会说的话：“安德烈，这一生都过去了……”说完忧伤地微微一笑……

代尾声 戈尔巴乔夫机遇

一生都过去了吗？然而是哪个一生呢，戈尔巴乔夫可是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改革期间仿佛活了几世人啊。引退前两天，他同意与美国人科波尔谈谈“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科波尔在克里姆林宫拍摄苏维埃国家的濒死状态以及该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的辞职过程。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此刻您的心里是什么感受?*”这个问题时，讲述了一则关于沙皇的寓言，说的是沙皇召见众贤哲，以便为他简要地阐明生活的要义。众贤哲思考了很久，直至沙皇临终前才来到他的身边，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出生，受难，然后死去。*”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对其最短暂的一生——苏联总统的一生进行总结。他还有其他的一生：共青团领袖、边疆区“党的行政长官”、中央书记、总书记等的一生。下一个一生——前总统的后苏联生活也已来临。如果将这些一生全都收集到一起，相互叠加，就成了整整一组套娃。只有全都加到一起，才能构成一个人的形象，这个人依然是个具体的活人，却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事件——变成20世纪最不寻常的政治现象之一。

众贤哲并未提到一个人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得到机遇：在生命簿上签字、留下自己足迹的权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利用这个机遇。

然而，用什么来量度政治家留下的足迹呢？在戈尔巴乔夫这个世袭的耕地者之后，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垄沟。可以对他的所作所为作一个简单明确的评价吗？因为他的形象和个性一样，即使在他的战友中间至今也依然是争论和互相矛盾的诠释的话题。

在几乎同时问世的几本书中，一位作者——原中央书记、起初积极支持总书记的法林说道，所谓的改革并未成为“*革命之中的革命*”，倒是成了“*即兴之作之中的即兴之作*”，退化成了“*冒险行为*”，另一位作者——切尔尼亚耶夫则将改革称之为空前的历史性突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泱泱大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掘墓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家。对于那些坚信不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那些认为不需要具有人的面貌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人，他依然在发出挑战。有人认为他的过错在于理想主义，在于对“民主的自动作用”的浪漫主义信念，有人则认为他是在一个习惯于沙皇和暴君的国家里不够强硬果断的领导人。谁更接近真理呢？

人们用以衡量遁入历史的政治家的价值观念标尺各不相同。曾经有人问原法国部长和戴高乐的新闻秘书A.佩列费特，退休将军戴高乐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得到的回答是：“*榜样。*”在他看来，这个字眼集中表达了杰出的法国和世界领导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伟大。

另一位总统密特朗的顾问、现任法国外交部长维德林认为，评价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只能有一个标准：结果。甚至政治家的道德也不是凭意图、而是凭结果来衡量：“*在道义上做个负责的人。*”

而从未给任何人当过助手的柳巴尔斯基夸奖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意图，而恰恰是因为结果：“*首先我想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自由所做的比任何别的人都多，我们未能充分地利用自由，这不仅仅是他的过错。至于戈尔巴乔夫并不都是自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带有相反的意图，这并不重要，归根结底，历史上只对结果作出评价，而他超过了所有的期望。*”

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输了。作为救世主，他将载入史册，救世主的命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然而，另一位杰出的欧洲政治家密特朗出乎意料地向作为政治家而不是救世主的戈尔巴乔夫施以援手。他认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将政治家的活动说成失败，但仅仅是在“*从有限的角度——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评价的情况下。这是相当重要的细微之处。

其实，正是怀有敬意地反观历史，竭力迎合历史、猜测历史，而不是希望扭转历史，才使得戈尔巴乔夫变成一个更具西方特点、传统的俄国“沙皇”特点较少的政治家。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比在他那不习惯于这样的执政者的本国更易得到理解（也更被看重）的原因之一。西方政治学家将他同自己的政治家进行比较，这也绝非偶然。其中之一又是同戴高乐作比较。美国人赛蒙·瑟法蒂认为这两位相去甚远的国务活动家的相似之处，正是倾听历史、最有效地利用历史所赋予的一切机会的本事。他将二人称为“*历史的机会主义者*”，最后说道：“*正是这种品质将国务活动家变成了真正的革命者。*”

至于这是否确实是偷听到的“历史的沙沙声”和戈尔巴乔夫谦虚地感到自豪的“*牵着它的衣襟*”的本事，抑或如他的另一位原助手彼特拉科夫所认为的事后将“*预谋的功劳*”归于自己的能力，毕竟对于历史本身说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遇到自己最初的选择那未能预见到的如此后果时也不发抖、不后退的大无畏精神。

我们还是让当事人自己来说说吧：“*我问心无愧，*”1991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在其最后一次正式视察国内各地期间飞往伊尔库茨克的夜航飞机上，对记者们说道，“*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以文明的方式使国家变得有人情味儿的尝试。*”这是不是他间接地公开承认一个打算以民主方式对俄国进行改革的人的过错、触目惊心的幼稚呢？

至于戈尔巴乔夫，尽管他自然宁愿人们把他称作革命者而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从一开始就不曾打算在旧国家的地方创建新世界和新国家，而只是想帮助国家发生变化。他选择民主说教和公开性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主要工具，违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忠告，拒绝“秘密和威望”（况且他知道俄国执政者的“威望”往往仅仅通过非同寻常的暴行

来赢得)，在许多人眼中他变成了“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担当不起肩上的重担。

表面上看来也许就是如此：因为戈尔巴乔夫 1985 年以“无所不能”开始，1991 年则以事实上的一无所能结束。那些抨击他将到手的权力“挥霍一空”的人并未考虑到，他最初的威势是以党的独裁为支撑的职务上的无限权势，而摧毁党的独裁正是他的意图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历史继承性，按照奥威尔的说法，这种专制制度，即‘权力作为目的本身’乃是极权主义国家存在的惟一意义，”《文学报》在改革开始十周年之际这样写道，“他的失败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的不成功是他的立场。”至今许多人都责备他自愿拱手交出政权，却不向军队求助。好吧，那样一来，我们今天就不会遗憾地回忆起他的下台，我们就会遗憾地回忆起戈尔巴乔夫在 1991 年 12 月变成了叶利钦。谢天谢地，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权力并未像沙子或水一样从戈尔巴乔夫的手中溜走：他开始有意识地将其分发给那些无缘接近权力的人，就像耶稣分发面饼一样，指望让所有的人都吃饱。然而他并不是上帝，他未能让所有的人都吃饱，何况这里说的是权力。此外，发生了免费分发时常常发生的问题：有的人相互厮打，有的人什么也没得着。结果是不满者的人数有增无减，就连过去支持过他的人也不愿意饶恕他，不仅为改革的令人失望的结果，而且也为改革的意图本身。

还有一点也饶不了戈尔巴乔夫，那就是他曾经尝试连同“任意挥霍的”权力一起将个人责任也还给每个人，恢复人对于国家的主权。不仅是通过粉碎布尔什维克专制制度、免除迄今为止那个“对一切负责”的党的责任，而且也通过他的举止和为人。伟大的改革家身上并无任何庄严高傲之处。“原来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那些习惯于把执政者看成依靠自己对“秘密和权威”的权力的领袖的人，以责备的口吻谈到他。因为狡诈的“他和我们一样”的说法，使得“我们”无法为我们没有“他”那样的行为举止而自圆其说。这是不可饶恕的。

此外，戈尔巴乔夫还火上浇油：“我不想将任何英雄业绩归于自己

……我依然是我自己，我是作为具有良心和道德的人去行事的。我从来没有自己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感觉。我至今并未对他们感到失望。尽管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很糟糕的。他们忍受着旁人不会去忍受的事情。也许，这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在起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辩护词令人想起西班牙作家卡洛斯·罗萨的中篇小说《烈士谷》中假想的、绰号为“心上人”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德七世与弗兰西斯科·戈雅[①]的对话：

“戈雅：可以使全体人民入迷的幻想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您手里掌握着这样的机会。您的命运是如此地不同寻常，您可以给我们带来和平、和睦、工作，主要的是给我们带来希望。而您会留下仇恨、狂热、贫穷和绝望。如果上帝不干预，那在您之后就会发生国内战争。您甚至都不能很有信心地说，谁将继承王位。

费尔迪南德七世：您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拯救自己的人民，仅仅是因为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我本人与他们血肉相连呢？人民和我如同可以将人烧伤的火与热。我们一起点燃，一起燃烧。”

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在克里姆林宫宫庭之内不得高声说出大家都“闭口不谈”的话，可是他决定打破荒唐游戏的规则，他不顾后果地向世界通报说“我们是在同冒险的社会主义模式打交道”，就是说，国王一丝不挂。然而，在一个并非完全正常的国家里执政者是个具有正常的道德反省和清醒理智感觉的人，这对于业已形成的体制、最终对于国家说来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天真男孩，还是一知半解者，政界的“多余的人”，新的皮却林或者恰茨基[②]？

---

① 戈雅(1746—1828)　西班牙画家、版画家。

② 皮却林系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恰茨基是格里鲍耶陀夫剧本《聪明误》中的主人公，均属于俄国文学中典型的“多余的人”形象。

那么，这位“优柔寡断”、随时随地总是“晚半拍”的领导人，怎么会设法先于许多人以自己的原则和计划进入新的、即将来临的世纪，进入未来的呢？因为米哈伊尔和赖莎实际上在并未离开自己国家的情况下，正是移居到了未来的、照他们的观点是“可能的”俄国。他怎么能在历史机遇赋予他的不过几年时间内，更多是以言语而不是行动、多半是以榜样（我们想起了戴高乐）而不是强迫，造成如此的震动，造成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如此深刻的转折呢，以至不仅那些因柏林墙和“邪恶帝国”的崩溃对他心存感激的西方政治家，而且还有不久前的俄国民意测验，都开始称戈尔巴乔夫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

再说，如果不是预言家、政治思想家或者未来学家，而是按职务应当脚踏实地的国务活动家，将自己更多地同未来而不是同现在联系在一起，这到底好不好呢？他所领导的国家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他曾建议他们赶上自己。这个问题不仅留待他，而且也留待他们作出回答……

从改革开始至今，已是15年有余，眼下许多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也许没有以最好的方式利用戈尔巴乔夫所碰到的历史机遇的，不仅是他本人（原因上面已经讲到），而且还有当时的苏联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再说整个世界也没有充分地利用“戈尔巴乔夫机遇”。

党内官僚宁可选择八月政变的自杀行动，也不肯按照他的建议与社会“瓜分”权力。民族精英拒绝了他的“温和联盟”的模式，争先恐后地投入“主权”、自然资源和军事潜力的再瓜分，他们认定每个人在国际市场上以“私商”的身份出售这些东西，比以“联盟集体农庄”庄员的身份出售获利更多。与戈尔巴乔夫断绝往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里分成了相差悬殊的两个部分：一部分人轻松地回到了“强势政权”侍者的习惯地位，一部分人则分别回到各自的厨房，在那里继续着自己那暂时还允许、却已是“不通过电话机”的谈话。

西方也忽视了“戈尔巴乔夫机遇”，结果换来的是像“冷战时期”

那样冷峻、令人生疑的俄国伙伴，这个俄国对于西方的威胁已经不再是导弹（尽管导弹也算），而是向全球扩散的脏钱、有毒废料和“野蛮东方”的习俗。

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将俄国历史轨道转到与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国合作的方向的、浪漫主义的和气势宏伟的计划，实质上是再现了在他之前的大部分俄国改革家的理想和希望。他与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预计国家及其政治家准备跟他走渐进之路而不是革命之路。他的打算落空了。

“戈尔巴乔夫来得太早了，”他说道，仿佛在避开作为独立政治人物的他自己。就什么而言太早了呢？是就受到倾听和理解而言呢，还是就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言？然而有谁为他、除他之外又有谁会为此事先种上果树呢？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既未期待身后得到承认，也未期待得到历史的“平反”。他认为，“反正总有一天肯定会开始某种事情”。关于自己，他说道：“当时要背十字架。即使到了忍受不了的时候……”谁也不能责备他没有试图利用自己的机遇，以便“开始某种事情”。

……当他还是苏联总统时，同事们在对他60寿辰表示祝贺的信中，曾经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我正在竭尽全力，绝对是竭尽全力，我打算这样干到底。如果结局圆满，那么对我的一切攻击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等待着我的是失败，那么即使有十名天使发誓说我做得对，也于事无补。”不过，假设他期待着天使的袒护，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成其为自己经常无端提起的戈尔巴乔夫了。

在自己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15年之后，“始终不安分”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再次成为党的领袖——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主席。尽管他此次当选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地界的大理石墓室中、而是在莫斯科郊外国营农场教学中心的普通楼房里进行的，原苏联总统并不显得灰心丧气。“人们已经开始懂得是怎么回事儿了。因此到下一次选举，光靠金钱决定不了一切，”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说道。

难怪“政治囚犯”西尼亚夫斯基看透了不久前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执政者有一个类似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灵。而且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批评新的克里姆林宫当局时，也说自己是受到另外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俄国两名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中的另一位)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鼓舞。“铁幕”倒塌之后，原先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几个国家都当上了总统。俄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戈尔巴乔夫并不因此感到难为情：他认为即便在过去担任正式职务时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为了“成为戈尔巴乔夫”，职务并不需要。只需“干自己的事情”就行。

而他为自己所选择的事情则是非同小可：改变俄国并使之与世界和谐一致。这里一个人和一生显然不够。“伟大的戈尔比”作为改革家、一个改变世界并迫使人们发生变化的人，尤其是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世之后，注定要孤独。也好，归根到底，这是长跑运动员的常态。

……在一次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快要结束时，我控制不住，提出了一个我早就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您的敌人、对手、那些背叛您和阻碍您将所设想的事情进行到底的人，您原谅吗？*”

他微笑着说：“*一般来说，原谅应当是上帝的事情。我可是已经几乎……*”他作了个停顿，末了说道：“*几乎是那儿的人了。*”他抬起眼睛，不知是朝着天花板，还是朝着天空……